

历史备忘录系

主编 李辉

许觉民 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林昭，不再被遗忘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昭,不再被遗忘/许觉民编

(历史备忘书系/李辉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54-1976-3

I. 林...

II. 许...

III. 林昭-纪念文集

N.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4849 号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校对:常薇琪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E-mail:cjlap@public.wh.bh.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核工业中南三〇九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5 插页:2

版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8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54-1976-3/K·77

定价:12.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林昭遺像 1958年



1951年的林昭



1951年林昭参加土改时摄



1951年，林昭（中）参加土改时摄



1955年摄于北京大学



1955年摄于北京天坛回音壁前，
前排右第一人为林昭



1959年的林昭，摄于北京北海公园



林昭与北大同学在北大校园内摄
右一为林昭，右二为张玲



林昭之墓

“历史备忘录系”总序

李 辉

世纪之交，百年回眸，千禧之年……人人争说世纪末，或者展望新世纪，似乎都陶醉在诸如此类的词语之中了，仿佛只是到了如此关节，日月起落季节转换才开始真正具备历史意义；仿佛过去以往的岁月流逝，仅仅是为了这一时刻的引人注目，为了在无限延伸的时间行程中凸现出孤傲身影。

其实历史每时每刻都以同样的步履行走着，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那一天，也不过是同样的日起日落。不错，世纪转换时候的欢呼雀跃当然会令人有一种别样感受，但假如仅仅是将之纳入流行或畅销之类的炒作，或者虚张声势，不切实际能来一次新的千年、新的百年的展望，用一些空洞美妙的词句来掩饰思想的苍白，那么，还不如扎扎实实地站在现实土壤上，在斑斓缤纷、扑朔迷离的背景中，冷静、客观地把历史细细梳理。惟此，展望或者梦想，才不至于过于空泛。过于一厢情愿。

梳理历史诚然需要宏观描述和概念的归纳，但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大量的历史事实、细节之上，不然就会失之于片面、

笼统、甚至虚假。时间从来不会有季节省略，历史当然也不应该有空白。用更多的历史档案和回忆来填充被人们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空白，这便是主编这套“历史备忘录系”的初衷。在此之前，我曾先后参与策划“火凤凰文库”和主编“沧桑文丛”，现在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支持，再次推出“历史备忘录系”，这是以往两套丛书的自然延伸，同时又有所侧重与发展。曾有过主编“民间档案”和“个人记忆”两套丛书的想法，如今“历史备忘录系”合二为一，试图为行将过去的世纪，留下多层次、多角度、具有民间性、最具个人化的史实记录。

“历史备忘录系”将更强调“民间档案”的特点，作者来自各界各地，名气无大小之分，大事件中的小人物，小人物的命运，或悲、或喜、悲喜交替，生活的原生态，常常更能反映出历史的本相，因之各种作者均有择选的必要与价值。形式也可多种多样，日记、信件、交代、采访实录、回忆录，视内容而定。而且我相信，原本不起眼的个人记录，愈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历史是一团混沌，是错综复杂的有机构成，那么，唯有方方面面上下下各式各样的记录，才有可能接近其原貌，才有可能在繁多细节中凸现出冰山下一角。

希望读者能够接受和喜欢这样一套并不取巧也不花哨的书系，也欢迎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成为本书系的作者。

1999年10月26日，北京

前 言

林昭死于“四人帮”暴力之下，她的死，是正义不灭的象征，是宣示一种思想力的高扬。她面临着种种选择，可以不死，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活下去的途径，可是她选择了死，为了真理，她抱着“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之志以赴死。她用死向后人投下了一句气贯长虹的誓言：“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她用死向后人证明她是正确的。她用死使残害者用尽方法要她屈服的一切阴谋伎俩归于泡影！

林昭有一股刚气，说准确一点，一副硬骨头。只要她认定是对的，便从不回头，不论是她的亲属或好友向她陈说利害，哪怕说得唇敝舌焦，她毅然不为动，她只是义无反顾地咬定自己的观点之不可更改。这不是别的，正是林昭最光辉的尊严处，人们纪念她，正是从她那里懂得了人的尊严的神圣准则。

林昭的案件是平反了，尽管不是说得那么彻底，但毕竟将她的冤情得以大白于天下。至于林昭案情的始末，却并不为世人所共知，自去年后，几个报刊陆续刊登了不少关于她的案情的文章，才渐渐地透露了事情的真相。然而还很不够。许多林昭生前的朋友、同学、亲属等陆续写了纪念她的文章，并且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很有必要把有关的文章集中起来编一个纪念文集，这

不仅是为了告慰死者于地下,更是使生者由此增添一些对世情的悟性。

我已不记得哪位诗人说过,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林昭之未死,证实于她活在一切实有正义感与良知的人们心中。至于那些残害林昭的刽子手,据说他们还很得意地活着,天网恢恢,让他们在林昭的光芒面前发抖吧!

1999年10月

历史备忘录系

主 编 李 辉

长江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历史备忘书系”总序 李 辉

前言..... 许觉民(1)

林昭之死..... 陈伟斯(1)

玫瑰花 林斤澜(10)

林昭的光芒 方 方(13)

悼许宪民、林昭..... 冯英子(16)

应共冤魂语 投书寄灵岩 陈伟斯(18)

追求与幻灭 陈 箴(29)

我的姐姐林昭(上) 彭令范(39)

我的姐姐林昭(下) 彭令范(48)

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张元勋(64)

幽明心语..... 张 玲(120)

一个不屈的英魂..... 刘发清(126)

回首往事..... 羊华荣(135)

血溅罗裙直道存..... 孙文铄(149)

文弱女子性刚烈..... 马 嘶(163)

沙雕美食 遥祭英灵	倪竞雄(170)
北大魂——林昭	甘 粹(191)
读《我的姐姐林昭》	林斤澜(195)
故乡人民的骄傲	黄 政(198)
林昭三十一年祭	陆震华(204)
化作春风意更长	李虹岗(217)
不可多得的才女——林昭	顾 廉(225)
流芳千古	李茂章(229)
今日红花发	钱惕明 史 洪 叶 强 王 润(235)
林昭二三事	陈叔方(239)
林昭的欣慰和遗憾	羊华荣(243)
林昭,您在哪里!	谷 天(246)
无声的歌	沈如英(248)
悼林昭七律二首	朱怀真(251)
献给林昭	邓荫柯(253)
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活着走进会场	郭 煌(259)
 附录:林昭追悼会纪实	 (265)

林 昭 之 死

陈伟斯

1968年“五·一”清晨，茂名南路林昭家中，笼罩着一片不祥的预兆。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来了，他们毫无表情地打量着这个家庭，冷冷地说：“林昭已被处决，付五分‘子弹费’”！林昭的妹妹默默地付了款，年迈的母亲起初还不理解，当她意识到时，已经昏厥了过去。

这个排除在“红色”世界之外的“黑”家庭，从此进入了漫漫长夜：林昭的父亲在苏州自杀了；母亲也因而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几年后忧愤而死……林昭的名字从此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消失了。虽然在粉碎“四人帮”三年多后，有关方面重新判决，宣告了林昭无罪，但在判决书中，林昭只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形象。直到今天林、江反革命集团宣判时，在新华社记者穆青、郭超人、陆拂为所写的一篇题为《历史的审判》的报道中，人们才知道林昭是为反对现代迷信而献出生命的勇敢女性。据熟悉林昭的同志介绍，在这篇报道发表前不久，林昭生前的老师和同学已在北京为她举行了悼念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列、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聂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罗青、中国社会

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许觉民、北大教授杨晦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十多位同志出席了悼念会。林昭在狱中用血写的一首诗,也在会后广为流传:“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他日红花发,认取血痕斑。媿学嫣红花,从知渲染难。”林昭的预见,今天终于实现了。自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千枝万株的红花,不是已经到处竞发!

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成长

林昭在狱中时,曾写了一首《家祭》,怀念卅七年前在“四一二”事变中牺牲的她的舅父许金元同志(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卅七年的血迹谁复记忆?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的牢狱里哭您!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我知道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事实也确实是这样,林昭是踏着烈士的血迹走向革命的。

林昭出生在苏州。她的母亲许宪民早年追随胞兄参加革命,曾是一次罢工斗争中的组织者,以后为人民也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林昭 17 岁时就迎接到她舅舅为之奋斗牺牲的胜利之日。于是她投入了在无锡惠山之麓的苏南新专学习。这是一所充满革命理想、信念的新型学校。林昭在这所学校里,像一团烈火投向革命。母亲要她上大学,她固执地要在实际工作熔炉里经受锻炼,甚至不惜和家庭闹翻。在“土改”时,她挎着背包跑遍了当地的农村。她曾表示,将来要成为一个作家,写出一部反映“土改”全过程的小说。在学校和前辈的教育影响下,她怀着一片赤子之心,对革命越来越充满激情。有一次中秋之夜,一个同学用放枪代替爆竹欢庆佳节,林昭硬是认真地教训了他:“子弹是人民的血汗,不许你浪费!”谁能料到若干年后,正是人民血汗

凝成的子弹，夺去了她的生命。而在杀害她的林、江反革命集团眼里，子弹还有一个价钱，而她的生命是一钱不值的。林昭从学校走向社会，开始她在常州民报当新闻记者。当时，二十岁的林昭有着使不尽的精力，写了很多新闻报道、诗歌、散文和相声。在记者中，她以文思敏捷、才华出众而闻名。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她经受了现实生活另一方面而的考验，许多“新专”时代优良传统逐渐如烟云消逝，人与人之间出现了意料不到的关系，信任换来了欺骗，真诚的友谊变成了相互的猜疑。真心者不受欢迎，巧言令色、到处逢迎者反得赞赏、提拔。像孩子一般单纯的林昭在这种情况下而前，瞠目结舌，她甚至也走进了迷途。有人要她揭发母亲的问题，她居然也写了一些无中生有的材料。多年以后，她才向母亲表白了这桩隐痛。她说：“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没办法，写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我不得不满足他们……我没存心诬陷你。”林昭从痛苦中惊起，从此她认真地投入了思索，她对许多社会现象作了分析，选定了要坚持真理的道路，宁可到井里、河里去死，决不再讲违心的话！

“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最高考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新闻系，也正是到北大以后，她才学会理解问题。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她多么向往这个民主的摇篮啊！在这个最高学府，她重新迸发了苏南新专时代的热情，她对自己的前途焕发了信心和希望。她告诉妹妹说：“我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我要着手改编鲁迅的《伤逝》为电影剧本，还要为《二泉印月》的作曲者瞎子阿炳写部传记小说……”但是在林昭的生命之路上，迎着她的并非都是鲜花、彩锦，而更多的是荆棘、险滩。在大鸣大放

之际，她竭力为费孝通的“早春天气”叫好；她支持流沙河的探索；她在“自由论坛”上大声朗诵：“我是剑，我是火焰！”……她甚至公然说出了对“绝对权威”的怀疑，并很有见解地预言：“绝对权威只是利于教条、宗派……”她要为祖国的命运思考！可是这种思考的结果，却是一顶沉重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于是，她在民主的摇篮里觉醒，也从这里落进深渊。

林昭成为“右派分子”后，她的思想并没有退却。她忧心如焚地写信给她妹妹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维系我的一切全垮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还惨……”

林昭确实像牛虻一样疯狂了。她把一切启蒙她的人都看作了“蒙泰里尼”。她曾向一个苏南新专的老师发出了“责难”：“你们为什么当时教育我要诚实、坦率，而没有教我如何做人？”她终于从悲愤走向绝望，她用绝命书作了绝望的思想表白：“我的悲剧是过渡时期的悲剧，人们只看到我流泪，却看不到我心头在无声地流血……”她对那些在历次运动中用别人的血来“染红面貌的人”是深恶而痛绝的。她说：“我不爱也不能爱所有的人，那些折磨过践踏过我的人，愿我的影子永远跟着他们，让他们永远记得曾出力把我拉开生活，杀死我，让他们身上永远染着我的血。”

林昭自杀被抢救后，她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又向北大的领导发泄了满腔悲怨：“蔡元培先生当年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像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呢？……”

林昭这些绝望中的表白，在当时自然只能得到“罪加一等”的回答。

在“剃刀边缘”的探索

“反右”以后,林昭吞食了“拒不认罪”的恶果,“右派”而后“劳教”。以后因病遣送回上海家中。这时候,在中国大地上又出现了更大的折腾:“大炼钢铁”、“共产风”、“瞎指挥”……到处可以看到衰退和萧条的景象,但到处又是必不可少的强迫命令,大哄大叫,尽管善良的人民为能够饱餐一顿而感恩戴德,但更多的人是在灾难之中期待、沉思……林昭和她在上海结识的一些朋友们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于是,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就形成了。这些朋友观点一致,他们率直地对当时的某些政策表示怀疑,特别是对袁德怀同志按照组织原则如实反映了情况又受到批判一事,更为不满。他们编印了《星火》来阐述他们的观点和意志。这个刊物发表了很多针砭时弊的文章,林昭也写了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她的朋友们为此送了一本“南共纲领”给林昭。他们都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和中国相类似,值得参考借鉴。因而,他们将自己的意愿写成书面,准备寄给各省市领导同志参阅,希望改进党的某些错误政策。当然这是一次危险的探索,其结果完全可以预料,当他们尚未行动时,就被捕了。

血写的诗

林昭是在1960年10月入狱的。1962年初她被“保外候审”。可是“保外”却给她更大实践自己意愿的机会,尽管母亲对她谆谆劝导要她安心养病,她仍是满不在乎。她甚至要家人观赏她在狱中学到的“绝技”——戴着手铐梳头、穿衣……这时她

继续为她的意愿而行动,准备真正搞起结社活动,同年12月,她终于再度被捕。

面对着庞大、森严的牢狱,林昭没有后退一步,正如《历史的审判》中所说,她是“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

林昭在狱中,与其说她的思想因此更顽固,不如说她对祖国的热爱更深挚了。她对祖国的深情,可以在她狱中所写的《啊,大地》这首诗中看到:“啊,大地,祖国的大地,你的苦难,可有尽期?在无声的夜里,我听见你沉郁的叹息。你为什么这样衰弱,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为什么你血泪成河?为什么你常遭乱离?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

“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不仅是林昭对祖国热爱的表示,也是维护她既绝望又充满希望的精神支柱。这种矛盾,使她在一种奇特的超自由中生活着,她不断地唱歌,不断写诗,也不断地绝食,甚至经常割开血管写血书。她的斑斑血滴凝成了诗,诗又化为更多的血。正如她的一首血诗所写:“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揩吧!擦吧!洗吧!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又如一首《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就更难分清是诗是血了:“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入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为什么要写那么多的血书,她曾对妹妹说:“血流到体外,比向内心深处流容易忍受。”这大概就是她不断割开血管写诗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她的忍受力几乎是人们难以想象和理解的,她能在180天反铐中自理生活,她能在不断的生命威胁下,一如既往,从不低头“认罪”。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林昭的诗,每一首几乎都是这样交织血泪。尽管她有礼貌地呈献给这时代,但谁敢接受这些开在血泊里的玫瑰花?就在这时,乌云已在凝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正利用长期来个人意志决定一切的缺点,抬出了封建亡灵,制造起空前的现代迷信活动,于是,神州大地到处是朝圣的教徒,求神的呼号。动乱的风暴席卷全国。可是正当所有的人身不由己地拜倒在偶像脚下的时候,独有这朵开在牢狱中的红花却昂首不屈,从来没有在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中丧失过自己的意志。恰恰相反,现代迷信只有激起她更猛烈的反抗和抵制。请听她妹妹在一次探狱的叙述吧:“一天,我接到了探望姊姊的通知,因为在抄家后分文不名,我只得向单位借了钱买了些东西送去。到了监狱,当所有接见的人都走了,姊姊才被带出来,一见她,我大吃一惊,她的打扮正与外面一片红色海洋截然相反,她穿了一件淡色的上衣,用白被单当裙子,长长地几乎拖曳在地上。手臂上套着一块黑布,上面用白线绣了一个‘冤’字。她的头发留得极长,齐根扎了一条白手帕,宛如过去戏台上的窦娥……我隔着铁丝网看得发呆了。当然,我想我是理解她这样打扮的含意的,这是无声的反抗……她走了,这个长裙曳地的背影,铭刻在我的心灵深处,永志不忘。但当时我已预感到死亡的巨大阴影已笼罩在她的周围……”

这时,正当舞台上李慧娘的影子也使林、江反革命集团骇怕之际,这位牢狱中出现的现代窦娥,他们当然更不能容忍,何况林昭这时又变本加厉地在牢狱中唱歌、喊口号、写血诗,支支利箭直射现代迷信活动的要害,林昭终于从有期徒刑二十年加判

“死刑”，立即执行。据了解，在接到判决书时，林昭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1968年4月29日，林昭同志终于被杀害，过早地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黎明已经来临

十年浩劫过去了，但是浩劫的惨景仍历历在目。在林彪、江青所制造的现代遗神运动中，林昭只是这场浩劫中一个不知名的牺牲者。但是，她的宁死不屈、为真理而献身的事迹，却宛如一颗殒落的孤星，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一道燃烧着鲜血的曳光。这道光芒随着人民的胜利而愈益灿烂、明亮。因此，林昭的被历史宣告无罪，也是现代迷信正在被彻底摧毁的标志。但是，在林昭的无罪判决书上，看来似乎是得助于“精神病患者”。就这点来说，林昭在泉下也是不安的，如果说当时作出结论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那么，这种局限就不应该再在今天出现了。

当然，在林昭身上，我们不能忘记悲惨的昨天，但更重要的要看到今天。随着“四人帮”的垮台，特别是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我国已真正而临了林昭所渴望的“一个美好、真实的黎明”，过去林昭用鲜血、生命为之奋斗的种种愿望，现在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人间的现实。封建专制和现代迷信的亡灵已逐渐被驱散，国家体制改革的呼声甚嚣尘上，如箭在弦。在党中央领导岗位上，她所想望的“有德者居之”^①已为人民所公认。民主的号角，已开始吹响；法制的权杖，已不再为个人所侵占。中世纪裁判所的专断和封建株连，再也不可能进入我们的生活。曾

^① 林昭在狱中的血书：“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

为野心家所利用的红色牢狱,已用来惩罚他们自己。特别是制造一代浩劫的罪魁祸首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已经受到法律的严正制裁。对林昭来讲,她血写的遗言也已经得到了证实。

安息吧,林昭同志!

玫 瑰 花

林斤澜

大约十来年前,我去到无锡。高晓声带我到惠山,去看看大约三十年前住过三五个月的房子。上上下下可以推门的推敲而进,不可以的也到门缝张了张,走到第二泉那里,高晓声就要找个雅座喝碗泉水龙井,作为雅兴的收尾。我却惦记着一方池塘,塘边的青石板路,垂柳、太湖石假山。当年的日脚匆忙,年青的脉搏紧绷,有时在池边略站一站,也说不上悠闲,可有些清净的喜悦。后来的年头如浪头,一两年不起浪,叫做“弦儿不紧”,两三年呢,就是“缺根弦儿”了。人,不直升浪尖,就是滚落浪底,这才觉出来片刻的松弛宁静,可以海绵一样吸收柔情。回想起当年的池边小站,也有了当年感觉不到的滋润。

这个意思不容易说清楚,高晓声也不等我细说,笑笑,抬腿就走,有些蹊跷。

走到一个干坑旁边,站下。我说这不是,他说这就是。我说这不是这不是,他说这就是这就是。

一池春水哪里去了?青石板路哪里去了?一两棵干巴巴的树比没有还难受。我们住过的曲折小巷古旧平房都在哪里?拆

了？圈起来了？空着了？

当年的忙忙碌碌失落在眼时的空空荡荡里，当年的片刻宁静也没有着落了，这个干坑若只管干巴也罢，不，它干在那里发愁。

又过去了大约五六年，又一次走到无锡，没有人带路，自己走到惠山。忽然出现了街市，马路，楼房。和街市的繁华，马路的热闹，楼房的现代气象，应有尽有，应有的精神面貌也当尽在那里。

想着去看看一个新坟。当年的才女，后来错划、错捕、错杀，新近平反安葬的彭令昭之墓。没有找到。

人家告诉我在哪里哪里的山坡上，我无端想起若在当年的池塘——后来的干坑旁边，可好，能叫干坑又叫池塘了。

那么去找池塘，也没有找到，干坑也没有，连拆得空荡荡的地皮也找不见，眼前的都是楼房、马路、街市，好不气派。

又是后来的后来，想起来却有一座彭令昭之墓，在向阳的山坡上，新挖的黄土喧喧，墓碑上没有刻下“三错”，有一首才女的小诗，写着带刺带血的玫瑰花。

(补记)

这篇千字文是应江南晚报之约，凭点感想，随手写下，后来竟得了个奖，转竟写得随便了。

八十年代初，彭令昭平反后，亲朋同学给她立碑。有说刻上错划错捕错杀，那么是块三错碑。有说碑在名胜景点，只怕煞风景，岂不第四个错了。有考虑周到的，以为立碑求其长久，还是不太扎眼的牢靠。有想像力丰富的，主张刻上一首才女自己的小诗，意味深长，又别致脱俗，这个主张大家赞成了。

有几位建议刻上一首叫做“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记不清

最后的决定了。

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
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
滔滔流成河……

也曾商量营墓于无锡惠山，后来选定她的生身之地苏州灵岩山，两地都是天堂风光，都是适宜的。决不会煞风景，倒有可能成为旅游的名堂也说不定，但那是以后的事，现在只看见到处想方设法的卖钱。

诗人邵燕祥介绍过她的诗，标题是“血泪中的玫瑰花”。她自己在狱中说过：“血流到体外，比向内心深处流容易忍受。”像这样的话，都像石碑一样沉重，且有棱有角不兴随便。

林昭的光芒

方 方

照理,在中国的二月里,每一个日子都应该是喜气洋洋的。二月总是象征团圆象征幸福象征新春的来临。作为办刊人,我们总想让自己的刊物最重要文章能同人们的欢乐情绪融在一起。然而,发稿前夕,我们收到了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女士寄来的稿件。1998年,我们曾经藉北大校庆之时,独家发表了有关林昭经历的文章。从此,林昭的名字便带着她特别的光芒进入千千万万的人心。远在美国的彭令范女士在第二篇文章中,再一次为我们详细地描述了林昭在狱中的种种惨烈经历。这是关于林昭的又一份沉甸甸的控诉。我们岂能因为民族的节日而放下林昭?因为有了林昭,我们才看到这个民族的希望——为了真理,不惧死亡;有了林昭,我们也才看到了人类最灿烂的光彩——为了自由,宁舍生命。

对于我们,林昭是一个永远的话题。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作“好死不如赖活着”;还有一句老话,叫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样一类的老话,找出千条也很容易。它们的存在使无数软弱的心灵得到了安慰。而对林昭

时,这些心灵常常也并非就会惭愧。这不错。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利。有反抗的权利,也有沉默的权利;有勇敢的权利,也有胆怯的权利;有始终不肯放弃真理而宁死不屈的权利,也有暂且回避一时、徐图今后的权利;有心不服口也不服的权利,也有心不服而口假服的权利;有拼命上书,驳斥谬误,阐明自己观点的权利,也有把自己思想深藏于心,人云亦云地附和几声的权利……如此种种,每个人的承受能力有限,千丝万缕地客观条件亦有异,任何一种选择都不能说错。但是要说的只是:你既作了选择,你就要默认一个事实。即:只有一种选择才能被人称为英雄。而人格的力量也只在一种选择中光彩夺目。比方林昭。还有张志新。还有遇罗克。还有……这样的人也实在有限,因为世界不是由英雄组成的。我们都崇拜英雄,但能成英雄的总是少数。

人们习惯用忘却来抚慰自己受过伤害的心灵。“好了伤疤忘了痛”也是一句流传很广的老话。那些本该永远铭刻在心的东西竟是被我们有意无意中地淡忘。许多的我们喜欢振起嘴角风趣地谈论风花雪夜的温馨,谈论时尚的冲击波,谈论蝇蝇狗狗的趣事使生活多么丰富,觉得它们对于我们人类是何等重要。然而静夜之时,总会有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审视着这么容易忘却又这么容易满足的我们。她的眼睛清澈明亮,她的面孔依然流露着果敢和无畏。她仿佛在说:历史就这么过去了么?你们就这样轻易地原谅了专制原谅了灾难原谅了所有的一切以及你们自己?她的诘问令我们霍然而起。她就是林昭——为了追求真理,为了争取自由,在监狱中惨烈反抗的林昭,是由母亲交上五分钱子弹费而被枪杀的林昭。

林昭在前,我们怎能不无数次无数次地反思。反思一段漫长的历史,反思一个时代劈头盖脑地传存下的观念;反思我们自

己。偶尔的时候,也摊开自己的双手,思忖一下,自己的手上是否也留有林昭的血痕。

真的,这样的时候说林昭,会有人说我们不合适宜,可是不合适宜就不说了吗? 我们还是得说。一直说到人人都记得这个名字,人人都知道她为何而死。

悼许宪民、林昭

冯英子

早年曾在苏州作过记者的著名新闻工作者冯英子(上海《新民晚报》顾问),1982年5月来苏州参加悼念“文化大革命”中被摧残致死的许宪民、林昭母女的活动,故而赋七律诗一首:

驱车百里及残春,一束芳馨祭故人。
喜得青山埋玉骨,恨无白铁铸奸臣。
因邻韩冢思英发,却对胥湖忆怨恩。
两代奇冤今洗雪,十年往事岂堪论!

诗后有题记云:“许宪民同志(林昭母亲),大革命时期中共江苏省委许金元(许曾任中共苏州独立支部书记)之妹,幼随其兄投身革命……平生支持革命事业,未遗余力。其女林昭同志,先后就读于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和北京大学新闻系,有志于新闻事业。十年动乱中,母女均被摧残致死,前年始获昭雪。壬戌四月,由苏南新专与北大部分师生,为营墓于苏州灵岩山韩蘄王冢侧,植树立碑,刻林昭遗诗于其上,有‘他日红花发,认取血泪斑’

等语。予识许氏母女逾四十年，登临祭扫，悲从中来，追念往事，因书七律以悼之。”

《苏州市志》编者按：许宪民曾于解放前夕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在民盟苏州支部领导下开展地下工作。曾与人联合投资创办苏福汽车公司，解放后带头申请公私合营，任公司董事长。其女林昭，资质聪慧，追求进步。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复遭迫害致死。许因此深受刺激，1975年于上海外滩自尽。

（摘自《苏州市志》第三册 1222 页，第五十四卷杂记）

应共冤魂语 投书寄冤岩

——林昭三十年祭

陈伟斯

近日偶翻旧札,发现过去抄阅的两首旧诗。诗曰:一:“今夕月朦胧,灯辉酒靛红。相望无一语,归去浪千重。梦觉欢娱少,伤愁忧患中。早知春将尽,飘泊怨东风。”二:“黄昏烟雨随春去,清夜无语独自怜。相忆年年方寸乱,新愁点点压银笺。江南疏雨哀愁绝,蓟北秋月断梦凉。空向碧波诉冤语,松岗夜月共相望。”这两首哀婉凄戚的诗作,是现在美国霍普斯金医院作研究工作的彭令范女士悼念乃姐林昭(彭令昭)的旧作。当我为两姐妹的命运陷入了深深的沉思,猛然想起今年4月29日,正是林昭逝世三十周年。

多年来,我总想到林昭墓前去祭奠,无奈只知道她躺在苏州灵岩山湖光山色之间。在万冢丛中,实寻觅不易,只好作文悼念,也许比献上几束野菽山花更有意义吧。其实,林昭之墓,除了存有一绺头发以外,什么也没有,只是让人凭吊的象征,十余年前,记得我曾应令范之邀,到墓地去过。在我的回忆里,只存着令昭生前同学好友们哀伤的脸容,以及在墓前长跪不起的令

范的背影。

和令昭墓并列一起的,还有她父母的双穴,这里也是空空如也。其父彭国彦自绝而亡,母亲许宪民因反革命死因难明。林昭是现行犯被处决,所有遗骸都无留存。

我和林昭仅见过几次。那时她还是梳着小辫子的小姑娘。由于她眼睛明丽,熠熠有神,至今还有印象。但我和她母亲许宪民则渊源深厚,可说是同一壕堑的战友。我和许大姐相识于苏州解放前。那时,中共华中局江南工委会派石云和我到苏州开展策反工作。许大姐和我接上了关系。我们多次到乔司空巷15号许家密谈。她是苏州女界的大红人。是“国大”代表,县银行总经理,还有其他不少衙头,和许多头面人物均有往来。她和我们合作得很好,联系的关系很有价值。例如大名鼎鼎刺死孙传芳的施剑翘,就在许的鼓动下帮我们取到有关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重要军事情报。她又帮我们策反了一些地方自卫队供我们调遣。她又慷慨地资助了两架电台,供我们和华中局社会部联络,并提供了收、发报的场所。她又介绍了匿居在苏州的以胡均鹤(静波)为首的一帮军统、中统、汪伪特工起义投诚。这些关系在上海解放后的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幸潘汉年、杨帆却也因此等关系蒙冤难白,成为日后所谓杨帆门下“‘食客’三千三”大案的张本。

我和石云都十分景仰许大姐的革命意志。许大姐所以甘冒生死的危险帮助解放事业,实有其历史原因。她的大哥许金源原是苏州党的负责人。“四一二”事变后牺牲于南京,尸体装在麻袋沉下江中。许的先生彭国彦是国民党考试院考试及弟的头名县长。此人一生清廉,在其县长任内,曾救助过不少蒙难同志。“江南工委会”张志强同志被捕获释,即是其中一例。光复后任中央银行专员,当时该行行员,均可按例免费发给金块,此

公居然拒受。至于许宪民本人，她在景贤中学读书时就追随乃兄参加革命。有次，苏州人力车工人举行罢工，她也走上街头拿着喇叭发表演说、呼喊口号，她曾经神情激动地叙述起当时的情景：“我穿着一件红衣，在街头穿梭来往，真像疯了似的。其实我并不真懂得革命，只知道跟着金源大哥摇旗呐喊，但此后却得了个‘红衣女郎’的名声。”

大革命失败后，国事日非，日本军阀铁蹄声声踏进，国难加剧。许宪民一介女子，不愧须眉，奋起参加抗战，江南沦陷后，她随军后撤，接着又潜反故里。任国民党三战区淞沪三区专员，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后不幸被捕，并在苏州宪兵队受尽折磨。获释后，旋即返重庆。在此时，她到处宣传沦陷区日寇的残暴、人民的苦难，并在多次大会上作报告。她的经历曾传颂一时，被誉为苏州的巾帼英雄。抗战胜利后，许宪民回到苏州，英姿依旧，仍热衷关怀民间疾苦。那时，苏州城里出了件大案，一个军统特务强奸了女教师常东娥，并致之死地。常母奔走呼号、无有结果。许宪民闻说拍案而起，挺身支持，最后硬是打赢了这场官司。此事风传姑苏，各报相互报导，许宪民成为风云人物。

解放后，许宪民虽然为革命作了不少贡献，她从来未向我和石云提出任何报偿和要求，依然回到她在苏州的工作岗位。肃反前后，也吃了不少苦头，却一笑置之，绝无悔意。“反右”后，我率先沦为异类，家中鬼也不上门来，和许宪民也中断了信息。1961年，当我摘帽回家探亲，冯英子同志曾不避嫌疑上门做客。记得他曾谈起许大姐曾想帮助我跳出苦海，落户到苏锡一带。当然，她也是自身难保的泥菩萨，助我谈何容易，我只能心领她的好意。1980年，我“改正”还家，重遇冯英子，说起许宪民情况，不意竟惊悉许大姐一门遭难的噩耗。前几年，冯在《苏州杂志》写了《许宪民二十年祭》，更使我勾起了对许大姐一门的怀

念,使我最难忘的是许大姐和冯最后一次见面的叙述:“……一天,我正在复兴路陕西路附近溜达,忽然有个疯婆子向我迎面走来,她同我擦肩而过,回头向我招呼:‘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大吃一惊,赶忙回过头去,只见她披着一头乱发,穿着一件油溜斑斑的破衣,在秋风中显得很萧瑟的样子,脚上鞋也没有跟,那毫无血色的脸上,嵌着一对目光呆滞、满含忧伤的眼珠。她说话时环顾左右,带点恐怖的神情,那样子有点像《祝福》中暮年的祥林嫂,但我终于认出来,她是许宪民。……”当老冯认出后,许宪民却匆忙走向马路的对面,显然她顾虑的是头上还有一顶“反革命”的帽子,怕累及自己和朋友,冯英子同志此后再也没能看到许宪民。

读罢全篇,我默然良久,唏嘘不已。许大姐沦为今日之样林嫂,据我所知的材料,很大程度上与她的宝贝儿子有关,而更重要的是,莫过于女儿林昭的横遭处决,并由她手里付出了卖命钱——自己的不幸,丈夫的自杀、儿子对老娘的“革命行动”,加上女儿的惨遭横死,世上有几个人能承受如此的命运重压?终于,许宪民从外形到内心全线崩溃,曾几何时,她就不明不白的离开了人间。

解放前我多次到许大姐家中,她总得意地夸耀林昭和儿子,她说十四岁的儿子已写出了几十万言的武侠小说,将来肯定会赶上“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等大作家。谁能料到这位奇才少年日后竟然成为母亲的痛疽?对林昭,许宪民更是赞不绝口,说她能诗能文而且对共产党有着奇特的亲情,也许是大伯父许金源的召唤和母亲的感染吧?我们在许宅时,林昭也有过到解放区参军的流露,我笑着说:“我们来了,不是天快要亮了?要革命有的是机会。”

苏州解放了,林昭果然不顾父母要她读大学的要求,像一团

烈火般地投身革命,进入了无锡惠泉山麓的“苏南新专”。那时,她既稚气、热情,又显得成熟、冷静,长于思考。她是四十年代末期参军的青年们的样板。她追求真理,坚决跟着共产党,高歌革命歌曲,学习保尔·柯察金,以舒拉和卓雅为榜样,如饥似渴地阅读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她和同时代的战友们一样,对党敞开胸怀,像“牛虻”那样忠诚。而对阶级敌人,她(他)们毫不留情地参加斗争。她(他)们大叫大喊,嗓子喊哑,手掌敲肿也在所不惜。她(他)们学习打小报告,认真地检举揭发坏人坏事,白天黑夜密切监视周遭的动向,最后甚至大义灭亲,甚至不放过战友的一言一行。当然,她(他)们也自觉自愿地认真检查自己,一切都为了取得亲爱的党对儿女的信任。这些时习风尚,自然也交织在林昭的成长过程。二十岁时,林昭从苏南新专分配到常州民报社工作。这是刚接管的民营报纸。从跨进报社的第一天起,林昭便记住自己是共产党派来改造旧报纸的新闻战士,处处要自觉宣传党的方针、路线。她任职编辑,副刊成了她发挥文学能量的天地。她不仅编好来稿,而且配合宣传任务写了大量的通讯、诗歌、特写、相声,全面地展示她的才能,常州第一个全国劳模徐建华,也是由她首先报导,被评为好稿。她爱祖国,爱苏联老大哥。斯大林逝世给她老大的创痛,为此,制作了一朵小白花,长戴辫梢。她对祖国对人民,爱得认真,爱得深沉,在“新专”时,有一次中秋之夜,一个同学在站岗时鸣枪庆贺佳节。林昭是班长,她严词谴责了这位同学说:“一颗子弹是人民的一滴血汗,你无权浪费它。”

1954年,林昭以优异成绩考进北京大学新闻系。在这民主摇篮里,她犹如投入了慈母的怀抱,她满怀信心,希望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记者。她的写作计划满满地一大堆。她要为创作《二泉映月》的瞎子阿炳写传记,要改编鲁迅的《伤逝》成电

影……她成了急待展翅飞翔的海鸥。但正如同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面临了早春天气的压抑感。当她经历了电影《武训传》的被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等等政治运动后,她发现自己的爱与恨是一盆浆糊。尤其当她想起曾以不实之词在“大义灭亲”的号召下检举过母亲时,悔恨之泪汨汨而下。她性格上执着、认真,追求真理的一面,这时已主宰了一切,不再跟随流俗翻云覆雨。她猛然写信给母亲表白了自己的卑鄙,并发誓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伴随着林昭的觉醒,一场大鸣大放,引蛇出洞席卷中国思想界的灾难不幸来临。林昭这头刚学会飞翔的海鸥,一头栽进了罗网,戴上了一顶沉重的右派帽子。从此她在这民主的摇篮里沉入深渊。

林昭绝望后,陷入了疯狂,她自杀不成,更加剧了拒不认罪的勇气。她憎恨一切折磨、欺骗、摧残过她的人。日后,她曾写道:“他们可以杀死我,我要让他们的身上永远染着我的鲜血。”她又宣称:“我是剑,我是火焰!”她又公然表示对绝对权威的怀疑:“绝对权威只有利于教条、宗派……”如此拒不认罪,后果是送“劳动教养”进行改造。以后,林昭终还是有幸“因病”遣返上海家中。这对“北大”来说,摔掉了一个极为麻烦的包袱,从此可以心安理得逃脱迫害林昭的恶名。

林昭返回上海时,正逢中国大地上刮起共产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折腾时期,她目睹中国将走向更大的灾难,正像唐·吉珂德那样向大自然的规律开战,于是和上海的朋友们探索祖国的命运。他们为彭德怀抱不平,对大跃进公然怀疑,并编印了一本《星火》,以示他们的主张。她和朋友们又以《南共纲领》为借鉴,写成书信准备寄给各省市领导参阅。呼吁书尚未发出,林昭即由此从“劳教”分子升级到现行反革命罪犯。

林昭是在1960年10月入狱。1962年初,她又因病“保外”回家。这次,母亲许宪民要她安心休息,别再去碰国家大事了。林昭却认为正是写她的狱中回忆的大好机会,一本长长卅万言的《狱中回忆录》终于有机会留在人间。

十余年前,我在其妹令范的宿舍里,曾看过这本狱中自白。这是一本血泪凝成的人间奇书,也是用钢铁意志组成的地狱之花。这本密密麻麻以青豆般大小的字迹写成的书稿,可说是天惊地泣的世纪文献。读罢以后,我可以说,所有五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愧对林昭——正是她如此大胆直言,以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面对一身刚而毫无惧色。正是她,经历了长期惨痛的折磨而仍拒不认罪。正是她,甚至走在六十年代的张志新、遇罗克的前头……可惜这本书稿已再难寻觅,我只能从复印下来的若干残页摘录一些遗稿,以供读者对林昭其人其事的理解。(该复印件字迹模糊,大部分要推敲再三才能辨认。此外,林昭毕竟年轻,不可能具有成熟的思想、理论,甚至她对柯庆施之流也存有幻想,这些都无损于林昭的主流思想——对绝对权威的公然抨击、批判。)

林昭的狱中回忆,从上海高院1981年12月30日对她的无罪复查判决中,也可以看到她何等忠实于自己的信仰和思想。该判决书说:“林昭于‘北大’读书时被错划为右派,于是以长诗、文章等表示不满;1968年她在被错判服刑期,又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等表示不服,林昭如此拒不服罪。”……她的回忆录说出了个中原因,她写道:“有天傍晚,林肯驾车回家时,看见一头公猪陷于泥淖,拼命挣扎已经下沉到一半,眼看快要灭顶。林肯想下车把它救起,一低头看到自己穿的是一套仅有的整齐衣服,不免迟疑,便匆匆赶车走了。走了半里,耳边似乎一直听到那头猪在呼叫,终于还是调车回头找那泥淖,林肯费

了九牛之力,几乎成了泥人,终把那头猪救了上来。事后人们虽称赏他的行为,但都认为这样做不值得。林肯说:“我不是为那口猪,我为自己的良心。”亚伯拉罕·林肯一句短短的话,终于成为日后林昭的终生誓言。在常人眼中,自然会认为是非常人的心理行为。林昭回忆录证明了这一点:“1962年8月29日初审开庭时,已经来了可以领会的暗示:‘你有病吗’?可是十二分抱歉,可敬的先生们,管有什么病也得,可能这个年轻人在反右后以及其他许多事件重重刺激下有了或有个精神异常现象,但至少不比先生们更加精神异常得厉害。”确实,林昭将她的对手都看成这位法官一样。因此,她对一切违反自然规律的非理性行为,敢加以蔑视、唾弃。“……相形之下,斯大林倒似乎多少还存留有那么一些理性。在他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里,不是答雅罗申科还强调:‘人们只能因势利导客观规律,却断然不能去创造以致更替客观规律……’‘……如果这样,犹如盲人瞎马,也许总要到不落水必撞山而后已’,‘害死自己那叫活该,可恨是害死自己之前,已害死许多人……’”林昭为了保卫良心、理性的过程,也成了由右派、劳教到现行反革命的过程。但她仍能通情达理:“我致函‘北大’校长并不错误,因为这个满怀沉痛的青年人不能无动于衷我们同时代惨烈的鲜血与沉重的苦难,却到底还是提出了某种希望甚至和解的方案请校长效法蔡元培的榜样,保释“五一九”以来的被捕者,让我们回到母校读完未竟的学业。作为年轻人,这样一种善良而本分的要求有什么可以责备之处?难道这不是我们莘莘学子青春生活中应有的最低权利吗?!”

母校对她在灭顶之际的呼吁充耳不闻,林昭只能承受命运的安排,走向监狱。“良心”终于使她不能通情达理地去乞求最低权利了。在监狱中,林昭以血书、呼口号来表达良心的抗议,

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肯定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这就出现了林昭在狱中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决斗。

“从到第一看守所的第一天，我便闻到了一股气味，……仅仅三天之后，我们（看守所狱方）使用十分性格化的典型语言对她作了说明：‘我不制服你这黄毛丫头，我们不相信！’‘原来你们镇压反革命或诸如此例的政治条例，还有一条黄毛丫头必须制服’，那也好，黄毛丫头除了奉陪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看守所的狱方确实小看了黄毛丫头。于是批判的武器改为武器的批判。“这么地，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就开始了。而这事情也跑不了两种可能……（以下字迹模糊不能辨认。）……非刑虐待光是以镣铐铐，人们不知玩了多少花样。一副反铐，两副反铐，不行，时而交叉等等，至今臂肘之上，伤痛犹在。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性的在我绝食之中，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之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镣铐，从未为我减轻一些譬如暂时除去一副。天哪，天哪，这是真正的地狱，人间何世？而当这个被百般惨毒折磨得忍无可忍的年轻人提出奋激的抗议时，人们竟恬不知耻的回答：“手铐不论怎样戴或戴几副可不曾有过规定。”

狱方的镣铐和幽默，对林昭都无济于事。“若谓打得光蒋家大军者必能制服黄毛丫头”不一定正确。黄毛丫头的答复是：“三军可以夺帅，未必能夺匹夫之志。不论黄毛丫头，红毛妖精，如不全而看问题，就会直接对林昭的问题造成莫大被动……任何人没有理由责怪林昭，当然林昭更没有理由认错……为什么不想一想，万一制之不服，甚至百制不服，则当如何罢手呢？万一反抗者的丫头竟然宁死不从等等，又当如何下场？”

镣铐的“批判”硬是被“黄毛丫头”顶住了。当局确实在宁死不屈的林昭前面考虑到下场，终于作出给林昭“保外候审”释放

回家。当局所以作出这一决定,其实并非因“武器”的批判失灵,而实是黄毛丫头除了不怕镣铐以外,兼以喊口号、唱《国际歌》,甚至屡屡割开血管以血写诗、以血抗争。作者在80年代初到上海静安公安分局查看林昭档案时,曾看到她以手代笔,以血为墨写下的一首《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真正的血诗:“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林昭回家后,将“保外候审”视同等闲。她经常当着家人的面,“练习”在狱中戴着两副手铐穿衣吃饭、洗脸、梳头种种“绝招”。她对其妹令范说:“如果需要,我还是要写血书,因为让血流在体外,比向内心深处容易忍受。”

林昭如此“顽面不化”,对经历180天反铐苦刑毫不“自省”,对流血视如“儿戏”,必然会“错估形势”。回家不到10个月,她又被“朋友”告密,再度入狱。这已是史无前例的“文革”山雨欲来之际,她自然在劫难逃了。到1968年间,林昭从被判十二年徒刑加刑到死刑。在狱中,林昭早已视死如归,她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进行“反改造”。到临刑前不久,其妹令范得到探监的通知,在铁栏前,她看到的是一位身穿白衣,长裙曳地,臂缠黑纱,上在绣着一个大大“冤”字的姐姐。

在死亡前夕的会见,令范悲痛欲绝,乃姐则神色自若。

面对死亡,林昭更有明确的预感。在回家时,她曾抄写了一首预示前途必死的诗:“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在她留下的狱中回忆中也写道:“林昭可早把话说在前头,有得这么‘抬举’我(指反铐),不如干脆赐我一死,我倒感到成全。民间本有传说,死刑犯受的子弹,应由自己出钱,而一颗子弹一毛五,我就自费买了也没问题。只要给人一个死法,当年一看到阮(北大同学)临刑前的照片后,这个冤痛莫诉的青

年人(指自己)顿时热泪滂沱。同室的难友说,能把血流在光天化日之下众人眼目之前,亦云不幸中的幸事。而林昭的血,是一点一滴滴在无人看见的阴暗角落……”

1968年4月29日,终于完全应验了林昭的忤语。她不仅把血淌在无人看到的刑场,而且其母许宪民也为此付出了子弹费。令林昭没料到的是,卖命的钱削了价,只值五分钱,当然这绝非林昭的估计错误,谁能想到20世纪中叶还会出现这个中世纪的悲剧呢!

“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噫,林昭应当之无愧矣。

1998.4.25.

追求与幻灭

——记林昭及其父母的悲剧

陈 箴

1957年在反右浩劫中，“北大”新闻系的学生有七、八十人被打成右派，几致全军覆没。其中罹难最深，结局最惨者是一个未出茅庐的女青年——林昭。她的罪名是支持右派分子的观点、宣扬良心与组织的矛盾。对风靡全国的现代迷信活动绝不屈服。终于被“引蛇出洞”，戴上右派帽子。但与众不同的是，林昭从此再不回头，心甘情愿地背着“顽固不化”的桎梏，为表达真理必胜而忍受非人的折磨。别人都劝她识时务，鸡蛋碰不过石头，她嗤之以鼻，而更加意气风发，横眉怒对千夫，粪土当代左派名流。她上万言书、写血书、高唱《国际歌》、绝食等等行动，坚决要以鸡蛋之身去碰石头。林昭剑及履及，义无反顾，终于由右派蜕变成“死刑犯”。1968年4月29日牺牲于上海。

13年后，“四人帮”垮了台，新华社记者以愤怒之笔公布了林昭死难的消息，并传出了林昭死后由家属支付5分钱子弹费的天大奇闻。这种比中世纪更野蛮的暴行，全国为之震惊，成了“四人帮”必垮的罪证。

时光如今又过去了十余年，林昭的事迹在“北大”百年校庆纪念的前后，全国多家报刊从林昭的光芒中，发现了她高贵绝伦的品质，林昭似乎又从黑暗的夜色中向人们走来，正如她的“北大”同学张元勋所评价的那样：“在1957年的‘北大’人中，能够符合鲁迅先生所界定的人格标准的，恐怕只有林昭一人。”

林昭的精神是什么？概言之：“如无自由之思想，独立之意志，毋宁死。”

林昭在狱中曾写了一首《家祭》，怀念她的舅父与母亲：

“三十七年的血迹，谁复记忆？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舅父啊，甥女在红色的牢狱里哭你。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我知道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这是林昭立志革命的思想根源，否则她完全可以审时度势，何止死于非命？

林昭，苏州人氏，原名彭令昭。又名许莘。林昭的舅父许金源，是大革命时期中共苏州党的负责人之一。1925年的下半年，中共江苏省委派侯绍裘、张闻天、叶天底到苏州开展工作，侯对外的身份是苏州私立乐益女子初级中学的教导主任，在党内担任苏州地委书记，同时又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常委。侯到达苏州后，即介绍许金源参加中共及国民党。侯于1926年赴沪，由黄震汉接替他的工作。据黄震汉回忆，当年黄和许二人白天在三元坊开国民党党员会议，晚上则在许金源家开中共党员会议，两边会议都由许主持，黄则秉侯绍裘的指示作政治报告。1926年的下半年，叶天底、许金源领导了一次丝厂的罢工活动，罢工失败后，苏州地方实力派迫使乐益女中的校长解聘了侯绍裘。到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叛变革命，共产党员纷纷被捕，许金源、叶天底分别在南京、杭州遇难。直到1945年，苏州的报纸刊出了许金源等七人因坚不投降而被国民党杀害，并将尸体沉入长江的消息，家中才证实了许金源的死讯。（解放后许金源

被追认为烈士。)

许金源牺牲时,其妹许宪民(林昭的母亲)还在苏州景贤女中读书。当时的中学生鉴于国难深重、国事日非,颇多过早地萌发报国之志,加之许宪民又受乃兄许金源的熏陶,16岁便跟随乃兄参加种种进步活动。如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开会时把门望风等等。据冯英子同志说,当时许似乎和“C·Y”有关系,是苏州城里第一个穿军装的革命女性。国共分裂后,许宪民仍敢说敢为,成为社会瞩目的新女性。许宪民后来嫁给彭国彦,彭是吴县县长,在夫人的影响下,彭多次为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开脱,至今仍有一些同志念及此事,深感谢忱。

许宪民由青年而成为少妇后,仍矢志爱国救亡。“九一八”事变后,许宪民在苏州奋起行动,她和冯英子、项坚白、谢如玉等人积极从事抗日活动,如开展演剧、歌咏、读书会等,并和女同胞们发起成立苏州妇女会,吸收大量女青年参加,进行宣传、组织、救护和战地服务训练等工作。吴中妇女,代有人杰,许宪民可算得上是一位巾帼英雄。

作为母亲的许宪民,给女儿林昭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在苏州沦陷后,许宪民从后方辗转回到故里,将两个女儿寄故在苏州濂溪坊娘家。孩子们难得看到她几次,而且往往是夜间来,当夜就走,有时孩子睡着了,甚至连孩子也不敢叫醒。林昭到日后才知道母亲是重庆派到沦陷区工作的人,职务是三战区上海淞沪三区专员。许宪民后来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其间,受尽了日本宪兵及“76号”特工的刑讯折磨,最后逃脱厄运,保释出狱,旋即返回重庆。许作为沦陷区的见证人,到处作演讲、报告,控诉日寇与汪伪的罪行,一时成为抗战名人。日本投降后,许宪民全家回故乡团聚。由于许已颇有人望,回乡后即担任苏州县银行董事,《大华报》总经理,及苏福长途汽车公司董事长。……许宪民

功成名就,但不改初衷,到处为民排忧解难,招惹事非。当时苏州曾发生一桩轰动的大案,有个小学女教师常东娥被人强奸后杀害,常母到处为女儿呼号伸冤,但凶手有“军统”特务作背景,因此官司无从打起。此时许宪民挺身而出,在《大华报》上进行揭露,愤怒谴责凶手的暴行,凶手以匿名信及邮寄子弹进行恫吓,许宪民不为所动,终于使常女获得昭雪。

此外,冯英子此时在苏州创办了《大江南报》,该报为苏州大亨严欣琪所嫉恨,必欲致该报于死地,冯英子奋起迎战,也得到不畏强权的许宪民的支援。该报的记者鞠盛被当地的特务以“中共外围组织‘群社’分子”为罪名,予以逮捕,在许宪民的全力营救下,鞠被释放出狱。

1946年,国民党举行伪“国大”竞选,在史良的支持下,许宪民参加竞选,当选为“国大”代表。在此合法的名义下,许宪民更加敢作敢为,当时,蒋家王朝已面临末日,中共华中局社会部派出石云等同志到苏州开展策反工作,经有关人士联络,许宪民欣然接受合作。她慷慨解囊,资助了建立地下电台的经费,并提供了收发报的场所。此外,许宪民又提供了不少策反对象,最重要的是与伪省长李士群部下的特工总部二处处长胡君鹤拉上了关系,胡是原中共共青团团中央书记,其妻赵尚芸是东北著名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妹妹。胡于1932年12月在上海被捕,经严刑拷打后叛变,担任“中统”要员,胡参加合作后,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解放后,胡随杨帆到上海,经中共有关方面批准,任命为“情委会”主任。胡君鹤作了很多贡献,但最终却成为潘、杨冤案的导火线。此外,许宪民还介绍了刺杀军阀孙传芳的女杰施剑翘与石云见面。施表示可以搞到淞沪警备司令部作战区的情报。这些关系都分别上报,受到杨帆的重视。许宪民提供这些关系是冒着生死风险的,但她从不计较得失,竭尽全力为解放上海贡

献一切。也是为了继承乃兄许金源烈士的遗志而了却自己的心愿。

林昭就在这种家庭的影响下逐渐成长。她耳闻目睹母亲的见义勇为的行为,从小已树立了跟共产党干革命的坚强意志。此时,天下大乱,解放军过江在望,苏州城厢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气氛,林昭勇敢地瞒着父母,自己寻觅光明的火种。她参加了与地下党有关系的“大地社”,到处宣传党的政策,当时竟有人说她是“小神经病”。她的积极、大胆、不计生死,终于使她上了苏州“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单。

苏州解放后,林昭自然便像脱缰野马走出家庭,参加她日夜向往的革命队伍。她顶住了父母要她读大学的压力,甚至写出“与家庭生不往来,死不吊孝”的决心书。从而跨进了革命的摇篮——惠泉山下的“苏南新专”。从此,林昭一往无前,决心跟定共产党永不回头。

在“苏南新专”时,由于铁心干革命,对党是一片赤诚,真是“爹亲娘亲不如党亲”,为了表示阶级觉悟高,竟至“大义灭亲”来揭发母亲。最令人心地发怵的是,她参加“土改”时,因为当时工作队都发了枪,一次,一个男同学试放了一枪,林昭严厉地教训他:这是用来消灭阶级敌人的子弹,浪费了就是犯罪。对方并不就此觉悟,林昭急得直哭。二十年后,真没想到,其母真的付了五分钱的子弹费,眼睁睁地看着亲生女儿的被镇压。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最高考分进了“北大”新闻系,她欣喜若狂。不久,她便深得教授们的赞赏。后又参与了北大《红楼》诗刊的编委。林昭的大学生活,使他在学术上突飞猛进,思想上迅速成熟。但多次政治运动的经历,尤其是对《武训传》、“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批判,使她对以往深信不疑的信仰开始了反思。因此在“大鸣大放”时,当她读到“北大”新闻系张元勋

所写的大字报《是时候了!》，立刻满腔热血，引发她的共鸣，卷进了鸣放的洪流。可是，张元勋绝没想到，他会为此而被判刑 8 年；曾为张元勋申辩的林昭，也因“参加张元勋反革命集团”，“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及“宁进监狱的反动立场”等罪名而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

林昭一经打入牛鬼蛇神之列，她的思想终于再一次发生突变。从此，她对现实社会不再存幻想，对自己的理想主义由破产而逐渐以经验差别是非。她理直气壮地写信给当时“北大”校长陆平，公然声称，在军阀统治下的时代，蔡元培先生尚能为学生仗义执言，你为什么不能？

此时，她又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要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抗拒，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能仰赖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打开，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由此可以看到林昭已从极左思潮中挣扎地站立起来，觉悟到人是应该有自由的思想，独立意志的。“要自己解放自己！”——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不仅直指当时风靡全国的现代迷信活动，而且具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芒。

林昭的转变，表现在对已往家庭的关系上，也一反常态。在极左思想占上风时，她对父亲彭国彦，一向划清界线，称其父是反动官僚阶级。当她反思后，发现了乃父的耿直孤高，一生廉洁奉公的平凡面又不平凡的品质。她开始内疚，并对父亲产生了亲情与敬仰。

彭国彦是国民党官僚中的一员，但，他却是国民党官僚中的“丑小鸭”。彭不是靠夤缘攀附而当上官的，他是靠真才实学考上的“县太爷”。30 年代初，叶楚傖在江苏主政时，发起考选县

长的举措,彭国彦以头名成绩获选,放任吴县县长。彭是一个传统士大夫式的书生,曾留英涂金,沾上了威斯敏斯特的民主气息,因此一上任,便公正从政,秉公办事,甚至释放了一些共产党人。但此人书生气十足,与国民党治下习气无法融合,他多次拒贿,开罪了顶头上司,又断了下面财路,因此,做了两任县长,便赋闲回家。谚云:三年穷知县,十万雪花银。但彭氏回故苏,只落得两袖清风,一身清白,依然是一个穷书生。日本投降后,彭氏任中央银行专员,应是一个财源滚滚的美差,当时物价飞涨,黄(金)白(银)独秀,中央银行有不公开的福利规定:行员皆可定期分得小金条一块,转手就可获利颇丰。而此君却认为此乃不义之财,竟坚决拒受。

在父亲眼里,林昭是他寄予希望的天才。林昭幼时天资聪慧,对文学有特殊的颖悟力,在学校读书,经常跳级,作文考试屡屡名列前茅。彭国彦因此期望女儿成为现代的班昭,故取名“令昭”。可他万万不能料及,在极左思想的主宰下,女儿竟连老父的姓氏也会抛弃,以示划清界线。若不是彭国彦与林昭的父女关系,肯定会僵化到底。

父亲的形象在林昭的眼里恢复了正常,而整个中国却变得反常:接连的大折腾,大跃进、大炼钢铁、大饥荒、大逃亡、加之大说僵话,冤狱遍地,连彭大元帅也难幸免。国家形象被畸形地扭曲,国民经济渐趋崩溃之势。这时的林昭伤时忧世,满腔孤愤,她批判共产风,为彭德怀鸣冤,写信建议学习南斯拉夫的经验。……结果又成为新的更骇人听闻的罪证。于是厄运连连:1960年10月以阴谋接翻人民民主专政罪被捕;1962年3月准予“保外就医”回家,同年12月以扩充反革命组织罪再次收监,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在两次入狱期间,林昭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她的自由思

想、意志，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已无法存身。在她的灵魂深处，舅父、母亲、以及父亲的高大身影使她真正受到震动！不自由，毋宁死，对林昭来说是唯一出路。因此，她拒绝悔改，拒绝“保外就医”，视监规如等闲，对 20 年徒刑的判决，她公然声明对其藐视，并表示“以此自傲”，“应该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要求”。

就在林昭两次入狱期间，她日以继夜奋笔疾书，被剥夺了拿笔杆子的自由，便以血书明志。1963 年秋，当西风乍起，黄叶飘零，风雨凄戚之际，林昭有感于和鉴湖女侠秋瑾悲凉身世的相似，就借秋瑾的断句为韵，写出了立志成仁取义的《秋声辞》，其中：“狐鼠纵横山岳老，脂膏滴沥稻粱贫。”“夜夜肠迴寒蛩泣，丹心未忍逐春磷。”“劫里芳华不成春，秋风秋雨愁煞人！”。这和同一时期所风行的那种到处莺歌燕舞的大手笔相比，谁更具有真实性？岂非不言自明。又如：“忧乐苍生夙愿真，壮怀激烈照天陈。吞麟谁复思汉候，蹈海我终不帝秦。”“浩歌慷慨夺江津，最是知音吊五伦”（地、富、反、坏右）“莫笑狷狂乔作态，秋风秋雨秋煞人。”则更是心字浩茫，摄魂夺魄之作。再如《自诔》一诗中有：“恶不能辍，愤不忍说，节不允改，志不可夺，书愤沥血，明志绝粒；此身似絮，此心似铁；自由无价，年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等句，简直是掷地有声，决心牺牲的宣言书了。再如：《血诗题花》：“祇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都明白地揭示林昭光照天地、气贯长虹的自由、民主的思想。这在同时代中，又有谁能写出这样贴切万众心灵的诗！又有谁敢于公然作出如此强烈的灵魂的呼喊！

然而，林昭的诗才还不足以显示她反抗的全面性。她在狱中所写的《给人民日报的公开信》，则可说是代表林昭的思想、勇气、才华的划时代的作品。是和“四人帮”及现代迷信作对抗的当之无愧的正气歌。

林昭的人生岁月多么短暂,她的人世历程远不似她父兄辈的经历,但取得了足以成为他们代表的资格,这就是林昭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深究下去,可以发现是“五四”精神的再现,是父、兄辈历经整个世纪所争取实现的,由中国文化历史中优秀遗产和西方民主自由思想所融会的产物。而林昭特殊的个性,则和她的家庭、其父母的遗传难以分开,此外,中国积弱受侮的社会背景,也使敢于反抗的林昭终成为当代大无畏的女中人杰。

出现林昭这样一个人,对历史和社会来说,应该说是大不幸,凡是个性鲜明、意志独立的人,在一个无法无天、绝无个人自由的社会里,除了委曲求全、识时务,甘作思想奴隶者外,都难逃祸从天降的结局。事实正是这样,当彭国彦听到林昭第二次被捕消息后,他深知林昭和他同样是难驯服的异类,必无好下场,因此,脸色顿变,口中喃喃地说:“我家完了!”不到一个月,一代书生彭国彦就此仰药自尽。林昭之母许宪民在“文革”中所经受的苦难,据冯英子同志说,已和遭难的样林嫂几无区别,当她为女儿付出了最后一笔卖命钱,当她活过了林昭最后的日子后,终于再无勇气生活于世,几年后,也以自杀了此残生。

林昭一门浩劫,幸而至今仍有很多人深深地记忆着,并未成为历史的陈迹,就此而言,也许历史垂怜,使长期习惯于在思想牢笼里生活的人,发现了丝丝微芒,这也许是告慰林昭一家最好的佳兆。

林昭的同学张元勋说:“林昭的事未能成为家喻户晓,是活着的人的悲哀,也是我们负疚之极的事。”比起张志新、遇罗克来说,林昭的名字似乎仍被埋葬。这悲哀何止仅仅存在林昭的亲友、同学的心中……。要解答这个问题,我想起当代美国作家弗兰西斯·福山的话:“究竟历史是经过灾难才有进步,还是历史不

过在每回浩劫间欲行又止？”

人类的历史不可能是直线发展。每次灾难后的间隔，欲行又止，似乎是常规，从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历来看，我们怎么能说历史是直线发展？

更值得提起的是，陈寅恪提出的为学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林昭则早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从行动上不惜以死捍卫之。这在当代知识分子中间，能有几希？

顾准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中声称，“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顾准的遗言，只有在林昭身上体现得最彻底，当她发现自己已成为理想主义的奴才后，立即走上彻底的经验主义，不信神、不信邪、不盲从、不妥协，高呼要自己解放自己。她在1963年6月18日写的《绝食书》竟“妄狂”地说“一息沿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试问当代能有几人敢在狱中，如此“妄狂”、如此气如长虹？！

林昭决未读过陈寅恪、顾准等名家的鸿篇巨著，可是，在风雨如晦，秋云满天，惨雾席卷大地之时，竟能有此见地并言行一致，誓不后退的，世人如林昭者，敢问又能有几希？

历史在每次浩劫间，总可能会徘徊不前，欲行又止。世上事，进步总是主旋律。

我的姐姐林昭(上)

彭令范

林昭和我是嫡亲姐妹。她原名彭令昭,父亲给她取名令昭是要她效学班昭。她起先用林昭为笔名,后来才正式改名为林昭。母亲为此感到很不高兴,认为这是姐姐与家庭疏远的一种表现。

姐姐是长女,有一段时间家中只有她一个孩子,即使父亲喜欢男孩,姐姐还是得到许多优惠和专利。加之她天资聪慧,对文学有特殊的颖悟力,很小就投稿,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曾有类似“神童”的称号。另外她身体娇弱多病,是外婆的掌上明珠。母亲曾告诉我,姐姐和小舅舅吵架,能使小舅舅气得只会哭。反正她是家中一个“宠坏”的孩子。我和姐姐都喜爱文学,但有不同的偏爱,她喜欢鲁迅,我喜欢巴金;她喜欢马雅柯夫斯基,我喜欢莱蒙托夫;她喜欢狄更斯的《双城记》,我喜欢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她喜欢华颜钧的《二泉映月》,我喜欢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她喜欢杜甫,而我则喜欢李白。她喜欢哭,她的哭是撒娇,是愤怒,是发泄,并不一定是悲哀。我极少哭,特别是经历过种种尘世磨难后,我既没有眼泪,也体验不出哭的感情。

我认为哭只能表达原始的悲哀，我的泪，流向心灵的深处。

姐姐有强烈的正义感，斗争性强，有炽热的爱，也有或许是过分的恨。这大概是革命者和英雄人物的性格。

1949年，姐姐在苏州景海中学高中毕业，那时她17岁。父母亲理所当然地要她进大学，她却暗自去考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录取后姐姐坚持要去，母亲则大怒而不允。那天深夜，姐姐起来整理了一个小包裹。我当时和她同住一个房间，就问她，你做什么？她说，不许响！然后她从窗格栅栏里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逃了出去，从前门出去到我们住的房间中间还有一条夹弄，要走一段路，而且大门晚上闭上门闭，不熟悉的话很难离开。等她正在夹弄里摸索的时候，我溜到外房叫醒了睡在那里的老保姆王妈。我说快去告诉母亲，否则明天她会非常生气的。王妈立即去了，母亲马上赶了出来，此时姐姐还未打开大门。于是母亲把她“捉”了回来，对她说，明天早上再谈。姐姐回到房里大发脾气，把我和王妈骂得狗血喷头。

事情并未了结，第二天姐姐仍执意要走，母亲坚决不许，于是形成僵局。最后母亲伤感地说，苹男（姐姐的小名），如果你真的要说的话，以后你就不要再回来了。姐姐毫不犹豫地答道，好，我就不回来好了。这一下母亲生气了，说你口说无凭，立下契约，今后一去，恩断义绝，以后“活不来往，死不吊孝”。姐姐说，好，我就写。姐姐随即拿起笔来一挥而就。她到底写的什么，我没有看到。接着她拿起包裹，扬长而去。母亲呆呆地好几天没有讲几句话。姐姐去后，大概有两三年与家里不通音讯，似乎真的断绝了关系。到后来，苏南新专的教务长罗列曾到我家和我母亲谈了不少时候。事后母亲很生气，因为姐姐在填表时，在家庭成分这一栏里填了“反动官僚”。

以后，姐姐又考进了北京大学新闻系。

姐姐进入北大后一度很受人注目。她当了《红楼》编委,又是游国恩教授的得意门生。游老先生希望她能转到中文系,因为她的文学底子好。她在那段日子里似乎自己也很得意,那年她暑假回来,给我留下了较好的回忆。有一天,她给我看一首名为《无题》的诗,我看后说,有感而发,你似乎爱上了什么人。她笑着说,小鬼丫头、你怎么知道?我答道,只是猜猜而已,讲来听听。她说,我在舞会上遇到他,他很注意仪表,举止潇洒。那天,我很随便地头戴一个由野花编成的花环,频频起舞。他请我跳了一次,他的舞跳得很好。隔了几天,我在未名湖冰场上走,他在后面引吭高歌《教我如何不想她》,我只能回过头去和他打招呼。我对姐姐说,要是我,就不回头,看他怎样?她说,反正我想他是有意。后来在《红楼》编委会上发现他也是编委之一,另一编委是山东人,对我很感兴趣,老是缠着我讲这讲那,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们交个朋友吧。我说,我们是朋友呀,他坚持要和我做进一步的朋友。我说不大感兴趣。他又说,你不妨培养一下这种兴趣……《红楼》编委张元勋等贴出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时候了!》,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张元勋因涉及“七人集团”欲往英国代办处政治避难而以参加反革命集团被捕。到“文革”时期,姐姐在上海因事被捕,张元勋曾以姐姐男朋友身份来上海提篮桥监狱探监。后来姐姐被“镇压”后,他重新又被逮捕,被吊打,说他是逃犯。我认为张对姐姐一往情深,而姐姐可能不大欣赏他的风度。

姐姐成为“右派”的详情,我不十分了解。她主要是支持张元勋他们的那张大字报。另一罪名是在北大“自由论坛”上宣扬“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当然还有不少理论观点。据说她并未划为“极右分子”。北大新闻系后来并到人民大学。合并前姐姐在北大苗圃劳动,一度与谭天荣在一起,他们感情不错,姐姐称

谭为小弟。后来谭天荣也被逮捕了。平反后谭在兰州大学任教,他有一本著作署了林昭的名字。姐姐到人民大学后在资料室劳动,与王前同在一室。后来在学校遇到另一“右派”甘粹,甘17岁参加部队,在四川参加过土改,随后南下,在军队中成长,以后保送到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在特定的环境下他和姐姐相处得非常投机,组织上警告他们不要来往,他们非但不听,反而计划要结婚。组织上就把甘粹分配到新疆劳改农场,他以后历尽艰难从新疆回到北京,那时姐姐早已被“镇压”了。一直到“四人帮”倒台,姐姐平反后,在北京开了一次追悼会,甘粹在会上唱了一曲林昭谱写的歌曲《你在哪里》,粗犷的歌声倾诉了他所有的感情。张元勋会后对我说,林昭这首歌是写给谭天荣的。

姐姐在北京劳教了两年多,因支气管扩张,经常咯血,母亲去北京把她接回上海养病。母亲常为此后悔,说如果让姐姐留在北京或者不会出事,我却认为像姐姐的个性,任何地方都一样,她的结局是不会改变的。

姐姐不论在划了“右派”之前还是之后,她的思想是不变的。她是一个革命极端主义者,没有中间道路,没有妥协,没有调和,“不自由,毋宁死”。她的志向是要改变社会,改变不合理的制度,甚至要改变人的思想意识,即使她的思维逻辑并不完全合理,但她认为合理的制度也尚有争议之处,她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姐姐回上海不久,她在复兴公园遇到兰州大学的“右派”和另一北大“右派”,因为观点相似,往来频繁,以致后来被称之为是个“集团”。他们认为对彭德怀的处理不公,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和大量人民死亡,深感到政治上有严重的错误,因未被公允处理而强烈不平。对南斯拉夫被称之为修正主义,认为是莫须有的罪名。这些观点,他们写成信件寄去北京有关方面。他们

似乎并未考虑到事情有复杂性,只以为陈述自己的意见是正常的行为。隔了不久,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派人去苏州将姐姐逮捕。

那时,父亲和母亲已经分居,父亲住在苏州,各有房子,姐姐住在母亲家里。逮捕的那天,姐姐正在母亲的房内。公安人员进来进行了搜查,把罐头都打开来看,姐姐讥讽道:如果我有能耐将情报藏在罐头里,我今天也不会在这里了。恰好这时父亲闯了进来,他立即变了脸色,口中喃喃地说,我们家完了,我们家完了!说着踉跄离去。不到一个月,我父亲自杀身亡。

姐姐逮捕后认罪态度恶劣,被判 20 年徒刑,其他二人则各为 7 年和 13 年。事实上她根本不是主犯,只是参与者,只因为她的态度是抗拒的。

1962 年,姐姐因病保外就医,我和母亲去静安分局接她。她带了一只小包裹出来,一见我们立即往回走,并说我不回去。当时分局的人都很惊讶,大概从来没有见过有人不愿回家的。在分局的门房内折腾了半天,姐姐对母亲说,你怎么这样天真,他们放我出去仍要抓我进来的,何必多此一举。后来公安人员说,你们想法把她带走就是了。但姐姐拖住了桌子腿执意不走,我和母亲根本拉她不动。最后由母亲请一位朋友家里的花匠来,硬把她按上三轮车载回到家里。

姐姐保外后,情绪渐见好转,很喜欢讲话。总是要告诉我们狱中和上海第一看守所的故事。我们都不想听,以免增加痛苦。但是姐姐偏要说,她说,哎,你们要不要看“杂技表演”?我在看守所反铐了一百八十天,我给你们表演一下,反铐了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脸、吃饭和大小便。母亲说不要瞎说。姐姐说,真可惜你们不要看我表演,因而丧失了一个机会理解二十世纪的一种特殊生活模式。她说着,空气似乎凝结了,我们都无言。

这时候,姐姐和母亲常常发生龃龉,有时为了生活细节,有时也为了经济和前途。有一天深夜,母亲数落了姐姐几句,姐姐说,你要我走,我就走好了。说完就往外跑。母亲马上对我说,快跟着她!于是我立即追着她下楼,追上了她,说什么她也不肯回来。我最后只能说,姐姐回去吧,夜深了,我明天还要上班。又等了一些时候,她才慢慢地走回来。

母亲很自信,总认为姐姐在她身边不会出事,于是把姐姐带回了苏州。在苏州她遇到了另外两位“右派”,由于姐姐对“右派”有深切感情,她与她们立即引为知音,演出了一场什么戏剧我并不清楚,1962年年底姐姐再度入狱。以后,姐姐被囚于上海提篮桥监狱。但是我们不被允许去探监。有一次一位与姐姐同禁于一囚室的人释放出来,找到我们说了些姐姐的情况,说她身体虚弱,经常咯血,但还绝食抗议,割破血管或用针刺出血写血书,她处处与监狱管理人对立,态度强硬,看样子凶多吉少。

我最后见到姐姐是在1966年年底,那时“文革”已开始,母亲已被批判,编入“学习班”。我接到监狱接见通知后,因没有钱,不能买姐姐要的全部东西。去见的日子正逢全市大游行,全市公共车辆停驶,我从早晨8时出发,走了5个多小时,才看到提篮桥监狱灰色的墙。

我递上了接见通知,那门房警卫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让我进去排队。那铁丝网分隔着家属和犯人,看守检查着送去的东西,我站在那里茫茫地等待。许多比我晚来的家属都已走了,只有一条长凳上坐着我一个在那里,我实在太累了,我似乎忘记了我还没吃中饭。到夕阳的最后一道余晖闪耀的时候,一个监狱人员走过,我就问道,还要等很多时候吗?他没有正视我,但很快地回答我,你还得等!难道等待就是我生活的主题吗?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过《基度山恩仇记》,我特别欣赏它的结束语:

“在上帝揭露人类的未来以前，人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两个词里边：‘等待’和‘希望’。”然而无穷无尽的等待是难以忍受的。

最后，当所有的家属都已走光，犯人们也都回到监狱，姐姐出来了。她浑身素缟，上穿白衬衣，下穿用白被单做成的白长裙，她的长发从头顶部扎起一把拖在一边，就像京戏中旦角受刑时的打扮；另外，在她的额头用一块白布条围住，上用血写了一个“冤”字。她慢慢地走了出来。我懂得了为什么我得等到最后一个接见。隔着铁丝网，我轻声叫了一声姐姐。她说，怎么妈妈没有来？她已经开始不高兴了。我说她在苏州不能来。她说你带来些什么东西，我要的席呢？我说我没有钱买。她说，哼，母亲不在，你就用不着来看我。说完转身就往回跑，甚至看也没看我一眼。我把旅行袋交给了看守，仍呆呆地坐在那里。我不知道后来自己是怎么走回去的。我没想到这是我们姐妹一场最后一次的见面，而且她还生我的气，她还不知外面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展开。

1968年5月1日，我从乡下回沪休假。下午二时左右，我听到有人在楼下叫母亲的名字，我就开门出去，上来一位公安人员，他问是林昭家属吗？收五分钱子弹费。母亲问什么？我非常冷静地从抽屉里拿出五分钱给他。当母亲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后立即晕厥过去。

姐姐罹难后，我们没有见过判决书，也未看到任何公开审判告示贴出，像当时一般判死刑犯人一样。大概半个月后，母亲的一个学生黄雪文，要我有空去他家一次，他住在虹口区离提篮桥不远。我去后，他告诉我在他家附近一条街道的电线木杆上贴着有关林昭的判决。他说，你如果要去的话，到天黑了带一只电筒去，不过得小心。我又紧张又焦虑地找了许多时候，终于在那不受人注意的电线木杆上找到了那“非正式”的宣判，那种打

印不清的字，文理欠通的语句，读来很吃力。在幽暗的电筒光下，我背下了判决书。我的心沉沉的，正如死一般寂静的夜晚。

打倒“四人帮”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历史的审判》，其中有一段关于林昭的记载，成为林昭平反的序曲，应该感谢陆拂为先生给穆青先生提供了材料。此后陈伟斯先生在上海《民主与法制》上写了一篇《林昭之死》的文章。不久后上海静安区法院开始对林昭案件清查。其间我曾去提篮桥监狱访问过监狱医生，他曾一度为林昭而受过处分。我向他了解的一些情况均属第一手材料，包括姐姐在世的最后几天，以及从病床到刑场，还有姐姐在临刑前监狱内开的审判会的情景和龙华执行时见证人所说的，这一些我都不想说也不忍说了。

姐姐已去世 30 年了。我经常在梦中见到她，见到她不高兴的样子，醒来总觉得无限的伤痛。我既不能捍卫她的信仰，藉承她的写作能力，即令写一篇有关她的文章大概也不会使她满意。她的淳正朴实对真理的追求，她的真挚炽烈的爱和恨，她的不屈不挠执著的信念，还有她毫不妥协的牺牲精神，或许正是这伟大而可悲的时代所缺少的应有的品格罢。林昭的道路也许将湮没于下一世纪的曙光中，我希望年轻的一代不再承受林昭的种种痛苦与磨难。新世纪的宠儿们，当你们沐浴于阳光灿烂、欢乐充盈的新时代，是否会留下神圣的一角来悼念林昭“未完成”的杰作呢？

我如今在异国求生存，中年从零开始另一种生活和职业是很艰苦的。我仍有我难言的痛苦，没有归属的空虚，但我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平庸之辈和失败者，甚至还不甘心像茨威格那样留下“遗书”，我的最终一切有赖超自然的控制。

相见则是缘，能成为亲姐妹当然更是缘分。不过我不相信来世，就像歌德说过的，如果是幸福、快乐的一生，此生已足；要

是痛苦、坎坷的一生,又何必再来?幽冥异路,我和林昭姐妹一场也就从此终止了。深深的遗憾也难以弥补,淡淡的欢乐已不再复现。

一切认识林昭的人,请在你们繁忙的生活中留下几分钟来悼念她吧,她是爱你们的,这种爱,甚至远远超过我们姐妹之情。在我失去姐姐后,感谢你们把我当作你们自己的妹妹一样。当我第一次听到姐姐的新专同学陈样孙对我说,令范,林昭已不在,而你是我们大家的妹妹。我听了是很感动的。

无论生活多么不公正,无论人性多么险恶,那一道人性至善,充满希望的圣光永远存在。

姐姐,安息吧!

我的姐姐林昭(下)

彭令范

“北大”风云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最高考分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在这座民主摇篮里,她犹如投入了慈母的怀抱,她满怀信心地希望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记者。她的写作计划满满一大堆,她要为写《二泉映月》的瞎子阿炳写传记,要改编鲁迅的小说《伤逝》成电影,她因为参加过土改,要写一本《中国土改史》……她成了急待展翅飞翔的海鸥。同时,她也如同当时敏锐的知识分子一样,面临了早春天气的压抑感,当她看到电影《武训传》被批判,又经历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她产生了一种迷惘与不祥之感。到1957年的5月,她看到未名湖畔垂柳碧波,花儿在开放,整风的消息传来。她在5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样的春天,到处谈论着整风,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期待着……昨天出现了第一张责问主席团三大的代表由谁选出的大字报,随后出现了用大字报帮助党整风的建议……夜里,大饭

厅前出现了更多的大字报。这可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5月19日，由学生张元勋等贴出《是时候了！》的大字报，用诗的形式，写出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这首激情的政治诗，激动了林昭，她沸腾了，当她看到有人反对这首诗时，她说，是这样的吗？不，绝不。她也忍不住写诗支持《是时候了！》这首诗。自此，她全身心地卷入了这一民主浪潮。

与此同时，学生谭天荣在广场上发表了演说，并与人展开辩论。到处是一团团的人群。林昭对谭天荣的演说发生了兴趣，使她震惊，她认为他是一个能独立思考、不墨守成规、敢于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敢于触动权威、富有创造性的人。她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祖国最需要的。她满怀喜悦地注视这位同学的风采风姿……

至25日，校党委书记江隆基作了讲话，认为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要求全体党员虚心耐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不要沉不住气，要继续支持大鸣大放。

可是到26日，广场出现了“反对恶意煽动诽谤！”“马列主义卫道者万岁！”等标语，出现了新的辩论。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说随着运动的进展，出现了一些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右派分子乘机

向党进攻……

林昭失眠了。她眼看到一些敢说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神经错乱,是“狂人”,是“疯子”和“魔鬼”。她在日记中写道:“是这样的吗?不!不是!”“……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然而任何怨言都无济于事了,这只刚学会飞翔的海鸥,一头栽进了罗网,戴上了沉重的右派帽子。

林昭于是像牛虻一样疯狂了。她把一切启蒙她的人都看作了“蒙泰里尼”。她向就学过的苏南新专的一位老师发出了“责难”:“你们为什么当时教育我要诚实、坦率,而没有教我如何做人?”她由怨恨与悲愤交织在一起的情绪,喷发为疯狂,由疯狂而走向绝望。她在绝命书中表白:“我的悲剧是过渡时期的悲剧,人们只看到我流泪,却看不到我心头在无声地流血……”她对那些在历次运动中用别人的血来“染红面貌的人”是深恶痛绝的。她说:“我不爱也不能爱所有的人,那些折磨过践踏过我的人,愿我的影子永远跟着他们,让他们永远记得曾出力把我拉开生活,杀死我,让他们身上永远染着我的血。”

林昭自杀被抢救后,她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林昭这些绝望中的表白,在当时自然只能得到“罪加一等”的回答。

痛定思痛

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林昭在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主要的工作是为学校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整天查阅过去的旧报纸。工作由王前(刘少奇同志前妻)领导,还有一位是人民大学学生、被戴上了“右派分子”

帽子的甘粹。王前对林昭等十分同情,对他们没有多加管理,她见林昭身体不好,还时常送些食品给她。这一年多时间,林昭的生活还算平静。

可是林昭的心情并不平静,她在思索,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规模的群体性的大冤案?为什么好心帮助党整风提出的意见,统统被都说成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行?

她时常徘徊于天安门英雄纪念碑前,她景仰革命的先辈,她也在这里寻求答案。她的难友劝她不要碰硬,鸡蛋是碰不过石头的。她立刻严正地回答说:“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亿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也会被击碎的!”她又在日记中写道:“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她在心力交瘁中不断地求索,但是现实所回答她的却是绝望。她痛苦莫名,她病了,病得不轻,孤身只影在北京,是说有朋友可以照顾,但在卧床治病中却必须有家人照料。我母亲得知消息后,急忙来到北京将她接回上海去。

林昭的病经过调养后,渐有起色。她是一个不耐寂寞的人,总是经常要出去走走,去图书馆、去公园。在日常去公园散步时,逐渐认识了几个青年朋友,时间久了,相互间不免要纵论时事,漫说中外。1958年,中国大地上又出现了一场极大的折腾,“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天等于二十年”、砍尽树木大炼钢铁等浮夸风弥漫全国。他们几个人谈论着那种“瞎指挥”的“共产风”,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多久他们又眼看着生产萧条的景象,物资迅速匮乏,什么也买不到,街道上排满了长队,人们因营养不良体质迅速下降,浮肿和肝炎很快地蔓延,而到处

的大哄大嗡依旧。林昭和她的几个有共识的朋友们,率直地对当时那种随意性极大的左倾政策表示不满。他们又谈到庐山会议彭德怀按照组织原则如实反映了情况后反而受到批判和撤职一事更觉得是非颠倒。他们怀着赤子之心表达着自己的共同看法,编了一本名为《星火》的刊物,陈述着他们的针砭时弊的文章,林昭在刊物上写了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编印未被批准的刊物,本是不合法的,但是他们纯粹为一股政治热情驱使,不顾一切地倾吐着他们的衷肠之言。他们看到了一本《南共纲领》的书,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与中国有类似之处,很值得参考借鉴,于是也写成了文章。以后他们又将这些问题综合起来写成一篇报告,准备寄给领导机关参阅,希望对某些错误的政策有所改正。不消说,这是一种极危险的探索方式,结果他们都没有预料到,他们以“反革命小集团”的名义被捕了。

这是噬脐莫及的事,然而林昭却并不后悔,她认为为了申述自己思想的目的而付出代价是不奇怪的。她在以后的日记中曾谈到这件事,她写道:“有一天傍晚,林肯驾车回家时,看见一头公猪陷于泥淖,拼命挣扎已经下沉到一半,眼看快要灭顶。林肯想下车把它救起,一低头看到自己穿的是一套仅有的整齐衣服,不免迟疑,便匆匆驾起车走了。走上半里,耳边似乎一直听到那头猪在呼叫,终于还是调车回头找那泥淖。林肯费了九牛之力,几乎成了泥人,终于把那头猪救了上来。事后人们虽称赏他的行为,但都认为这样做不值得。林肯说:‘我不是为那头猪,我为自己的良心。’”亚伯拉罕·林肯一句短短的话,终于成为林昭信守的良知。她为对得住自己的良心而甘愿付出一切。这一次,她由一个“右派”劳教分子升级到了“现行反革命罪犯。”

狱 中 八 年

姐姐是在1960年10月被逮捕入狱的,先拘留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度音讯全无。母亲千方百计想得到一些她的消息,多方奔走仍毫无结果。一年多后,她转到静安分局关押,才有信出来,说可以送一些钱和她所要的东西进去,但是要见面就很困难。母亲每次送物回来,总是很沮丧,因为知道了姐姐在里面“表现”很坏。姐姐每次来信,总是要白被单,我们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到后来才知道,送去的白被单她都撕成条条用来写血书。

姐姐在1962年被准许保外就医。她回家后,讲了一些在看守所和监狱里的情况,她对有些看守人员深恶痛绝,尤其是在一所时,有一个女狱警非常残忍,姐姐称她为“不中用的警犬”,姐姐经常针锋相对地对她对犯人生活上非人道的虐待有所指责,姐姐有时整天呼口号“要人权”,大呼“犯人也吃饱饭”等等,直到呼叫到声嘶力竭,然后她就开始绝食。至一二天后他们将她送往监狱医院去吊盐水针。

在一所时,大都是所谓“政治犯”,所以都一一单独囚禁。开始林昭的斗争影响还不大,由于她的“不安分”,个别狱警对她恨之人骨。姐姐常在他们当班时高唱革命歌曲,大声要求给囚犯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合理的待遇,如果他们不理她,她会整夜敲打狱门。

在判刑后,有一度她关到提篮桥监狱。她仍单独囚禁,但比之一所与其他人的隔离情况似有改善。有一次狱中伙食忽然少了,也根本没有所谓二周一次的“改善生活”,她就发动其他人拒绝用餐,并带头喊口号,跟她喊口号的并不太多,于是她立即引吭高唱《国际歌》,这一下所有的犯人都高声附和,狱中仿佛沸腾

起来了。后来当局立即以绝食为借口将姐姐送进监狱医院。

姐姐第一次被送进医院时,对主治大夫就大骂了一通:“哎,你这位医生,是救人的还是杀人的?像你这种人会有人道主义吗?你不要碰我!”这回第二次进来,她对主治大夫的看法渐渐改变了,大夫对姐姐轻轻地说:“请你安静些,在这里多住几天,这里毕竟是医院。”说完就悄悄地走了,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以后他总是暗中设法在一定范围内照顾她,尽量地给予方便。林昭的名字从一所到静安分局监狱都是赫赫有名的,监狱中的人都知道。在分局监狱中,还有一位狱警老人,对林昭也非常好,起先她还同他闹,他等她发作完后一面摇头一面说:“你何必生这么大气呢?留些精神吧,已经够你受了。”林昭遇到医生和这位老人时,少受不少痛苦。

对林昭施行虐待的狱官,她自然是冷眉怒对,她除了放声大骂外,还割开血管写血书,例如她在一首诗《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中写道:

向你们,
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
无声无息,
温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

她经常以血书抒发胸中之怒火。另一首用血写的诗中写道:

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洗吧！
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
谁能抹得去？

林昭在狱中曾写了一首《家祭》的诗，怀念她的大舅父许金源。三十七年前蒋介石“四一二”事变中，许金源担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时，被国民党抓去装入麻袋抛入长江中。现在林昭在身陷牢狱中想起舅父时不禁失声痛哭：

.....
三十七年的血迹谁复记忆？
死者已矣，
后人作家祭，
但此一腔血泪。
舅舅啊！
甥女在红色牢狱里哭您！
在《国际歌》的旋律里，
我知道教我的是妈，
而教妈的是您……

历史的变化真是如此地不可解，林昭分明踏着革命烈士的血迹前进，却得到了如此悲惨的摧残！

与姐姐拘于同一室的一位基督徒俞以勒，成了姐姐的好朋友。她俩相约如一旦分开，用敲击和停顿代表英文字母的密码

联系,不久真的分开了,幸而正在邻室,她们的密码就用上了,借此经常谈话。

俞以勒出狱后,曾到我工作的医院来看我,并告诉我姐姐在狱中的情况。她感到特别痛苦的是林昭经常写血书,她的二十万言的“上书”写完后,纸笔都被没收了,因此她改用血书,起先只是用血写些诗,她用牙刷柄在狱中硬地上磨尖后,刺破血管用血写在白被单条上。俞以勒说她是一位勇敢异常的女性,但是她身体显然已每况愈下。

姐姐一度保外治疗时,我们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多的白被单,她支吾其辞。当我们看到她手腕部有血迹斑驳的伤痕时,母亲立即把她衣袖拉起来,手臂上也全是小的切口疤痕。母亲当时放声大哭:“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呀!”当俞以勒告诉我的时候,姐姐的手臂一定是更惨不忍睹的。

1962年8月29日初审开庭时,林昭在日记中回忆说:“法官问:‘你有病吗?’可是十二分抱歉,可敬的先生们,管有什么病也得,可能这个年轻人在反右后以及其他许多事件重重刺激下有了精神异常现象,但至少不比先生们更加精神异常得厉害!”

林昭在狱中以呼口号、写血书、蔑视法庭来表达良心的抗议,她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这就出现了她在狱中的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狱警们一再警告她:“我不制服你这黄毛丫头我们就不相信!”林昭在日记中写道:“原来你们还有一条黄毛丫头必须制服的条例,那也好,黄毛丫头除了奉陪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狱方确实小看了黄毛丫头。于是批判的武器改为武器的批判。林昭写道:“这么地,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就开始了。而这事情也跑不了两种可能……(以下字迹模糊不清)非刑虐待光是以镣铐,人们不知玩了多少花样。一副反铐,两副反

铐,不行,时而交叉等等,至今臂肘之上,伤痛犹在。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性的在我绝食之中,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之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镣铐,从未为我减轻些,譬如暂时除去一副。天哪,天哪,这是真正的地狱,人间何世?”

姐姐在提篮桥监狱时,有一次母亲和我曾去探监,经过一道道戒备森严的大门,警卫都以奇特的眼光打量着我们。最后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内见到了她,她步伐缓慢地走出来,身体十分虚弱,只有眼神炯炯有光。当时公安局希望母亲能说服她坦白认错,他们也就借此下台。母亲对姐姐说得口干舌焦,姐姐什么都听不进去,什么都不接受。她对母亲说:“你怎么这样天真,他们是不会放我过门的,我一定会死在他们手中。”母亲说:“你可以不让自己死在他们手中,眼光放得远些。”“这是不可能的!”姐姐斩钉截铁地回答。母亲又气又急,提高了声音说:“苹男(姐姐的小名),你脑子放清楚一些,你死后谁也不会追认你为烈士的,你死在沟壑中,无声无息……你的所作所为,只会给我们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母亲还未说完,姐姐毫不犹豫地接着说:“那也只能对你们不起了,我为真理不惜任何代价!”

以后我又到提篮桥监狱,又作了一次探监,谁知道这是我与姐姐最后会见的一次,详情已见于前文(注:见本刊1998年第5期)。除此之外,林昭在北大的同学张元勋,在姐姐就义以前他是最后去探监的一人。张元勋戴着“右派帽子”冒着风险而去,他深知不是直系亲属是规定不准探监的,他机智和勇敢地用着“未婚夫”的身份才获得狱方的准许。但是狱方还仔细地查对,决不听探监者的一面之词,查对的第一对象就是犯人本人,他们问:“张元勋和你是什么关系?”灵敏的林昭所回答的正和张元勋所提的“未婚夫”对上了口径。

张元勋在探望姐姐的谈话中,她已知道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她告诉他:“他们要枪毙我!”她并不畏惧。她嘱咐张元勋,将来把她的文稿整理出版,诗歌集名为《自由颂》,散文集为《过去的生活》,书信集则为《情书一束》。但是她的文稿由于散失过多,加以时机不合,她的遗嘱至今仍未得实现。

张元勋先生的勇敢精神,除了他和林昭深厚的友谊外,他对正义的崇奉,对是非的严正立场是十分明显的。

1968年4月,林昭终于从有期徒刑二十年加判死刑,立即执行。她在接到判决书时,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我家在1968年4月30日付了子弹费以后,不久母亲的朋友朱太太来电话叫我们到她家里去一次。我去后发觉她家里气氛沉重而又异常。她先问我有无姐姐的消息,姐姐在执刑前几个月她们没有她的音讯。我就把付子弹费的情况告诉了朱太太,她听后立即脸色灰白,沉痛地说:“这是真的了。”在我追问下,她告诉我,她的大儿子祥祥每周二次在龙华飞机场勤工俭学,4月29日由同学送回家时已面无人色,神情呆滞,半晌讲不出话来。朱太太追问发生了什么事,那同学说:“我们今天在龙华看到枪毙人,是个女的,祥祥看了立即变色,说是认识她的。”等那同学走后,祥祥突然哭了起来,说:“大姐姐被杀害了!”因为他的精神受到了打击,先要他休息。到第二天朱太太向他问个究竟,祥祥说他们一帮勤工俭学的在机场内做些杂务工,每天下午三时左右结束。那天结束后,在机场内多玩了一会儿。到三时半左右,突然望见有两辆军用小吉普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

三跑道,接着由两个武装人员架出--反手绑架的女子,女子的口中似乎塞着东西。他们将她腰后踢了一脚,她就跪倒了。那时走出另外两个武装人员对准她开了一枪,当她倒下后又慢慢地强行爬起来,于是他们又向她开了两枪,看她躺下不再动弹时,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快疾驰而去。祥祥说,他当时几乎叫出大姐姐来。朱太太再三追问他是否会看错,祥祥说绝对不会错,大姐姐有她的特点,只是更瘦了。身上穿的像是医院里的衣服。我听后,我只说最好你们暂时不要告诉我母亲,她可能受不了。

在回家的归途中,我脑海里浮起的只是这一幕血淋淋的惨象,龙华、四月、自由、五分钱子弹费、母亲的泪……

过了几天,有人转告我,同狱一犯人在一次公审大会上看到审判林昭的经过。林昭是被拉到台上的,因为林昭在狱中无人不晓,犯人们见到她出来都呆住了。林昭被带出来时,她的口中塞了橡皮塞子,这种塞子能随着张口的程度的大小而伸缩,专防囚犯喊口号用的,因此她越想张口,塞子就越大,整个面颊都会鼓满起来。另外还可依稀看到她颈部的塑料绳子,这是用来扣紧喉管,防止发声的。这些都是监狱对特别“危险”的囚犯的处理办法,不过双管齐下尚属罕见。林昭的脸发红发青,她眼中燃烧着怒火,许多人看了都感到十分难过。

按照常规,狱中公审大会开始时,只要囚犯一押上台,下面犯人们便要大声呼喊口号,但是那天审林昭时竟寂静无声。主持人立即大怒,吼道:“你们这些囚犯都死了吗?”然后就领头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的口号,而和者却并不很“热烈”。转告我的那位讲得十分详尽,我听了却无法表达我的感情,只觉得一股寒冷面逼人的气流注入我的心胸。

林昭执刑后几天,我们收到通知去提篮桥监狱取遗物,我陪

着神志恍惚的母亲一起去了。在门房递上通知单,所有里面的警卫都又以奇特的眼神看着我们。母亲很哀伤,抽噎不止,我的面部一点表情也没有。这次取得包裹一只,内有棉袄一卷已完全拆碎检查过,血迹斑驳的被单若干和不少白布条上模糊的血书,还有几件衣服。我们反复寻查所谓遗物,难觅片纸只字或林昭在狱中多年的别的留存。

林昭虽在含冤中被镇压,但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与外界的联系中,我感觉到社会的正义力量支持着林昭,尽管那些支持并不能改变林昭的命运。

我记得,姐姐在第二次入狱后,曾住过上海精神病院作精神鉴定。精神病院院长是著名的精神科权威栗宗华医师,他亲自为林昭作精神分析。在“文革”中,栗医师因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和林昭两个病例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几乎也划为反革命,罪名是包庇反革命分子,想以精神不正常为理由来开脱严慰冰和林昭的“滔天罪行”。栗医师为此抑郁成疾,不久便逝世。当年在《二医战报》上有栗宗华的专辑,摘录了栗与林昭精神分析的对话。林昭说:“我父亲曾对我讲,利用青年人的纯真热情搞政治是最残酷的。政治是骗局,尔虞我诈。过去我一直不信,当悟出真理时已太迟了,现在我已超过了受骗的年龄,但尚未到达骗人的阶段。历史将宣告我无罪。”那期专辑中猛烈诋毁栗宗华医师不学无术,包庇反革命。而栗宗华曾对人说,林昭是个难得的人才。

80年代初,我向上海高级法院院长关子展提出对林昭案件平反复查问题,受理后由静安区中级法院院长赵凤岱承办该案。当时《民主与法制》杂志的陈伟斯先生曾去采访,看到有一房间关于林昭的档案。在这期间,有一天我接到通知,上海公安局有人为林昭的事要找我谈话。我在外滩的一间办公室内见到了这

位同志,他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他要见我的目的。在谈话中我才明白他要告诉我一些有关林昭的情况,他对林昭的一切比我要清楚得多。他告诉我林昭的案件自始至终在公安局内部有两派意见,从判刑处理、执行到目前平反复查其分歧之大不可调和,因此平反的事甚感棘手。他告诉我内情的一番真意我很感激,我知道了他在林昭问题上持反对意见的。

为了要寻求细节,我决定乘案件平反复查之时,前往监狱医院去采访那位给姐姐看病的医生。我为了确保访问成功,事先即托人了解那医生愿否见我,能否讲一些林昭的情况。托人去了解的结果,他说了一句:“医院是不会让她进来的。”我于是决定直闯监狱医院,到那边我向门卫说明林昭被“四人帮”杀害,现正进行平反,要向医院了解些情况,门卫打通电话后让我进去了。我在一间像护士室的小房间内等候,约十分钟后那位医生进来了,他个子虽小但显得精明能干的样子。见面时他有些紧张,我说明来意后他有些惊讶。在谈话中知道,林昭在医院中住了不少次,多数是由他给她诊治的。他的内心是对林昭持同情态度的,总是设法让林昭在医院里多住几天。他说,她是一个“任性”的女孩子,有极强的煽动性,在治疗中稍有一些恢复的时候,就又宣传起她的政治主张来了,她能说会道,影响很大,文笔又快,刚好一点,就“上书”、“参本”,忙个不停。她来住医院,起先主要是因绝食而抢救,后来有几次因写血书把血管切得太深面流血不止才送来医院,也有因咯血不止而入院的。他说,林昭去精神病院鉴定也是他提出来的,因为她常常说其他人包括医生在内都要谋害她,他觉得她的思维有时给折磨得不正常。人是很残酷的,他只觉得她太可惜了。他因为“包庇”她,起先他被“靠边站”,后弄去劳动了一年多。他说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所做的唯一不违心的事。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力救她。她最后一次来

医院是大咯血，人瘦得还不到 70 磅。他简直认不出她来了，只有她的眼神仍闪烁着光芒。趁没有人在旁时，他对她说：“唉，你又何苦呢？”她轻声地回答：“宁为玉碎。”他有些不好的预感。果然有一天上午，三四个武装人员直冲进病房，把林昭从病床上强拉起来，当时她还在吊葡萄糖，那几个人大叫：“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林昭毫不畏惧并从容不迫地说：“让我换件衣服。”他们说不行，随即像老鹰抓小鸡似地将她架着走。她在门口还对护士说：“请向×医师告别。”医生说，其实他当时就在隔壁病房内，听得很清楚，他说他不敢出来，他只觉得自己浑身正在发抖。他说当了一辈子的狱医，从来没有看到任何犯人从病床上拉起来立即开了公审大会就去执行的，他不知道她犯了什么罪，也不想知道，他没有能力去辨别。当她慷慨激昂地在病房传布她的言论时，他总是远远地躲避。他也从不要看她的“万言书”，这样才能与她保持纯粹的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他曾对领导说，他从来不知道她的政治主张，他只是看她的病。他最后对我说：不知道你想了解什么，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但想到你姐姐最后一句话向我告别，或许你姐姐还是希望告诉你一些我知道的事实真相。

谈话后我的感情都浸沉于那些阴森的画面中了，脑际呈现出姐姐在最悲惨的日子中的刚强的身影。我正想着，医生已经站起来了，他向我握手道别，我向他道谢，他一言不说，只是摇摇头。当我走出门回头看时，他木然地站在那里，像一座塑像一样。

我离开提篮桥监狱大门时，我回顾了一下，这道灰暗高墙的阴影将永远伴随着我的余生而难以忘却……

姐姐早在 60 年代初就说过“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她的被平反、恢复名誉正是 20 年以后的事，如今又将过去了近 20 年，林

昭的故事才得到一些公开的昭示,可是她能获得真正的历史的评价,恐怕还在遥远的将来了。历史无情,当历史的洪流将千万人卷走时,什么痕迹也留不下来,林昭或许只是最后升起的一星泡沫,一瞬间也就归于虚无——不过我坚定地相信,林昭的人格是永恒的。

1998年11月写于美国巴尔的摩。

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张元勋

1998年的9月里,一套包括《原上草》、《六月雪》、《荆棘路》的《思忆文丛》的问世,向今人重新提起一个过去了的话题。

今天,年龄最小的也应不低于五十八九岁的人们才能赶得上过去了的那一场风雨,也就是说:由于“扩大化”而造成的五十五万多的不幸者们,今日幸存者都已进入暮年,而相当多的人都已进入坟墓!

今天,年在五十五岁以下的人们,他们当时尚属婴幼儿,对那一场风雨则忆中不存,更勿论今日之三十岁、二十岁的青年一代,那就更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了!

当年的受害者与知情者们相继谢世,苟活者则年日老而人渐稀,大有“知情者死,信史将绝”的危险!这正如《荀子》所谓之“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非相篇》)。时间可把一切的存在化为乌有,把一切的美与丑、功与罪都消失净尽,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造化常为庸人设计”的千古常情!

历史终于走到了今天,《思忆文丛》的辉煌问世,把讳莫如久的重要话题重新提起,把四十一年前的一代大案的庐山真面展

示给世人,并留给历史,让后人不再在被蒙骗、被封锁中知焉不详。

但是,《思忆文丛》还不是“1957年史”,只是一个“文丛”而已!从那里看不出这些文章诞生的时代面目,更看不出他们的作者的命运。所以,钱理群先生还说:“我还想关照历史运动的参预者‘个人’的命运,这其实是我在重读这些《言论汇集》时,特别感到兴趣的。——我以为缺少了这样的关注,我们的历史叙述将是不完全的。”(《原上草》:《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下同。)这里提到“个人的命运”!这提法是很好的。

北大百年校庆,昔日的受害者与知情者们欢笑雅集但总感到一种凄然与失落的氛围异于当年,大家说来说去,话题唯在怀旧,竟无一人询问这些受难者1957年之后的苦难的历程,(其实那是最重要的话题!)回避语涉关于“个人的命运”!

为什么呢?这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在我们这些老校友的北大记忆里,原是深藏着那一段或难堪,或痛心,因而‘不好说’的历史,谁愿意轻易搅动……”

是的,就1957年的北大来说,师生之间有1500人因“扩大化”而被开除了公职与学籍,发配于穷山恶水、荒原大漠之间亡命了之,二十二年后,又把这“扩大化”了的1500人无一例外地平反,也就是说,就北大来说“扩大化”已“扩大”到无一正确全盘错误的程度!这多么令人触目惊心!二十二年,那人生最美好的一段岁月便在这“扩大化”中丧尽!若无十一届三中全命的伟大决策,这些人便会与全国五十五万不幸者同作冤魂、同归于尽!四十一年之间,我们全年级竟有近十位同窗英年早逝,时运的坎坷,生计的艰辛,过早地夺去了他们才华横溢的生命!陶尔夫、刘绍棠都是我们尊敬的学长,却不料“天戕良人”,使他们太早地离开了复苏伊始的神州大地,使我们母校百年聚首的相约

化作终古的悲哀！

但是，我们的话题所及仅此而已！对于“善终”者哀于言表，而对于在 1957 年风暴的延展中惨死于“人民”枪口下的北大冤魂，却无人提起！这是为了什么？我想：谈到被杀者总会牵动起更多的思考，所以仍然回避语涉“个人的命运”。

而非常遗憾的是：《原上草》并没有记述那群人“后来的行踪”，甚至连死难者的名字也一个未存！也就是说：死难者的遗作当时还未被北大的执权者们所留意，以致遗漏在那本作为“大批判”时的反面教材的《右派言论汇集》之外，他们悄然凶死，连遗音也悄然迷失！

哲学系的学生黄宗羲绑赴刑场，临刑前对他的妻子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一点找一个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被杀在 1958 年。

西语系英语专业的学生顾文选，1966 年夏自河北省某劳改农场逃出后未久抓回，被引渡而归，即被处死，其时无妻室，故无遗言。

化学系的学生张锡琨，企图越狱而被处死，时间已是“四人帮”垮台后的 1977 年。他的遗体由他妹妹领走，掩埋于四川盆地。

而中文系新闻专业的 1954 级女学生林昭之死，则由于密杀及灭尸更被掩盖得毫无踪迹！

她死得惨烈，死得冤枉！

我的案头放着一份 1954 年 8 月 15 日的《解放日报》，其 7-11 版刊登的是《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四年暑期招考新生录取名单（华东区部分）》在第十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生名单中有一个“彭令昭”。当我们负笈京华，聚首燕园的欢乐的日子里，“彭令昭”一直是名下无人的“隐君子”。两个月过去了，

在杨晦先生为全年级开的《文艺学引论》的阶梯大教室,我们终于弄清了那个叫“林昭”的姑娘就是“隐君子彭令昭”。她在全年级的“亮相”,是因为系办公室的冯世澄先生举着一捆寄给“彭令昭”的书,并且喊着这个名字,而从座间起立跑到冯先生旁边的却是林昭。当时有个新疆的男同学名叫买买提·塔吉里克,据说他来北大之前曾是新华社新疆分社的社长,现在他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和我同住在十五斋,林昭被系里指定做他的“辅导员”,帮助他讲解一些课程难点,所以,她常来十五斋,我们因之也就与她很熟。她是苏州人,“令”与“林”是同音字,她的乳名叫“苹男”,爷娘唤女皆呼之,或单唤作“苹”。(譬如:1966年,她的母亲许宪民先生给我的信中用“暗语”般地语言告诉我林昭的初判刑期云:“苹年二十”便是。)年稍长,“苹男”之外,爷娘又唤作“令昭”,她自中学即投稿发文,亦以“令昭”为笔名,后则改用“林昭”,盖以“令”、“林”是同音字。此处对她的名字的说明是为了纠正当今的某些文章中的枉说,说她“非常像”、也“非常爱”林黛玉,自己才改为“林昭”的。其实,林昭是最不喜欢别人说她是“林黛玉”的,“林黛玉”这个文学形象在“红学”专家们的文章中褒奖得几成完人,而在人们的现实思考中却是一个缺点与弱点太多的女子,故像林昭这样熟通《红楼梦》的北大中文系女学生,我们称她为“林姑娘”时,她或可领受,而若真的说她是“林黛玉”时,她会怒不可遏,感到是一种羞辱!一年之后,大家相处已熟,有人或偶戏称之为“林黛玉”,但只能是背地里的微辞,而非源自她自己的声张。而这主要是由于她确实瘦弱,而且又确实褒现了勤学善思、语多卓见的特点!——这些作为人的素质表现上值得注目的优点,如果集之于一个年轻姑娘身上,则更会引人惊叹。

我第一次与她交往,是在图书馆的缮本书库里,她正在那不

太亮的台灯下翻阅着一大堆线装书,我看出那是《毛诗郑笺》,后来我们从图书馆里出来,在南阁、北阁旁的逶迤小路上,她边走边对我说:“《邶风·七月》:‘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说的是什么?我看说的是女奴隶为奴隶主的小姐作陪嫁奴隶的制度,她们陪嫁异国,就永远不会再见到自己的生身父母,所以‘伤悲’。古代的学者早就指出:‘妇人谓嫁为归,’还说:‘诸侯之女称公子也。’可见‘公子’是贵族小姐,不是少爷,现在许多注本,都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女奴悲伤,害怕被奴隶主公子掳去,受到侮辱。’岂不荒唐!”她又进一步分析说:“其实,我看整篇《七月》几乎用了极大篇幅描写了奴隶主为他的女儿准备出嫁的细节,从养蚕采桑到织布染色,从狩猎狐狸到‘为公子裘’,准备的都是嫁衣。”她的这些观点,大约也曾请教过游国恩先生,记得有一次,游先生身体不适,我到燕东园去探望先生,他还谈到林昭的勤学与多思,提到她对《七月》的见解游先生多有称赞。后来,听说游先生曾建议系里把林昭从新闻专业改到文学专业,先生以为:林昭若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会很有培养前途。后来不知为什么游先生的这一建议没有实现。其实,林昭在考入北大以前就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常州民报》当记者,考入北大中文系仍在新闻专业学习,她博览群书,文思敏捷,众文体皆能,若不是命运不祥,她会成为一位优秀的新闻文化工作者、文学研究者的。(1980年12月11日,在北京为林昭举行了平反追悼大会之次日,我与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女士到北京大学燕东园杨晦先生的寓内去拜望并辞行,这位八十六岁的仁厚长者见到我们潸然泪下,他向我说了两件事:一、当年在讨论逮捕我的时候,先生是坚决反对的;二、当年在讨论游先生建议林昭调入文学专业的时候,先生是坚决同意的。——但皆适得其反!先生不无兴叹地说:“我每当想起这些就觉得心里难过!”稍停又说:“林昭是

游先生看重的学生,多少次游先生的学术讲演,都是即席发挥,没写讲稿,事后都是根据林昭的记录整理存文的,如果没有后来的那场运动,林昭可能会成为游先生的好助手!即令不改专业也无妨于此!”)

1955年的春天,北大学生会设“群众文化部”,大力组建了名目繁多的文学艺术社团,例如:国乐社、西乐社、舞蹈社、戏剧社、大学生合唱团、摄影社、美术社、武术社、北大诗社等等。

北大诗社集中了北大校园诗坛上的著名学生诗人,当时的社长是现代派诗人赵曙光,社员则有古典派诗人崔道怡,哲理诗人马嘶、李任,海滨诗人孙克恒,抒情诗人薛雪,学者诗人谢冕,大漠诗人任彦芳,唯美诗人王克武等,都是北大诗社的台柱,也是今日蜚声诗坛的著名诗人与诗歌评论家!

而林昭则以她独具的江南女儿的聪颖与文思,以她的古、近、今体兼能,诗、词、文俱佳的丰赡素养,在北大诗坛占得一席之地!“林姑娘”的美称由此兴焉!她极爱与人逗嘴,每雅集总不免先口战良久,戏谑争胜,猜灯谜、忆亡书,以是角低昂!其时,我混迹于这北大校园诗人群之间,忝列末座,耳濡目染着天才花园里的春色,肥沃了自己的贫瘠与乏陋,获益匪浅!今日思之,堪谓幸运!但这样的一种文学与友谊的结社,自1957年后,便霜残雨摧,燕园春色灭、斯文绝!大有“草色遥看”的怅惘与萧然之态!令人兴叹!

北大诗社自1955年春即出版月刊《北大诗刊》,初为32开小本,后自1956年改为16开本。我和林昭都被任命为编辑部的成员,于是经常与校印刷厂打交道,林昭对清样的校对往往三四次仍不放心,连当时的厂长唐海宽先生对她的认真与细心也佩服不已。她往往在车间里一呆就是半天,记得1955年的12月31日下午,全校已经沉浸在迎接新年的浓郁气氛之中,她还

在印刷厂的办公室里对《1956年新年专号》的清样作最后的校对,而后签字付印。那一期她和我是责任编辑,我们走出印刷厂的大门时,夜幕已经降临,校园里播放着悠扬优美的轻音乐舞曲,学生餐厅的除夕聚餐宴会已将结束,我和她走到大饭厅里时同学们多已散去,食堂工人已在收拾餐桌,迎新年通宵化妆舞会即将在这儿开始,我们只可从窗口要了两份菜,在一个角落里的餐桌边匆匆吞咽了事。元旦清晨,未及到老师家中拜年,我和她如约在印刷厂见面,取走了工人师傅昨晚加班赶印的《北大诗刊——1956年新年专号》,专号的封面用的是粉红色胶板纸,印着提着灯笼的女孩的刻纸图案,堪称朴素而美观——这是出自林昭的匠心!

但是,林昭在《北大诗刊》编辑部却只是一个“兼职”,她的“本职”则是在校刊编辑部,我有时向校刊文艺副刊投稿,便会受到她的“编辑大人”般地品头评足!幸亏我们的另一位女才子张玲往往在场,为我声援。“张玲、林昭”,这两个不可分开的名字,在当时北大校园诗坛上引人注目,她们的诗情与奇想,往往令我等“须眉”之辈瞠目惊叹。她们的诗已不仅仅在北大校内刊物上发表,而是在《光明日报》等刊物上相继问世,张玲的一首题为《照相》的诗,其中有句云:“照上我们的笑容,最好连笑声也照上!”可谓“黄编、幼妇”、“绝妙好辞”!我迄今未能忘怀。张玲祖籍山东烟台,她的父亲是北大西语系教授、著名翻译家、哈代研究权威张谷若先生,家学渊源,张玲有着与林昭异曲同工的才思与文学根基,她有山东人的耿直,不似林昭的尖刻。所以常保我的拙稿勉强过关。例如:我曾写了一组短诗,共三首,题为《阳春三弄》,我的自我感觉还算“良好”,可是林昭却大笔一挥:“不用!”而且说这说那了一番,后来毕竟还是发表了《其二》,共八行,其末两行为:

忽然，夜风把湖心吹起涟漪，
欣喜。冰已消融！春已有了消息！

张玲说：“我很欣赏你的格律，这大约是受了林庚先生诗风的影响！”她其时已是学者味十足。

三首取其一：张玲之见也；舍其二：林昭之见也。取舍之间，所见略同。

今年北大百年华诞期间，张玲夫妇邀我宴集，我们的老同窗、著名诗人邓荫柯夫妇光临弄觞，言及林昭及往事，我等伤之于怀！张玲而今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编审，著名翻译家、散文家，是一位有世界声誉的英国文学学者，她当年与林昭同住一室，是林昭最亲密的“闺中诗友”，林昭长她三岁，常以“大姐”自居，呼张玲为“小妹妹”或“小家伙”。1980年12月11日，在北京为林昭举行追悼会，张玲主持了这个大会的筹备工作，把一腔无法抒发的悠久的友爱亲挚之情在哀婉的祭奠中寄往那冥冥无凭的静界幽境，去慰藉那不朽的天才的诗魂的英灵！

1956年的秋天，北大党委决定创办一个学生综合性文艺刊物，这就是非常著名的《红楼》。《北大诗刊》停办，并对其编委会成员作了增补，而成《红楼》编委会，阵容如下：

主 编：乐黛云先生

副主编：康式昭、张钟

编 委：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张元勋、谢冕、张炯。（名字的次序是依当时的年级自高而低排列的）

可以看出：这回林昭是以“本职”从校刊编辑部调到《红楼》的，于是便有了一句口头禅，称她为“红楼里的林姑娘”。

别看那么一个著名的刊物，而真地要到北大去找那个“编辑部”，却是找不到的。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一间专用的办公室，

每次开编委会,都是临时借用学生会、团委会甚至党委会的办公室,而具体的修改文稿、校对清样等工作,就往往“习惯性”地挤在林昭的宿舍里,那间屋是文科女生宿舍 27 斋二楼,一室住了八个女同学,自然也就有八个木凳,这就足够我们坐的了。但我们在那里打搅也只能利用课外活动,上午有课,晚上自是不应打搅她们。那间小屋里住着的八个女同学,林昭之外,还有两位后来也成右派的,即张玲、韩其慧,她们都在 57 之难中无一幸免,发配新疆,韩其慧死于其处,弃身沙丘热海之间。张玲在二十年的边塞大漠的磨难之后,有幸苟活着回到北京,参加了年逾八旬的张谷若先生的《苔丝》的译本的校译工作,这一部世界名著的最新校译本浸透了译著世家父女两代人的心血与智慧,终于在 1985 年辉煌问世,堆积在张玲案头的初校、二校、三校以至六校稿,也如象征派的雕塑般的显示出“山石荦确”般的壮美,它也像一位老人,使我们望之便忆起张谷若先生的那种认真、执着、一字千酌的学人风采!

至今,张玲还常提起,我们这些人在她们的“闺中”结社的记忆,说我们这些人随地吐痰,乱扔废纸,每次我们“下班”散去,她们“八女”都要大力清扫一番,疲劳不堪,对我们渐感厌恶!

1956 年 12 月 31 日的夜晚,北大的燕园内灯光如昼,可容纳八千人的大小餐厅,学生宴会之后,早就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餐厅的中心放着一个直径两米的大花盆,里面栽着一株五六米高的针松圣诞树,枝叶之间灯光明灭,空间是被香水喷过了的,弥漫着茉莉、玫瑰的芬芳!“迎接伟大的 1957 年”金色大字悬挂在主席台上,所有的聚光灯都投射在这十个金色大字上,仿佛它就是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金色的日子!那光明的日子!那光彩夺目、充满伟大希望、铸定灿烂前途的日子!

其实正是严冬,北京的冬季其实奇寒,面北大的儿女们的脸

上都蒸腾着汗气,舞厅内灯光微暗而柔美,姑娘们的脸上大约都有粉,嘴唇是被唇膏涂过了的,在微暗的灯光中,却成了黑色。林昭与张玲也在这“无忧之境”里飞翔。这八千北大学子不是楚之骄兵,而是天之骄子!

午夜十一时三十分,我们敬爱的马寅初校长、周培源教务长等学校领导来到迎接新年的会堂,登台贺年,舞曲骤停,八千骄子静立。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第十二响,余音未绝,北大沸腾了,如群山在笑!这八千子弟的第一句高呼,呼的是什么?是——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马老的习惯用语:“兄弟我!”刚一出口,他的话便被海涛般的掌声所淹没,这位慈祥、正直、爱国、渊博的老人与长者,他又何曾料到这样的坦率、真诚、融洽、无虑的聚会,以后竟不会再有了!永远也没有了!他何曾料到:再过四个半月、五个月,这个般着郁郁葱葱的针松圣诞树的大厅里,这悬挂着十个赫然金色大字的北京大学的天堂里会降下宙斯神火!一场史无前例的“引蛇出洞”之战,竟会在与国际帝国主义的决死之战、与国内蒋家骄兵的决死之战告捷八年之后,在新中国的复苏未久的战火焦土上展开,会在这八千“天之骄子”中展开!其心之决,其志之壹,可谓任何“回天之力”皆已不存!这是为马老所不曾料到的!于是,就在这八千骄子之中竟有1500人中计罹难,更有如林昭这样的正直、热忱、赤诚、爱国的青年男女死于枪杀,更不用详说那一支被逮捕、被开除、被远放、被驱走的不幸大军,他们浪迹天涯,背亲离戚,在荒原绝域、饥寒劳苦中熬尽了青春岁月,有的折磨摧残、英年而逝,有的苟活幸存也憔悴若痴,且年及衰颓、孑然孤苦,苍天不助!——在这1956年的除夕午夜,时光流向1957年元旦的临界时刻,这是马老、也是所有的人所不曾料到的!

马老的绍兴乡音未改,高呼着:“兄弟我给大家拜年!”一个

穿着大红毛线衣、白色长裙的女同学登上主席台，把一串鲜花“项链”恭敬地戴在马老的脖子上，垂在他的胸前！掌声、欢呼声混成海洋！这时，马老率领校领导们走下主席台，来到学生中间，舞曲又重新响起，一个男同学跟在他的背后，把双手放在马老的双肩上，而周培源教授则又跟在这个男同学的背后，也把双手搭在他的双肩上，如此照做，很快一条“人链”连结而成，又似一列列车，在祖国的土地上快跑，马老是火车头，在舞曲的优美的节奏里，他带领着这支中国一流的科学大军向前快跑！他率队而行，开始只在边缘，队伍像一条长龙蜿蜒蠕动，缠绕婆娑，光怪斑斓！他逐渐向中心盘旋，于是八千人组成的长龙，形成一个极大的同心圆，又像一个极大的漩涡，八千骄子都坠入其中，而马老则在这漩涡的最中心，豪情无限！

哪能想到，这真是一桩“异兆”！正如《红楼梦》的第七十五回之“开夜宴异兆发悲音”一样，以“漩涡”为开始的1957年，终于把马老及八千子弟席卷而下，这悲壮的下场竟在欢乐之夜怪异地形成！可是谁又能去思量与留意！

而《红楼》终于在1957年元旦之晨与八千儿女见面，在刚刚结束了新年通宵舞会的大餐厅门前，两张大餐桌上堆满了《红楼》创刊号，参加了通宵狂欢的北大儿女，晚妆未残，微有倦意，便围购如堵，林昭与《红楼》编辑部的发行组组长李鑫与其他同学一起在那里忙碌着，而大家都同时发现：创刊号的封面上是一幅木刻图案，是一个牧羊人正驱赶羊群走下山岗，山上草木摇曳，山外浓云翻滚，图案题名竟是“山雨欲来”四个字。

“山雨欲来”，这对伟大的金色的1957年元旦的第一印象，竟不幸言中！我们已忘却当时为什么采用了这幅木刻作为《红楼》的创刊图标，图文连述，岂不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吗？这与那汹涌的漩涡岂不是异曲同工、不谋而合了吗？为什么竟

如此之贴切！异兆与微示在北大儿女面前发出了历史的悲音！而其后接踵而临的现实，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论《红楼梦》之后四十回的景象：“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但这样的一段“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在北大的历史叙述（记忆）中已经消失，变成一片空白，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不留半点痕迹！”真如鲁迅先生所论：“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这真是一曲“红楼”之“梦”！

1998年11月的《中华读书报》的“书人书事”栏里，刊登着马嘶的《追寻〈红楼〉诗》一文，文中叙述的《红楼》创刊筹备中的一件重要往事：林庚先生为《红楼》创刊写的一首题为《红楼》的诗，全诗只有四行。四十年过去了，正如马嘶兄所说：“不但我个人对这首经历了历史沧桑又无迹可寻的小诗耿耿于怀，学友们对此事大动脑筋者也不乏其人。”北大百年校庆期间，5月5日的下午，我去探望在一起经历了漫天风雨的老友谢冕兄，便谈到这首《红楼》诗，希望通过两个人的共同回忆能“校勘”出一首正确的原文来，于是我们“认定”了以下的四行：

红楼你响过五四的钟声
你啊是新诗摇篮旁的心
今天你为什么不放声歌唱
使年青人越过越觉得年青

直到读了马嘶的文章，才知道他从我们的另一位老同窗，发表在《红楼》第二期上的104行诗《东阳江》的作者蔡根林兄那里得到他珍存了四十一年年的《红楼》创刊号的封面和第一、二页，那刊登在第二页之首的林庚先生的《红楼》诗，赫然映入眼底！是这样的原貌。

红 楼

红楼你响过五四的钟声
你啊是新诗摇篮旁的心
为什么今天不放声歌唱
让青年越过越觉得年青

这首承载着沉重的历史意义的文献，终于不会再悄然而去！但马嘶的文章还讲述了他寻求这首诗的艰辛历程：他曾致函林庚先生，希望能从他的原稿中查到确文，但林先生给他的回信里却告诉他：“我的手稿及剪报等文革中被抄家时一扫而光！……《红楼》除非找到那期刊物，别无踪迹可寻，奈何！奈何！”

其实，当时《红楼》编委会决定请两位著名诗人为创刊号写诗，即当时正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的林庚先生以及任当时设在北大的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何其芳先生，由我去约请此事，当时皆答应了。直到十二月二十日，《红楼》的清样已三校完毕，唯空着第二页，等待诗稿一到即赶排付印。结果何其芳先生因忙于他事未写，我到燕东园他的寓内拜见时，只有他的夫人在家，先生外出。只有林庚先生，在他燕南园寓内，从书房里拿出一张只有10公分宽的纸条，上面用铅笔横写了如上的四行，题为《红楼》。记得四行之间颇有推敲改动之处，这似乎是一张初稿。为排印方便，我用一张正式稿纸抄清付印，而先生手稿就夹在我的一请日记里，直到我后来被捕，这本日记也被作为“罪证”没收，这份先生手稿也在劫难中悄然而去！非常可惜！如果有一天，这本日记还能归还给我，也许还有希望再觅到林先生的诗笺，但这可能性是极小极小的了！马嘶兄费尽心血极欲寻觅的《红楼》诗

原稿的下落我在此补述如是，这是他所不曾料到的！

后来，署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冯三浩等八位同学”在寄给《红楼》编辑部的信中，热情洋溢地盛赞《红楼》创刊，其中的一首贺诗最为精彩：

山外迷茫青峰暗
雨云汹涌似波澜
欲为燕园浇春色
来滋百卉美江山
风出谷中清且冽
满地新苗尽开颜
楼头诗客豪兴起
赋就《红楼》诵再三

这首诗，把“山雨欲来风满楼赋”八个字作为每句首字，也就是该诗的题目，描绘了创刊号上的木刻图案“山雨欲来”的恢宏气势，末两句，则是赞颂林庚先生及其《红楼》诗，尊称林先生为“楼头诗客”。

这封信在《红楼》第二期的“来函片段”栏中刊出，事隔四十一载，冯三浩先生等八位先生今天都在何处？他们的诗情使我钦羡不已！

《红楼》的第二期于1957年3月1日出版，那一期的责任编辑是林昭和我，直到今天，那一期的二校清样，还收藏在我的书橱里，那上面还留着林昭改稿校对的字迹和符号。

她在《编后记》里写道：

“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

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

可以看出：从林庚先生《红楼》诗中呼唤曾响过“五四”钟声的《红楼》再“放声歌唱”，到林昭的呼唤“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遗毒”和“不利的东西”，这一种申张用“五四”传统荡涤浮现在当时的黑暗与毒害的呼唤，是1957年新年伊始的一种思潮和渴望，一场“山雨”确实已在慢慢地向中国大地袭来！终于使“红楼一梦”化作了“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了！

《红楼》的第三期是纪念“五四”专刊，《红楼》编辑部几乎是全体动笔，马嘶、谢冕、林昭都拿出佳作，我也写了相形见绌之句充数于版而，另外，还收到孙克恒、任彦芳的优美诗作，大家都在“五四”这个主题里驰骋诗情，跌宕幽思，形成了数十首异彩纷呈的峥嵘组诗！真可谓气势不凡！

这一期几近“诗刊”的《红楼》于1957年5月4日上午在燕园内隆重发行，很遗憾的是：当日发行了一万册，谁会料到今日竟片纸不存！而这一组组诗尚未排印之先便被北大诗歌朗诵团突击排练，经过朗诵的艺术处理，成为一出动人的大型诗朗诵表演，于1957年5月4日的晚上，在北大东操场“五四”营火晚会上与火炬传递同时隆重演出，当时，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在主席台上把第一支火炬点燃，递给站在台前二级台阶上的等待传递的第一位同学，那同学接了火炬转身把主席台下的数十支火炬顷刻点燃，那数十支火炬又把等待着的数千支火炬点燃，整个操场顷刻之间变成一个火炬的海洋，光明的海洋，炽热的海洋，呼啸的海洋！而诗朗诵便在高音麦克风里激动响起！林昭站在主席台上的南侧，她是为诗朗诵作“顾问”的，她看着那翻动的火炬之山，火炬之海；听着那诗歌之风，诗歌之雨，在这诗与火、声与色、

灵与情、静与变的美景里沉思着，她只是看着。

最后，所有的火炬都堆在了一起，变成了一座山，涌起了凌空的烈火，把东操场照得如同白昼，数千北大儿女在这火的周围，鼓掌、跳跃、呼喊、歌唱——直到夜深，斗转星移，余烬渐熄。我与林昭离开这里时，晨光熹微，已是5月5日的早晨，星期日，整个校园静得像已入梦，连晨曲也破例未再播放，静极了！犹如《红楼》第二期的“封四”的一幅题为“黄昏”的照片之任锋配诗，其末四句云：

世界是这么广大
友谊是这么真诚
生活是这么美好啊
我们又这么年青

这是1957年5月间燕园儿女们的一片静谧心境，但是，再过半个月，这“静谧”也就不会再有，它像未名湖的如镜的湖水，忽然激起了劲风与洪波，这风与波涌起着，似乎与那“山雨”一起地涌起着，涌进了八千儿女的心底，那“静谧”终化作不息的江湖，至今依然激滟，而不再如镜！这又是谁能料到的呢！

“五四”过去了，《红楼》编辑部里逐渐感受着一种离情，编委会内与编委会外的一些作者，都临近毕业，于是举行一次联欢活动的构想乃应运而生，方案很快就拟定：游园！当然是颐和园。但，时间呢？只能在星期天，5月12日是5月5日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但那天中文系要开运动会，我们都要参加（《红楼》编辑部中除了王克武是西语系的，其他全是中文系。）于是只好再往下推迟一周，确定在5月19日了。

5月19日那天，春光明媚，气候宜人，确实是兴致最浓，参

加那次活动的有马嘶、李任、孙克恒、薛雪、康式昭、谢冕、任彦芳、杜文堂、张钟、林昭和我，我们一早就从北大西校门口乘“332”公共汽车到颐和园，十张入园券共1元5角，而后沿知春亭向北，走长廊至排云殿，登佛香阁至智慧海，到后山，沿苏州河从后门出颐和园，而后乘车返校，抵北大已是下午5点多。那天，林昭带着一个“120”照相机，她做摄影师，拍了许多照片，后来我们每人都洗印了，但今天只有一张在知春亭畔的合影还夹在我的一册旧书里，在公安局、监狱、文革之火的历次劫难中幸存了下来，成为“5·19”《红楼》编委会的颐和园之游的唯一的纪念，也是《红楼》编委会的唯一的一张合影纪念，（《南方周末》1998年12月11日第11版所刊登者，即是）。

那天的黄昏时分，北大的学生大餐厅的东门外的墙上出现了大字报，非常巧合，那天在大餐厅里正举行一个全校性的大会，是党委的副书记作报告，天气已暖，在餐厅外的广场上坐满了人，于是墙上的大字报立刻便被人发现了，大餐厅东门外渐渐围满了同学，许多人用手电照着，注意地读着那用红色标语纸毛笔大字写成的诗行：《是时候了》。

大约晚上十点钟，大会结束，同学们走出会场，大餐厅东门外的人更多了，最后甚至拥挤着，手电的光束从远远近近一齐投向那张“大字报诗”，有人捧着小本子在抄，还有闪光灯及拍照的声音。

午夜以后，校园内声籁俱息，可是，在许多宿舍里，灯光却是彻夜地亮着：有的变成小组讨论的会场，有的则是产生大字报的家园。

大字报，红色的纸，在至今知名于世的“北大三角地”迅速展延，所有的墙壁上皆糊满，犹如半个月前那一片炽红的火的山、火的海，并与那浓墨涂成的春潮带雨般的诗的风、诗的雨并至，

酿成了 1957 年的红色的五月、黑色的六月、灰色的七月！

5 月 19 日——这个在北大校史中占有光辉一页的重要日子，当《红楼》才子们畅述友情、抒发诗意、激扬一腔离散之情的时候，竟把它确定为“不思分离，却竟分离”的难忘祭日，于是在温柔的梦乡般的北大生活记忆里，我们终于走向了离散！离散：不仅仅是这个青春群体崩溃了、瓦解了，更重要的是心灵碎裂了，冰解了！当燕园内的话题不再仅仅重弹“世界是这么广大，友谊是这么真诚，生活是这么美好啊，我们又这么年青”，而是如“楼头诗客”的“豪兴”所言“让青年”“放声歌唱”的时候，如林昭在《编后记》所言“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炬”“烧毁一切旧社会遗毒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的时候，——如此的崭新与勇敢把燕园的“静谧”一下子打碎了！把象牙之塔般的《红楼》打碎了，一个《红楼》终于出现了“阶级异己分子”。5 月 19 日之后的再过十天，即 1957 年 5 月 29 日的上午，《红楼》编辑部举行了隆重的会议，宣布开除我与李任出《红楼》编委会的决定，原因是我与李任参加了“右派”刊物《广场》编委会，我又是那个刊物的主编，真可谓“罪莫大焉”！在那个“开除会”上，编委们多有发言，指出我与李任之罪。这是一次《红楼》编委会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会，这在当时，出现如此义愤是可以理解的，连林昭也在这个会上对我进行了批判，她的话，也如其他编委的话一样，既有当时的应付言语，也有情动于衷的肺腑之怒，但却有一句，我则难以忘怀，即：她说：“我有受骗的感觉！”——“受骗”，这内容包括的甚广，似乎不仅仅是“右派言论”，也包括以往的交往，似乎我终于在这 10 天内毕露原形，证明了昔日的假相，四十一年后，在纪念林昭惨死三十年的时候，说起这一段往事，我想把一个真实的林昭介绍给我们的友人与陌生者，要向世人讲清，死于悲壮的林昭，其思想与决心确实有一个成长、成熟、自我矛盾与

自我斗争的痛苦过程,她是非常爱我们的国家、爱共产党的,她在解放前,那时她才十五六岁,就为苏州地下党跑腿、捎信,(尽管她不是地下党,但她却知道她帮忙的危险性。)解放后,尤其是考入北京大学后,她写了许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诗文,在校内外的各种刊物上络绎问世,所以尽管她可以写一篇《编后记》,呼唤“烧毁一切”“遗毒”及“不利的东西”,而一旦真地面临如北大“5·19”民主运动初期的崭新话题,她竟猝然不可接受,甚至惊讶于面前的这些友人竟是反革命分子!她于是说出了她发自内心的痛苦:“我有受骗的感觉!”她的话是涌自最纯正的心灵的真实、痛苦之声!这与她后来终于在痛苦与困惑中悟彻,在北大的自由辩论会场上当众讲出自己自“5·19”一直困惑着她的那个“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于是她终于凭着一颗高贵的良心、诗人的良心、智者与学者的良心走了下去,凭着她那孱弱的身体经受了人世间是最残酷的酷刑、折磨与凌辱,走完了她太短促的、光辉的三十六年的人生!一直到1966年5月6日,距离她被杀还有两年,我在上海监狱探望她的时候,她还向我提起那次发言,她说:“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的话,无论在1957年5月29日还是在1966年5月6日,都说得多么善意,多么真切,多么好!

而我们终于走向了从群体到心灵的离散!实际上乃是一场不欢而散!《红楼》一共出了三期,再往后怎样了?我已经忘却。因为自1957年5月29日以后,我就不再对《红楼》“参与政事”了!“开除会”用了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清除阶级异己的工作宣告胜利完成,我与李任便从这个群体里首先被离散了出来,下午,在校园内的一处墙壁上贴出一张大幅漫画,画着一座小楼,一支穿着皮鞋的巨足从楼上层的一个窗口处伸出,两个小人头朝下的悬空而坠,其中一个小人的眼镜与鞋子都脱落飞于

空中,衣服也飞飘如翼,赤着双足,首如飞蓬,颇似身临空难,旁边还注明“张元勋”三个小字,漫画的标题是:“极右派分子张元勋、李任被清除出《红楼》编辑部!”

这样的离散,也是5月19日的游园活动时所不曾料到的!

北大在漩涡中离散!连我们敬爱的马老也坠入其中!他从此也被离散!被从这个听惯了他那慈样的浙江口音的“兄弟我”的非凡群体中“离散”而去!以至被质问:“你是哪家的马?”他在轮椅上度过了意志执着的晚年!但他却带走了千万北大人的最崇高的敬意与最深切的怀念!

一个极闷热的晚上,在北大十六斋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激烈的“口战”正在进行,听众知多少?无从计算,大约一百米方圆之地全是人,夜色浓黑,正是“月黑雁飞高”的夜晚,大有“闻其声不见其人”之状,短兵相接,发言者站的是饭厅的餐桌,大家都正年青,无需阶梯,一抬腿便可迈上,讲毕,一步便可跳下,几经跳上跳下,又加捶胸顿足,往往语未毕讲话者便与桌子一起倒翻子地,于是第二张餐桌又继而用之,据餐厅管理员说,那一夜十余张餐桌报废。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三天来的文字交锋,激化成当面对峙,那一夜,已经形成了“群体力量”的“反右派斗争”大会,所谓“群体力量”是说一群后来标榜自己是“左派”的人,此时已集中火力向“右派言论”反击,一些发言已提到“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的严肃课题,开后来扣帽子恶劣行径的先河,而当时的我,就正处在这种出手不凡的猛烈的火力的焦点,正当“群体力量”前者呼后者应,轮番讨伐之时,一个女学生在浓密的夜色中登上餐桌,她那夹杂着婀娜的苏州方言的普通话,音色浑厚,不似女孩惯有的娇柔,在震耳欲聋、声嘶力竭的此前的男声叫嚷的未绝余音之隙里忽然传来如此迷人的声音,颇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新意,当时沸腾喧闹的听众顿时化作悄然。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的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你是谁？”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咆哮而出，打断了她的发言，这显然是一位陌生人，凡熟悉她的人凭着她的声音就勿庸再问。

“我是林昭！怎么？你又是谁？竟是如此摆出一个审讯者的腔调！你记下来！‘双木’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她稍停，又说：“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工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从那个黑夜：1957年5月22日的那个黑夜，她开始义无反顾地背起了那命运的十字架，毫无反悔地走上一条穷途，十一年后，她终于被密杀，灭尸，这是她在当时或许已经思及的事，但如此惨死却是她所不曾料到的啊！

这天夜间，林昭在未名湖畔的迷茫夜色中向我说：“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祭日！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从此，她不再如昔地凌厉，什么话也不说，什么文也不写，每日仍在那尘封似铁、霉味可人的缮本书库里静读，这反常还应以5月22日的迷茫之夜的浩叹为起点。那天次日，张玲问我：“林昭昨夜喝了多少酒？”我愕然了！她说：“她还醉着，枕头上全是红色的酒！”据说她一直僵卧了两天才坐起来，在桌上的一张破

纸上写了十二个字，即：“天之机我，如不我克！此责其谁？”前两句她引用的是《诗经·小雅·正月》的诗句。

其实，她醉卧如死的时候却有人并不肯放过她，决不肯善罢甘休！她发言的次日，便有一个写了一张大字报诗，题名《致林昭同志》，她开始被置于“左”的火力之下，毫无疑问，这一张大字报诗，宣告了林昭的厄运的开始。

同样是这个“写手”，又写了另一张大字报诗，如下：

向左！

向左！！

向左！！！

共和国的公民，
我们守住每一个窗口，
举起我们的枪口：

向右！

向右！！

向右！！！

还是这个“写手”，又是一张大字报诗，题为：《是什么时候了？》是针对我来的。

而俄语系四年级的学生杜嘉蓁，以“杜真”之名写诗《组织性和良心——致林昭》和《是时候了》驳斥“向左、向左”者！

口战之后，文战继续着！

但林昭却是沉默了！

1957年6月8日之后，“右派”已被明判为敌人，与大餐厅南门正对着的学生宿舍楼十六斋的北墙上写着一排白色大字：“一切资产阶级右派都是反动派”，宣告了北京大学反右派运动

的开始。这时,我已处于被监管状态,我班有两位同学已跬步不离地与我朝夕“厮守”!直到暑假,我被通知“留校等候处理!”不能回家。那两位同学一位家在武汉且有妻子,一位家在上海,皆因“伴我”而不得归去!校园内空空如也,少有人行。有一天,我竟意外地遇见了林昭,原来她也没走,一直独自躲在宿舍里读线装书,却并无人监管。她告诉我:八月间要到中国青年报社实习,有机会可去找她,实习完回上海。并留下电话号码。这真是喜出望外!没有料到:在这被监管、被隔离的灰色的七月里,竟得到与林昭会晤的更多的机会,这真是“天作之合”。

负责监管我的两君,其任务旨在不放我逃走便算胜任,他们毕竟是我的同窗,对我甚知,起初甚严,乃渐懈,后则渐宽,直至只要晚间能回宿舍便可。于是我便常到东单十三条中国青年报社去与林昭见而。校内十八斋东门外有一个电话亭,内设外线电话,免费使用,我几乎每天都要与林昭通话,她如无事,便约我进城会晤,每次约在下午,回校则已是午夜,从西直门到颐和园的“332”次车的末班九点半即无,故我只能走回北大,回来后,二君均已鼾声如雷,次日亦不追问。

林昭八月中旬实习结束,即将返沪,临行前的晚上,约我见面,我又到十三条西口等她,她如约而至,我们一同步行到什刹海,其时天色已黑,夏日昼长,天才黑即近八点半,这一次什刹海的星夜荡舟,今天看来已可称得上“空前绝后”之举,已是永远失去的历史。记得她告诉我:编辑部转来一部长篇小说手稿,题为《青春之歌》,其女主角也姓林,也是北大女学生,也是在学生运动中遭受波折。她说她刚刚看,稿子还要讨论。

林昭离京而去,却不再来信,直到九月开学,我又随班上课,这时我已经是四年级,开始写毕业论文,游国恩先生已找我谈过两次话,于是我又天天跑图书馆缮本书库,读线装书,却未再遇

见林昭,也不能向人询问她何以在沪未归,只让疑团在胸而已。中秋节后,竟收到她的一封短信,又是意外,信中只言暑期回沪后病发,咯血甚烈,在沪求诊,于家休养云云,并写诗一首如下:

醉不成欢愁依旧,思绪缤纷共相就,
弄章琢句涂鸦满,暗风入窗凉初透。
水深浪阔君知否?冠盖京华斯人瘦,
霏霏无尽江南雨,梦回冷泪湿薄袖。

她预感到大难将临,危险在即,而我却还盲目乐观,以为批也批了,斗也斗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帐算清了!倒有了一点轻松之感。我给她回了一封短信,大致讲了几句盲目的乐观,也写了几句诗,聊表思念之情。

1957年下半年似乎格外的平静,北大又似乎回到5月19日以前,但所不同的是:人们似乎都极疲惫,似乎都静静地反思着。这场斗争,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在中国绝不会再有异议之声,更不用说逆耳之言,一切都一呼同应地悦耳与赏心!那些“以身试法”的“右派分子”已成过街老鼠,其实比过街老鼠还狼狈:老鼠过街尚可迅速窜匿,而“右派分子”则无处藏身,日日“过街”于众目睽睽之下,随便什么人,在随便什么地方,认出某人是“右派分子”,只要喊一声“站住!”那就须从命立定,而后听之任之地为其所骂、所打、所凌辱、所刁难,凡有此情便会迅速聚众围观,同仇敌忾,众声怒斥,众拳脚交加,众唾齐飞,直到他们满意、快意、情尽、兴足而罢!谁若稍有反抗,其后果当然严重,拳脚之下,颇感由重量级而升到最重量级!所以,别看北京大学的堂皇学府之巍峨,别看那里曾是蔡元培、鲁迅、李大钊、陈独秀、马寅初的思想田园,却不见得处处、事事、人人皆都闪烁着“科学”、

“民主”的光辉,而这类行为尤以当时刚刚考进北大的 1957 级新生最甚!他们没赶上暑期前的反右派斗争,却都有“打落水狗”的勇敢与兴致,藏在他们心中的动力是什么?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式的娱乐,还是“竖刁自宫”式地求宠?真是叵测!我有几次从餐厅走向宿舍的路上,便被这些素不相识的少年认出,于是便被堵截,用中学生的腔调呵斥,踢掉我手中的搪瓷饭碗,说:“饿死你这个反革命分子!”而后用脚把饭碗踩扁,大骂而去。已颇具十年后的“小将”之风!“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至于还有一些人,则惧怕株连,见右派皆避之犹恐不及,而“右派分子”之间固已不许往还,遇于途,只有“道路以目”、无语互视而已!

十二月的一天,北方冬早,寒气凛冽,我独自由西校门走出,向北往圆明园方向走去,十分意外的是:在那静无人声的小路上竟与张志华未期而遇!真是喜出望外。!

张志华,这个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右派”分子,也是由于被聘为《广场》编委而身罹于祸的。他是福建人,才华横溢,会写一手美妙的抒情诗。《红楼》第二期一次就发表了他六首《大学抒情》。今天我与他的“圆明园之晤”,如果被人发现,便会带来一场灭顶之灾!幸而其时奇寒,圆明园废墟之间更为荒凉,谁肯来此谈情说爱,此可谓苍天之助!他告诉我:“林昭回来了!”又是喜出望外。他讲:“今天上大课,竟与林昭坐于比邻。”(五年以后,在北京南郊的监狱里,我又与张志华相遇,依如这一次“圆明园之晤”相同,也有喜出望外之状,他简短地告诉我:他到上海去找过林昭,但她已被捕了!)

于是,我希望在校园内也能够遇见林昭,但是一直没有如愿。待到 12 月 21 日,星期六的晚上,我独自地从南校门走到海淀。57 年时的海淀是一片田野,只有一条南北的泥路坎坷而狭

窄,一到夜晚,连路灯也没有,只有几家小店铺的门内闪出微弱的电灯光给漆黑的街上投上一方光亮,而唯一热闹的地方应数那坐落于路西的新华书店,那狭窄的店堂里面,一进门摆着一个两米见方的案子,上面摆满书刊,许多人都围站在那里捧读浏览,我也挤于其中漫无目的地翻阅,我无意地一抬头之间,竟看见林昭也在这书案的一边,在我的斜对面看着我!她围着白毛线编织的长围巾,连头都包着,又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此时,围在这书刊展销柜台周围的全是北大学生,我料不会有人认识她,但认识我者确是不乏其人,“打落水狗”的余勇当然尚多,但余兴确已太少,更何况在此浏览者多不是一年级的那些“同学年少”,一种“壮怀”不断地“激烈”,也会带来厌倦与乏味、无聊与肤浅,说到底,在北大最主要的是读书与思考,“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正是一种层次,所以,一场“山雨”倾盆之后,打与被打、斗与被斗,都化作噩梦般的记忆,以至四十年后的百年校庆大家相逢一笑的时候,都笑得十分尴尬与惨然!而且只说“天气很好”,别的,则“不好说”了。

正是那么一个对人格扭曲的时代,连北大的空气与传统也扭曲成象征派雕塑,谁都不应该迷信或想象那里何等圣洁,那里从来就没有“圣洁”过!过去了的一百年中也绝无此事!始终是“光荣与耻辱”杂糅的闹市,(钱理群先生最近作的《北大百年的光荣与耻辱》的学术报告,言之甚确、甚详。)而且,“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卜居》)的境况时为主流,翦伯赞先生与夫人就双双自杀在那里,马寅初校长就被从那里赶走!百年校庆期间,我去拜见久别的恩师林庚先生,他居住了半个世纪的燕南园故居已陈旧不堪,墙壁与地而都已驳落与湮漫,园内一片荒芜。室内放着的仍是四十年前我在北大读书时看见的沙发与木椅,老人家八十多岁的高龄,兀然地静静地坐在那狭小的窗前。我的老友谢

冕兄向我说：“林先生今天最大的困难就是太穷。”谁能想到，这位誉满中外的诗人与中国国学大师，他的学生中有些人今天已飞黄腾达、风云于政坛与学坛之上，也以“大师”的姿态大讲什么什么“国学”之类，“雷鸣”不休，而这位培训“大师”的真正大师，却寂然地坐在久居半个世纪的故居里，用昏花的眼睛看着那狭小的废园。当我向他提到他的诗集《春野与窗》，老人家便又回到他的华年的回忆中去，吟诵着：

春天的蓝水奔流下山
河的两岸生出了青草
再没有人记起，也没有人知道
冬天的风哪里去了

仿佛傍晚的一点钟声
柔和得像三月的风
随着无名的蝴蝶
飞入春日的田野

真是美极了，把人带到一个优美的意境中去！而后，又从兴奋中的华年回到寂寞的故居，依然兀坐在狭小的窗前，“好像一段呆木头”！他还零碎地记忆着往事，而且还提到一个女学生之死。他的回忆又把我的思路拉回到1957年12月21日的晚间，由他的废园向南顶多也不过三百米的距离便是那海淀新华书店，那个夜晚，那次巧逢真是太珍贵的一次话别，从此，大家皆沉人离散！这是在尚称自由的日子里的一次相逢、一次离散！真可谓苍天恻人！而九年以后，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又一次相逢与离散，那已经是铁窗下的悲欢，林昭诗中谓“吞声九载”便

是。这也是我们所不曾料到的啊！

那天晚上，林昭转身走出书店，向北进入一条极狭窄的小胡同，当然漆黑，我则随之前行，脚下坎坷，胡同很长，走了许久才见一片星空，眼前是西郊收割完了的稻田，一片平阔的广野，此处说话算是最佳之处。她说：“情况已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我们都要时刻作好被捕的思想准备！”她说：“你记住我的家庭住址，不管磨难多久，也不能失去联系。”于是她说了两个地址：“一、上海茂名南路 159 弄 11 号，二、苏州乔司空巷 15 号。”并也叫我讲清我的青岛家庭住址及我的家兄名字。其时身边无笔纸，只可强记于心中，而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只能如此，写在书面的东西都是极易引起祸端的。

如此绸缪是准备着一次不测的离散，这预见其实四天之后，即 1957 年 12 月 25 日之清晨我被秘密逮捕更证明了其必要与正确。那两个地址乃深深地、暗暗地埋藏在我的记忆里，埋藏了八年，八年之后，已是 1966 年之初，我从监狱走进劳改农场之后，这心中的暗暗地牢记了八年的地址终于化作一种“寻觅的程序”，与住于上海的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取得了联系，但那时林昭已于六年前被捕入狱，而且判决为有期徒刑二十年。

终于夜深，北京海淀西郊的冬夜幽静而奇寒，所有的光都熄灭了，只有天上的寒星，这世界上似乎只有我和林昭两个人，这时似乎勿须再多虑被谁发现，我们又穿过狭窄曲折的小胡同，回到海淀大街，万籁俱寂，一片漆黑，但大约百米之外，便到了北大西南围墙之外，中关村的东西大路由此向北经北大西校门通往颐和园方向，此处电线杆上有一盏路灯，在这里我们站下了，林昭取下口罩和头巾，似乎要留给我最后的印象，我看到两只粗粗的短辫子上面系着白色的蝴蝶结，她的面色苍白，在路灯的微光下更显得清瘦，她告诉我：星期三要到北海医院去查体，星期三

之后再见面。她礼节性地嫣然一笑，于是分别：她向东往南校门，我向北往西校门各自面去。今天想起，才知道一个故事从这儿真正地结束了！

这个故事是什么？我想就称之为“北大往事”吧！

三天之后，即十二月二十五日之清晨，起床铃刚响，校园内夜色未尽，我被传至校办公楼二楼之办公室，被秘密逮捕，直到1979年11月24日上午，在山东省的一个监狱里，由北京市中级法院来鲁裁决平反，悠悠二十二载风雨之途、辗转羁押于荒原大漠之间的艰辛历程，化为一场难忘的梦！

我被判刑八年，1965年12月24日“释放”。“四人帮”时代的“法律”为局外人所不详，刑满者并不能回家安居或步入社会乐业，而是强留在劳改队里仍旧进行着所谓的“继续改造”，我当然不能例外，这就是那来自“最高指示”中的“杀、关、管、放”四字诀中的那个“管”字的含义。“管”，就其本质而言仍是那个“关”的继续。但也稍有差别：“管”较之“关”的最大区别（或曰“优待”）就是可以请假回家探亲，尽管准假极严，假期极短（至多一周），而且每年只准一次，但，毕竟竟有一次！

另外，就是通信：信写毕不准封口，必须交给“管教干部”审查，由他们寄出。若私自寄信，一旦发觉，他们可以到邮局去把信追回，那就要大祸临头！外面来信当然必先经过他们之手，待发给本人时已经撕开！这种行径往往使人联想到“初夜权”的横暴与恶劣！

他们对隐私最感兴趣，极为关注别人信中的异性话题。我有一位昔日的女同学叫“慕容佳”，她来信问候，嘱我“注意身体”云云，信被“审查”之后，他们从字迹之娟秀及名字为“容佳”（他们作如是说！不知姓为“慕容”。）则断定来信者必为女性，于是兴致生焉，追问再三。

如此“邮路”，大大限制了我与外面的联系，幸好，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的名字不像女性，又加许先生字迹雄劲，语言苍老，故他们判定这是一位“老头子”，才免去许多纠缠。我与许先生的信件往还皆用“暗语”，——其实不过是稍作文言和少用典故而已，而这些“窥私癖”病患者则瞠目不知所云，我与许先生却是十分默契，我终于确定 1966 年的四月底或五月初到上海探望林昭。

我于是提出请假，对一个刚刚释放的犯人，劳改队里似乎有一种约定俗成的通见：允许他回家一次。这种“一次性”专利般的“优待”则表现为此假一请即准，我亦如是。这就是说：我又可以走向阔别太久的人间之路了，那时，我正在河北省某地的一个劳改农场，途经天津，回到阔别九载的青岛，（我自 1956 年寒假毕，开学赴北大，1957 年未能回家，后又八年徒刑，共别九载。）周围的邻居都用警惕的目光窥视着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归来。阔别九载，祖母早已谢世；父母老矣，发如冬雪；家中多了一个女人，那是我的大嫂；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孩，那是我的侄女！我大哥也因我的沦落株连未休，在小人、恶徒的欺凌之下过着仰人鼻息的生活！他毕业于中国南方的一所著名的大学的中文系，他的师友不乏其时及当今学术界的赫赫巨擘，而他却“一贬再黜”地终于在山东的一个穷僻的小城中学里，与我同步熬过了“反革命亲属”的类似元代“南人”的岁月，过着“不敢不局”的生活！他破旧的桌上堆积着的二十年来风雨自知的结晶——那一千几百首的古、近、今体诗与词的手稿《那复室吟稿》两卷，那“角吹梦断徒慷慨，诗赋魂销自惨悲，人别故园长去后，千秋留诵是宏辞。”的咏《二安祠》的幽思，常使人感到是他对自己半生艰辛的浩叹！

他右耳早聩，唯仗左耳偏听人间真假言语，文革之间，一次批斗，一“小将”高喊：“他弟弟是反革命，打死他！”于是一掌击于

左耳,从此连“偏听”也不能,变成了他自嘲之的“真聋天子”了!近年来,我的在异国当一名国家机关的“代表”的侄子买来价值连城的“助听器”,但已无“助”于事,也是枉然!再不能使他进入这喧闹的世界,分享那呕哑嘲哳的合鸣!他只能用一双昏花的眼睛看着这熙熙攘攘的潮流,真正“目听”着这衣冠多姿的人生!他现在早已是一所大学里的教授了,作为弟弟,我带给他的唯一的“贡献”,就是这二十多年来的屈辱的人生!如此而已!

但他却沉重地内疚着,他告诉我:“1960年的秋天,非常意外地收到林昭从上海的来信,询问你的情况,也询问我们全家情况。我给她回了信,告诉她我正被管,你正被押,唯有三弟正在医学院读书。唯恐其中有诈,要求她寄一张照片。信寄出未久,即收到她的第二封信,写得很长,羽声慷慨,说她的妹妹也在学医,‘今朝为士,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并寄来一张照片,背面题诗一首。”他从一本旧日历里翻出夹在里面的那张一寸照片,背面的诗如下:

楚头吴尾劳相关,顾影低徊敛鬓鬟;
困顿波涛佳岁月,凋零风雨旧容颜。
堪憎勿怪人争避,太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笑君犹自问庐山。

正因为是一本旧日历,当年的抄家才幸免于火,而其他的书皆被付之一炬,包括那夹在书中的两封林昭的信!他还说:“林昭第二封信中曾提出要到青岛我们家来,当时,因你在押,街道治保人员对我们家监视甚严,若林昭来此,必然会为他们所注意,那时我们家其实是一个险境,她来此岂能安全!所以我回信把情况告诉她,未料,从此不再来信。”他内疚地说:“是我把她拒

于千里之外,早知她当时和以后的处境,无论如何也得叫她来此:避难也好,探访也好,或者能够躲过那次灭顶之灾!”

其实并非如此,两天后,我抵达上海,许宪民先生告诉我:林昭尚未收到第二封信就突然被捕,当然更谈不上再写回信了!

许宪民先生告诉我,当逮捕了像我这一类的“极右分子”以后,北大开始了大规模的处理右派行动,林昭由于她那句“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以及与我往来较多,而划作右派,她陷在悲愤之中,不吃、不睡,终日泪流满面,她说她的心在流血!终于在一个夜里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被同室的张玲、韩其慧发现,及时抢救,没有死成。于是被认定她在对抗,“态度恶劣”!宣布加重对她的处分:劳动教养三年。她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其实非但无用,更招来不测之难!后来,北大中文系负责新闻专业的副主任罗列先生担心林昭体弱咯血,若劳动教养可能会折磨面死,于是出面为她担保,经过他冒险游说,总算奏效,把她留于新闻专业资料室由群众“监督改造”,被指定在苗圃劳动。1958年6月21日,北大新闻专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资料室随迁人大,林昭亦随至人大新闻系资料室,她的工作则是为学校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整天查旧报纸。而这时那里已早有一位女士,这就是王前女士。她同情林昭,对她多有关照。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底,林昭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的心情愈益不佳,咯血加剧,乃请假要求回上海家中医疗休养,这个请求一直拖到1960年的春天,由当时的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先生亲自批示准假,许宪民先生到北京接她回沪,临行之前,与王前女士依依惜别,约以来日,谁知乃是永诀!并合影留念。那张四寸的黑白半身照片背后,林昭写了一首绝

句：

风雨同舟始相知
看记天涯共命时
今日握手成一笑
胸怀依然凌云志

她与王前女士并肩而坐，都有微笑，但却又是笑得那样惨淡，那样凄然！林昭回到上海后生活在母亲、妹妹身边，疗、养皆好，日渐康复。她体力稍好，便常到图书馆、公园，逐渐结识了几位青年友人，往还渐繁，不免语涉国事，认为彭德怀受冤，对他处理不公；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和大批的饿死的人，深感不平；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与中国有类似之处，很值得参考借鉴。他们写成文字，上书北京，交邮寄出未久，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便派人去苏州将林昭逮捕（北时林昭在苏州家中养病），未及一月，其父自杀而逝！她先被拘于上海第一看守所，音讯全无，一年多后，直到1961年底，竟不判不放，1962年初，静安分局竟通知“保外就医”，许先生把林昭接回家中，并一起返回苏州故居“隐居”休养，但至12月，又被逮捕，投进上海提篮桥监狱，未久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从此一去未归，直到被于其处密杀了结。

实际上，一直到今天也没能说清她到底犯了哪些“罪恶”，到底都有些什么具体的必杀之罪！即令一直到1980年8月20日上海高级法院为她作出平反的裁决，竟然也仅仅就只是“裁决”，也没有指出处死时的罪名与罪状！她的母亲唯一能知道的就只有每次接见时那些管不了多大事情的狱卒们的口头禅：“她不服从管教，抗拒改造！”“她谩骂政府干部，绝食威胁政府！”云云，说来说去，都不是判处二十年的原因，而是服刑后的表

现——这是与判刑毫无关系的事！但这些“表现”却积累成后来的杀身之祸！据说（据狱卒、狱吏们说）：她用记日记、写诗词、写血书等方式控诉冤情，表示抗议。表达自己坚决斗争到底的决心——总之，九年的狱中生活斗争，她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稿、日记、血书等书面材料，这些材料记录了她狱中生活受难的真相！但这些材料也如她的遗体一样，也是下落不明、不予交还！干尽了灭绝人性的罪恶的群体，害怕他们的倒行逆施公之于众！我坚信：真理必定会得到伸张，而邪恶必定要受到惩处！

我决定到狱中探望林昭，抱着一种大的、奢望般的希望去看她，那希望的内涵似乎只有一点：开导她从“顽抗”中退下，争取避开危险，保住自己！但这奢望真是太奢望了！后来的事证明了这一点！于是彭令范打电话，询问监狱当局他们确定的接见日期，说：他们定在6号！

于是，似乎是走向一个节日，又似乎是一次约会，6日上午八时，我与许先生一到监狱传达室，值班人员便向里面打电话，马上获准“进去”，二门内的一间办公室里，先由监狱长与我谈话（三十年后才知道他是副职），他很严肃地说：“允许你与林昭见而是我们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照顾，我们希望能使林昭得到感化而幡然悔悟，监狱你是知道的，你如果做出不符合我们要求的行为，其结果你是清楚的！”我点头唯唯。在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能见到林昭，什么样的委屈求全都可接受。因为我深知：朝令夕改、出尔反尔，是他们的惯计，诺言与谎言在他们那儿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又说：“经过研究，这次接见定为两次：今天和明天两个上午。”他的话极简要，然后就引导我们向狱内走去。来到一个大院，高大黑色的铁门迎而而立，视之弥高，这便是真正的牢房的总外门了。铁门是南向的，其东侧就是接见室。他把我们带到室内，又引进内室，但见西窗下放着联椅及一张长

案,案子这边摆着大约十余排联椅,真像一个“会议室”。案子的南端是一个高出地面约五十公分、设有两级台阶的木制“讲坛”,其上摆着犹如大学课堂上的“讲台”,又像是商店里的柜台,其后也放着联椅。走进此处,段副狱长让我坐在西窗下的联椅上,他坐在我的右侧,许先生坐在长案一端的单人木椅上,稍待,脚步声自外室响起:进来的是三位衣着警服的男子,段副狱长介绍:他们是狱内的“管教干部”,其中一位是直管林昭的“队长”,语罢告辞而去。他们列坐在我的两侧。稍待,又闻脚步声:进来的是四位便装年轻女郎,她们登上“讲坛”,在那“柜台”后面的长联椅上并肩坐定,一齐望着我。她们的任务是什么,我怀疑是翻译或录音员。稍待,又闻脚步声:一列佩手枪的武装部队鱼贯而入,大约有二十人左右,列坐在那一排排的长联椅上,都极严肃,昂首挺胸,一齐望着我,可谓睽睽相覷!于是,这一间空荡荡的接见室顿时“人满为患”起来,气氛也一下子紧张起来。看起来,这真是一次极不寻常的“接见”!确如段副狱长所说“这是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的举措!他们如临大敌,既做了技术上的安排,又做了弹压的准备,由此,可以推论林昭在上海狱中真可算是“头号要犯”了。

接见室内人已济济,唯有我对面的联椅依然空着,是虚席以待。

终于又闻脚步声自外室响起!我的神经突然紧张,一下子达到了极致:我意识到与我们阔别九载、历尽苦难的林昭即将出现在我的面前!

林昭终于走进接见室!她的脸色失血般地苍白与瘦削,窄窄的鼻梁及两侧的双颊上的那稀稀的、淡淡的几点雀斑使我忆起她那花迎朝日般的当年!长发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看来有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

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的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绊带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这个字,向着青天,可谓“冤气冲天”!

她站在门内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个室内三十双眼睛都一齐注视着。我无法猜测此时此刻他们都想了些什么?是不是都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还是想到人世间有大悲恸、大无畏、大欢喜、大冤枉!整个室内无论是带枪的武士还是不带枪的狱警,以及那便装俊美的女郎,都被这一笑的嫣然而惊诧着、困惑着,甚至是震撼着。后来,他们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未见过林昭的如此一笑,这实在是她这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展现的迷人的、永恒的美丽与春色!使我又依稀地看到那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以及飞飘着的白绢蝴蝶结的昔日风采!

我从坐椅上站了起来,似乎也有微笑,静静地看着林昭缓缓地走向那个虚席。她捧着一个旧布包,一大卷卫生纸。一位身着医生白大褂、内着警服的女警医一直在搀扶着她,她们的身后,是一位佩枪的警士。

林昭就坐在我的对而,隔着那个案子,那位文雅的女警医与佩枪的警士坐在她的两侧,与我则是“而面相觑”。

“开场白”是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管教干部”向林昭发出的警告:“林昭,今天张元勋来与你接见,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希望你通过这次接见受到教育,以便加速自己的认罪与改造!……”“乏味之至!”其语未休便被林昭的话打断,但那位“管教干部”并未激怒,甚至尴尬地望着我,向我说:“这是常事!”林昭视其言为“老生常谈”而不屑一顾,抬手指向周围,问我:“这些人,你们那里叫做什么?”我未敢回答,不知怎样措词才不会激怒周

围的那些监管者！我此刻最怕的是中途被他们停止这次接见！这个心理很快便被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察觉了，他很客气地对我说：“不要紧，怎么说都不要紧！林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所以，她的话也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客气的了！我们已经听惯了，不要紧！”既然如此，我明白了，乃答：“队长！”林昭颇感兴趣地说：“一样的，一样的！我们这里还叫‘政府’！与他们说话，要先喊‘报告政府’！在北大跟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学现代汉语，还没听见朱先生说过人变成了‘政府’！在这里谬误已是习惯！”然后高声说：“这帮东西怎么能是政府呢？我怎么能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呢？”我尽量保持出一副毫无表情的神态，故意把话题引开，我说：“平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头发梳起来。”“打扮？打扮什么？女为悦己者容！”稍停，她问：“什么时候来到上海的？”我答：“五四！”又问：“家里都好吗？”我答：“都好！都非常惦记你、挂念你！都希望你好好改造、平安出狱！”她打断了我的话，高声说：“出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们早就告诉我：要枪毙我！这已是早晚的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可以唆使一群女流氓、娼妓一齐来打我，故意地把我调到‘大号’里去与这些社会渣滓同室而居，每天每晚都要在他们（以手指周围）的主使下开会对我斗争，开始这群泼妇也瞎三话四地讲一些无知而下流的语言，可笑的是她们竟连我是什么犯都一点也不知道，骂我‘不要脸’！真是可笑！他们这帮东西！她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他们竟然还知道‘要脸’！她们理屈词穷，气急败坏，于是对我一齐动手，群起而攻之！”可以想象，这样的“斗争会”就是对林昭的肉体的摧残！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酷刑！解放后虽然标榜“废除狱内体罚”，而许多地方仍采用开“斗争会”的方式鼓动犯人打犯人，依然进行着这类人身的折磨，其残忍野蛮的程度真可谓骇人听闻！那些女犯为了“立功”，

斗争林昭乃是她们“积极靠拢政府，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立功”良机，所以对林昭越是殴打得凶狠与残忍，就越算是“积极改造”、“靠拢政府”，“立功”也就越大！在这样的诱导与唆使下，林昭几乎天天都在群妇的撕、掐、踢、打的非人虐待中煎熬着。她说：“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纽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她指着周围）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么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说到这里，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的无法脱下。她又说：“这是一帮禽兽！”指着周围：“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我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她说：“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都给我送线来！”她边说边咳嗽，不时地撕下一块一块的卫生纸，把带血的唾液吐在纸上，团作纸团扔在脚边。“但他们还不解恨，还要给我带上手铐，有时还是‘背铐’！”稍停问我：“你知道什么叫‘背铐’吧？”我点了点头。一直还极力故作“静而不怒”的那些“管教干部”此时也无法再故作下去了，向我说：“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神经不正

常？”——林昭抢白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我沉默着不敢发言，便插嘴说：“不要说这些了，说些别的。”“不要紧！”林昭又抢白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几个月前妈妈接见时告诉我你想来看我，问我行不行？问我行不行有什么用！我告诉妈妈你问他们去！总算走运，他们同意了，许多天以前也通知了我，我盼着你来，就是想告诉你前面的这些话，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稍停：“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语未毕面泪如雨下，痛哭失声，悲噎不止，以至无法再说下去。

这时，许宪民先生尽量保持着一幅安详的神态，说了这天接见中的第一句也是唯一的一句话：“不要哭！张元勋这么远来看你，你这么一哭，他不也会哭起来了吗？”“他不会哭！”林昭立即从悲噎中平静下来，又说：“他是男的，不会哭！”

后来（接见结束，林昭离去之后），那位“管教干部”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也从未见过林昭的如此一哭，这实在是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她第一次宣泄了自己的悲痛！

冷静下来。我向她说：“给你带来一点东西，都是食品，监狱里最需要吃的东西！”她才注视那个放在案子上面的大提包，这是我昨天从淮海路的食品店里买来的。其中，有三个品类的蛋糕，八市斤的听装奶粉，印着美丽图案的听装大白兔奶糖，以及

香蕉、桔子、苹果。于是，按照监狱的规矩，我把那个大提包推到坐在我身旁的“管教干部”的面前。他一件件地取出，放到案子上，然后一包一包地打开，听装奶粉与听装大白兔奶糖本是原装商品，也一一撕破密封，撬开盒盖，并用铁钎子向奶粉中上下刺人，凡十几次，检查完毕，我把这堆东西推到林昭的面前，她笑了，拿起一块蛋糕递给我，说：“你送来的这些东西，现在是我的了，我请你吃！”我拒绝了，我希望的是多留一点给她！我说：“你吃吧！我在外边随时可以去买！”她说：“也好！”于是咬了一口，她忽然向身边的那位女警医严肃地说：“倒一杯水！”女警医向室外只一挥手，立即就有一个年轻狱警送进来一把暖瓶和一个茶杯，女警医把杯中倒满开水递给林昭，于是便边饮边吃，显得非常自得。我说：“今天我们在这儿相会，可谓之‘篮桥会’吧！”

（我国古代有“蓝桥会”的故事，描述的是裴航与云英的爱情，他们约会于“蓝桥驿”。而“提篮桥”与“蓝桥驿”以“篮桥”与“蓝桥”同音面巧合。）林昭又一笑，接着说：“又是‘并台会’！”（“并台会”，这里用的是《白兔记》中的“井台认母”的故事，以包含探监的不仅是我，还有许宪民先生在场，是她们的母女之会。）

这时，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向我宣布：“已经中午十一点了！”提醒我们接见即将结束，分别的时间快到了，这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了！此时，林昭向我说：“你过来，到我这边来！”她站起来向我招手，要我从案子的这边走到那边，靠近她，我迟疑了。这时，那位“管教干部”又表现了理解与关怀，主动向我说：“可以！可以！你可以过去！”

我于是绕过案子坐在林昭的对面，确确实实是促膝面谈。

这是最高潮的时刻：所有的人都似乎怀以极大的兴致欣赏着！连那威严的武警的脸上也浮现着松弛的表情，那踞坐于“讲坛”上的四位女郎，全神贯注而又津津有味、用极微细的上海方

言简短地切切耳语。

林昭在沉思中,终于说:“赠给你一首诗!”于是她轻声地吟诵,韵圆而铿锵:

“篮桥”、“井台”共笑之
天涯幽阻最忧思
旧游飘零音情断
感君凜然忘生死
犹记海淀冬别夜
吞声九载逝如斯
朝日不终风和雨
轮回再觅剪烛时

说明:

第五句:指 1957 年 12 月 21 日晚上,海淀新华书店相遇的事。

第六句:吞声:杜甫《梦李白·一》:“死别已吞声,生离长惻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

九载:从 1957 年 12 月 21 日到 1966 年 5 月 6 日接见时,时历九载。

第七句:朝日不终:《老子》:“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风和雨:陆游《卜算子·咏梅》:“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第八句:剪烛:李商隐《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夜山雨时。”

(“吟诵”之学今几失传,我辈初知之于先师浦江清先生所授,而林昭未之忘也。她祖籍苏州,通晓苏绣与评弹,著有《苏绣及其它》、《苏州评弹的研究》。苏州评弹最讲音律,林昭习传统诗词之吟诵亦得通晓评弹之功也。)她慢慢地、一句一词地边念边讲,她那夹杂着婀娜的苏州方言的普通话,伴随着那浑厚的音色,昔日曾在北京大学的美丽如画的燕园春色中缠绵,谁能料到

一朝沉沦，竟会在这与世阻隔的角落里回荡！听来是那样的雅致与壮美、迷人与亲切。她说：“诗言志！此刻已无暇去太多地推敲声病，只是为了给终古留下真情与碧血，死且速朽而我魂不散！第三句‘断’字或许也可改成‘绝’字，第四句‘死’字有点拗，但怎么改呢？诗言志，如此而已！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在捧着的那个旧布兜里搜找，最后取出一件似是纸片的东西递给我，我接过来回身递给那个“管教干部”，那个人向我挥一挥手，并说：“不用查了，你收下吧！”我把那“纸片”放在掌心定睛看去，才看清原来是用包装糖块的透明纸折叠成比韭叶还窄的纸条编结而成的一只帆船。我记得听我的家兄说：1960年，林昭在通信中曾夹寄着一张自画的贺年卡，那上面画着一艘帆船，还有一行字，写着“直挂云帆济沧海”。今天，还是那只云帆，却漂落到这里！我顺手摘下衣袋里的英雄金笔，递给她，并说：“送给你吧！”她接到手中，欣喜地赏玩，但她忽然看见笔杆上刻着的“抓革命，促生产”六个字，立即改容，不再欣喜，顺手一掷，钢笔被扔到案子上，她说：“我不要！”

这时，“管教干部”已在催促：“时间到了，有话明天再谈！”我告诉林昭：“监狱领导告诉我：安排了两次接见，明天上午我还要来！”她很高兴，叮嘱说：“明天再来，给我再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猫头的！”

谈话结束了，最先离去的是林昭，亦如来时一样，由她的女警医搀扶着，那个佩枪的警士押随着走出内室，而后便是四女郎、武警，最后才是我与“管教干部”，他们依然很客气，向我说：“今天的接见效果不错，你劝她好好改造，她都没有发脾气，可见你们的交往确实很深，过去她的母亲刚说一句，她便表示不耐

烦,不愿再听下去。”又说:“林昭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今天送给你的这只帆船就是其中之一,种类多着呢,全监狱都知道,她是一个聪明人,很少见!”我们边说边走,将走出内室的门,我不禁反顾这间难忘的密室:空空如也,只有地上那一堆殷血的卫生纸片!走到院子里,又看见那高大的黑色铁门,但却又见到林昭正背立在门前,抱着旧布包、卫生纸以及我送来的食品,凝望着我与许宪民先生。我们又获得了这难得的临别的一晤!(岂知这竟是永诀!)我们都未悲感,都被明天的再见而陶醉着、安慰着、诱惑着,她身后的那一扇小型便门打开了,她几乎是退着迈进那铁门槛,依然微笑着望着我们,一直到那扇小铁门徐徐关闭,她在我们的视野里永远消逝!我与许宪民先生还兀自呆立在这悄无人声的大院里。——“走吧!”依然是一句十分客气的声音,我们才恍如梦醒,才意识到那位“管教干部”还站在我们的身旁,他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说:“处长在办公室里等你们!”——这位神秘的人物是谁?三十年后,我与一友人偶然谈起这段往事,谈到这位处长,十分凑巧,我的友人对他略知一二:他当时就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现在当然已经离休了,闲住在上海的家中,日日与犬猫相伴、花草为友,消磨着悠闲的岁月。那位副监狱长当然只不过是他的下属!

我们随着“管教干部”向外院走去,最后,还是二门里的那间办公室,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在门口和蔼地迎接我们,他不同凡响,穿一身很新的灰色的毛料中山装,黑皮鞋,头发梳得整齐,面色光洁而白皙,一口浓重的上海口音南方普通话,真是一位典型的南方儒雅之士和权力在握的决策人物。他示意“管教干部”通出,让我们坐下,他也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木椅上,直截了当地劈头便对我说:“今天接见的效果不好,原定的明天的接见取消了!”这真是一声灭顶而降的霹雳!他稍停,又换了一个思路说:

“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他稍作沉默，又说：“我们也没有办法！”

不知从什么地方增长了勇气，刚才在接见室里的谨小慎微似乎一下子消失了，我于是斗胆，向他请教：“报告处长，林昭主要的抗拒行为都有哪些表现？”

“林昭恶毒攻击反右派斗争！替右派分子鸣不平！”葛处长语极简洁，但却不暇思索、斩钉截铁，稍停之后又说：“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毫无疑问，他没有畅所欲言。那个时候不慎失言都会遭到灭顶之灾，即令这位权力在握的处长也不会例外，其时在全国已经风起云涌地文革国难已如不周山倾，预兆着洪水时代的到来！

相对语竭。我已记不起怎样与这位处长分手，怎样走出这座闻名世界的监狱的城堡式的外门，今日留在记忆里的是在离监狱大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市内交通汽车小站，我与许先生便在那里等待乘车，不知怎么，眼泪从眼睛、鼻子、以及喉咙里汹涌而出，不是眼泪，似是清水，汹涌地、如注地奔流！许先生拄着手杖，无动子衷地站着。

这天下午，我跑遍了上海各大食品公司，中、小食品商店，寻购那种绘着“猫头”的奶糖，但，完全徒劳，在那个时候，“大白兔”奶糖是容易找到的，而“猫头”图案却无处寻觅。

第二年的5月1日，我又偷偷地来到上海，又与许宪民先生一道来到提篮桥监狱，但传达室庄严宣告：“监狱已军管，一切接见停止！”

1968年8月，我在山东某劳改队的禁闭室里接受了“管教干部”的通知：“林昭已于今年5月1日枪决！”他问：“你有什么想法？”

“没有想法！”我告诉他们。

禁闭室是借用一个原是储存化学剧毒原料的仓库,密封极好,其铁制门窗坚厚而小,严密无隙,尤以“室中室”的结构为最:进入外门,几步便是一墙一门,开门入之,又是一墙一门,再开门入之,又是一墙一门,——如此层层相套,大约要五套之后,再一墙一门,便是关押我之处。此处十分狭小,外面什么声音也听不到,在里而即使呐喊捶墙,外而也一丝不闻,真是“人间密室”!这里没有阳光和公众,密封严紧,犹如一个“鳄鱼的胃”!不知有多少骇人听闻的罪恶在如此绝境里肆意为之,而且永远也不会泄之于世!可称之为“魔鬼的餐桌与婚床”!我从1968年7月7日押于此处!

引起的缘故,乃是上海探监,事实证明:有一个全文的录音,他们对我与林昭的谈话字斟句酌地追问,不厌其详地考证,真比今天的一些“教授”们的治学态度与方法还要严谨百倍!他们追究的是“暗语”中的真义,我与林昭的谈话的每一个字、词、句里“皆有密码”,他们真把我们这些书生当成“克格勃”与“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了,实在太抬举了我们!

其时盛夏,在这空气凝结、缺氧、高温、永远漆黑无光的魔窟里,墙的上端原有一个碗口大的圆洞,似乎本是排气孔,如今自我来此即被墙死,光亮尽绝,而蚊虫却有千万,充满了狭小的空间,可谓“密度”极大,我的脸上被碰撞不已,只须两手于空中随意一拍,掌心里便噍类群亡,但却于“蚊势”无减,在这永远漆黑、不辨昼夜的漫漫永日里,蚊虫永无休止地聚讼成雷,在我的耳畔宣言与歌唱,举行着它们的盛宴!我的血也从它们的利喙簌簌之中离我而去,化作它们的血,于是,我的血便在这黑暗狭小的人间里欢歌与飞翔!

在这里,那个提着一大串钥匙频频来“观察”我的人可谓费尽了心机,他每次开开最后一把锁的时候,首先用手电从锁着我

的那扇铁门上面的栅栏照进来,但当他发现我还活着的时候,便一声不吭地回头而去,而后便听见锁门声一阵阵地渐远渐弱以至静寂。终于在一百三十八天之后,我走出了这“鳄鱼之胃”,当我迈出那最后一道铁门又置身于蓝天之下的刹那,第一个感觉就是刺眼的阳光与清凉的空气!我竟奇迹般地活着走出了这地狱,并没有被殛杀!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审问探监的经过?那次探监其实是在严密的监视下进行的一次最为“公开”的行为,何须如此再作事后追逼?即令事后追逼,又何须要那样地去欲置我于最秘密的死地?我因之常常想到一种可能:灭口!那是一次统筹的措施,他们认为:那次林昭的接见是他们的一次严重的失策!因为她竟泄漏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天机”!故当场撕毁承诺,停止了第二天的接见,而“善后事宜”则是移交给我所在的劳改队去完成!对我如是,也可想象对林昭又当如何?所以她的无声无迹地消失、先斩两天而后“奏”、不交待尸体的下落、不向家属退还遗物,这一切,都表明她的“消失”所包含着的阴森恐怖的内幕与骇人听闻的过程!我这里用了“消失”这个词,没用“死”,就是因为她的今日姑妄言之的“枪决”,真情似乎并非那么简单,她也许在别的时间(不在1968年4月29日而是或早于或更晚)、别的场合死于其它的方法与手段之下,也许其实并未杀,至今还被关在类似“鳄鱼之胃”中,——当然这种可能性是极小极小的!她经受的屈辱与残酷是十分复杂的,也是无法想象的!

杀害她的是1968年那个时候的上海监狱、上海公安局、上海法院的那帮人中的某些人,这些人,今天称他们是“‘四人帮’的上海爪牙”,实则却为他们开脱了罪责!其实,“四人帮”横行于世之时,中国大地上的妖雾冤氛有几件确是此四丑亲手所为?还不是那些论道无术、杀人有素的“革命猛士”们的贡献!至于

杀一个像林昭那样的弱女子，根本就勿须呈报四丑去审批，更何况那个时候为了简化杀人程序，终审权已从最高法院下放到省高法院，上海是直辖市，其高级法院就具有死刑终审的生杀之权，所以，林昭之死，仍然是由 1968 年那个时候的上海监狱、上海公安局、上海法院的那帮人中的某些人说了算的！他们是真正的、直接的凶手！这些人今天不过六十岁上下，历史的谬误袒护了一代凶残，掩盖了多少骇人听闻的历史罪恶与惨绝人寰的狱中瘐杀真相！这里，林昭之死，这桩或者已是歹徒们妻妾屡闻生厌的床第碎语，却是迄今三十载真相未白的密杀惨案！

一个屠夫先在楼下呼叫“许宪民”这个名字，彭令范闻之急忙开门，他面对着她的惊惧神态，而表现出的那副不屑详言的恶棍骁勇与杀人娱乐后的快感与快意的神色，令彭令范没齿不可忘怀！

他一共说了三句话：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

林昭已在 4 月 29 日枪决。

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

“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新华社记者穆青、郭超人、陆拂为在 1981 年 1 月公审“四人帮”后的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一文中作如是说！还说：“在中世纪被判‘火刑’烧死的犯人，无需交付柴火费；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里用‘电椅’处死的犯人，也从未交过电费；唯有在林（彪）、江（青）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发明。”

其实，“史无前例的创造发明”还不仅仅是这杀人收费的暴行，还有这“先斩后奏”的杀人通报也是文明的人类世界里所罕见的壮举！——当刽子手临门通报的凶日，林昭已在一天前被

害！这样的“时间差”是为了什么？毫无疑问是为了灭尸！

开始似未听懂，继而意识到噩耗成真之后，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晕厥于室内地上，彭令范拿了五分钱的硬币打发了那个刽子手，他对“尸体现在何处”的询问一言不答、犹如不闻，扬长得意而去。

这是发生在 1968 年 4 月 30 日下午 2 时左右的中国上海的茂名南路 159 弄 11 号楼上的林昭生前家中的一桩“史无前例”的“天下奇闻”！

但是，这噩耗对许宪民先生及年未而立，其时已是内科医生的彭令范来说，似乎并不是多么突如其来！因为早在此之前的两三年间的每一次犯人接见，她们都会听到林昭的“他们要枪毙我”的述说，甚至还听到过林昭的“他们要强奸我”的惊人地当众指斥与揭发，致令那些衣冠狱吏、狱卒们汗颜否认，故作惊讶状！可见其蓄谋已久！

“枪毙”与“强奸”（甚至轮奸）似乎是一对孪生怪胎，往往鱼贯并行而至！这大约不是上海提篮桥监狱里的首创，早在那可怖的“上饶集中营”那里被名之为“废物利用”的强奸与轮奸几乎是那些被俘的新四军女战士们的无一幸免的厄运！张志新在割断喉管之前先遭轮奸！至于古代历史中，那些酷吏们，对女犯的诱奸、强奸与轮奸（有的甚至把女犯私藏家中，长期奸淫。）的枉法与肆虐，真可谓史不绝书！杀人与娱乐被刽子手们最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1966 年的 5 月 6 日，我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探望林昭的时候，她就曾当着森严的现场向我述说过对她要枪毙的警告与强奸的图谋，当时，能够堪作证据的只有她穿着的那破旧的衣衫上密密缝着的粗线针脚：纽扣皆被狱中的折磨与殴打时的撕抓拉扯掉尽，代之以粗线密缝的针脚，是为了对于随时可能侵及的强

奸暴行的抵抗！这说的是平日，若在密杀之时两三大汉挟一弱女子于密室，欺凌侮辱任其为之，故死刑女犯在行刑之前的“准备措施”中遭到强奸与轮奸，缝了衣服姑作“抵抗”！别无它计！——这说的是：假如是先奸后杀，而若先杀后奸，则无所谓什么“抵抗”！我想：在那公理不及、歹徒肆虐的阴暗角落里，像林昭那样的病弱之躯，仅仅凭了几根粗线就能真地“抵抗”得了那群豺狼的欺侮吗？如此忧虑，在一位与我素昧平生的年逾八旬的老人的来信中，也表示了相同的思考，他说：“林昭就义前，有可能被辱。”——这其实是一种共识！凭着那八十年的人生风雨而产生的并非无稽的忧虑！

至于“枪毙”，则更属“官方消息”了！在那次接见结束之后，从那位形貌非凡的监狱长的谈话中即已得到权威的预示：“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证实了在那警戒森严的接见室里的林昭所说绝非妄言，也更证明林昭的全部谈话（包括刽子手的强奸图谋）的真实性！这些罪恶计划堪称蓄谋已久！而今，面对着刽子手的“三句通知”，雄辩地证实了那位处长的“死路一条”的预定方案终于兑现了，那么，那“强奸”的方案呢？却无从对证！

无从对证！本来“死人口中无对证”这已是人之常识，杀人可以灭口，本来已可使什么样的狱中暴行都不会再泄漏于人世了。杀人者本该放心了，但，又为什么不放心？既已“灭口”，竟连尸体也不知下落；进而灭尸！这又是为了什么？难道那尸体上除了子弹杀伤的痕迹之外还会有别的什么人身伤害的痕迹吗？难道当真是惧怕作尸体妇科法医鉴定吗？——确是悬念！于是这一桩密杀灭尸的恐怖兽行的背面，究竟隐藏了什么骇人听闻的实况？在这悬念的思考中使人终于悟出什么是阻挠这沉冤三十一载的林昭惨案真相大白的关键障碍！

非常巧合的是：在4月30日彭令范付了子弹费以后，许宪民先生的友人朱太太打来电话约彭令范见面。她告诉彭令范：她的大儿子祥祥每周两次与同学到龙华机场勤工俭学，每天下午三时左右结束。4月29日下午三时半左右，突然望见两辆军用吉普车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接着由两个武装人员驾出一个反手背绑的女子，她的口中塞着东西。他们从她腰后一脚，她跪下，另外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枪开枪，她先中一弹，血溅衣衫，倒地爬起，又开两枪，脑浆涂地，仆于荒原！然后四凶手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驶疾驰而去！她的遗体被运往何处？只能去问驾驶那疾驶而去的吉普车上的凶手们！他们包揽了密杀与灭尸（也许还要辱尸）的全部过程。祥祥认出她就是大姐姐，他目睹惨状，惊恐失常，不忍详视，痴痴癫狂！高呼：“大姐姐被害了！大姐姐被害了！”祥祥面如死灰，目瞪口呆，由他的同学送回家中。

这是一声晴空霹雳！

于是，许先生几番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上海公安局、上海高级法院询问林昭的遗体究竟被如何处理？如果掩埋，埋于何处？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绝，皆不奉告，而且声厉色狞，拒于门外！于是，这位年逾七旬的母亲，终于意识到与她含辛茹苦度过了三十六年的非凡岁月的女儿今日真地失去了！迷蒙地消失了！毁于一朝，化为乌有！于是她哭，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的长街上游荡，幽灵似地游荡！她念念有词，有时呼喊一声其义难辨的语句，于是她也笑。记得诗人田间的长诗《她也要杀人》的开始云：

是谁杀了我的儿？

我的儿是谁杀了？

——一位失去儿子的年轻的母亲的哭声，半个世纪以前就在我的耳边回响，今天终于与这位失去了女儿的年迈的母亲在上海长街上的喃喃唤女之声融为一只裂人心肺的哀歌！她终于迷失了记忆，全然忘却了她自何处来，又欲何处去！她开始挎着一支竹篮、握着昔日的竹杖，在大上海的人群中梦游与呓语，她一切皆已忘却，也不再悲哀与欣喜，她失踪在人间的海洋里，在汹涌的人流中沉浮、漂流！

只有彭令范，没有眼泪，头发蓬乱，精疲力竭，这世界坍塌了，化为“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不可致诘”的“无物”，化为“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化为“恍惚”（《老子·十四章》），化为“无物之阵”（鲁迅《野草》），化为无尽的废墟，落压在她的瘦弱的肩上、蓬乱的头顶！这个幽静无光的故居，如今就只有她还存留着迷茫的记忆！

有一天，一位好心的人来说，她看见许先生在某某马路上徘徊，彭令范于是急往其处，遥遥望见年迈的母亲白发蓬乱，形容瘦枯，她似在喃喃地唤女，在那茫茫的人海中任自漂流、沉浮游荡而去！其实她在寻找！

老母亲被拉回家，未久，又出走，消失在茫茫的大上海的人海里。终于有一天，她也倒下了！倒在繁华的马路旁的人行道上，遍体鳞伤，面颊青肿，口鼻流血，一只鞋失落远处，竹篮与竹杖已被踩扁和踩断。有人围观，有人视而不见地匆匆走过。——“她是被红卫兵小将打死的！他们说她是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亲，林昭已被枪毙了，也不能叫这个反革命老太婆活着！一声吆喝，簇拥围打，拳脚交加，顷刻命绝！”——后来，彭令范听人如是说。

发生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式的野蛮与残酷，是筑成那个“史无前例”的砖石，多少家庭就是在如此不明不白中消解了！这就是

真正的“家破人亡”，或更确切一些说是“人亡家破”。

于是，彭令范终于沦为孤独，她虽以高才生的资格从上医毕业，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她当然是“敌对阶级”与“异己分子”，所以，她也只能几乎是“有幸”之极地被分配到“上海山海关路张家宅地段医院”，当一名内科医生，代号“3”。那“张家宅”是一座三层小楼，一望便知这曾是一个富豪的私邸，作为一个家庭来说，确有豪富气概，但若作为医院，则实实在在是太小了！在二楼“内科”的那间狭室内，“3”号医生的诊桌前排着长长的就诊者，她有很高的医术，耐心与亲切的情感，病人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彭医生”！她的白衣胸前佩戴着一个“3”字圆章，而“1”、“2”、“4”桌前候诊者却是十分寥落。她的脸几乎全掩盖在那大口罩中，只有一双眼睛和她的亡姐一样，冷冷地望着这喧闹的世界！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但仍对她的遗体的下落不作解释。但亲友之心其哀未绝！1980年12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苏南新专的林昭生前的老师和同学在北京举行了追悼会，彭令范发表了哀恸悲婉的讲话！林昭的遗像周围是菊花与翠柏编织的花圈，但本该陈放骨灰的地方却只有一个白色的方盒，里面放着林昭的一缕头发。

1981年清明节，彭令范填《烛影摇红·忆故人》三首，分别凭吊她的舅父、母亲和亡姐，她的舅父是大革命时期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部长，“四·一二”事变在雨花台就义，被装入麻袋抛入长江。第三首为怀念其亡姐林昭的，如下：

血染芳华，恩情已断何心报！
浮生尝透梦魂残，愁泣霜枝傲。

千古空名焕耀，
几人留，山河共吊！
曲终还散，泪墨尘埃，神嗟天笑！

——林凡书于虚谷

这里，她用了“林凡”之名，寄托着对亡姐林昭的哀思！

现在出现了几种造假的文章，居心叵测！例如：某文讲述林昭被害后“她的尸体无人认领，是由慈善机构送去火葬场焚化的，因此，连骨灰也荡然无存。”——这纯属编造！做成如此故事，可以把人们的疑团消解，可以把那灭尸的罪行掩盖！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人看见她死于何处，何以会有一个“慈善机构”出来“慈善”？须知：那个时候有一条规定：火葬场是决不火化枪毙了的犯人的，叫他们死无葬身之地！那么“慈善机构”又怎能破例？再说，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慈善机构”。

又如：又有一个人自称是“林昭的母亲生前好友”，他又假造了一个“丁芸女士”，说她是“曾与林昭同室囚禁过的中学同学”，于是又假造了一个“丁芸”写的《狱中日记：林昭最后的日子》，这篇假货，首先骗了报纸的编者，进而骗了天下读者，陷编者于不义！也损害了人家刊物的信誉，真是恶劣之极！彭令范来信说：她母亲生前根本就没有那位“好友”，林昭生前根本就没有那位名叫“丁芸”的“中学同学”，更不用说“同室囚禁”过，“日记”所言尽是凭空捏造，知情者一看，句句是假话，“日记”的造假者根本就不了解狱内生活，只是根据银幕上的《江姐》一类的故事去想入非非地瞎编，其中一部分情节则是从已经刊登在别的报刊上的关于林昭的文章中剽窃来的。“日记”中信口雌黄般地编造出林昭在狱中与同室犯人“悄悄地开了一次联欢会”“举行了一次聚餐会”，甚至是与丁芸睡在一个被窝里共枕而眠！尤其是她临

刑之前,竟“穿上妹妹彭令范探监时送来的那件红色的呢制的新外套,又从口袋里拿出一面小镜子,照了一下脸,还梳理了几下散乱的头发。”“向女囚们频频招手,并笑着说:‘诸位小姐妹,再见了,再见……,’”“她想要唱《国际歌》,可是狱卒马上用棉团塞住了她的嘴里,”——这些情节,只是电影故事可以细心拍摄,而在监狱则是根本不可能的、决不允许的!彭令范说:她根本就没有给林昭送过“红色呢制新外套”,这“红外套”实际上就是江姐穿的那件红线外套的联想!

这些假文的副作用是委婉地交待了林昭的狱中生活的“丰富多彩”,甚至使人感到监狱里充满着友情与温暖,甚至颇有诗意,掩盖了那恐怖非人道的摧残与虐待暴行,与林昭对我面述的情况大相径庭!尤其是假文中每每言林昭之死,都似乎实实在在,只字不提密杀与灭尸的滔天罪行!——这其实乃是那些凶手们最怕追究的关键所在。

编者曾到苏州专访过那位造假者,见其面始知已是八十高龄的长者,询问他丁芸下落,他支吾言之:“她在美国!”询问他:“她那本日记何在?”他言之:“在丁芸那里。”如此了事!似此一位高龄长者,竟突发奇想,颇似冯梦龙做起“小说家言”,他编造的实在称得上十分拙劣!但我们终无法猜度出他的居心何在?他到底想得到什么?

今年北大校庆,我在人民大会堂里参加这伟大的庆典,坐在我身边的都是北大人,这些在苦难中走过来的幸存者,大家都没有忘记林昭,都说:“她如果活到今天,也会坐在这里!”我忽然想起上海提篮桥监狱:在人间,休看无处不是人群辐辏、摩肩接踵,却也有高墙永巷、深壑密宅之幽境,那里真可谓远隔人寰、法禁不及之处。例如:皇宫、监狱与寺院,都永远是酿造密闻、结构残酷的洞穴!那里没有公论与公德,极易形成其处的主宰者的狂

想,膨胀起越常的欲念,而为所欲为,密杀、灭尸、奸淫及各种巧夺天工的酷刑设计都在《二十五史》中朗朗有鉴!上海提篮桥监狱兴建于外国侵略者之手,他们的设计直到今天仍不失为十分科学化,我曾读过一篇文章,谈到其处,言:一个婴儿从降生第一天住入此处,每日换一囚室,需到其四十六岁方可把囚室住完!——这是一座多么庞大的恐怖之海与死亡之谷!是一个巨大的“鳄鱼之胃”!在如此深海幽谷之中,什么样的肆虐都可以允许其主宰者自由想象、自由设计、自由布置、自由实施!以至什么样的外力——包括法律与党的伟大之光都无法照进这个独立藏奸的幽境——欲查清密案底里其实则绝不可能!像林昭,一个孤立的弱女子,一个新中国时代成长起来的女学生,一旦身陷此境,岂能有生还全身之望!

但我忽然想起那位完全是一副知识分子形象的处长,他没在接见现场怎么会洞悉“今天接见的效果不好”呢?我想,这大约就是那四位女郎的“直播”工作的作用!他隐于密室,监以视听,如此一位心狭而细、色仁而险的决策者岂能容得下像林昭的桀骜不驯、嫉恶如仇的风骨!就以他论列的林昭之“罪”来看,不过只有“恶毒攻击反右派斗争、替右派分子鸣不平”两件“实事”,两件“实事”说到底不过只属言论与思想,若再列举,那就是被视为“最严重的问题”的“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这十三个大字了!其实仍然属于言论与思想!这十三个大字是“最”严重的问题!可见上述“恶毒攻击反右派斗争,替右派分子鸣不平”还不算“最”!所以可以推论:林昭“当诛”之“罪”的焦点不在“恶毒攻击”云云,而在后面的那称“最”的十三个大字!由处长形于词色、信口称“最”观之,可见林昭对施之于她的一切措施的抗争已到了令他们气急败坏、不杀不足泄其愤的地步!所以林昭之死乃是带有个人泄愤色彩的集体谋杀的罪行!若论“罪行”

是举不出构成处死的事实的,耿耿于杀人决策者之怀的就只有那“逆我者亡”的屠夫逻辑!他们从密杀到灭尸,都做得天衣无缝,不留痕迹,以致使这一桩“江南一林,千古奇冤”的真相迄未大白于天下!其实,尽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早已在1980年重查林昭死案后作出裁决,宣告林昭无罪,而有关方面迄今仍公然拒绝协助弄清这一冤案的真相,甚至迄今也拿不出林昭死刑的判决书。足见上海那一伙人对法制的肆意践踏已到了何等令人发指的程度!甚至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改革开放已取得了伟大辉煌的成就,民主与法制的建设也走上了科学化与健全化的道路,那些在昔日极左路线的倡导下制造了累累冤案的当事人与执行者们,还固守昔态,要把那些丑恶的旧帐不了了之,一直带到棺材里去!他们是拿不出杀人的理由的,他们明白此案一旦大白,他们便会被推到被告席上去,所以才会对新华社记者的公务采访,公然采取“不说、不让、不给”的负隅顽抗的态度!这就是当前弄清林昭从被密杀到灭尸的真相的最大障碍!

现在,在苏州的灵岩山西侧的安息公墓墓地上有“林昭之墓”,但那里面只有她的一缕长发、一套旧衣、一张照片,是一个空空的“发之冢”!她的遗骨抛落在何处,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良知未泯的人道的知情者,我们真诚地请求你发一次善心,就请你写一封匿名信,请寄往“苏州灵岩山安息公墓管理处”吧!为我们提供寻找林昭遗骨的线索与地址!求求你了!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感激你的恩德!苍天在上!佛在我心!上帝与一切神灵都会呵护你“立地成佛”的!

愿上帝保佑你或你们!阿门!

1999年1月18日于曲阜师范大学

幽 明 心 语

——忆林昭

张 玲

在校门口注册完毕，走进临时分配给我的斋、室，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你。两条南式辫子吊在耳际，浅灰蓝色工装裤裁剪合身，白衬衣、体质弱，瘦长脸上一对南人那种灵秀的眼睛含着笑。没有怎么寒暄介绍，你我已相处自在。你是“调干生”，比我年长几岁，叫我“小鬼”。分班后，你我不同小班，也不再同室，但并未妨碍彼此过从。

两个月后，在北京市应届高中毕业生大会上，我曾代表毕业生献辞，朗诵自写的毕业诗，进北大后，负责诗社的学长们很快就登门相邀，于是入了诗社，开始在校刊和一些油印刊物上发些校园诗文。忘记是怎样一种机缘，我知道你也爱诗。我们唱和应答，一起颂赞大学新生活，编织青春之梦。

天空又深又蓝，
银河又长又宽，
住在家里的時候，

从来没有这样好的夜晚。

明亮的灯火装点着黑暗，
歌声笑声洋溢在空间，
校园里的夜晚，
使人忘掉睡眠。

独自坐在小院里的时候，
空气从来没有这样新鲜，
和妈妈住在一起的时候，
我的心胸啊，从来没有这么宽。

诸如此类，当然都是孩子气的感受和文字。那是政治气氛浓厚的时代，有人批评我的东西，“时代气息不浓。”我欲求一改诗风，却头脑幼稚空虚，不得其法。

一天，你含笑递给我一张纸片，上书一首以娟秀字迹写下的自由体，题名《饭厅进行曲》。那时学生食堂实行“供给制”，鱼肉菜蔬之类副食分桌定量分配，馒头米饭等主食放在厅中央几个大木桶内，自由各取所需，虽然餐餐丰足，一些人却偏喜先取为快，弄得秩序混乱，很不雅观。你，温婉蕴藉而又敏捷锐利，看不惯这种做法，就写下这首诗。还记得是用反讽笔法，有“冲呀，挤呀，勇往直前，我们是饭厅勇士……”云云，颇类海涅《织工歌》口吻。我读后，感到立意新颖，但意犹未尽，就和了一首传统说唱体打油，登在了校刊上，恰正配合了学校的文明礼貌教育，系内外熟人诗友纷纷祝贺我这次小小成功，并就此鼓励我今后多写些这类富有“思想意义”的诗。其实这首诗的立意属于你；而你，却只顾笑殷殷地欣赏念诵其中那些比喻和形容。当时的我，少

不更事,未懂人际,甚至至亲朋好友间,除却友爱共济,还有计较、猜忌,因此也鉴别不出,你那纤弱胸际包藏着一颗多么宽容大度的心。

正因这颗宽容大度而且爱诗的心,你常主动找我为伴。学校生活比在家时有节有律,数月间我长胖长壮了不少,于是由“小鬼”成了你的“黄油球儿”和“哥萨克”。白天课间,室友大多挤到大小图书馆、阅览室,宿舍反而成了最安静的自习所在。你常悄然而至,笑殷殷地谈诗论文,或品尝我从家中带来的花生糖煮栗子。我去你室,则多见你埋头于线装诗类经典,或抄录警句妙语,笔记阅读心得。黄昏日薄,你我循着未名湖边的湖光塔影漫步,往往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感受。稠人广众,男女同学杂处,高谈阔论之余,你我有时还要隔着大家,以改变人称,移花接木的方式,继续我俩的“私房话”。

那时候,中文系学生,大多早已熟读《红楼梦》,在开“清代小说”课和“《红楼梦》专门化”时,吴组缃、何其芳二位先生更将《红楼梦》热加温到了沸点,大家自然而然将美丽的燕园比附大观园,又将同窗女友比做荣宁府中一些女孩儿。于是,你以籍贯地近姑苏(记得你祖籍常州),又改彭姓为林,且大有黛玉“娇袭一身之病”和“行动如弱柳扶风”之态,而被称为“林姑娘”。起码那时,你确有几分似林黛玉,少不更事的我,曾以为那是有意摹仿,其实是因为那种诗的气质,那种外表文静阴郁,内心火热狂放的性格——这半自天成,半自你家庭不幸的身世;起码当时,你本人也喜欢并默认这个称呼,而且以你的聪慧、幽默给同班一位心直口快的同学取名史湘云,给另班一位取名傻大姐儿,对我这个家庭温馨、少不知愁的小妹,你悄声说:“你是薛宝琴。”

不管自来现实的男性眼中,林黛玉多么并非佳偶,我是初读红楼后就喜欢她,直至如今,且曾幻想,假如我是男儿,定然娶她

为妻,且对之悉心呵护,主要是因为她那晶莹如冰似雪的聪明和诗意。但是五十年代是一个如火如荼的时代,崇尚健康、壮美,像你那样的纤弱、敏感、细腻,在大学校园中女生为贵之时,仍然缺少知音和追求者。然而情感也是以稀为贵,一旦萌生,却能刻骨铭心,终生不渝。你新闻专科学校时代的女友倪竞雄与你保持了长久的联系,且从上海来北大看你;校园内热情澎湃侠肝义胆的诗人张元勋,更是你最投契的文明诗友。你与他们的情谊,在日后的风雨患难中,早有见证。

大学二年级开学时,你从南方省亲度假归来,剪掉辫子,烫起头发,穿上时新的衣服,满面春风地给大家分赠带回的土仪,这又令人想起林黛玉从苏州重返贾府的情景。星期日,你特意邀我留在学校,与另外两个上海籍女同学一起,在湖边土山照相,其中两张,已成为珍贵的永久纪念。节假日进城,你也到我家做客。母亲喜欢你那份与她自己假小子女儿截然相反的文静,给你做家常菜,照你身穿的衣服样式为舍妹做新衣。而对他人爱重,你具有快捷的感受力,将我家当作自己的家,将我父母当作你的长辈。你总是分享我从家中带到学校的书籍和小吃最多的一个。我从东北实习归来,带回数件抚顺的煤精雕刻品,你有些故作娇憨地抢先挑选了自己最喜爱的两件。其实,你只是太喜爱精美,并非贪占任性。你母亲从上海来探望你的时候,曾特意到我家中,馈赠多少精美的江南食品,从那以后,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我从未再尝过那样可口的美味。我二十岁生日时你赠我的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明寒山赵氏刊本《玉台新咏》,亲题“上言各努力/下言长相怀/张玲二十初度。”我至今珍藏。

然而当年我是那样地混沌不开,竟没有充分领受你的这份情谊。就在我们四人星期日校园留影不久,一天下午,你在宿舍里一边哭泣一边记日记,又一边哭泣一边将日记一页页焚烧,面

我竟浑然不觉,甚至认为你是有些脾气乖张,耍上海小姐的小性儿。其实,那是有人批评你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提示你“不要与单纯的小青年儿过于接近,以免对人家有不良影响。”

由于这样一些生硬、过左的干预,敏感的你又尚未做好承受的准备,因此显得脆弱;再加上情爱无所寄托(其实,怎能说你那份纯真可贵的情不是所托非人呢!)你有了明显变化。由风趣机巧变得沉默寡言,脸色更见苍白,身形更显瘦弱,明澄的双眸多了一层愁翳,嘴角平添了悲戚。你更多地独来独往,有时只身在圆明园的废墟上徘徊到深夜。但在我初次恋爱时,你还是关切地对我款语呢啾:“小鬼呀,恋人之间,气质相投是最重要的。”

然而我是那样地混沌不开,竟然没有在意你的变化,你的孤独与悲愁,还有你的劝诫!大三开始,孜孜于课业之余,你我分别忙于编辑《红楼》诗刊和校刊《未名湖》副刊,往来减少。但似有男同学说:“昨天傍晚又见到你们俩的裙子在未名湖边飘然而过。”那是什么形态,你我不得而知,但无疑,那其中有青春之美。

风浪袭来,我不识水性却胆敢弄潮,立即陷于没顶,挣扎中自身难保,却偶然瞥见你也在近处波涛间翻滚,你我无力相呼,无力相援……

十余年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竟落得那样结局!你我都以“待罪之身”踏入社会,不能告别。启身前,我回到城内家中,母亲出示你日前悄然送来的一方绣帕和一张字条,上书“此时无声胜有声”。当时的我,如此愚顽无知,竟如同交出我自己那些纯属私物的全部日记和情书一样,也交出了你的手迹。因此,随后我们的永诀,使我对你欠下了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务。岁月漫漫,校园的五七风浪已成“小巫”,我不再少不更事,不再混沌不开,不再愚昧无知,也才稍懂痛惜那失不复得的一切。巨浪淘沙,时光冲却脑海中多少无价值的记忆,但永远洗刷不掉你那张

字条。于无声中,我常说:那是我欠你的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务,也是我生平少有的欠债。

1999年5月1日,林昭三十二年忌辰后二日

一个不屈的英魂

——悼念林昭

刘发清

1968年5月1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林昭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4月29日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5分钱的子弹费……

二三十年了,一张笑脸化成了一个带血痕的影子,总在我脑屏中闪现、旋转、萦系着。它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稍有减色,反面被时代的激流冲刷得更加鲜明。最近她仿佛变成一个铅球,沉重地压在我胸口,使我烦躁不安,甚至喘不过气来,逼迫我非写出来不可。倘写不出,好像无以报答地府的英灵,也无以安慰自己的良心。

她叫林昭,是我的大学同学。她长得身材适中,文雅端庄,有一对像燃烧着的火焰般闪亮的大眼睛。她经常在北大校刊和学生会主办的《红楼》上发表清新活泼的散文和颇有才气的诗歌。我记得当年伏罗希洛夫访华时,《中国青年报》接连发表的两首欢迎诗歌,就出自她之手。她学习刻苦勤奋,成绩优秀,是同学中的佼佼者。但她才多身弱,性格倔强,曲高和寡,有点像

林黛玉,同时她又姓“林”(其实她真实姓名叫彭令昭),因而不知从何时起,她获得了褒贬参半的“林姑娘”(黛玉)的雅号。因为我和她同级不同班,而我这个来自粤东北山区的放牛娃,在她这位喜欢穿花裙子的上海姑娘面前,未免有些自惭形秽之感;加上我又听见别人说她“骄傲自大”、“不关心政治”、“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极浓”等等。所以最先接触不多,交谈更少。到了三年级,我们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写作组,她是组长,我是组员,要商量写作问题,说话自然多了。她文思之敏捷,知识之广博,口才之犀利,以及善于思考,是我颇为钦佩的。

1957年“反右”运动在北大开始以后,像她这样有独立见解的人,理所当然地最先“加冕”为右派分子。随着运动深入扩大,即使平庸如我者,只因直言多说了一些与潮流相悖的话,亦未能幸免。命运就这样把我们变成了“同路人”。

我当了“右派”以后,仿佛从云端掉入地狱的无底深渊里,沉浸在忧愁与忏悔之中,受到最大限度的孤立。每天除劳动、写检查和上课之外,几乎剥夺了开会、散步,乃至说话等一切自由,商且时时刻刻被监视着。

1958年7月某日,我们毕业生分配的方案已经公布。我明白:只有遥远的边疆,才是适合我去的地方,与其被迫,不如争取主动,报名到陌生的大西北去。但此去前途未卜,自然是凶多吉少,心中忐忑不安。当时我正在谈恋爱,女朋友虽然表示愿意等待我到“摘帽”以后;但我预感到自己永远难忘的初恋恐怕不会有好结果……因此,我伤心,我惆怅,我悔恨,我嚎啕大哭,我咬过自己的手指,揪过自己的头发,陷入无穷痛苦中而不能自拔,一天下午五时左右,我低头走着,校门边突然有人低声喝道:“右派分子刘××到哪里去?”我吃了一惊,抬头一看,原来林昭笑吟吟地站在面前。

“别开玩笑，我想回校去。”我愁眉苦脸地回答。

“嘿，”林昭突然提高声调，“回去做什么？去吃晚饭？”

“不，……我近来几乎吃不下饭。何况现在时间还早，饭厅没有开门呢。”我看见她明亮的眼睛里含着几分讥讽的表情，茫然和尴尬地回答。

“走！我们到外面吃顿饭去。我请客。”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我不饿，不想吃。”

“哼！饭要吃，面且要吃饱。你不饿？也罢，那你也得陪我去。”她好像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我环顾四周，没有发现“狼一样的眼睛”，便转身跟着她走去。

饭馆顾客不多。林昭找个角落坐下，我没精打采坐在她对面。当我再次表示没有胃口时，她向服务员要了一碗肉丝面，举起筷子咯咯地笑：“你不吃，我可要吃。”她一边吃，一边告诉我：她当“右派”之初，不吃，也不睡。人们说她在流泪，其实她心里在流血。她甚至曾经自杀（我知道她自杀而被抢救过来，但我没有勇气去看她，此时也没有勇气追问关于她自杀的细节），可是现在她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多个右派，全国有多少？”她停下筷子，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我是不容易服输的人。从前我虽然钦佩林昭的才气，可是我心里没有怎么服她，况且她的年纪跟我差不多。可现在她却像一面镜子照亮了我，我觉得她好像变得高大起来，像个哲学家一样冷静地睁着眼睛审视着一切……

我们从饭馆出来，已日薄黄昏。夕阳的余辉染红了北大校

园,玫瑰色的彩霞在西山上炽烈地燃烧着,远处暮霭苍茫,微风轻轻吹拂,白杨树叶沙沙作响。北京夏日炎热开始退去,夜晚特有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清爽凉快开始降临。林昭忽然停下脚步,说:“喂,我们逛逛颐和园去吧。”这里去颐和园只有两站路,乘公共汽车只需五分钱。傍晚时分,颐和园游人很少,昆明湖的万顷碧波,万寿山的曲径的清幽静寂,奇花异木的浓郁芳香——啊,多么富有诗情画意!这正是游园休憩的好时光。

我犹豫了一会儿,却说:“算了,时间不早,我们还是回校吧!”我之所以不去颐和园不是我的一切美感都泯灭了,也不完全是逃避“瓜田李下”之嫌的闲言碎语,而是害怕被怀疑在一块搞什么秘密“阴谋活动”,从而在即将分离之前招来不必要的甚至令人难以预料的后果。

“……”林昭望了我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有说。进入校门以后,我们各自分开走了。

不久,我被“分配”到大西北。林昭“罪行严重,态度十分恶劣”,本应送去“劳动察看”,但因病留下在北京做资料工作。我离开北京时没有向她辞行。没有料到,此行竟成永诀!

1960年春天,我在黄土高原一个小县一所中学农场劳动。这个所谓“农场”,就是全校师生用镢头、铁铤在贫瘠荒原上开出的几亩荒地。路边盖了一间宽不到三平方米的低矮小土屋,房门用几块木板拼成。除了我和一个“作伴”的学生住在小屋内以外,“农场”一无所有。这是一个漫长而可怕的春天。河边草丛刚刚露出淡淡的绿色,天空常常弥漫着灰黯的云雾,寒风袭人,冷侵骨髓。附近农村里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我虽属于“干部”,但根据规定,该县干部每人每月口粮从27斤“节约”到25斤,接着“节约”到22斤、20斤,每人每天平均食粮6.666……两,好在这里时兴一天吃两顿,每顿供应3.333……两玉米面。

除盐巴外,没有菜,没有油,没有任何肉、副食品。县城里唯一一间熟食店早已歇业。街上冷冷清清,看不见任何食品出售。只有一所县医院门庭若市。我所在学校,除了少数几个脖颈壮如公牛的食堂管理员和领导人以外,老师和学生有的得了肝炎,有的水肿病,有的肚子疼……我在“农场”无事可做,但头晕眼花,每日翘首两次开饭时间,而每一次可以领到一块手巴掌大小、约二寸厚的玉米面“花糕”——这是当地手艺高超的大师傅发明的“增量法”所制造出来的杰作——和一碗也是玉米面烧成的汤。几乎用不着牙齿帮忙,两种美味食品刚到手便自动滚进我的肠胃里去了。然而我总觉得“花糕”太少了,倘有一箩,我也可以一次把它吃个精光……一天,我突然觉得两条腿沉重得灌了铅似的,脚和小腿肿起来。我一步一步慢慢地挨到校医室,刚从卫校毕业的年轻校医,只把我从头到脚扫了一眼,什么话也没有问,就在药柜里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一盒中成药——“银翘丸”,把它塞到我手里。“这是治感冒的呀?”我不胜惊讶地问。他摇摇头,说:“‘瓜菜代’嘛!但不许多吃,一天只准吃两颗……”

我的水肿病越来越严重,整日昏昏沉沉,但校医室连“银翘丸”也没有了。我知道自己病情严重,甚至作好了思想准备:我不能偷,不能抢,也不能逃跑。因为我是……可怜我才27岁!最可怜的还是我千里迢迢之外的老母亲,因为她在我8岁时失去了我父亲,只有我一个独生子……

正当陷于绝望之时,我突然接到一封信。那柔中带刚的娟秀字体,一看便知是林昭的手迹(我到西北后一直和她保持通信)。我撕开信函,掏出、摊开信笺准备读下去时,忽然一个小纸包跌落地上。我俯身拾起,打开一看:——啊,全国通用粮票:5斤、10斤、15斤……一共30多斤!我急着看信,信中说:知我处境十分困难,她的日子虽然也不好过,可是她饭量不大,吃得少,

因而有点节余,凑了这么一些,略表寸心,幸勿见外……我把信反复读了三四遍,用手帕擦了几回湿润的眼眶,心潮起伏久久难平:世界上最崇高的美德,莫过于“舍己为人”;世界上最完美的情操,莫过于“雪中送炭”。在这困难时刻,有的亲人为争夺一点食物而反目为仇,有的夫妻为几斤粮食而分手离异。而我和她只是一般同学而已,她送我的岂止是几十斤粮票,而是世间爱人与人爱的无私的情操和伟大的美德。她不仅向我伸出救命之手,而且展示了她那水晶般透明高洁的灵魂。这区区 30 余斤粮票,在当时仿佛胜过 300 斤、3000 斤……难于计量的友情,使我感到渺小的身躯难以承受它的重量。我赶快回信,表示万分感激,信中还真诚敦促她“认真改造”,祝愿她“早日回到人民怀抱……”不久,我接到她复信,大意说此乃小事一桩,不足挂齿;至于足下所说“认真改造”云云,则“你我都是共坐在一条船上的‘旅人’,船若靠岸,我亦可登……”

我对这 30 余斤粮票,倍加珍惜,每天限定加买半斤粮票的“花糕”或“黄团长”(黄玉米而馍馍),决不多加一两。直到这年夏收以后,我的每月口粮供应恢复到 27 斤,还有一点萝卜之类的蔬菜。奇怪,我没有吃药,水肿病却不知不觉痊愈了。

可是同年 10 月以后,我与林昭的联系突然中断了。我给她写了一封又一封信,都仿佛石投大海。我多方猜测,四处打听,但都一直未曾听到有关林昭的半点消息。

1979 年,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即将调回家乡之前,去看望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我问她:林昭今在何方?她出人意外地满怀悲情告诉我:林昭在文革中被“四人帮”枪杀了!

天哪!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我仿佛触电一般,说不出半句话来,眼里顿时掉下簌簌泪水。半天,我才吃力地想起鲁迅先生的“忍看朋辈成新鬼”诗句……我要了纸和笔,透过朦胧的泪花,急

急草就《哭林昭》诗一首,现摘抄如下:

此世难忘弭难粮,高情厚藉翰华长。
减卿瘦体盘中粒,饱我孤寒病饿肠。
飘零沦落更惨死,噩讯迟闻泪沾裳。
黄土冢中眠傲骨,惊水长啣怨浦江?
芳魂杳杳难入梦,春草幽幽一缕香。
船靠岸边君不见,空留遗恨泣同窗……

可是林昭为何而死?怎样死?死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那位同学也和我一样,脑子里全是大“?”。直到“四人帮”被拉上历史宣判台,报上发表了新华社记者穆青、郭超人、陆拂为写的报告文学《历史的审判》,才痛悉:“在我们熟悉朋友中就有这样一位同志。这是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名叫林昭。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上海的监牢。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上‘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的生命。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消息:1968年5月1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4月29日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后来,我又读到上海《民主与法制》杂志1981年第三期《林昭之死》一文,对林昭罹难过程才有较为详细的了解:林昭的舅舅许金元曾是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4·12”事变中牺牲的烈士。林昭的母亲早年追随其兄参加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林昭受其舅舅和母亲的影响,十七岁参加工作,参加过“土改”,当过新闻记者,在工作

中成绩出色。1954年她以江苏省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1960年林昭因病回上海以后,与几个朋友编印了《星火》,她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长诗《海鸥之歌》、《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和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林昭等因看了“南共纲领”,认为南斯拉夫情况和中国很相似,不妨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寄给有关领导人作参考借鉴。她因而于1960年10月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因为她在狱中坚持真理,从不低头“认罪”,甚至变本加厉地直接有力地抨击“四人帮”在搞现代造神运动和愚民政策,终于从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林昭的妹妹谈到她最后一次探监见到林昭的情景:“一见她,我大吃一惊,她的打扮正与外面一片红色海洋截然相反。她穿一件淡色上衣,用白被单当裙子,长长地拖曳在地上。手臂上套着一块黑布,上面用白线绣了一个‘冤’字。她的头发留得很长,齐根扎了一条白手帕,宛如过去戏台上的窦娥……我隔着铁丝网发呆了。当然,我想我是理解她这样的打扮的含义,这是另一种反抗……”林昭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是:《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1979年1月,北大发出了关于林昭错划右派的改正通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了林昭案件,于1980年8月22日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宣告林昭无罪,冤案终于平反昭雪。1980年12月11日,林昭生前部分教师、同学、好友和亲属在北京举行悼念会。参加者有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罗青,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许觉民,前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人大新闻系主任罗列,作家林斤澜,作家、北大同学刘绍棠、陆拂为等八十多人。我未能参加追悼会,发去唁电:“千秋岂短,浦江尚滴颦卿血;四载何长,粤海无平难友心。”以寄悲愤与哀思。

林昭的悲惨命运,令我想起张志新,想起我们这一代不幸的知识分子。林昭的悲剧,难道不是时代的悲剧么?然而,决定暂时胜负的也许是力量,决定历史胜负的却只有真理。被残暴的“四人帮”所戕害的林昭,虽然倒下了,但历史已经证明:她是真理的殉道者。她只活了 35 岁,正当开花结果的盛年,没有结婚,无儿无女,“质本洁来还洁去”。她宛如夜晚一颗一闪即逝的流星,生命虽短,但那划过天际的璀璨光芒,会点燃人世间许多追求真理的心!

1985 年夏天,我游览了古城苏州,参观了名扬中外的拙政园,驻足虎丘胜景,饱餐了中国的“威尼斯”——苏州水域的美容秀色。回到广州以后,暨南大学钟山同学问我:去看了林昭的坟墓没有?“什么?林昭有墓?”因为我仅仅知道林昭身后只留下一束头发。他说:有。那是几个同学凑钱在林昭的故乡——苏州给她修了一个墓,——“一抔净土掩风流”。不过,是“衣冠冢”?还是骨灰墓?也许只是一个纪念碑。但即使是纪念碑也罢,我到苏州没有去看她,真说不过去,令人黯然。可是我又想,倘见了她,我能说些什么呢?就说“安息吧,林昭”吗?对此类废话,林昭的英魂,即使在天堂抑或在地狱里,她乐意听么?想来想去,我似乎找不到一句适当可说的话。我只默默地对自己说:“惭愧吧,后死的苟且偷安的‘须眉浊物’!”

1988 年 2 月

回 首 往 事

羊华荣

我与林昭是同学,曾有过一段难忘的友谊。我早就想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为她的生平补充一点史料,后因种种原因,拖了下来。这是数十年前的往事,我也已过古稀之年,有些事仍历历在目,有些事已模模糊糊,这里只能零零星星的述其大概而已。

我常想,林昭本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姑娘,有她的爱,有她的恨,聪明而善良,她做着与当时女大学生同样的梦。她以后的一切,完全是被不正常的社会环境逼出来的,是她不得不用血来书写自己历史的。我相信,历史将会主持公道,她将以不屈的才女形象,永远流传于人间。

一、相约黄昏后

1954年9月,有天在北大学生食堂吃饭,意外地见到林昭,原来她也是刚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学生。我们本是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能在这里见而,大家都很高兴。原苏南新专同学同年考入北大的,还有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汪宁生,图书馆

系的王启宇,中文系新闻专业的陆拂为,当时我们常在一起聊天。在第一学年,我与林昭同在北大广播站任编辑,晚饭后常在一起处理稿件,周末也常请她跳舞,我们是很熟的。

1957年,我们先后被划为右派,虽在食堂和路上能碰到,但很少有交谈的机会。秋末冬初,北大反右高潮已过,校方对右派的监管有所放松,这就使我们有了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有天晚饭后,我在海甸新华书店翻书,感到身后有人,回头见是林昭,大家相视而笑,随即先后走出书店。当时的海甸镇很小,走出书店,穿过一条小巷,就是田野,我们在田野里边走边聊,度过了一个漫长的黄昏。自此,我们相约,每日黄昏在校外相见。自从成为右派后,周围的人都和我们划清了界线,转眼间,我们真的成了孤家寡人,整日寡言少语,独来独往,因而我们每日在黄昏相见时,心情分外的愉快。开始,大家发发牢骚。她对社会生活中的反常现象,对反右斗争和对右派的处理,均感到难以理解。对一些人的言而无信,对一些师长们的言不由衷,对一些同学和朋友们的背信弃义,亦深表不满。当时林昭的情绪较低落,身体又不好,真是身心交瘁。过去我与林昭虽很熟,但大家在一起时只是聊聊天,开开玩笑,或探讨一些问题,对她的内心世界知之甚少。现在,她在我的面前倾诉一切,我感到,她是一位单纯而缺乏世故的姑娘,她坦诚善良,但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显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她对很多事看不惯,想不通。我比她年长,社会经历比她丰富,虽对反右不满,但并未为此而悲伤。我在林昭面前,虽也发些牢骚,但更多的是充当了劝导者的角色。有天,她忧伤地说:“反右伤害了年轻人的心。”我笑笑说:“年轻人的心值多少钱一斤。当权者可不管什么心呀情呀的,这是诗人的语言。”我劝她,不要把目前的一切看得太认真,时间会把一切都冲淡的,不值得为此而烦恼。在闲谈中,她

提到她的小名叫“苹苹”，我说：你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林黛玉，连小名都相似。她说：此“苹”不是那“颦”。我说：那“林”近似此“林”。她说：我可不是小心眼。我说：就是容不下多少委屈。当时，我确实有意识地劝导和鼓励她，希望她能从低沉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她是一个要强的女性，有次我不留意，把话讲重了，她生气地说：我不要听你的说教，不要你的同情和怜悯。我作了些辩解并表示歉意。我们相处一段时间后，她的情绪有所好转，心情逐渐开朗，有天，她握着我的手说：你真像我的大哥。我说：你有大哥吗？她说：我没有哥哥。我说：那我就认你这位妹妹吧，但我有一位妹妹，就称你为二妹吧。她点点头。我笑笑说：这下我真的有位林妹妹了。至此，我们更接近了，在此后的通信中，我都称她为二妹，她则称我为兄，自称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也尽了一些做大哥的责任。

偶然发发牢骚，是挺痛快的，发多了，也感到乏味，慢慢地，我们的牢骚越来越少，较多地谈论一些轻松的、有趣的话题。这里有认真的探讨，也有牢骚和玩笑，反正不拘一格，任性而谈。林昭知识而宽，记忆力强，思维敏捷，幽默善辩，和她在一起无拘无束的聊天，可以说是一大乐趣。

有次，我们谈起北大一位右派被捕入狱时，议论起牢狱的问题，认为牢狱的大门为右派敞开着，但牢狱是人盖的，也是人坐的，右派亦是人，坐坐牢亦无所谓。并认为，牢狱可以毁掉人，也可造就人。我们列举了一些古今中外坐过牢的名人，有的因坐牢而大有成就，名闻于世。

有次，我们议论天下的英雄，认为自古以来成功的大英雄，也必是大流氓，他们有一共同的特点：就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一切手段，他们从不信守什么仁义道德。我们分析了刘邦、曹操、朱元璋等历代的大人物，几乎很少有例外。

我们议论过历史的真伪；老庄思想与孔孟之道；小说与诗歌；无神论与宗教等话题。有次谈到基督教时，她说：你不要贬低上帝，我信奉基督教。我们也谈论过爱情、婚姻等话题，但只是一般的闲谈。当时我是极右派，即将去山区劳动，不仅是前途茫茫，亦可说是生死未卜，此非考虑爱情与婚姻之时。我们在一起较为随便，谈话无所忌讳，为抵御冬夜的寒冷，我们也比较亲近，但这都是朋友之间的相互关怀与信任。在闲谈中，她曾说过，她过去没有真正的恋人，只是有一些谈得来或比较接近的朋友，也有人曾向她表示过好感，她也婉拒了。我感到，林昭思想比较开放，喜交往，不耐寂寞，她的思想感情，需要表达，需要与人交流，因而她需要朋友，需要知音，甚至需要关怀与爱，但对她来说，这未必就是爱情。

她不是传统型的女性，她在恋爱、婚姻等问题上似无一个固定的模式。有次她谈到北大一对恋人均被打成右派后，他们蔑视一切，冲破阻力，登记结婚了。她对他们的浪漫与勇气大为赞赏。她也讲一些爱情故事，但大都是浪漫式的恋情，这或许是她恋爱观的反映。

林昭爱诗，也喜欢谈诗。有次在谈论诗与酒的关系时，她说：在中国文学与诗歌的发展中，酒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诗人都是嗜酒的，如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等。很多作品的内容是与酒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没有酒，诗坛将一片苍白，整个文学同样是如此。有时她即兴作首小诗（内容均记不起来了），她的诗爱用典故，有时较费解，我嘲笑说：以后我得抱一部《辞源》来听你的诗。她反嘲说：抱歉抱歉，不知你是只羊，人家对牛弹琴，我对羊吟诗。说罢，她得意地哈哈大笑。她有时也低吟一二首旧的诗词，在夜色茫茫之中，她那轻步低吟的神态，使人感到有种特别的味道。我曾写过一首打油诗取笑过她，诗的大意

是：

没有月亮，没有星星，
旷野一片寂静。
夜色中飘游着一团阴影，
似烟、似云、似风样的轻。
这是何方的幽灵？
哦！原来是林妹妹在行吟。

她看后笑笑说：写得还真实，就是少了点诗味。

她有时还作曲，她曾唱过两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征询我的意见，我们曾一起探讨过。

林昭不重修饰，但留意仪表之美。有天，她送我一张照片，是在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前拍的。她身穿中式蓝布上衣，围白围巾，两条发辫上扎白色蝴蝶结（她平时常这样打扮），神态自然，背面题“什么是美，生活本身”。她选这张照片送我，显然她喜欢这一朴素大方的形象，背面的题词，亦是她当时美学思想的反映。

有天黄昏，她意外地穿一件红色呢外衣，我说：今天是什么日子，打扮得这么漂亮。她说：这是她自己设计和缝制的，尚未完工，穿来请你看看，是否合身。我对此完全是外行，但还是赞美了几句，特别是称赞她还会做衣服时，她显然很高兴。当时我打趣地说：“穿锦衣而夜行，惜哉！”她答曰：“不见天日，奈何！”

我们一般相约在附近的田野里，但有风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在荒坟或密林中寻找一些略可避风的地方。有天，我们在荒坟中聊天，荒坟外有条小路，因天黑，未注意有人经过，谁知路过的行人听到荒坟中有声音，回头就跑，我说：这下我们变成鬼了。

林昭笑笑说：谁也没有把我们当人，是鬼，人们还敬畏三分，做人不如做鬼。她拍拍坟头说：孤魂野鬼们，来吧，来和我们共度良宵。她还讲了一个人鬼相恋的故事。

在刮大风或下雨时，我们常躲进小酒店里，一杯浊酒，几碟小菜，边饮边聊，悠然自得。有时向店家借来象棋，边下边饮。她棋艺不如我，但酒量比我大，我喝酒后脸红，她喝多了脸发白。我们一般不多喝，只是在此避风取暖而已。有时她高兴或不愉快时，要我陪她多喝两杯，有次我劝她不要再喝了，她轻轻举起酒杯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来，干杯。她喝酒还能自控，我从来未见她喝醉过，即使多喝一点，也从来未见她说酒话。有次从酒店出来时，我先取下自己的外衣，她批评说：应先为女士取衣，再取自己的。我说抱歉，恕我不知姑苏闺秀们的规矩。她笑笑说：在女孩子面前就得学点规矩。她有时比较随便，不计较，但也有女孩子的细致。

在月色好的夜晚，我们有时去颐和园或圆明园遗址。有天，我们在颐和园十七孔桥赏月，此夜月白风清，周围一片寂静，湖而银光闪烁，万寿山雾气朦胧，此时此境，宛如置身于仙境之中。我问林昭：凡人想做神仙，神仙又想下凡，究竟是天上好，还是人间好？她沉思片刻后说：彼此彼此，人间到处都是专制，天上也等级森严，决非一片净土，否则养那么多天兵天将干什么？反正没有极乐世界。我说：极乐世界者，及时行乐也。此时此刻，此情此境，岂非一片净土，岂非极乐世界。她说：这是自得其乐而已，但你说得有点道理，净土在心中，极乐世界在身边，当从自身去寻求。

有天我们在圆明园遗址漫步，此时月色皎洁，寒风习习，一片断垣败壁，衰草乱石，勾引起林昭思古之幽情。她低吟了曹孟德诗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又捡起一

块石头问道：你来自那座仙山，为什么流落到人间？你经历了多少人间荣华，又承受了多少人间辛酸？你在沉思什么？你为什么默默不语？我说：你作一篇《石问》吧。她认真地说：这里的石头都有灵性，上面都刻有一部《石头记》，只是我们读不懂罢了。

在没有月色的夜晚，我们有时什么都不谈，静静地聆听树梢寒风的呼鸣，或看远处灯火的明灭，此时此刻，整个身心似与天地相融合，已不知右派为何物。

从1957年秋冬到来年的春天，除特殊原因外，我们几乎天天相约在黄昏之后，林昭用“相濡以沫”来比喻这段难忘的友情。

1958年春末，我去山区劳动，开始，我们还常通信，她有时寄来新作的诗文，自己绘制的书签、贺年卡，还寄来新拍的两张照片。后来她告诉我，我给她的信被人拆看了，不久，我亦遭到查问，我们的联系就困难了。当时，在山里劳动的右派每年有两次休假，可以回北大休息几天，因而我与林昭还相会过几次。当时她在人民大学，白天要上班，我们仍相约在黄昏之后，最后一次是在北海公园度过的。她回南方后，曾在苏州养病，我们还通过信，那时她用的名字叫“许苹”（许是母亲的姓，苹是她的小名）。

二、寂寂的园林

1962年暑假，我从北大回到常州老家，意外地收到林昭寄来的信。我们已有二年多未联系，曾听说她被捕了，但不知详情。当时我在大山里劳动，无法打听她的消息。信是上海寄来的，她也不知我在何处，是根据1950年苏南新专同学录的地址，把信寄到我的老家。她怕我收不到，信写得很短，但我仍很高兴，因为得到了她平安的消息。几天以后，我去了上海，林昭家

中的老保姆告诉我,林昭已去了苏州照顾她有病的母亲,我随即转往苏州,找到她的住址,门内有位中年妇女(林昭的房东),我上前打听林昭。她上下打量一番,然后冷冷地说:不知道,这里没有这个人。我一再进行解释,竭力表明自己不是坏人,但她仍说不知道。我正感到为难之际,屏风后出来一位中年男子,他显然已听到我们的谈话,他略略讯问了我的情况,告诉我:林昭去医院探望母亲了,并告诉我去医院的路线。我道谢后出来了,但意识到林昭的处境并不妙。

我在医院顺利地见到了林昭,她很意外,也很高兴,把我介绍给她的母亲。林昭比过去胖了,身体似很好,穿着合身的旗袍,烫了发,看上去挺精神,已非昔日的瘦弱多病的林妹妹形象,因而刚见到她时,我犹豫了一下,几乎不敢认她了。

由于天气炎热,我们从医院来到人民公园的树阴下,畅谈了别后的情景。她谈到,她和兰州大学的右派在一起聊聊天,发发牢骚,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了,现在保释在外养病,不知何时还把我请回去。她谈到我们在北大时有关牢狱的议论,她说:由于当年的议论,思想上有所准备,因而入狱后并未感到恐惧。她谈到在狱中如何学会戴了手铐梳头,她因高唱《古怪歌》而急得狱警跳脚大骂等等,她还幽默地说,有位审讯人员挺有风度,如果他不是逼我招供,我也许会爱上他。她谈到对社会的不满,谈到目前交往的朋友,也谈到思想上的矛盾。她曾说:有时真想做个不问世事,只管做饭洗衣的家庭妇女。我笑笑说:恐怕你未必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她说:不一定,我还是会做家务的。她头发上戴了朵小白花,我问她为谁而戴,她说是父亲。我说:过去你不愿提你的父亲,现在怎么成了孝女,她只是笑笑。

我也简略地谈了一些在山区劳动的困境和目前的状况。

次日,我们相约于拙政园,边聊边游,她介绍了此园的特色

和景观。由于我把墙上的一面镜子误当作门，镜中反映的景色误以为是门内的景色，引得她哈哈大笑，并赞扬此园设计的成功。林昭较爱笑，大概是遵守笑不露齿的古训，她笑时习惯性地用手掩口。但她不爱哭，我从未见她哭过，甚至未见她掉过泪。

中午天气炎热，园中几乎没有游人，只有树上的知了不停地高声唱着。我们在一个僻静的小亭中坐下，有意无意地共同回味着一些难忘的往事，多少年的风风雨雨，难得有如此宁静的片刻。

小憩片刻后，她若有所思，用手指不停地在石桌上画着，我问她画什么？她说：画八卦，我想在你的衣服上画一个八卦。我说：那不成了狗头军师。她笑笑说：是羊头军师。随即，她认真地谈了她的一些想法。大意是说，当前百姓吃不饱，饿死了好多人，百姓对当局不满，到处有人反抗，社会很不稳定。她不满当前的社会，决心要为自由民主而斗争。她希望我能和她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她的活动。在此之前，我已隐约地感到，她可能在参与某些活动，现在终于讲明了。我沉默片刻后，明确地说：我同意你的有些观点，但不支持你的任何活动。我解释说：我在大山里劳动数年，虽生活艰苦，但那里的景色秀美，我已迷上那些山山水水，今后将寄情于山水之间，对政治已没有兴趣。她说我是逃避现实，并挖苦地说：“哀莫大于心死。”我反驳说：大道得从心死后，心不死何以成大道。你始终纠缠于是是非非的圈子中，不能超脱，根子就在于心不死。我劝她，现在是夏天，天气太热，但不久就会有一个凉爽的秋天，政治亦然，有它自身演变的规律，凡事当待时而动。我还说：你具有诗人的气质，不具有政治家的气质，诗人讲真情，政治家讲假意，你太真，不宜搞政治，否则必然会吃亏。当时我们谈了很多，不时的有些争辩，我竭力想说服她，要她处处谨慎小心，凡事三思而行，希望她能平安地度

过这段艰难的岁月。她则不断地批评我是消极逃避,明哲保身。最后,我说:你目前的处境不仅困难,而且非常危险,出路只有二条:一是走,设法去香港,那里可能有一片自由的天地,但去亦非易事;二是韬晦,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但必须要像个顺民。大丈夫当能屈能伸,不能凭一时意气,知不为而强为之。你当杜门不出,埋头研究文学,既可掩饰自己,精神亦有寄托,且可有所收获,此乃一举三得之上策。她虽承认我说的有道理,但又表示难以做到。开始,我较有信心,以为她会接受我的劝告,其实,我估计错了,她经过多年的艰难磨练,显然性格比过去更坚强了,信念亦更坚定了,但也少了一点冷静与机变。晚饭后,我们在人民公园乘凉,一直闲聊到深夜。

第三天上午,我们相约在新开放的网师园,我们仔细地观赏了此园的布局、建筑和景致。读了一些碑文和欣赏了对联及其书法艺术。虽然我们的分歧依然,但游得比较愉快。她还送我一一张自己绘制的题为“铁窗之花”的书签。书签的八分之七均涂成黑色,在右下角画一朵小红花,小红花上画二条黑线,象征铁窗。由于红黑对比鲜明,在浓重的黑色重压之下,此花显得特别鲜艳和倔强。当时,我对此书签的构思和绘制大为赞赏,可惜在“文革”初把它烧了。

中午,我们在一家小饭店里饮酒,她希望我在苏州再住几天,我拿起酒杯说:虽说“酒逢知己”,无奈“话不投机”。她笑笑说:还不至于到“半句多”的地步吧。其实,我本想在苏州多住两天,但我是穷学生,囊中空空,已无力支付每日的食宿费用。林昭是靠老母养活,我实难启借贷之口。

我离开苏州时,林昭送我到车站站台,当火车启动时,我们紧紧地握握手,互相说了声“再见”,她随即补充说,我们说的是“再见”,不是“不见”。她轻轻挥着手,目送我离去。当时,我感

到：她留下的是失望，我带走的是遗憾，但决没有意识到，这次分手，从此真的“不见”了。

我回北大后，我们还通过两次信，但给她第三封信未有回音，可能是又被捕了。不久，我也去了四川，从此失去了联系。

三、侠骨断肠

在苏州时，林昭告诉我，她被捕抄家时，我的两封信亦被抄去了。审讯人员要她交待这方面情况，她含糊地回答，好在信中只有一些日常问候话，因面也未深究。后来我常想，我与林昭在一起讲了些离经叛道的话，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打个喷嚏都可能获罪，何况是右派们非议社会的言论。如果林昭在审讯时稍有不慎或是为了坦白从宽，吐露出一些谈话内容，那么，我很可能也会经历一场牢狱之灾。但她没有这样做。

1968年初，我在上海，林昭老母对我说：林昭被判刑二十年，而主犯只判十八年，她问有关人员，为什么女儿判得特别重，当事者答以“抗拒从严”嘛！1962年在苏州时，林昭也曾提及审讯人员向她逼供和她拒绝交待的情况。林昭宁肯自己多受罪，也不愿连累朋友们，她有一颗高洁的侠义之心。

林昭喜欢交朋友，但不善于交朋友，她往往轻易地把观点相同、处境相似的人引为知己。在苏州时，她讲到几位新交往的谈得来的朋友，其中几次提及一位卖书的右派朋友。她告诉我一些从他们那里听来的小道消息以及对社会的种种议论。我曾问她，对他们的情况是否很了解，她摇摇头，我劝她交友要谨慎，不要轻信，在你周围可能有一张无形的网，我提到她房东的神态，也提及对她朋友的疑虑。后来，听说其中有位“朋友”就是带有特殊任务来接近林昭的，她上当了。

1968年春,林昭母亲曾谈到,林昭在狱中,有位同监的犯人,取得了林昭的信任,并称即将刑满释放,表示出去后愿为她做点什么。林昭把她引为知己,和她谈了不少知心话,要她出去后和某人联系。而这位“狱友”,也是一位有特殊任务的人,她又受骗了。林昭得知受骗后,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在狱中破口大骂,这就使她的处境更为险恶。

林昭缺乏处世经验,常以一颗坦诚的心面对社会,面对人生,不理解社会是如此的复杂,人心有时是如此险恶,因而她屡屡遭人暗算,中人圈套。她的最后悲剧,与此有着密切的联系。

四、可怜天下父母心

1968年初,我住在上海同学家中,有天我来到茂名南路林昭的老家,想试探地打听一下林昭的下落。很巧,林昭的老母许宪民在家,她显得苍老面憔悴,已无昔日的风采。我作了自我介绍,她很快就记起了我。她说:在苏州时你较胖,现在瘦多了。我说:我长期被胃病所折磨,身体一直不好。我们谈起了林昭,她说,文革初,北大校长陆平被点名批判,上海有些造反派表示,林昭被划为右派,是陆平所陷害,他们要到北京去告状,为林昭平反。当时,为了女儿,我积极地为他们提供材料和一切费用,但毫无结果。现在钱用完了,林昭的书稿等亦散失了,家中仅留下她的一首诗,她随即找出此诗,这是一首长诗,诗题似为《普罗米修斯》(或为《盗火者普罗米修斯》),我匆匆地读了一遍,诗中热情地歌颂了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献身的精神。她简单地谈了林昭的被捕、判刑和在狱中的状况。她提到林昭北大的同学张元勋,曾到狱中探望过林昭。她说,当林昭得知她所信任的那位“狱友”是位特工时,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她不断

地痛骂,这就使她的处境更为不利。她随手给我一封林昭从狱中带出来的信。信的内容很简单,说她近来身体不好,例假已二月未来,给她带点日用品去。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亲笔信。其母忧悒地说,前次去探监时,监中管理人员对她说:你的女儿不会好了,不用再给她送东西了。我现在真不知怎么办?我感到,林昭受刺激后,精神上有些不正常,想以这个理由保她出来就医,但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中,恐亦无法办到。

后来她谈到了自己。她说,我每次探监出来,心情特别沉重,有时不辨东西,走错了路。有次适逢大雨,我都不知在附近躲雨,而是糊糊涂涂地仍在雨中走着。我听到路过的行人在背后说,这个女人是疯子。现在儿子埋怨我,怪我们影响了他的前途,女儿被迫和我划清界线,很少回家,林昭又在狱中,我亦年老体弱,想到这些,心中非常难受,只能独自暗暗流泪,我未想到一生的奋斗,会落得如此的结局,有时,我感到真像是一个疯子,说着说着,她伤心得眼睛湿了。

当时我心头也感到一阵酸楚,轻轻地说了句“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劝她不要过分难过,要保重身体等等。我知道这些都是无用的废话,但自己亦是泥菩萨过河,帮不了什么忙。

我亦简略地谈了与林昭的友谊和对林昭的关怀。可能她当时与人交往较少,因而对我的相访是欢迎的,谈话亦是十分坦诚的,我们谈了很久,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当我们发现有人在门口探头探脑时,我就告别出来了。

当时,我深感林昭处境的艰难,但总以为还有重见天日之时,决未想到她匆匆而去,死得如此惨烈。

五、最后的话

林昭去世已三十年了，我也已是风烛残年，能为林昭写点什么的时间和机会不多了，我很想在此文的结尾，为她写几句合适的话，但想了好久，未想出满意的词句，因而选抄了林昭的几句诗，略表我的一点心意。诗曰：

埋骨何须定北邙，
铭幽宁教笔低昂。
平生磊落巍奇气，
化作清风意更长。

这是林昭 1958 年寄我的一首诗的前四句，我认为：这不仅是林昭的诗句，也是林昭的抱负，也是林昭生平的总结，也是林昭的墓志铭。

血溅罗裙直道存

——纪念林昭同学就义卅一周年

孙文铤

林昭英勇就义已经三十一年了,然而同学们对她的哀思时时都萦绕在心头。

去年庆祝北京大学百年华诞的时候,我们新闻专业 54 级幸存的部分右派难友单独在中国人民大学餐厅聚会。大家肃立,为去世的四位难友林昭、韩其慧、杨吉林和刘秉彝默哀三分钟。第二天全年级同学聚会时,罗列老师在发言中对反右运动中被整的同学表示内疚,甘惜分老师在发言中称我们十八个右派同学是“十八棵青松”。回穗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便写了一篇《一抔净土掩风流——我所知道的林昭》。拙文在《同舟共进》杂志发表后,我复印了数十份,分别寄给老师同学和相关人士,请他们修正错误,补充事实。反响很热烈。我先后收到二十几位老师同学的回信,或指出错误,或补充事实,或寄来资料,或寄来照片。这说明,大家都在关心着林昭。现在,便综合大家提供的材料再撰此文,以纪念林昭难友就义卅一周年。

从林昭改名说起

林昭原名彭令昭。她为什么要改名换姓呢？我听到过三种说法：一说是“林昭”与“令昭”谐音，她在《常州民报》当记者时用作笔名，以后便因袭下来；一说是因为她特别爱读《红楼梦》，尤其喜欢林黛玉，故改其名；还有一说是她想跟“反动官僚”家庭划清界限，故去掉“彭”姓而用此名。我想，这三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而且完全可以统一，就不必去深究了。值得注意的倒是林昭究竟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

林昭的舅舅许金元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那时，许金元在苏州博文中学任教，联络一些进步青年成立了“觉悟社”，主编《觉悟杂志》进行革命宣传。1925年9月，他与叶天底、张闻天、侯绍裘等人在苏州益乐女中秘密成立中共苏州独立支部。1926年叶、侯二人相继离开苏州，遂由许金元担任支部书记，后又去南京担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部长。1927年3月7日，他在《国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向左转》的评论文章，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不久，“四一二”政变发生，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江苏省委遭到严重破坏。4月9日下午，当许金元与侯绍裘去省委开会的时候，途中被特务抓去，关押在南京夫子庙原“贡院”的密室内，当晚就对他俩进行审讯。许、侯二人大义凛然，怒斥敌人，视死如归。特务们用尽心机一无所得，便于4月13日凌晨将他们二人装进麻袋，用卡车拉到燕子矶旁的九龙桥下，先用刺刀将他们刺死，然后投尸于长江的激流之中（苏州博物馆办过许、侯二烈士的事迹展览）。

林昭的母亲许宪民早年就读于益乐女中，受其兄许金元的

影响,1926年即参加CY(共青团)。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所以她又加入了国民党,担任苏州妇女会总干事。“四一二”政变后,她相继去上海景贤中学和武汉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期间,她穿上军装,赴长沙、重庆等地从事救亡工作。抗战胜利后回到苏州,历任妇女教养所主任、吴县救济院副院长以及苏福长途汽车公司经理等职。1946年春,许宪民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积极从事统战工作。1949年,她创办《大华报》,自任社长,投入了迎接苏州解放的活动。解放后,她先后被选为民盟苏州市委委员、苏州市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后来移居上海。这样一位为国家、人民做过许多有益工作的民主人士,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均受到冲击,1968年又因女儿林昭被枪杀而深受刺激,遂于1975年10月22日下午在上海外滩公园内服毒自杀。

如此说来,林昭应该是生于一个革命家庭。然而,林昭在解放初期填写干部登记表时,为什么要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填上“反动官僚”而惹得她母亲生气呢?哎!我们这一代人,解放初期就像被人灌了迷魂汤似的。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为了表示自己立场坚定,与家庭划清了界限,常常会自己跟家庭过不去。拿我来说吧,解放前父亲是私人银行里的中级职员,因担心失业后一家人没有饭吃,便买了十几亩地,于是我就自作聪明地在家庭出身一栏填上“地主”,以后才知道父亲的成分是“职员”。还有一位北大同学叫张本吉,就因为小时候家里收租时帮助父亲记过账,便在“本人成分”栏中自己填上“小地主”,结果害了他一辈子。林昭当年填表时的心态和我们是一样的。就因为她的父亲彭国彦在旧社会当过江苏省吴县县长,她就填了“反动官僚”四个字,并且改名换姓以示同家庭决裂。其实,彭国彦在吴县县长任内颇有政声令誉,曾因不肯向江苏省民政厅长行贿而两次被诬陷入狱。像这样的“反动官僚”,比现在的那些跑官晋

爵的“红色官僚”总要好一点吧。

“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

林昭在狱中写的《家祭》一诗说：“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牢狱里哭您/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我知道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这是事实。

林昭从小受舅舅和母亲的影响，追求进步，向往光明。她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杨绲经、程伯皋、张文英等人在苏州阊门外闹市区开办了一家“大地图书馆”，作为传播进步书刊、团结进步青年的场所。林昭主动报名参与，在图书馆里担任收发员。1947年，林昭又参加了由张嵩发起组织的“苏州文艺社”。这是一个进步的文艺团体，以冯英子主编的《大江南报·星火》文艺副刊作为自己的宣传阵地。当时，苏州文坛左右两派的斗争复杂激烈。一些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企图独霸苏州文坛，便利用官方报纸诬蔑新文学是“最下流的普罗文学”，是“祸国殃民的文学”，声称“决不容许那些所谓的新文艺在文坛上泛滥成灾”；一些专写黄色小说的无耻文人也跟在他们后面攻击新文艺，其中叫嚣得最起劲的是一个署名为“江南屠夫”的人。为了反击反动文人的进攻，苏州文艺社召开了一次笔会，对“江南屠夫”进行口诛笔伐。林昭参加了这次笔会，并以“慕容贞”的笔名，在《大江南报》上发表了一篇《我的“讽刺”——“祸民殃民”乎？“福国利民”乎？》的文章：

屠夫们在磨刀霍霍，朗朗批评道：“祸国殃民的文艺！”一面就返身写出“三角地带”，以最腥臭最狰狞的声音和手势兜售女人的“秘密”。然而，我们原谅他的——难道他这种“福国利民”的“文艺”，不正是从特等的土地上所开出来的“祸国殃民”（此处

疑有脱字)女人的秘密的确值得兜售的吗?难道这样的一种“花朵”能够在事先不得到地底、事后不得到天空而成为现在这样的“艳若桃花,美如乳酪”的吗?

外国有“从一粒砂里看一个世界”,我们就能“在一朵花上看一块土地”。那么,——不要文艺,愈少愈好;只要“秘密”,愈淫愈好——“屠夫”们的世界,如此而已。

此外,我又说什么好呢?——拉拉扯扯,指手画脚的结果,不过是又一次完成了对于自己的“讽刺”罢了。

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竟然写出如此深刻而成熟的文学评论,不能不令人惊叹。经过这次讨伐,“江南屠夫”再也不敢露面,便在苏州文坛消失了。

1948年春天,吴县中学(今苏州高中)学生唐崇侃联合一些进步学生秘密组织了一个“大众读书会”,经常以爬山、郊游等活动为掩护,跑到苏州天平山、狮子山一带去阅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手抄本。林昭是这个读书会的积极参加者。

这一切,说明林昭在解放前夕,已经是一个有共产主义觉悟的进步青年了。

反右运动前的林昭

1949年,林昭在苏州景海高中毕业了。父母亲希望她能上大学,而她却考入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常州民报》当记者,并参加过土地改革工作。她的这一段经历,苏南新专的同学最清楚,我就不在这里饶舌了。

1953年,我国高等院校按苏联模式进行院系调整,原苏南新专教育长罗列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兼新闻专业负责人。

1954年夏扩大招生,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与她在苏南新专的同学陆拂为一起投奔他们的老师罗列来了。

刚入学时,新闻专业54级有一百多人,大多是调干生和党团员,分为四个班。后来一些“三代清白”的同学被挑选赴东欧各国留学,剩下的98人合并为三个班。我与林昭、陆拂为都在第三班。在四年的同窗学习过程中,林昭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活脱脱一个林黛玉:外貌清灵秀丽,身体弱不经风,走路一摆三摇,说话嘴不饶人,性格柔中带刚,气质孤芳自赏,兴趣十分广泛,才华百里挑一,所以我们都叫她“林姑娘”。

记得开学不久,三班同学在未名湖畔的石船上,为赴罗马尼亚留学的杨家春同学开欢送会。林昭在会上唱了一首李叔同作词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在回宿舍路上,我批评她不该唱这首歌,太悲凉,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她立刻反唇相讥:“难道让我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弄得我张口结舌。我领教了她嘴巴的厉害,以后同她交谈总要‘三思而后行’,否则就可能碰钉子。

这就是反右前的林昭!

我们读大学那时候,没有现成的教科书,有的课程甚至连油印的讲义也没有,全靠课堂上听讲、记笔记。林昭的学习笔记是记得最快最好的,字迹清丽,条理分明,成为同学们“对笔记”的样本。以林昭的聪明才智,应付新闻专业的课程游刃有余,她便把课余时间用来博览群书,写诗撰文,还拟定了写作计划,时间抓得特别紧。最近,有“老夫子”之称的李天宠同学回忆说:

“在北大四年,如果说有哪位女同窗是我心中一颗明亮的星?那就是林昭。但由于我性格内向,羞于和异性打交道,对于我所敬慕的林姑娘,也只是心仪而已。时隔多年,她的音容笑貌

宛在眼前,有几件仍然记忆犹新:

其一,是关于林黛玉、薛宝钗孰优孰劣之争,发生在男生宿舍。一方为某男同学(姑隐其名),一方为林昭。我对于同学间的争论向来是不介入的,这次也不例外,尽管我在内心深处是站在林昭一边的。遗憾的是争论的细节不记得了,只是感到这场争论是双方人品的一次大碰撞。

其二,是在女生宿舍所见。北大四年,我到女生宿舍仅此一次,还是偶然随陆拂为一同前往的。当时林昭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正襟危坐地看书。她见我们进来,只是简单地应酬两句,又沉浸到书中去了。如果不是与她同房的其他女同学热情招呼,我们可有点尴尬了。这倒不是林昭有意对我们冷淡,而是她太专注于那本书了。我当时有点吃惊,一向热情奔放的林姑娘,竟然也‘呆’得可以。

其三,是几位同学到吴翼明家去品尝他夫人做的糖醋鱼。晚上,我和林昭同乘一辆无轨电车返校。我们都没有找到座位,只好拉着吊环站着。林昭跟我交谈了几句话后,就从提包里取出一本厚厚的书,好像是《红楼梦》吧,一手拉着吊环,一手持书,就着车上微弱的灯光看起来,全然不顾电车的摇晃和震动。当时我想,我已经是书呆子了,没想到还有比我更呆的。

其四,是我应林昭之请,给同学们讲解围棋。那是在一间教室里,大约有二三十人吧。我摊开棋盘,从最基本的棋理讲起,一而讲一而在棋盘上演练示范。我发现,听讲最专心的是林昭。突然,她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棋要叫围棋?我用棋子摆出各种阵势,说明包围与反包围是这种棋的基本战法,所以叫做围棋。当时我们正在学习《矛盾论》,我又结合围棋的棋理,讲了内线中的外线和外线中的内线等道理。林昭听了很感兴趣,表示要跟我学围棋。遗憾的是不久反右运动就开始了。我们之

间的棋缘也就到此结束。这件事表明,林昭的兴趣是很广泛的,决不限于文学一隅。仅此一点,她就远胜于一般同学,更不用说女同学了。”

这就是反右前的林昭!

也许是由于曲高和寡吧,林昭与本专业的同学比较疏远,而与语文专业的张元勋、沈泽宜、马嘶等人则比较接近。他们在一起编辑校刊《红楼》,组织诗社,是北大文坛、诗坛的一个活跃分子。无论是天下大事还是身边小事,她都喜欢写诗撰文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感情。

1956年英美两国因苏黎士运河争端出兵进攻埃及,林昭在《光明日报》发表诗歌对埃及人民表示声援。

同年暑假,林昭听我说大连、旅顺是个好地方,她便去旅大市旅游。回校后,给我看过她写的组诗《旅大行》(其中的一首《坦克》发表在《红楼》上),内容是歌颂中苏友谊和旅大市的建设成就的。

1957年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罗夫访华,她又在《中国青年报》连续发表了两首诗歌颂中苏友谊。

由此可见,在林昭的灵魂深处,哪里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影子。

这就是反右前的林昭!

林昭为什么被划为右派?

1957年的春天,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党中央决定在党内整顿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春风吹进了具有民主传统的北大校园,血管里流淌着五四血液的北大儿女行动起来了!

5月19日,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大饭厅的山墙上。第二天上午,张元勋、沈择宜用诗歌形式贴出《是时候了》的大字报,号召大家“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不久,以谭天荣为首的百花学社宣告成立,由张元勋、王国乡等人主编刊物《广场》出版。一时间,北大校园沸腾了: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到处都有人在演讲和辩论。林昭被这种热烈的气氛所感染,积极投身于运动之中。她参加了百花学社,支持《广场》的出版,并公开发表文章和诗歌,称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北大得到了贯彻落实。

然而,谁能想到,早在北大第一张大字报贴出的前4天,即5月15日,毛泽东已经写了供党内高级干部阅读的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提出了反击“右派进攻”的问题和“引蛇出洞”的策略。

6月8日,毛泽东又起草了《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根据指示精神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而正式敲响了围剿右派分子的锣鼓。

6月26日,中共中央又在《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中,要求对“已经暴露出的这伙阶级敌人,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

7月9日,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讲到了北大的反右运动:“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由此可见,伟大领袖对北大的反右运动非常关心,而且亲自规定了北大的右派人数。(以上引文均见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这种形势下,谭天荣、张元勋、沈择宜、刘奇弟、王国乡等“五十几个人”当然在劫难逃。包括林昭在内的“百分之一二三”也

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

至于林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具体罪状，迄今发表的有关林昭的文章皆语焉不详。我曾写信问一些参加过林昭批判会的同学，大都说记不清了。最近，黄身寿同学给我寄来他保存了40年的《红楼》复印件，上面刊登了几篇“声讨”林昭的文章：《翩然“红楼”座上客，竟是“广场”幕后人——如此林昭真面目》、《幕，拉开来！——林昭是“广场”的幕后谋士》、《林昭，什么时候摇身一变？》和《评“党，我呼唤”》。这些文章指控林昭的“罪状”有几十条。请看：

《是时候了》发表后，林昭写了《这是什么歌》的长诗支持张元勋，面当中文系三年级的党员准备批驳张元勋的时候，林昭说“你们共产党员就会拿着大棒等着打人”；

她在十六斋前宣称：党团员存在“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她还在十斋当面骂过江枫同学是“教条主义的看家狗”。

刘奇弟说“铁窗禁贤良，忠臣血洒地”，林昭认为“刘奇弟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她在背后不是说党对整风没诚意，就是说哪个党员不顾人家死活；

她不但以言论支持《广场》，还以行动投入了维护《广场》的战斗。她亲自为《广场》写了《党，我呼唤》一诗。为了《广场》她不辞辛劳地从实习报社三天两头跑回学校与张元勋筹谋划策，张元勋也几次到报社去向她请教；

林昭名义上是《红楼》的编辑，但当张元勋要退出《红楼》另立“广场诗派”时，林昭反对，认为应该留下来用自己的观点去影响《红楼》，削弱党对《红楼》的领导；

《红楼》选编“整风运动特辑”时，她主张将张元勋的《是时候了》和王国乡的《一个积极分子的自白》和《一个落后分子的自

白》两文选入。她还推荐右派词人戴佳珊的作品,因为她特别欣赏“官僚主义今犹在,只是招牌改”这样的句子;

这几天,她一会儿哭,一会儿高声朗诵《狂人日记》,诬蔑那些批评她的同志是在她身上跳舞,而且把鞋底上的血渍抹在她的脸上;

在肃反运动的时候,她深夜坐在未名湖边,大声朗诵屈原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发泄不平。其实她不是“上下求索”,而是“左右求索”;

整风运动以来,她愤怒一阵,沉默一阵,一会儿高呼:“我是剑,我是火焰”,一会儿又转过头来问:“你们党员对我的看法怎么样?”

林昭以任锋笔名发表的《党,我呼唤》是一首含有怨意的诗。全诗用呜咽的哀哀欲绝的调子哭诉解放后遭遇的不幸,说“奇怪的谴责像马刀砍来,我年青的心伤痕斑斑……”

战斗的队伍容不得叛徒,《红楼》应该将林昭清洗出去。够了,够了,这么多的“罪状”,林昭自然插翅难逃。然而,正而文章反面看,林昭的一些闪光的语言,说得多好啊!

“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多么中肯!直到现在,这一矛盾是解决了还是扩大了呢?

“官僚主义今犹在,只是招牌改”——古词今用,多么贴切!其实“今犹在”的何止是官僚主义!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屈原开始的求索,想不到两千多年后灾祸竟然降临到求索者身上。

“我是剑,我是火焰”——可惜这支剑刺伤的是她自己的心,这盆火烧掉的是她的身躯。她最终成为一只在烈焰中永生的火凤凰。

重读这些批判文章,使人毛骨悚然。想当年,美丽宁静的北

大校园变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场；和谐的同学关系被人为地划分为左、中、右以后，左派瞪大眼睛监视和揭发右派，右派提心吊胆夹起尾巴做人。这是一幅多么可怕、可悲、可叹的图景啊！

划为右派后的林昭

反右运动后期，右派分子被划分为极右分子和一般右派分子两类，对右派学生的处分分为劳动教养、劳动考察、留校学习察看和免于处分四个等级。极右分子都送去劳动教养，其中有一些人，如刘奇弟、张元勋等，还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逮捕判刑。林昭没有被划为极右分子，但因为她的“认罪态度恶劣”，受到一般右派分子最重的处分——劳动考察。

性格刚烈的林昭怎么也想不通：难道包括舅舅在内的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就是这样的吗？她跑到团中央去责问：“当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时候，愤然向北洋军阀政府要求释放五四运动被捕的学生，现在北大领导却把自己的学生往火坑里面送。良知何在？天理何在？”这样的抗议当然是无济于事的。她感到悲痛，感到绝望，决定自杀。第一次自杀是吞服两盒火柴头，被同室同学即时发现，送去校医院洗胃灌肠得救。第二次是在一个晚上，林昭突然失踪了，班上立即组织同学分成三路去找。一路是女同学，拿着手电筒，扛着准备救援的竹竿和绳子，去到未名湖畔，边走边喊着林昭的名字，结果一无所获；另一路是部分男同学，去到颐和园，找到天亮也不见她的踪影；第三路去到城里的北海公园，也扑了空。第二天上午，林昭自己回来了。原来，她那天晚上的确去了北海公园，想要投湖自尽。但当她离开了北大这个使人欲哭无泪、欲死不能的“阶级斗争战场”，来到美丽宁静的北海，呼吸到清新的空气以后，她的头脑清

醒了。她躺在一张椅子上想了一夜，弄明白了许多道理。回校后，她的情绪好多了，平静地对大家说了声：“谢谢！”

那么，林昭的北海之夜究竟想了些什么呢？从离校前她同刘发清和赵雷两位难友的谈话可以窥得一豹。

刘发清被划为右派后，情绪低落。一天下午，林昭拉他去校外的一家饭馆吃饭。她对刘发清说：“我当右派之初，不吃，也不睡。人家看我在流泪，其实我心里在流血，还曾经自杀……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多少右派？全国又有多少？反右运动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寻求答案……”

赵雷被划为右派后，受的处分和林昭一样——劳动考察。在离校前，他俩干脆不再去上课了，经常相约去圆明园旧址和一些寺庙游逛、闲谈。林昭对赵雷说：“我当右派不冤枉，但干的右派活动太少有点冤枉。要想改造社会，不干则已，干就要往大里干，绝不低头屈服！”

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林昭以后有那么悲惨的遭遇也就不奇怪了。

林昭与张志新

林昭受到劳动考察的处分后，本来应该与赵雷等人一起送去京西煤矿劳动。她曾跟赵雷说：“以后咱们互相帮助，你替我干重活，我替你们做饭、洗衣服。”赵雷说：“你的想法太天真了，在那里决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果然，赵雷以后在京西煤矿下井挖煤，差点死在里头。当时，罗列老师考虑到林昭体弱多病，让她去京西煤矿劳动非死在里头不可，便出面说情，把她留下，在

学校苗圃做一些轻微劳动。1958年夏,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罗列出任新闻系副主任,又把林昭带到了人大,“安排”在新闻系资料室监督改造。同学们都说,罗列老师做了一件好事。

林昭在上海被捕以后,几乎与所有的北大同学们失去联系,只有张元勋同学以未婚夫的名义去探过监。一直到1981年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大家才在穆青、郭超人、陆拂为合写的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中知道林昭慷慨就义的消息。从那时起,人们都自然而然地将林昭与张志新烈士相提并论。有人称林昭为“五十年代的张志新”,有人为林昭没有像张志新那样被迫认为烈士而不平。

林昭的英名在世上沉寂了一段时间,直到去年北京大学百年华诞,纪念林昭的文章又在报刊上出现。这说明,尽管林昭就义已经30年了,人们并没有忘记她。但要指出的是,有的文章随意编造林昭在狱中的情节,这是对林昭的亵渎。最近,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女士在《今日名流》杂志相继发表了《姐姐,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和《我的姐姐林昭》,人们才对林昭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英勇斗争和慷慨就义的情形有了比较准确的了解。然而,林昭在狱中所写的日记、诗词、血书以及审讯记录等等,至今未能公诸于世,不能不令人遗憾。再有,林昭反对现代个人迷信比张志新早二十年,她的死比张志新更为壮烈。张志新死后被迫认为烈士,而林昭呢?她在九泉之下能安息吗?

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是“北大精神”的精髓。“直到战死为止”的马寅初,“匹夫不可夺志”的梁漱溟,“决不低头屈服”的林昭,就是北大精神在校长、教授、学生中的最佳体现者。可以坚信,这种北大精神是任何人也压制不住的,它将会在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身上发扬光大。

文弱女子性刚烈

——忆林昭

马 嘶

一个极其偶然的的机会,使我真正了解了一位我曾经十分熟悉却又未曾真正了解的人,她是我在燕园中的一位学友,一个年轻的南国女性。

1980年12月,我去北京为我们的刊物组稿。11日的上午,我同翻译家江枫到府右街光明胡同去看望刘绍棠。来到那个小四合院,绍棠却不在家。他爱人曾彩美告诉我们:“绍棠参加他的同学的追悼会去了。”我们忙问:“参加谁的追悼会?”绍棠在北大的同学当然也便是我们的同学。曾彩美说:“林昭。”

“林昭?”我和江枫相顾愕然,异口同声地问:“在哪儿开?”

“在中国新闻社。”

我和江枫同时说:“我们也去吧!”随后就问:“几点钟开。”

“说是上午10点钟。”

看了看表,已超过10点钟了,我们只好作罢。

为了探知林昭的死情,当日傍晚,我们又去了绍棠家。

这回绍棠在家里。他告诉我们,因为上午人到的不齐,追悼

会下午才开的。我和江枫都感到追悔,如果上午赶了去,也便能赶得上开会了。

绍棠说:“开会时人到的不少,老系主任杨晦和罗列两位先生也去了。张元勋专程从山东曲阜赶来,他是最为了解林昭死情的人。

绍棠向我们介绍了他在会上听到和了解到的一些情况,这些都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1957年秋,林昭在北大中文系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因病留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工作(那时,北大中文系的新闻专业已并入人大新闻系),1960年回上海养病,与友人编印内部刊物《星火》,在上面发表诗作《海鸥之歌》、《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和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并将自己对社会时政的一些看法写成书面文字投寄有关领导人,因面涉嫌替彭德怀翻案。1960年10月,她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关押在上海的监狱里。“文革”期间,她在狱中激烈地反对“四人帮”的现代造神运动,便由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于1968年4月29日被枪决。死时,她年仅35岁,头发已全然白了。死后两天,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通知林昭年迈的母亲,宣告她已被执行。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5分钱的子弹费。

这便是当时我所听到的关于林昭之死的一些情况,这当然只是一鳞半爪了。以后,我才又从别人那里听到了她的另一些事情。

林昭的死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特别是在上海、北京等地的文艺界和新闻界,许多人虽然并不认识她,却都说她是一位才女,也是一位烈女,是一个张志新式的刚烈之士。

林昭之死在我心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也自然想起许多学生时代的旧事,我与她虽不同班,也不同年级,却是极相熟的,我

们之间有过许多交往和谈话,而我一直把她看成是一个有才华却又很柔弱的女子。

林昭是1954年暑假后来到北大的,那时我已升入了二年级。她在中文系学新闻专业,她入学后不久,我们就认识了,算是很能说得来的诗友。

她是从常州日报社考入北大的,因而我一直把她当作常州人,其实她是上海人。听说,她升学考试的成绩是极高的,是江苏的“文科状元”。她的衣着打扮完全是那个时代上海姑娘的平常样子,虽不豪华,却一看便知是上海人。青年式的发型,脑后的头发边沿贴着后颈卷窝进去,中式褂子的高领遮住了脖颈。她的脸色有些苍白和憔悴,似乎是不太健壮的样子。脸上有几点细微雀斑,嘴唇略微翘起。她谈不上俊俏,却有着江南女性的柔媚与秀气。她常常微笑着,也常常沉默着。她似乎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也是个性格内向的人,看见她,我就想起少年时代就知道的那个“小家碧玉”的词,仿佛她就是那样的女子。同学们是凭了印象去认识她的,都呼她为“林姑娘”,这当然是把她看成是林黛玉式的柔弱女性了。

她写诗,写得很多,在校内的《北大诗刊》、校刊和校外的一些报刊上发表,有时也署名“小昭”。她很快便成为活跃于燕园中的那个以写诗为主的学生创作集体中令人瞩目的一员,因而我们也渐渐相熟起来。她常常拿了新写的诗稿找我看,并且希望能够听到具体的修改意见。一次,她对我说:“你是个很诚实的人,我是把你当兄长看待的。希望你不要客气。”那时,我似乎已看出了她的寂寞,看到了她在那个集体中落落寡合的孤独处境。

1956年暑假,她去旅、大市旅行,回来后写了组诗《旅大行》,其中有一首《坦克》,发表在《红楼》创刊号上。我至今仍保

存着这首诗的剪报：

坦 克

小昭

（“旅大行”之一）

一辆披甲的坦克巍然兀立，
在军事博物馆门前广场中，
炮口威严地向着前方直指，
九颗红星记录了它的战功。

传说它曾走过漫长的道路，
从柏林胜利进军到远东，
它碾碎了九辆法西斯坦克，
它的名字是军团的光荣。

当年是它首先冲入旅大，
把自由的欢乐带给群众。
人民要求让它留在这里，
纪念那苏军——解放的英雄。

它身边常有人徘徊不去，
传说也越来越增加内容。
人们满怀深情与感激，
爱它——和它的千万个弟兄。

一九五六年八月旅大

在五十年代中期,这是一首很有激情、形式也较完美的诗,今日读起来,依然有着艺术的魅力。

林昭在燕园里算是个有些名气的学生,她有点灵气,但又很沉静,似乎不喜欢露峥嵘、显山露水,看来也是个很安分的人,平日埋首于做学问,用心读书、写作。我一点也不了解她的过去,也不知道她内心有什么隐忧,虽然彼此相熟,却又没有问过那些情况,这似乎是那个时代学友的准则。不过,我总是感到她是个郁郁寡欢的女性,真有些像是寄居在贾府中的林妹妹那样。

1957年春天,《红楼》编辑部组织一些写诗的朋友去完成组诗《五四之歌》的创作,我们共同参观了沙滩的北大红楼旧址和民主广场,瞻仰了那里的毛主席在校工作室和李大钊纪念室。这些活动,林昭和我都参加了,也都写了诗,发表在四月出版的《红楼》文学期刊上。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林昭对我说:“你快要毕业了,以后不知分配到哪里去工作,你给我写几句话吧!”她递过来一个硬皮笔记本,让我写。我把笔记本拿回宿舍,在上面写下了如下的话:“我不喜欢自己诗的风格,我喜欢的是李白、苏东坡和裴多菲。如果三年内我仍然找不到自己喜欢的风格,我将终生不再写诗,也请朋友们忘掉我。”写好后,我将笔记本交给了她。她看完,笑了笑,便拿走了。

不久,那个“不平常的春天”到来了,霎时间,宁静的燕园被热躁、喧闹、狂暴的气氛所笼罩,彬彬有礼换成了诅咒怒骂,琅琅读书声换成了吵吵嚷嚷,平和的笑脸换成了怒发冲冠,同窗好友竟成了阶级仇敌。这时,大餐厅的灰墙上贴出了“揭发”林昭的大字报,《红楼》反右斗争特刊也以《幕,拉开了》为题,发表了“揭发”林昭的文章,林昭已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没有再看见林昭,只听到人们说,她曾经自杀未遂(这也是从大字报中得知)。9月,我毕业离开了学校,她以后的情况也

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对于她,我心中一直存在着疑虑:从揭发她的大字报和文章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心怀叵测、与社会主义为敌的危险分子,而我亲身接触到的却是个落落寡合、忧郁感伤的柔弱女子。那么,她的真实面目究竟是怎样的呢?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真还是伪呢?这个问题使我困惑了很久很久。

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林昭的消息,同学们见面时,也没有提到过她的名字,她已经被人们遗忘了,仿佛她不曾存在过,或者,她已是个久远的历史人物了。直到过了二十年,我这才在刘绍棠那里知道了她的悲惨遭遇。但那些情况是真是假,有多少真实、多少虚拟,连绍棠也说不清楚。但我们敢肯定那些情况远非事情的全部,一定还有许多内情我们无法得知。我渴望着知道得更多些。

自从北京开过那次规模很小的追悼会之后,林昭的名字逐渐为新闻界和文艺界所知,成了一个谈论的话题。1981年初,我们邀请了北京的几位作家到我们城市讲学,那日,我陪几位作家去看电影,在车上不知怎么就谈起了林昭,他们向我询问林昭的情况。从维熙说:“林昭是一位才女。”林斤澜说:“我和林昭同过学,我们曾在一个新闻培训班里学习过。”

又过了一两年,在沈阳《鸭绿江》杂志当编辑的王金屏学友来信说:前些时,他到上海等地去组稿,听到了许多关于林昭的事,基本上弄清了事情的真相。他准备写一篇比较长的纪实性作品,来描写林昭事件的始末。我急切地等待着他的作品问世,然而,许多年过去了,我却始终没有读到他的作品,也许他根本没有写出,也许写出了却无处去发表。直到1988年初,我才在《随笔》杂志上读到了刘发清的《一个不屈的英魂——忆林昭》一文,这样,我算是对林昭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他写的正是我所不了解的关于林昭蒙冤的那一段生活。刘发清的文章中还提到

了另外两篇涉及到林昭之死的文章，一篇是在审判“四人帮”之时新华社记者穆青、郭超人、陆拂为的报告文学《历史的审判》，另一篇是《民主与法制》杂志 1981 年第 3 期《林昭之死》。从那以后，我一直在找这两篇文章，直到 1997 年 7 月，我才在旧书摊上买到了 1981 年第 3 期的《民主与法制》，看到了《林昭之死》，至此，我算了解了林昭之死的来龙去脉。我把《林昭之死》复印了几份，送给了同我一样急欲了解事情真相的老同学。

我终于明白了，林昭确为一个倔强刚烈的女子。也许，她确实有着人们所看到的多愁善感、茕茕孑立的一面，但那也许是独立不羁、卓尔不群的一种表现，她的骨子里是有着追求真理、甘为真理献身的坚毅精神和坚定信念的，因而她才有那样的刚烈行为。

沙雕美食 遥祭美灵

倪竟雄

林昭,你已走远了,远去卅多年了,你在哪儿?天上?人间?我好想你啊!总觉得你常在我身边。

那天,在老年舞厅里,华尔兹舞曲声中,我忽然感到你就在我身边翩翩起舞。当舞步擦肩而过时,你对我微微一笑,侧过头去。我看到你那两条长辫盘成的发髻上别着一朵白色的丝绒花。蓝底白花的上衣,衬着雪白的长裙。你娇弱的身躯使你舞步轻盈,飘逸。啊!真美。你说过:“什么是美,生活本身。”要不是你发际的霜白,我竟忘了你也老啦!

你的舞伴,似乎是那个爱唱歌的“王子”。不!不会是他。是那侠骨义胆的北方汉子?又似乎是他:那位有道家风度的“军师”。可绝对是那面目可疑的江南小子。

你比我跳得好,因为你年轻时就喜欢跳舞。菁菁告诉我,1953年你在上海交大看她,你想跳舞,她为你找了个好舞伴,那天你很满意,很高兴。今年孙复又告诉我,你在北大最喜欢跳舞,有舞必到。采一串鲜花编个花环戴在头上,进舞场直跳到结束。唉,我怎么就没有早点注意你这个爱好,否则我早就跟你学

了,如今也不至于老来从头学起了。

我想好了,舞会结束,咱俩进楼上餐厅去品尝风味小吃。不过这里品种单调,真没有五十年代咱俩在无锡那阵子吃的丰富多彩。

记得吗?那时候咱俩身上老缺钱化。1951年11月,我们土改在无锡东郊集中学习。那天是难得的休息日。我俩一起进城,你说今天可以好好吃个痛快。我说钱呢。你指指手里拿的一件簇新的毛料丝棉背心,说是妈妈刚寄来的,卖了它不就有钱了吗?后来真的把那件背心换了钱。我们先到崇安寺,一个个小吃摊挨着吃过去。糖芋头、鸡蛋饼、梅花糕、海棠糕、藕粥……最后到王兴记小笼包、大馄饨。背心挨的钱统统吃光,傍晚回来一路上有说有笑的。我忽然感到有点不安,“要是你妈妈知道这件背心的下落,不要气坏了吗?”你笑笑扮了个鬼脸。

.....

曲终人散,我四下里找你,可无影无踪。我呆呆地望着空荡荡的舞厅,一切感觉凝固了。服务员提醒我该走了。哦……是啊,林昭回天上去了,我还傻站着干什么?

我孤零零地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夏日炎炎,我却从心里感到寒冷彻骨。视线被泪雾模糊了,我好孤独啊,你是本该与我一起安享晚年的呀。

回家,我翻箱倒柜,找到了近五十年前你给我的许多信和我自己的日记。啊!一个活生生的你又在我面前了。于是开始了共同回忆……

1950年5月,我们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毕业,不约而同地志愿参加农村土改工作。用你的话说:“宁可放弃去文联的机会,不愿当空头文学家也。”而我宁可放弃回上海工作的机会,要

去参加只有一次的伟大的土改运动,将来要写出像《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那样的好作品来。

离校那天,新专一行 26 人来到吴县报到,晚上被安排在一间破房子里住宿。我与你并头躺在稻草地铺上。由于共同感受到离开温馨的母校,一下子到了冷落的陌生地,我俩开始了交谈,越谈越投缘,竟致彻夜长谈,大有相知恨晚之感。而我们俩在母校时并不十分接近。

次日各奔东西,你到一队去浒关,我到八队往甬直。从此开始了书信往来,成为了知己。

我们都带着一颗虔诚改造自己的火热的上进心来到农村;可同时又都牢牢地保留着内心世界的一角自我。因此在当时那种环境里必然引起许多矛盾甚至痛苦。

“确实,有些话,很多很多的话,对于想了解我的人是很丰富的材料。但谁也不会得到它,它们深深地埋在我心里了。”

“似乎一拿起日记,就不禁不由的要发发牢骚,发泄一下落后情绪。反正这东西是不见人的,没人给我戴大帽子。于是日记成了我灵魂的小天地,谁要看到我的日记,他就进入我的心了。”(1950.11.2. 来信)

其实你那小天地,也不过是保持一份独立思考的余地,也是年轻人很正常的心理。但你却往往对自己要求很高,总觉自己改造世界观方面做得不够好,而常常自责、苦恼。

你说:“竞雄啊,我愿意叫你一声大姐。客观环境不能不使我们不向前,我相信你并没有自甘落后。但如更为争上游一些,我绝对相信你会有更大进步,有时候我会这样想的。我们出来工作八九个月了,八九个月中,我们有所得。但,当我们一旦回去的时候,这些所得是否值得这八九个月的光阴?抑或辜负了?在我想着这些的时候,我心中像烧着一团火……有时候,我深愿

过去的日子再回来,让我重过一下过得好些……”

“竞雄,我觉得真正的好朋友,是也开玩笑也谈正经。谈正经诉心事无妨披肝沥胆,暴露不怕深,批评不怕重。以为如何?望你举手同意……”(1951.2.10. 来信)

“对你有些心情,我可以说是比较了解的。不为别的,只为我自己也曾有过相类似的心情。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一旦投入这大洪炉不经烈火,不成器材。碰几下简直是必然的,早不碰迟也要碰,迟早要碰。既碰了,就当它个教训接受下来罢。我想你如果能放下包袱生活和工作,你一定比现在走得更快,这是必然的……”

“我要向上,我要向上!但旧社会的谈毒、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如石块般拖住我的脚向下沉,到什么时候才能战胜它们!”

“家的温情把我抓住了,我想回家。至少在家里,我可以安定那么几天,让心上的创口结起来……此地有位同志有个怪论,认为人是没感情的。我们当然不同意这样的讲法,你怕也不会同意……竞雄,我希望你从此能一步步走出来,不要自己把自己关在圈子里头。你不用怀疑走了出来又如何?外面有无数火热的同志的手与同志的心在等着你!人是有感情的。阶级弟兄,革命战友,更是有感情的。”

林昭,你在这封长达六千字的信中,除了谈思想,还关心我对文学事业的信心问题。你说:“对于自暴自弃,我想你是指文学事业而谈的。大凡一个人喜欢了什么,不大容易改变。我自15岁开始写稿投稿,至今更坚定献身文化事业的决心。你说心中像燃烧着一堆火……我能体会这种感情,我自己也是如此的。在我心中也一直像烧着一堆火。虽然时大时小、时强时弱,但一直没有熄灭过。我也和你一样,当想起对我所确立的志愿没有更多努力时,是我最痛苦的时候。不过我有决心继续努力,以后

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我永不放弃我的笔。我深深体会到在哪里都不会没材料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丰盛的用之不竭的材料源泉。我宣誓,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不息地为人民的文学事业服务——尽我一点一滴力量。这不是漂亮话,真的,你想一想:个人的名利得失,比之我们整个的事业,是何等渺小不足道!”

“我最近调城厢镇工作。近 28 人分成 4 个小组。我忝为小组长之一,任重道远曷胜惶悚。在八里乡时当了一个时期团小组长,是第一次干这工作,但对我很有帮助。身体则这晌较坏,咳嗽甚剧,有时发热,胸痛与眼的黑影更使人害怕。真的,我决不愿意让青春消磨在病床上。即使我真病了,我也要工作到最后一刻。也许我比别人活得要短些,但只要生命能被充分利用,早死也不为憾。”

“我敢说,我们心中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的眼睛仰望着同一指标,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在努力向这方面努力,好吗?我们这挑战不是大吹大擂的,不是患得患失的。我们明确方向后,就竭力向这方面努力。如果做不到,让我们在见面时总结总结,检查检查,争取在 1951 年入党。好同志,请你伸出应战的手来!”(1951.3.5. 来信)

林昭,你可知道,我是在什么情况下反复读你这封长信的呢?当时我有二重痛苦,一是失恋,二是对于文学志愿信心的动摇。

那天,我在吴江一个乡,与乡干部出去开会。摇船过荡,来到三面环水的隆寿庵住宿。那里环境清静幽美,正当傍晚,遥望彩霞低处,一座美丽的石桥,近看古柏深处含苞待放的牡丹花坛。大殿里庄严的如来端坐,一老一少两个尼姑在做晚祷。一种隔世气氛深深地冲击着我的灵魂。我轻轻叹气:“假如我长在这里多好啊,可以疗治创伤,平静心境。”忽然触摸到衣袋里你的

信,拿起来重读,你那滚烫的心激励着我。战友,同志,知己,一股暖流注入心田、熨帖心肺、注入力量。顿时心里阴影被驱散,觉得刚才刹那间的出世念头是有罪的,深深惭愧。

林昭啊,土改总结的1951年冬,北大风云的1957年秋,上海监狱的1968年春,你从“不可教育”典型的被点名批判到“反党”成为右派打入另册,最后以“现行反革命”到被四人帮剥夺了生存权。翻阅你1951年3月29日来信,是怎样一种扭曲过程呢?我百感交集,是你变了还是谁变了?我百思不解。

“关于爱国主义问题,”你说,“我也有你同样的感觉,事实上可说是今日每个中国人的感觉。确实在我心底深处蕴藏着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同样多的对敌人的仇恨。你不这样觉得吗?要以什么去教育群众?教育者自己本身先得懂它。不仅要懂它,还得感受它。懂,只能保证你不说错,感受才可以使你以自己的热情去煽动起别人的热情来。对地主的仇恨是这样,对这爱国主义也一样。这种爱与恨,也同样是推动我前进的力量。当我看到了志愿军的英勇战斗的故事,从纸上的战云中探出头来,望一望窗外的恬静美丽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对工作的责任心。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

在提篮桥,你从铁窗里张望外面的大墙时,你心里想的同样是:“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正因为你不愿让祖国受难,你才自己去受难,是吗?

你说:土改“是我们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当然我相信你,一定同样有这种感觉,别的人也会有的。怎么不?我们不都是新中国的儿女吗?”

“身体问题——我不想告诉你,但亦没法不告诉你。最近(3月中旬)已去检查过,透视结果有阴影,是第一期。领导上叫我

休养去,我婉谢了。并提出等到城厢镇土改结束时(4月中)再说。你不要责备我不顾身体,事实是,我非到不得已决不愿休息。我们的战士在前线作战负伤不下火线,我认为自己身体尚未到须要马上离开工作去休养的程度。我们这也是战斗岗位啊!……在这生命的春天,季节的春天,要去躺在病床上,那究竟不是件有趣的事。”

是啊,你是一贯的不顾一切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当你在监狱里,也认为是在战斗岗位上为真理而战斗。你不顾老母弟妹受连累,切肤割脉,以血明志,绝食表态。你也明知道这样做会被他们认为大逆不道,罪该万死。你母亲以血泪文字哀求你珍惜自己,“你的血肉之躯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部分,你这样糟践自己,我心痛啊!”可是你说你没有退路,仍以战士不下岗位的决心坚持到那颗只值五分钱的子弹射穿你的胸膛。你的血肉之躯已经灰飞烟灭,如果你的灵魂有知,一定还会坚持在战斗岗位上。

林昭啊,你可看清了那个向你开枪的战士?当他举枪对准你时,你一定想对他说:“我不是罪人,我也是战士!”你在法庭上受审时就曾昂首挺立地说过:“历史将宣告我无罪!”仅仅过了历史的半瞬——12年,你就已经被宣告为无罪!

对于入党问题,你说:“我认定目标,为它努力。如果我今天不能入党,这说明我做得不够,我只有在明天更加努力。你对我的评语我诚恳接受。事实上,上次和你挑战的那些话,确也是针对我自己的毛病说的。首先是我应该时刻引为警惕,不要说过即忘。更希望你常常提醒我注意,好吗?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共同进步啊。”(1951.3.29.来信)

当健康情况好转时,你更念念不忘努力争取入党。“我已听到入党要求提高了,条件不同了……是的,在最初听到的时候,

我也有些怨意(只是“意”)但我为什么要为此发愁、情绪不定呢?这样岂不是只能使我离开党更远一些吗?决不,我只有更积极地工作,为党的事业努力,党不会看不见的,你同意我这样说不?”(1951.3.29. 来信)

我知道,家庭问题始终是你沉重的思想包袱。当你与母亲决裂去新专参加革命时,在表格的家庭成分栏中填上“反动官僚”,为了划清界线,你与家庭断绝了一切往来。

1949年新专同学参加农村工作,你写信给金声时说:“队委和别的同志们(指新专师生)的意思,认为这样决裂地对待一个并不是劣绩昭彰的家庭,怕引起坏影响。”所以“于月初写一信回家,向他们承认部分态度、措词的错误,并打通思想……若不是他们(同志们)劝说,我这次根本连信也不愿意写的。”

可是,到了1951年镇反运动期间,为了你与家庭有联系、有书信往来,你与你当时所在的农村工作团十一队的同志们之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今年6月,我从你当年土改队组长那里得知,那次土改队队委、团支部书记等特地到你所在组里来重点“帮助”你。你分辨说:我写信回家是教育他们好好改造,转变立场,难道也不对吗?结果引来了全体人员排炮似地向你袭来,批判你立场不稳、划不清界线。你招架不住,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使得四座震惊,炮轰你的人都呆住了。那是一种受了大委屈之后痛彻心肺的大哭!

但在你6月19日始我来信中却情绪昂扬地说:“最近为对家庭看法问题,亦曾一度与同志们有过意见分歧,但现在解决了。本来我只单纯地看父母有没有被捕,且近日来信,一改过去落后论调,甚为‘进步’。因此就肯定他们不是反革命分子。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启发,才使我认识到为反动派做事且又做得不低,这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对人民是绝对没有利的,应该属于反

革命分子一类。经过这次的事情,更使我认识到自己的政治水平、阶级意识、立场观点离开党的标准还很远,我需要更好地锻炼自己……一个人的改造过程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尤其是我们这些人旧的尾巴太长了,但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人,党不断教育我们(要)成为新中国的好儿女。”

其实,我现在才知道,你母亲当年给你写信告诉你的,是你父亲彭国彦当年在两千多大学生留学生参加的文官考试中得了第一名(民间称为彭状元),才做了苏州县长的。他当县长时有朝气、廉洁、口碑很好。尤其是当年的青年学生非常热爱他。正因为他有朝气、清名甚著,所以你母亲才与他结婚的。你父在江阴做县长时,正逢白色恐怖嚣张,许多共产党员受到酷刑和惨杀。而你父亲不仅没有残害同志,且释放了几个共产党员。最后他以正直清廉、拒腐抗上而丢官,竟至潦倒终生。而你母亲在抗战期间及解放战争期间,也尽她所能帮助过共产党,做过不少好事,也受过日寇的摧残与迫害。这是你母亲言词恳切地想与你沟通思想的信。你经过“帮助”之后,由想不通大哭而扭转到提高了认识:父母确系反革命一类,而母亲只是在表现“进步”罢了。

我相信,你这个转变,在当时决不是故意说的违心话。因为你我之间是只说知心话、不说违心话的呀。

林昭啊,你想成为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心不可谓不诚,志不可谓不坚。你追求进步之愿唯天可表!谁又会料到土改总结中那次大打击呢!

你还记得你在农村给我的最后一封信的内容吗?你用一张小照片剪成椭圆形具名,挺美也挺有趣。

“竟,我亲爱的:我谨以情书规格来写这封信。晴天霹雳:统

统调走……此时我也不暇问别的，但急问：吴江队调了没有？他们说：也在数。哈哈！雀跃三百。旁人说：莫非你有什么亲爱的在吴江八队，我笑道：正是我有一位怪动人的亲爱的在那里。

“说真话，集中并不使我怎么愉快。我不想见新专同志，因为心里觉得羞见江东父老（指没有在农村入党）。唯一安慰，便是可以和你重见。真的，我挺想你的呢。料阁下人非草木，总也不无同感。然而相见在即，快何如之。”

“今年2月26日，我与两参土改的军区同志打了个赌，赌得很特别，值得告你一笑。赌的内容是，我五年内是不是会结婚？如果结婚，我就输了；否则他们输了。谁输了，罚二石米的代价请客。彼此约定于1956年2月26日大家碰了头再说——你看好玩么？我之所以和人家赌，也就是为了心中不以情欲为念。”

这次打赌，你是赢了。1959年端午节前后，当时你作为右派在人民大学资料室劳动，我来京看你。你说将要与一个同在资料室工作的也是右派××结婚，我还以为你在开玩笑。其实，你作为女人，你也想为人妻、为人母，过平常人的生活。可后来那人被打发去了新疆。以后，你终于一直没有圆成结婚这个梦。

你未能为人母，却使生养你的母亲痛断肝肠；你未能为人妻，而使爱你的人抱恨终生。这一切，都怪你打赢了这个不吉利的赌。唉……

你那信上还说：“回锡也好，我们在住招待所之余，该也可以有时间共游惠山一次。我对惠山是怀念的，惠山的景物常会在我的脑海里映过。这回，我们可以徐步在黄公涧畔，吟啸于三茅峰顶，看锡山龙光塔上一抹金黄的残照，听山涧流水低唱淙淙，望太湖水天一色，锦绣江山风光如画……重过昔日的山径，重温昔日的梦……”

我俩回锡后是重游了惠山，重温各自的梦。可1951年12

月 21 日那个日子,又使我们年轻的心灵猝然经受到如此深沉的困惑与强烈的震颤!

那天下午,我俩一起走向听大报告的会场(无锡东郊工人干校,土改队集到处),边走边谈我们正在合作的剧本《翻身乐》。你还讲了“原野”的故事,就各自走到自己所在队的座区。

组织部陈部长做学习总结,他宣布土改结束要另行分配工作。

部长说,两年来同志们经过土改运动的锻炼,有多少人入了党,多少人人了团,可也有少数个别人的思想改造成问题……一部分长期病假一时不能好的同志,请他回家休养。还有少数实在不接受教育、思想作风恶劣、两年来进步不多的人,我们要他到另外的地方去改造,进城市工作帮助不了他们。我听到这里,不知怎么有了不祥预感。他接着举例道:比如大名鼎鼎的彭令昭!她一贯思想作风恶劣……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一片空白。只见我周围坐着的 8 队同志,唰一下都转过头来箭似的目光射向我。我脸热心跳,如坐针毡,就像陈部长点的是我的名。

走出会场,我们 8 队队长看到我说:“你啊,跟彭令昭差不多,危险!”

晚饭后我只有一个念头,要去看你,可当时 8 队管得很严,你是知道的,即使自由活动也要集体出去,尽量不要单独行动。体息散步也不许走过西边那座大桥,而偏偏你们 11 队又在大桥西边。显然是要掐断 8 队与 11 队——我与你之间的联系。而我在当天晚上没有请准假不能外出,那是必然的。

一晚上没睡好,想的是你怎么经受得住这个打击。我想起 11 月 8 日你告诉我,“小组里穷追我的历史问题,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只好割开手指用血写保证书给队长。”你又流着泪说,

“我有时的想法很危险，走过小桥时，我如一脚滑下河去，人家也不知道我是故意的。我是心高气傲的人，我活着总不会脱离革命。但一个失去了别人对你的信任的人，前途是可悲的。”我听着心里直发怵。

又想起在12月12日中午，你来叫我剪辫子。你那两条又长又粗又黑又亮的可爱的辫子，我怎么下得了手呢？你说要斩断三千烦恼丝，逼着我动了手。旁观的两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急得要哭，骂我是坏家伙。

我想着，白天上千人大会上你被部长点名为改造不好的典型，谁能受得了？何况是你心高气傲的林昭呢？我真怕你想不开。

第二天休息，可队里规定不许外出。好不容易上面说可以出去了，我不顾一切，像出笼鸟似地直飞你们队找你。宿舍里没有，浴室也没有。有人塞给我你写的一张条子，说你在这里等过我，现在集体看电影去了，你要我到影院打灯片叫你。我想你刚被点名，尽人皆知。我没有勇气再让你的大名出现在银幕上，让人纷纷议论。

我快快回队。晚饭一过，也不请假，急忙奔到大桥，看看是否能找到你。可夜雾茫茫，哪有你的影子？

我又奔回去，转弯抹角地向组长请了假，赶到你们队里去，寝室里空空。总算有人告诉我，你们都在饭厅开会。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饭厅门口向里面张望，只见黑压压的人，难以寻见你。只听声音传来：“本来报社要调你去，听到你这样的材料，就不要啦，彭令昭同志……”

我在饭厅门外像热锅上的蚂蚁般转来转去，总算从里面出来一个人。我嗫嚅地叫住他，请他带个条子给你，让你出来一下，我在桥头等你。

我在黑夜中的大桥附近徘徊良久，寒气透骨。夜渐渐深，心阵阵紧，怕再等下去回队要受到难堪的责问。我沉重地往回走，像在梦里，又像在舞台上扮演着一个荒诞剧中的荒诞角色。

回到队里，一群人正在谈论你，我不想再听。这一夜我失眠，反复问一个问题：林昭究竟犯了什么错，要受到如此对待？问谁呢？问天！问地！无回答。

次日星期天，中午聚餐前听说你队就要开拔离锡，我想放弃午餐赶去送你，可组长不准假。我又急又气，幸好来了两个小鬼带来一张你的条子：“竟，终于缘慳一面，真是遗憾千古。这样分手也好，也许会有很多人（包括新专人）会劝你不必和我接近。不过我相信你的决断，信任你对我的了解。马上就走了，我还能说什么呢？语言也许在这些时候是多么无力啊！我只有衷心地祝福你，祝你过得好，附一张照片，聊当一面。希望我们的友谊由此得到新生，在这转折点，别为我难过，我会改好的……知即（知己即日）”

读着字条，看着照片，禁不住眼泪打湿了纸条。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形容我那时那刻的心情，竟然会产生生离死别的感觉。

经过那个永不能忘的日子，我既不放心你的精神状态，又为你的健康担忧。

你到常州以后来了一封很短的信，说你在2月初果然病倒了。信上也不谈别的。直到3月13日来信，才把我心中的迷惑解开。

你说：“那两次会上的话一想起就在我身边响。多少次，在旁人只听到我低声吟唱着什么的时候，我的泪水流向心房。我的脑中常有一个东西梗着；怎么？我真已到了这么不堪的地步了吗？是的，我对不起党。可是，我也总怀疑是不是有人对不起

我。那时的思想之苦痛，不能言矣。我录下一联联句给你看吧：

恶名素著，坏事齐归；百身莫赎，百口何辩；谁知清夜泣血，衷心更比黄连苦。

真言难信，善行无缘；求生不能，求死乏术；唯叹罪孽深重，回头已是百年身。

真的，我还说什么呢？即使是在我这么亲爱的姐姐面前。总归是无风不起浪，一切都不必说了。

全队集中检查，我病未痊愈，但也支着去了。本来我打定主意对领导不提任何意见，可是祁××董××（队长、副队长）作了检查之后，很多同志勇敢地提出了尖锐的意见，把一些我不想提不敢提的问题都提出来了。我后来也提了出来，但很小心谨慎，并且清高地决定一个字也不提本身问题。最后祁检查时，当场痛哭流涕，较深刻地往思想上检查，说明了一些问题，并承认对同志的教育、培养和批评，是有些成见出发和打击报复的成分……提到我的时候，也承认有些问题领导上要负责……他又往思想上检查了自己过去的行为——对我的态度。我当时就伏在桌子上哭泣起来，因为心里已负担不了。之后我写了张小纸条给他说：很遗憾这会没在两年以前开，又遗憾这会开后不能再和你一起工作两年。后来他叫我有空可去交换下子意见。我心想到了今日之下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啊！原来如此，队长一次痛哭流涕的检查，承认了有打击报复的成分……林昭阿林昭！我想起你我平时谈到一些队里领导作风上的问题我们看不惯就要讲，而且你言词尖利，常要触到人家痛处，记得有次你来信（1951年8月19日）告诉我：“敝队队委（即整风时在农运报上检查过命令主义的）最近双喜临门——一是奉调去党校学习，二是已决定与原籍之黄脸婆及亲生小儿脱离。另娶本队一位细挑身材长长脸儿的女同志为妻——你或

许又将怪我口角尖刻,但不知怎的,我每提及此辈老兄作的这些孽事,口角就恁怎的也厚道不起来。”

而我看到过一位年已不轻的区长,当他的脚妻子挽着小包千里迢迢从山东来看他时,他冷落她,同时却在穷追一位我们队的女大学生,我想起了苏北、山东老区妇女是如何用那双脚奔波着支援子弟兵上前线的。她们缝衣、做鞋、担茶送粮,没有她们无私的奉献和牺牲,咱们军队能战胜那么多艰苦的战役吗?当时我气不打一处来,就对队里的女同志们说大家齐心点,不要理睬这些见异思迁忘恩负义者,结果不知怎么传到某领导耳朵里,我被他叫去臭骂了一顿,说我缺乏阶级感情云云。

林昭啊!凭良心讲咱俩两年来在土改工作中可以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问心无愧。唯独在生活细节上有些文人气息,加上在心灵世界里,我们保留着独立思考一角天地。因而对周围环境中的不合理现象嫉恶似仇,语不饶人。为此我们都吃了亏,而你竟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

你来信又说检查归来,百感交集。加上拖着病后身体去的,不久之后又重新病倒……那时候——真是身心交瘁……因此就不顾一切,坚决要请假。现在我们的直接领导——纺织党委书记——名何希敬,我为请假问题与他谈了好几次。他在百忙中抽出两小时和我详细谈,他问我有什么思想问题,我当然不愿暴露。后来禁不住他诚恳地一问再问……我感于他诚意,把思想情况都对他暴露了。他说:过去对你的问题,领导上是该负责的……而这回你所以想回家,我们应负责任。没能在你病中很好照顾你,所以使你感到革命队伍的温暖……。

“你想我说什么呢?竟,我当时是哭了的。当然和队长检查时的哭不同,(何还说:我不是祁队长)我像是又看到了胡子衡(新专领导)。我假也没有请,休息两天,就去工作了。自从那天

以后,我思想一直平静而且愉快,脑子里再也不想到其他东西,只有工作。我主动的搞工作、作汇报,我的喜乐随工作开展而增加。真的,我很愉快而且安静。我想,在党的教育和帮助下和亲爱的同志们的鼓励下,我会保持着前进的。特别从农村到城市正赶上火热掀天的三五反运动。你知道,亲爱的同志。一个人在复杂尖锐而又艰苦的斗争中,是会有新的发展的——政治上和思想上。”

啊,林昭,你又开始振奋了。我因怕做财经工作苦闷,你来信劝我:“姐姐同志,要说,干了财经工作就终结了文艺生命,我怎么说不敢同意。……就是算盘或商人,行情或业务,也总离不了生活,离不了斗争,离不了群众。既然有生活,……都是生活在斗争和群众中,创作的源泉永远无枯竭之理。”

“我觉得在最近一晌(大体上来常后)我确实是在尽量向‘忘我地工作’努力。如果真是全心全意考虑如何地把工作做得更好,个人是绝对忘得掉的。而,真正从心底热爱你的工作,自己也就得到了最大的愉快和安慰。”

“我这会思想上比以前干净些了,因为以前想的是‘我’怎么样,而现在我想得最多的是工作。我热衷于工作的出发点,在最初只是为了赎罪(你何罪之有?)和忘却,之后工作本身的兴味大大鼓励了我,之后我又把个人爱好结合了进去。你知道我的,我一直深爱艺术并且愿意做一个艺术家。我惊喜地感到群众工作是一门最完整而精致复杂的艺术。这里而有壮丽的画面,有辉煌的文字,有动人的诗篇,有动听的乐曲——有时代的脉搏。我感到做一个这类艺术家的光荣。我衷心地热爱了我的工作。”

你拚命地工作,1952年红5月在常州孚成厂工作时来信说:“最近一二十天来,很少在半夜以前休息过,有时搞材料直到

清晨,白天还得工作或开会,我在睡得最少时不过睡二三小时一天,不过我很愉快。在看到同志们或党国旗和毛主席像的时候,我可以不致如以前那么不敢抬头了。”

我知道你热爱伟大领袖,你在1950年6月7日(那时你在吴县浒关工作)在苏州新华书店见到一张四五寸阔、八九寸高的毛主席彩色像,一看就爱上了,但只有样张,已卖完。你很急切地去信给苏州老同学李璧莹请她代买一张。

在常州来信中你曾说过:“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它却在北京或莫斯科(不从地理上来说),但它并不拒绝将它的光辉指引我。每一想起它,我便感到激动,我常使自己从它取得力量。五反运动开始时我便在心里默念着我们伟大领袖——亲爱的父亲的名字,而写下了我的誓言。”

林昭,你的虔诚和执着使我深深钦佩。

1963年我进了在北京的中央戏剧学院,1954年你进了北京大学。我们将在北京得到深造,圆心爱的事业梦。你要成为毛泽东时代的好记者或文学家,我要成为反映毛泽东时代优秀典型的戏剧家。当我们在离伟大领袖最近的地方重逢的时候,昔日的风风雨雨都过去了。我们消除了各自心灵上的阴影,踏上了新的征途。我们的友谊也进入了黄金时期。我常来未名湖与你共度周末,住在你们北大的27斋。而你在星期天也常进城与我一起逛王府井、天安门。我们都万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遇。

我比你早毕业,在离开北京前你替我照了许多相。天安门的华表,颐和园的春色,昆明湖的荡舟,北海白塔的倒影,都摄入了你的镜头。你说当记者要学会摄影,你正在为未来的事业努力作准备。

谁又想到1959年春我出差来京看你时,正在毕业班的你已

是戴了帽子的右派。相见时尽管你表现得轻松愉快,一如以往,陪我逛街,说说笑笑,不时说些俏皮话。然而我知道你心头的沉重,你转不过这个弯来。我也没有感到你变了质,或是违背了你的誓言。你还是你啊,是什么变了?让你再次跌入人生的低谷!我困惑,也说不出任何可以安慰你的话来,甚至我们都回避这个使人揪心的话题。你告诉我要结婚的消息,是想用喜讯来掩盖悲剧的氛围。你为老朋友减轻心头沉重的一片苦心,更使我辛酸。你变得比土改时期成熟多了,你呀,真是命途多舛!

不久,你母亲把你从北京领回上海。你原想与我这个专业编剧合作写剧本、编评弹。后来却不知怎么进了大狱。

1962年春,你被保外就医出来,到我那间亭子间楼下叫我。我从上往下看,只见你一头新烫的鬚发,衣着整齐,而你向来是不修边幅的。你在半楼梯就问:“我从‘那种地方’来,你怕不怕?”“老同学嘛,怕什么!”见了面,你没有谈“那种地方”的情形,也不谈你被牵连进去的案情。只是叙旧,还想去见原苏南新专三班辅导员胡子衡。因我忙于写剧本,你下午一个人去了。回来对我说:“我见到了老胡,与他争论。我问他:‘什么是新闻自由?我想办报,你们允许不允许?’我还对他说:‘新专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教会我们做人不好,害得我们出去老是碰壁!’把老胡气得要命!”你讲这些话时,显然很得意。

后来见面谈的话题是大跃进人民公社。你知道我在写歌颂人民公社的戏,你告诉我许多人民公社的阴暗面,内地有的地方大片饿死人等等。我也知道61年在苏南常熟(常熟常熟不荒年)地区的饥荒。我带了70斤全国粮票,却也只能每天喝三碗粥,让我得了浮肿病。你说批判彭德怀是错的,我写的却是反右倾为主题的戏。我是奉命写作,你是自觉忧国忧民。我无奈地说:“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满国民党腐败才去参加革命的,难道

还能回到过去？”你摇摇头说：“你是好人，无论共产党有多少缺点错误，你总以善良的愿望去为它辩解。”从此你不再与我谈这些话题。

好久不见你踪影，我想你，到你家去找你。你妹妹开门出来对我说：“你怎么还来？我姐姐又进去了。”我问：“她又受牵连？问题大不大？”你妹妹说：“这次问题更大，你千万不能再来了。”

从此不知音讯。直到1979年农历大年夜，收到陆拂为来信，要我设法通知你：右派改正了。我急忙赶到茂名路你的老家，只见门户紧闭。邻居说：“彭令昭早就被枪毙了，她妈妈也死了，她妹妹住在外面。”这一顿年夜饭我没有吃，整个晚上也没合眼。

在北京悼念你的大会上，我念了一段你1951年4月4日来信中的一段话：“你也会有这样的经历的罢：独自走在田野里，看着那蓝蓝的天，轻轻软软的云花慢慢飘过，太阳柔和地照着，微风把青青的麦子掀起一阵阵波浪。那竹林、牛车、茅舍、小河……全都显得那么欣悦而丰富，令你禁不住要喊，啊！春天！

“真的，竞雄，在这季节的春天，生命的春天，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欢唱美好的生活？也许生活不如理想那样美好，但只要你有着一颗快乐的心，生活就会增加光彩的。我们会有一个无限丰富、无限光彩、无限美好的春天，而现在还只是开始。”

是啊，我欣赏你这段美丽的散文。就在你赞美的季节的某个春天，你生命的最后的春天，你倒在了荒芜的大地上。那里没有微波荡漾的麦浪，没有轻柔的飘云，没有和煦的阳光。你被封住的咽喉不能欢唱春天的赞歌，但你却挺着流血的胸膛坚强地站了起来，英魂直上九霄，俯视着人间……

我们莫再回忆那麻花般扭曲绞缠的过去吧，让我们在祖国的新的春天里漫步吧。我们不去惠泉山，不去颐和园，也不去舞

厅。我要带你去一个咱俩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海滩，去那里玩沙雕。你知道沙筑的游戏吗？用沙筑起各种景色：琼楼玉宇、名胜古迹、美味佳肴……想雕什么就是什么。还是去“雕”美味佳肴吧，你我嘴馋。用沙来雕筑各式各样好吃的东西，比无锡崇安寺、上海城隍庙、北京东安市场的名点还要丰富。

我知道你想吃什么，你曾经开过一张菜单。

炖一锅牛肉，煨一锅羊肉，烧一只红烧蹄膀。（我说最好是周庄的万山蹄、味道可美啦）

你是小猫，最馋鱼吃，那么蒸上一碗咸带鱼，鲜鲳鱼，鳊鱼要整条的，鲫鱼汆汤，青鱼白蒸，再弄点鲞鱼、鳗鱼、甲鱼。

啊，点心的品种可多啦！目前，年糕、馄饨、水饺、春卷、锅贴、两面黄炒面、粽子、粢子、米饭糕、臭豆腐干、面包、饼干、水果、蛋糕、绿豆糕、酒酿饼、咖喱饭、麻球、伦敦糕、开口笑、酥糖、花生糖、蜂蜜、枇杷膏、烤麸、面筋、油豆腐塞肉、蛋饺、蛋炒饭要加什锦。

还有香肠、腊肠、香肚、鸭肫肝、猪舌头。

还有苹果、香蕉、梨、桃要无锡水蜜桃。

这是身陷囹圄的你，极端渴望美食而向尘世提出的最后呼求。“妈妈，我要吃呀！”你还要猪头三牲，这是你亲点的祭品呀！你反复念叨：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头！

你写了一首诗：“尘世几逢开口笑，小花须插满头归。举世皆从忙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你在尘世未逢开口笑，天上呢？

“林昭，我们雕筑这许多美食得花上整整……二天还不够哩。管它呢，咱俩慢慢雕吧，边雕边吃，你这馋猫，一定是先吃鱼。”

“哼，当然啰，不过，海浪一来，把这些沙雕美食统统冲走怎么办？”

“没有关系，冲走了我们可以再筑，它们毕竟存在过呀！它

们毕竟了却了你的心愿，也了却了我的心愿。自从我知道你想得到这些美食，我总是惦记着要给你置办，祭祭你那干瘪的五脏庙。”

“对！嗨！大浪来了！冲走了我们的沙雕，大浪也冲走一切污秽、一切罪恶，那才痛快呢！”

北大魂——林昭

甘 粹

林昭去世已有三十一个年头了,我一直怀念她,永不忘怀。

记得 1979 年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回到北京,得知林昭平反昭雪的消息,曾与她生前的好友、同学发起筹办了一个追悼会,各地报刊也曾零星地发表了一些有关林昭的报道和追悼文章。当时,林昭的妹妹彭令范曾对我说:“你最了解我姐姐,你应该好好写一写我姐姐。”是的,我曾几次拿起笔来想写一点悼念的文字,却由于悲愤在心头凝聚得太多,反而喷射不出,我写不出一个字。从 1959 年与她别离,我被流放到新疆劳动改造至 1979 年回到北京,在这长达二十年里,我朝朝暮暮怀念她,年年岁岁等待着她。心想总有一天会与她重逢相聚。谁知梦断黄昏,她早已碧落黄泉。而我是孤雁南归寻故里,夕阳姑苏啼香丘。追忆林昭,我总觉得她有着一种令人吃惊的魅力和气质,这种魅力和气质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坎里。

事隔二十年后的今年,北京大学隆重举办了百年校庆。在校庆活动中,我看到了北大百年的光荣和耻辱。我脑中突然受到了启示,一下全明白了:林昭的神奇魅力和气质,不正是这种

充满捭旧图新的“五四”精神吗！林昭坚持真理、顽强斗争，至死不悔，不正是表现了北大一种独具魅力的精神。这就是科学、民主、自由；这就是求索、为新、向上；这就是勇敢、顽强，不屈地向旧势力抗争，这种精神是一代又一代北大人共同的结晶，是北大人的光荣与骄傲。正是这种精神，决定了北大在中国历史上不同凡响的地位和作用。林昭曾在《沿着五四的道路》一首诗中写道：“北大的老钟，它曾在我们的时代的交响乐章里，奏了一支烈焰狂飚般的激情奏鸣曲……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为何如此，是北大有一种精神，或者说有一股“魂”，在强烈地牵系着学子的缕缕情思吧！近百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数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与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特出的精神魅力——北大魂。

三十一年了，一张笑脸化成一个带血痕的影子，总在我脑屏中闪现、旋转、萦系着。它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稍有减色，反而被时代的激流刷得更加鲜明！北大魂——林昭，一直蕴藏在我的灵魂里，唤起我很多回忆，震撼着我的心。

我和林昭相逢在1958年6月。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当时林昭是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学生，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在1957年那场害人的反右运动中，我们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反右后，北大新闻专业合并到人大新闻系，林昭是随着合并而来人大新闻系，安排在资料室“监督改造”，而我也被分配到资料室“劳动考察”，领导我们两人的是王前女士，具体工作是为学校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整天在报刊库里查阅旧报刊。那时，林昭体弱多病，还经常发烧咯血。王前十分同情她，叫我在生活上多加关照。当时，我的心情也不好，林昭却像姐姐对弟弟那样关心我，鼓励我。我看到她那双惨淡、凄然的大眼

睛,也同病相怜地流下了眼泪。在生活上我尽力去照顾她。相处时间长了,我发现她身体瘦小体弱多病,但在思想上却非常成熟、刚毅、坚强,她关心国家大事,认为彭德怀受冤,对他处理不公;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和大批的饿死人,深感不平;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与中国有类似之处,很值得中共领导参考借鉴。下班后就回到自己的房里,埋头修改她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罗米修斯受难日”,为了纪念难友,她自己作词作曲写了一首歌,歌名叫“呼唤”,她还高兴地唱给我听,歌词是这样的:“在暴风雨的夜里,我怀念着你。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啊!飞出去寻找着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为什么我找不到你,你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还是沉埋在冰冷的狱底?兄弟!兄弟!我的心灵为你流血,我的呼声追寻着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由于我们两人天天在一起工作,生活上她体弱多病,有时重病卧床不起,我常常去给她买饭送水,慢慢地由相识到相知。这时,外面有了传言,说我们两个右派分子谈恋爱是抗拒改造的表现。林昭听到后,笑了一笑,向我问道:“你怕不怕?”面我的回答是:“怕什么?恋爱也不犯法。”谁知林昭更倔强地说道:“好,你不怕。走,我们手拉着手,在校园里走给他们看!”从此,在工间操和休息时间,我就和林昭手挽着手在校园里散步,有意走给他们看。本来我们还没有谈恋爱,结果这样一来,倒真的促成了我们谈恋爱了。时间很快过了一年,我们两人提出了结婚申请。结果,当头挨了一棒“不准结婚”,说什么两个右派分子不好好改造,结什么婚呢?!连做人的基本权力都没有。接着,厄运接踵面来,1959年9月,将我发配到新疆去劳动改造,叫林昭回上海老家看病体养。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两人别无选择,只有俯首听命。九月中旬的一天,我替林昭收拾好行李,送她上了火车。

在车厢里，一向刚毅、倔强、从不流泪的林昭，却伤心地抱头痛哭起来，口中念道：“甘子，是我害了你。”我也不顾车厢里其他乘客，马上抱着她，也哭了起来，并安慰地说道：“别哭！林昭，等着我，我会回来的！”谁知这一分别成为今生最后的诀别！

秋夜，夜凉如水。窗外，细细的雨丝无声地下着，我轻轻地推开一扇长窗，一阵秋风拂面，秋雨被微风甩落到了我的脸上，像晶莹的泪珠。在路灯的映照下，薄薄的雨雾使眼前的景物模糊了，可我却仿佛看到林昭正冒雨朝我走来，是梦幻？不可能。你瞧，她分明在向前走，踏着泥泞。我轻轻地呼唤着她的名字：林昭！林昭！可是，他去了。雨，无尽的雨，像扯不断的丝线，缠绵绵绵的，有如我一缕缕的情思。风儿，轻轻掀动我记忆的窗帘，不知是坠入沉思，还是在困倦中进了梦乡，我仿佛又看见了林昭那飘散的长发，像一株婷婷玉树般伫立在那里。真不敢相信，林昭后来竟然被无辜地枪杀了。林昭，你柔弱的血肉之躯终难抵罪恶的射击，你猝然饮弹，如玉山颓，似天地倾，一腔沸腾的青春之血，殷殷斑斑，把唏嘘悲泣的大地染红。林昭，你是社会的精英，民族的希望，你无愧于人民的养育和师长的教诲。林昭，你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牺牲生命，自豪地表明：五四先驱们的爱国主义火炬正在代代相传，是永远不会熄灭的。你的事迹将永载史册。我久久伫立着，凝视着远处路灯那微蓝的光，心中又忽然想起，老人说：人是有魂的。我相信了；人有魂，国有魂，民族有魂……为民主、自由而英勇献身的林昭更是有魂——北大魂。

1999年秋雨夜于北京

读“我的姐姐林昭”

林斤澜

今春,北京大学百年纪念活动中,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有悼念彭令昭(林昭)的。如乐黛云教授回忆几位“北京大学的优秀儿女”,其中有林昭的敢说真话,至死坚持表达的权利。“今日名流”的编者说,“我感到没有找到一个人的经历,能表现出北大精神的深层中含蓄的激情,直到我听到林昭的故事。”

林昭远在美国的妹妹令范,寄来一篇长文,题目就触目惊心:“姐姐,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见1998《今日名流》)。至痛文字不可复述,这里只说一点感想。

1949年林昭在苏州家中,报考苏南新专,她的妈妈反对,要她进正规大学名牌大学,例如北大,此事各有理由,更兼各有脾气。闹得母亲限制女儿行动,女儿爬窗争取自由。

新专结束以后,工作了一段时间,国家鼓励年轻干部进修大学,林昭果又进了北大。写诗,办刊物,不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同时在学业上,也得到著名教授如游国恩老先生的赞许。

“风华正茂”,1957年“戴帽”。分配去剪报做资料工作。她的妈妈着急了,叫她回南方耽在自己身边,谁知在南方倒遭逮

捕,做妈妈的可是后悔了:还是留在北京的好!妹妹令范最记得妈妈费尽心思,保她出来就医。这个姐姐竟攥铁门扳桌腿,不肯出狱。高叫他们不会放过我,出去了还要进来……1962年,当真又牵连进去了。“文革”中,1968年,惨遭枪决。说来人都不好相信,还到她家收五分钱子弹费。她妈妈当场晕倒……

“四人帮”垮台受审,长篇报告文学“历史的审判”中,有这么几句:“……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在中世纪被判火刑烧死的犯人无需交付柴火费,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电椅处死的犯人也未交过电费,唯有在林、江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报告文学的作者之一,是苏南新专毕业也是北大的同学陆拂为。

林昭在新专时节,那样十七八小小年纪,那样新解放的蓬勃气氛里,就叫“一根直肠子,一根热肠子”,弄得不合“革命世故”,总有些愤世嫉俗的样子,仿佛书本上读引过的,在“五四”前后,叫做“叛逆的女性”。这在林昭,当是祖母一代的人物。林昭的母亲,后来冻死在雪地里。不了解这一位母亲的生性,不知道是她不合时宜,还是时宜不合于她,她几番计较南方北方,难道晓不得恢恢天网?!

当年新专结束,上下左右临别赠言,曾把一个旧词“反讽”林昭:“生不逢辰”。

眨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近来才觉出来当初“反讽”的幼稚。现有大诗人、有名戏剧家也一落再落“天网”,过后屡见题词曰“生逢其时”,曰“生正逢辰”。

换一个角度看世事,立刻眼界开阔,胸襟坦荡,就是积极的人生了。生逢世纪之交,说什么时宜于我,我于时宜。时间永远交替,空间永远交错,令范的“心中永远的痛”,积极的意义就在永远之中。

林昭的知交倪竞雄,妹妹令范,还有北大的难友,连“刑事判决书”上都提示:林昭在狱中写过不少的诗。那是用倒流的泪顺流的血写成的,至今还大约封闭在提篮桥监狱的档案里。山重水复,不知道这样的功德,却如羚羊挂角。人生往往说了许多话,倒把最要紧的话咽在肚子里。前人去了,令范把“心中永远的痛”说出来,是希望后人心中永远没有这样的痛。令昭的诗,若这样作用起来可是“功德无量”。

故乡人民的骄傲

——忆为真理而献身的战友林昭同志

黄 政

4月29日这一天,是我们苏州故乡人民的优秀女儿林昭同志惨遭林彪“四人帮”杀害的日子,至今已卅多年了。当年她的鲜血洒润了中华大地,如今已染红祖国五月盛开的鲜花,正像她生前最爱唱的那支歌一样:“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争不歇!”在与她离别后这卅多个年头里,每每忆念起她总难以忘怀,如今又是五月的鲜花盛开时节,我追忆往昔而伏案沉思,用这笨拙的笔献上一篇短文,以作对她的哀悼和纪念,既是为告慰逝者,亦是为了寄希望于生者。

1957年的极左狂飙中,我以曾是“最可爱的人”被括倒成地富反坏之后五类之末,1958年初押往号称江苏的西伯利亚——黄海之滨农场劳役,四年后于1961年底释放回苏。当时正值天灾人祸国家困难时期,草民百姓理属当然是首当其冲,而我这释放的分子更是过着缺衣少食,无业流浪、生活无着的极端困苦的日子。林昭于1962年春从上海监狱“保外就医”回到苏州乔司

空巷 15 号家中休养,9 月初我们有幸相识,由于彼此几乎相同的经历和遭遇,相识未几而成知音,从此结下终生难忘生死相托的莫逆之交。9 月下旬上海有关方面相继三次发来传票催促她返沪,谁料当月底匆匆惜别,虽临别时互祝“保重,再见!”竟是战友间的永别。12 月间林昭再度被捕入狱,从此我们失去联系。不久,我亦由于被人告发而被捕,经长达一年多关押审查后即以“现行反革命罪”为由在沪苏二地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廿年和十五年重刑。在漫长而又艰难的狱中岁月里,每当沉思中想念起林昭同志她那种坚持真理,忠于信仰的顽强性格和那勇于斗争必申信念的无畏精神,屡屡激励自己,从而给我增添生活力量和对未来的信心。在无数静的静夜里常会思念起她:“生死相托的战友林昭你现在又在哪里?!”我亦曾无数次默默安慰自己,同时也坚信总会有那再见相聚的一天。漫漫寒夜终于熬过,春天又来到人间,1978 年秋我终于“刑满释放”出狱,虽极想打听她现在何方,在何地处境如何?但由于长期与世隔绝的监狱生活,使我犹如来到一个陌生世界,加之这“三类人员,刑释分子”的身份和无形枷锁,还是难以深知和证实林昭同志确切的消息,仅只听到一些似信似疑的传闻,心里却总希望这仅仅是个传闻而已,我还是坚信总有那明朗的一天,故乡人民一定会明了被误解而遭不幸的儿女们的真情。这一天终于给等来了,1981 年 1 月 27 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刊同时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新华社记者——穆青,郭超人,陆拂为三同志所写《历史的审判》长篇报道,终于得到多年思念的战友和同志——林昭,早已于十三年前被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们杀害的确切消息。之后又在 1981 年 3 月刊《民主与法制》上读到陈伟斯同志所写《林昭之死》专题报道,才真正明白林昭被害的事实和经过。至此,我再也无法强抑自己,战友的被害令我悲哀,烈士的牺牲感我哭

泣,满腔悲愤向谁人诉说,而这悲愤又能为谁人所知晓所理解?!回忆多年前在激烈的朝鲜战场上,我亲历目睹帝国主义的炸弹枪炮夺去朝夕相处,危难与共的战友们年轻的生命,那时我没有眼泪,只有满腔的仇恨和愤怒激励我更顽强地投入战斗。而多年后的今天,却万万没能料到,在我曾为之以青春,鲜血和生命保卫过的共和国土地上,却又目睹裹着红色的枪弹,盗用人民的名义夺去祖国优秀女儿年轻的生命,这时我没有仇恨,唯有不解的迷茫和无限的悲愤,而更令人不能忍受的是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又能向谁去诉说?!我彻夜无法入眠,在静静的夜晚里思索,我徘徊在她生前我们一齐走过的街头和与她一起踏过的旷野,寒春的雨幕中我独自一人又奔上当年我们一同攀登过的山巅,我又去过我们一同走过的河边,一齐去过的园林。我努力地细心地在处处点点寻觅着她当年留下的脚印,犹如能慰藉和寄托我无限的怀念和哀思。虽然分别这许多年月,别的许多往事都会渐渐被淡却遗忘,但唯独林昭那种倔强性格和对真理执着追求无畏精神,她那种待人真诚热情的态度,谈吐中那显露出来的博学多艺才华,还有她那常爱唱的《五月的鲜花》歌声,以及她那充满智慧而又饱含刚毅,纯真无瑕的眼神却常浮现在我眼前,她的音容和形象深深印入我脑中而毕生难以忘却。

我永远不会忘怀,在不足一个月中的时间里,我们几乎天天聚首畅谈,我们不谈身边琐事,不谈风花雪月,而主要谈论当时许多人讳言的政治路线治国方针。林昭以待罪之身依旧心怀天下,纵谈国事提出了系统的政治主张;例如:谈及广大农村饿病死人的事实,集体劳作无积极性问题,林昭曾说办人民公社不合国情不合情理,应当及早解散,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对当时全国城乡各行各业不允许个人经营,多种经营一律“割资本主义尾巴”,广大城乡小商小贩无出路,林昭就曾提出国家不

能统包统揽一切经营权,应当允许私人开业经营,发展多种多方经营,才能真正发展经济利国利民;林昭当时就曾认为:要改变国家落后状态,使之发展成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富强国家,必须改变闭关锁国方针,以便加强与世界的联系。仅靠本国财力有限而不足,应当争取友好国家的帮助,引进外资,举借外债来加速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技事业的发展;林昭还主张:针对当时农村政社合一公社化出现队头社霸城乡机构欺压民众腐败失效策失信于民的现象,必须严惩此类贪污腐败,鱼肉人民的人与事,为政者应自律以取信于民,国家才能治理好。这些在当时被认为属大逆不道,甚至连想也不敢想的,而在今天已付之实施并被实践证明是非常正确的方针大计,早在六十年代初林昭就鲜明地系统地提出来了,而且这些观点不是出于一时一事的心血来潮,而是完全建构在确凿的事实和详细的论证上的。

故乡的人们可曾了解?林昭同志那种决不向邪恶势力低头,那样不惜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从事奋斗,至死不悔,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记得林昭对我讲起关押上海狱中种种境遇,曾说:“我在里边(指狱中)活一天就要与他们斗一天,我没有别的武器,我就用唱歌写诗作武器来斗争,开头狱卒们不准,我就是不睬他们,越是不准唱,我越是非得唱,大声地唱,不停地唱,整天地唱,狱卒们不理解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精力,这么多的歌词,加上有时我还以写诗画画和绝食作斗争,他们无法理解一个革命者的情操和意志,就主观臆断说什么我患了精神病。既然他们这样错觉而歪曲了我,那也好,我就更起劲地唱,整天整夜地唱,装得更像些,以后狱卒们拿我也没办法,最后也就不大来管了,这就给我带来不少“自由活动”的机会,使我能够常与别人接触,从而掩护了我们的联系和斗争。如果说有人误解和以为我有别的什么,不如说是有意装得更像一些而已,那也是为了斗

争的需要和采取方式方法的不同。”这就是一个革命者坚贞的自白,是姑苏女儿纯真的倾诉。今天,我们也有责任来洗涤人们落在她身上的尘埃,有义务来端正人们对林昭同志革命者气节和形象的曲解,让南国女性故乡女儿纯真洁白清秀面目和高尚的美好形象,真实地显示在人们面前,并将成为姑苏故乡人民的骄傲,永远存留在一切正直人们的心间。

姑苏人民优秀的女儿——林昭同志已牺牲卅余年,今天我们追念她,称颂她,我们可曾理解她,知晓她为之以生命而奋斗献身的事业又是为什么?简言之,这就是为祖国的富强为民族的觉醒,为社会的进步,为人民的幸福。可喜可庆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廿年,我们的国家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已发生巨大的变革,人们从噩梦中猛醒过来,总结了廿多年极“左”路线的惨痛教训,加以整顿改革开放,使我们饱受创伤的祖国和人民得以医治和苏醒。在实事求是精神指导下,林昭和我的错案也已分别获得平反,在这廿年改革开放的变化中,就有不少是林昭同志生前所谈论所希望所追求所奋斗乃至所献身的愿望,都已实行和证实了,如林昭同志在九泉之下能看到这一切巨大变革,看到她为之献身的理想得以实现,也一定会发出胜利的欢笑和宽慰的喜悦的。

永远不要忘却过去,永远也不能忘记历史。

纵观古今中外历史无不证实:凡立志变革者必定会遭到保守势力的残酷迫害。但历史也同样证实立志变革者是推动民族进步社会发展国家富强的动力。林昭同志立志变革,勇于变革敢于斗争的顽强精神,这就是我们姑苏人民的骄傲。而那些杀害立志变革者的残暴势力又显得何等可卑和渺小。

让我们永远记住故乡人民哺育出的优秀女儿——林昭同志的不朽业绩吧!

林昭同志,安息吧!
故乡人们将会永远怀念着你!

林昭三十一年祭

——忆奋进、追求、实践中的令昭

陆震华

林昭,这不是她的本名,原名彭令昭。是我1946年在苏州华关中学上高中时的同班同学。我第一次见到她用林昭署名是1951年8月30日自太仓土改工作队给我发来的信,此后也就未曾见过,推想大概是写文章使用的笔名。我们联系中断的三年后,没料到她报考北京大学时,竟用林昭为正式名字。此后便一直沿用此名,直至遭冤、抗争、蒙难。1981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的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在那罄竹难书的残害忠良的血案中,人们始知北大有一位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意即江南姑娘)——林昭。我那时已在杭州多年,突闻噩耗,不胜悲痛。乃与其妹令范及新专同学倪竞雄取得联系,了解了一些往事,提供了林昭和我在过去的情况。去年林昭离世卅周年,《今日名流》和《南方周末》等报刊,相继发表了纪念林昭的一些文章,江苏沈立人同志也相约写林昭文字,一时又形成了再度追忆令昭的热潮,今年苏南新专同学会借校庆五十周年纪念,在《五十年情缘》中专辟了“林昭特辑”。我看了这许多回忆,令昭

当年那音容、笑貌、形象、意气，重又展现眼际，勾起那件件往事，悠悠岁月，似流水东去，现敬为我隔世之友林昭同志，撰文作祭！

1948年11月，我为逃脱国民党追捕去了苏北，解放江南时，我随军后，进入上海。7月调回苏州，见到不少老同学已出来工作，却不见令昭。传闻她现在无锡苏南新专。大地图书馆的吴祖德，（那时养病在家）告诉我：“你们去苏北后，她还来到我家，打听你们的消息；在大地无人主持之时，她常到大地去照料，解放后，大地为前途讨论怎么办时，她也来过，而且帮助统一了大家的认识。总之，平时她虽少来大地，但关键时刻，她就来了。好像有‘灵感’一样，说明她心中常有大地！”听到这些情况，促使我一定要找到她。于是接连向新专发去了三封信，终于得到了她的回信，这就延续了我们在解放前的友谊，建立了两年多的通信联系。

解放前，我们同学时间不过一年，一年后她转学城内景海女中，但她家仍在城外，故课后或周末仍常来图书馆活动，常常见面。彼此感到没有隔阂或想到什么“男女之别”。我并不是随便和哪个女生接近的那种人，我和令昭接触，并无有意为之，只是同在一个教室，她是女生中较小的一个，坐在第一排。座位是一种一人一座的铁木扶手椅，我是近视眼，人虽高些，也坐第一排，这样和令昭相隔不远，成了“邻居”。突出的印象是常看到她独自坐在那里低头写东西，而且用的纸都很小，一方块一方块的，大概是节约用纸。因而知道她善于写作。不过，她写什么内容，往哪里投稿，我不知道，她也不让人看。直到第二学期，她交与我《代和代》、《黄昏之泪》那两篇稿子后，我才看到写的是很有思想内容的东西，内心产生了惊异。还有的印象是穿着十分朴素。白皙的脸庞，梳两根辫子，瘦小的身材，常穿着一件浅紫色方格

子的线呢旗袍，脚上一双搭攀布鞋，即使有时穿一双浅口皮鞋，也是灰不溜秋、皱巴巴的样子。和班里别的讲究穿着的女生，毫无共同之处。看不出她家里是有钱人家或是什么达官显贵之流（那时听说她父亲当过吴县县长），谈吐细声细气，很平和，让人感到易接近，没有傲气。不过，非常敏锐，三言两语就能使人感到语中有芒刺，如果缺乏友善之人，就不大敢去领教。也让我感到，她人虽小（班里最小，不过十四五岁样子），思想见解却敢说敢为，无人可比。

班级里我算是班长，还有陆咸、杨彦蘋、彭令昭，我们都爱看课外书。那时看书也闹“饥荒”，没有地方去看。陆咸是文心图书馆的干事，他就带我去那里借书看，那里有我们急迫要看的书。但进城去护龙街（现人民路）要走很多路，来去费时间。他就提议自己来办一间。1946年底，也是“文心”干事的苏高中学生张文英，在城外乐安坊有一间小屋，她同意让出来供大家办图书馆，于是大家捐助凑书，我也去娄门外徐同泰找过去的朋友施祥麟要来一些好书，放到一起。其中文心又支援我们一部分书。那时杨彦蘋、彭令昭、林宝铨等也参加进来，有好多人都一起帮做开馆的准备工作。1947年初正式开馆，定名为大地图书馆。这样做以后，大家都感到高兴，因为既解决了自身看书的需要，又可以为别人提供看书的机会。后来，大家还排练《十字街头》话剧，义演筹款，为图书馆添购新书。这样，读者更喜欢来大地借书，图书馆成了进步青年的活动中心。与此同时，林宝铨和小时候的同学程伯皋等人成立了一个文艺团体叫“文青联谊会”，邀我参加。办了一个《初生》月刊，开始向大地同人约稿，于是便有了1947年《初生》二、三两期上刊登的彭令昭（用欧阳英笔名）陆咸（用唐诃德、仇晶笔名）的文章。由于彭的稿子由我转给伯皋，所以记得特别清楚。我还保存了这两本东西。

1947年暑期过后,彭令昭转到景海后,图书馆就来少了。不过星期天还是来和大家在一起,并未脱荒大地,当然平时课余的图书出借工作,也就不排她了。大概在1948年初,“文青”与《初生》正式与大地合并,成立了一个名为“群联互学会”的团体。《初生》改名《文联》继续出刊。这样,图书馆活动进一步扩大,不仅读书,而且加强联谊,又搞文艺创作活动。因而进出大地,和外而联系的人增多,在苏州城内外日益扩展其影响。由于“内战”形势发展,反动派的统治日益加紧。影响大了,颇易引起各方面人的注目。于是在那年8月底,杨彦蕓、我、吴祖德、还有沈家骏共三四个人开始商议此事,认为应缩小规模,不再搞出版物等易引起敌人注意的活动。在这基础上,9月5日召开了馆员大会,讨论这个意见。那天,彭令昭来了,并且积极发言,赞成我们的建议。加上光华中学一些大地同人的支持,取得了绝大多数的同意,决定取消“群联”、停办《文联》,加强图书馆工作。这件事原先我们几个人担心不易为大家接受,结果却比较顺利。这里要特别说一说令昭。会上彭十分领会我们酝酿的“内心”意图,就是要保全大地这块阵地,安全无虞,不出问题。而目不能太左,要防特务注意,借机破坏。(当然嘴上并不能讲出来)赞成加强图书工作,不办刊物。提倡多学习、多读书、多交流。于是程伯皋等也都同意,使改组得以成功。这里面完全因为有地下党中学生支部同志在起指导作用。而彭令昭在去景海以后,就在该校教师陈邦幸(地下党员)的指引下,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而且在1948年暑假将她介绍到苏女师支部杨愿老师处,吸收入党。这些就是彼此配合默契的基础。

1948年,是我和彭、杨、林、吴等同学,由不满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残暴统治,依靠美援打内战。到思想上迫切要求革命,努力寻找党组织的一年。彭令昭能在那时遂愿入党,实现在

这“黑暗的时代”里找到照亮前进道路的“火炬”，自然是极为幸福快乐的事。在这一时刻，她需要找一位同志，来分享这一份快乐。那么，她找谁呢？真没想到，她竟来找了我。这件事，埋在我心中那么久，从未向别人透露过。我想，她一定也是这样，不会告诉别人。情况是这样的，9月的一个周末，也就是开过大地改组的馆员大会之后约半个月，令昭忽然来到了我家，上楼进了我的房间。（她家离我家不远，但彼此从未来去）我来不及招呼她坐下，她就说有事要告诉我，我问什么事？于是她就靠在我那扇房门旁，边笑边轻声告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我听了当即明白了她为何来找我的意思，我以前看过她那找《路！……路！》的文章，此时她已经找到了“路”，我为她高兴、庆幸。接着我也回答她：“我也参加了组织！”那天讲话显然和平时不一样，因为两个人面对面，我注视着她。她的头发是经过整理的，而且发辫上扎着红绸带；上身穿的是雪白的府绸衬衫，下面是蓝底白点的裙子，那双皮鞋也很光洁；她的眼睛显露出异常的光亮，嘴角也凹下一个小酒窝，脸上泛起红晕，甚至我发现上面有那么几点小黑点。整个人换了一副样子。当时，彼此心中都感到十分快乐，留下了这一刻难忘的记忆。在那个年代里，在我心目中没有什么可以使人高兴的事。抗日战争刚过去，蒋介石又打内战，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物价暴涨，民怨沸腾。我虽然离开了学徒生涯，回家上高中念书，但我是边上学边挨饿，因为父亲的教书所得，养不了全家七口，经常要饿肚子。面对着“毕业即失业”的前途，读了书又有何希望？我感到生活只有痛苦和失望。令昭她这样一个家，当然不会有我这种体会。何况她的母亲许宪民在苏州竞选“国大代表”时，有人到学校里来宣传、拉选票，彭这个“国大代表”的女儿，几乎人人皆知。她何以要找上我家来告诉我这样的“秘密”呢？这，怎么解释？我觉得只有一个解释，那就

是她认为自己在政治上已不属于“那个营垒”的人，她的人党，表明了她已经叛离了她出身的那个阶级，而属于人民，那些劳苦、勤俭的人民中的一员。我记得她在1947年所写的文章中讲她的上一代人，已经是“腐烂了的木头”，他们在做的是“捞钱，刮地皮”的勾当，他们对青年是“使用最卑鄙的手段”，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安上各式各样的绊脚石”。这就是党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接纳她成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中共党员）的政治基础。她为什么对我那么信任？因为在华美中学和“大地”这些日子里，我的作为，让她看出我属于一种什么样的人，认准我和她一样，所以才能兴高采烈地跑来，一口气将内心的“秘密”向我吐露。她没有讲自己“已入了党”，我也没有说出我加入了“什么组织”，彼此心照是“同志”就是，没有再问下去，似乎都没有“泄密”，没有违反“组织纪律”，但彼此都从内心里获得幸福。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国统区当时有不少这样的女性，她们身不由己出生在反动阶级的营垒里，但当接触到真理以后，便投身到革命的队伍里，参加了共产党，心怀奇志，为人民的解放，作出很多贡献。如陈布雷的女儿为党中央提供过许多重要情报；（杨原是解放前北大学生，和陈非常要好，但陈解放后却死于非命）傅作义的女儿，为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的起义，作了有效的工作。这些是人所共知的。林昭也是解放前的中共地下党员，我不知道她在杨原的领导下为党做了些什么，但在临解放前，地下党获得情报，令昭和李璧莹上了国民党苏州城防指挥部的“黑名单”。为了她俩和党组织的安全，通知她们必须立即撤离苏州。李璧莹奉命于次日撤往上海，彭令昭却认为母亲是“国大代表”，不用撤退……未执行党组织决定。就这样，一方面这是一个原则性错误，为党纪所不容；另一方面党组织根据秘密工作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再与彭发生关系。从此令昭就失去了党籍。

彭在后来写给我的信中告诉我，苏州解放后，她曾去市委青工队找过当时的负责人崔思明同志。她还说：“即使只和我谈过一次话的崔思明同志，我也常记着他，偶尔在新苏州报上看到他的名字，也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但在他，我想也不会再记得那么一个掉过队的人。我对以前的问题，随着时间的过去，认识亦有所发展，也正因为如此，我深感这个污点的可耻，对着你们，我总难免有些羞愧、自卑，至今犹存。”那时她在太仓土改工作队，全力以赴地投入土改和新闻报导工作。她告诉我：“近来身体不大好，但我仍愉快地坚持工作，我深爱我们的工作，深爱我们的翻身农民兄弟。希望有一天，我能写信告诉你们说：‘我已重新回到党的队伍里了’，那时我会告诉你们许多话……”由此可知，她始终没有放弃她所追求的目标。

令昭是一个性格十分坚强的人，而且进取信念坚定。她没有从此“一蹶不振”，经过沉痛的反思，特别是从鲁迅作品的光辉思想中得到了启示后，她告别了过去曾朝夕与共的“大地”，为摆脱那种无形的精神压力，坚持继续革命，毅然和家庭决裂，投入苏南新专这个为新中国培养革命的新闻工作者的“摇篮”，奋勇前进。

解放后，她在苏州已无法得到人们在政治上给她的温暖和关心，也许还有人以“异样”的目光相持，这使她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痛苦，因此她要 and 苏州不再发生“瓜葛”，尽量不和过去的人联系。虽然，她曾因我主动去联系而透露出些许对过去的流连与希冀，可得到的却是失望。但她心无怨恨，只有羞愧，信中一再提“羞见江东父老”，“不敢（怕）进团市委的大门”。直至1958年在给北大同学（也是新专同学）羊华荣的“悲愤”诗作中，犹留有“岂为关山路莫通，孤穷如何返江东。回忆父老牵衣日，肠断眼

枯立西风。”之句,读之能不使人泣下!令昭的“脱党”,错在当年政治上幼稚、天真,并非立场问题。但历史无情,终成遗憾!

令昭于1949年7月进入新专,在无锡仅一年不到。学习新闻业务约六七个月,下乡时间就达四个月。那段时间,可说是为迎接江南即将开展的农村革命(土地改革)作准备的阶段,令昭下乡去适应在农家自己做饭菜,走泥泞小路的艰苦生活,也学会了下地和割稻等农活,培育了对农民的思想感情。到1950年5月新专毕业时,虽有人分配去新闻单位工作,但她却告诉我:“志愿去农村参加土改,为农民的翻身解放并更好的锻炼改造自己。”5月中旬,正式下乡参加苏州农工团集训(在木溪)。6月参加全团整风并新青团转正。吴县作为苏南土政重点,全面推开。7—9月参加浒关区新合乡重点土改工作。10月又参加区典型乡金坞乡土改。11月离浒关转赴太仓,参加城厢镇土改,后又调至典型乡土改并搞土地证典型实验工作。这样,到1951年5月令昭共参加了四次土改,一次秋征,两次参军(抗美援朝),以及三次发放土地证工作。参加了整个土改运动的全过程。我从她写给我的许多叙述中,觉得她投入我国这场史无前例的“土改运动”是完全自觉主动,并且是愉快的。她用实践证明自己不是“口头革命派”。她不仅参加土改,并且还报导土改,当时在《苏南日报》,《苏南大众》上都有她的通讯、报导文章,还有创作的诗歌。我相信她一定积累很多土改的素材,如果她没有遭此大难,我深信她一定能够写出一部“中国土改史”。中国的地主阶级是几千年封建制度(包括半封建半殖民时期)的政治基础,改变这个土地制度,铲除这个封建基础,是一场十分严酷、激烈的斗争,是改造社会所必需进行的。对于令昭自己来说,这认识并不始于现在,而是在“过去”,这个“改造社会”的任务,自己竟能在党的领导下亲身去参加,去实践,这又是多么兴奋的一件事!不

过,参与以后,实际斗争却是艰苦、辛劳,又十分复杂和细微的。对于一个刚踏入社会的青年,考验是十分巨大的。首先,是她的弱小的身体。在下农工队之前,她说:“我现在只是没有病倒过而已,身体也不算太好,咳嗽、牙痛现在仍有,有时发发小寒热。但只要我不病倒在床上,这些我是不算病的。”第二,新专毕业参加土改的人,有双重任务,“除了群众工作外,报导工作是一件很吃重的责任。”她说:“当然要写好稿子,就是先做好工作,这也是没有问题的。”1950年10月信中说:“自今年开始至今,没有病倒过。七一八月中,工作之余写东西,晚上常到十一时以后才睡,有回把甚至到一时以后。”土改工作队的任务,开始是一个人负责一个组,后来为每人负责一个村(100多户)。工作量是不轻的,林昭没有叫过累。

斗争实践确实锻炼人。在农村工作第一线,令昭在政治上的成长,突飞猛进。“土别三日,刮目相看”,何况是参加翻天覆地斗争的一年。例如:秋征工作中,有同志感到“向人家要东西,有理也没理”。令昭不这样看。她说群众主动找我去开会,中心谈秋征。我强调“政府是自己的政府”,强调“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说明“合理负担和照顾贫户”,又大略算了算账,要他们村上自评,比比看谁应减免。问题就解决了。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有理也没理”。我们今天又不拿人民血汗来浪吃滥用,“我们还是为着大家的永久利益”。她对自己的日子怎样过?也有深刻的见解。她说:“下乡后学会了烧菜煮饭,只是我们也没有什么菜可煮,天天青菜粳米饭。吃腻了就把菜和在米里煮菜饭、菜粥。东西贵,难得打牙祭,往往连汤都倒干。这种生活我也过得了。每到夏天,老百姓整天吃玉米、青南瓜,我觉得还是过这样的日子好。因为心里平安,不觉得内疚或愧对人民了。”这哪里还能看出有“城里小姐”的影子呢?又如在土改工作中,太仓城

厢镇追缴地主隐藏的米粮,令昭告我,过去觉得“地主可怜、农民粗暴”,但到了现在我已能启发群众说:“政策范围内应拿出来,一粒米也不能少!”看到地主在人民面前的狼狈相,我心里只有“冷酷的痛快”。在“镇反”中,令昭又给我举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前些日子在(太仓)城镇,“五一”枪决了十多人,其中一个是我负责的街上的汉奸恶霸地主,我从收集材料,组织控诉,直到提请公审,是我出了一分力送了他的命。枪决后有些人不敢看,我是敢的,我是一个个看那些伏了法的敌人,特别是那个恶霸,看到他们这样死了,心里和直接受害的人民一样扬眉吐气。”这些,都足以证明令昭在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上,和思想感情上,是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已经是一位比较成熟了的革命者。还有,她在对领导农业生产上发自内心的感情,听了也很感人。她说:“台风综合年的农作物多少造成了一些损害,但还不算太厉害,棉、稻的丰收还是有望的。当第一次看到农民欢欢喜喜地把雪白的棉花提回家来的时候,我心里也觉得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们虽没有参加生产过程,但却参加了领导生产的过程,从号召扩大棉田,翻掉薄荷,条播,脱草,拔稀,摘头,打叶……一路下来,每一步都曾经过我们的鼓动,教育和组织,现在已经丰收在望,雪白的棉花收到屋里来了,怎不叫人高兴呢!尤其当想到这些棉花将保证千万枚纱锭运转时,更禁不得从心里欢喜出来!”这难道不就是一位称职的农村干部的心声吗?但她对自己的朴素的概括,只是:“一个革命工作者,最高兴的事,应该是完成任务,而一个群众工作者,在对待群众的教育起了作用,推动了工作之后,那应该是更高兴的。”这就是工作中的林昭。

1951年10月苏南区党委通知土改工作团回无锡集中,进行思想总结后另行分配工作。其中有几天休息,令昭回苏住在家里,并未来看我。却在11月中将“思想小结”草稿寄给我看,

嘱月内连同意见寄回。我如期按址寄去。她即分配了工作,但去何处再未告我,从此“杳如黄鹤,一去不回”。我理解她为何这样做,我虽怅然,但有预感,如果她没有“当初”(脱党),我们的友谊不会中断。我虽力挽“过去”(我们之间的友谊),然其“内心创伤”无法平伏,别人并无意,总感被“歧视”。林昭的去意决矣!

林昭和我的友谊,有人总感“匪夷所思”,究竟算作什么?今日,我已将她的书信公开,应不属“情书”之列。我和她是同学之谊、同志之谊。她已设防在先,不能逾越,也不可逾越。在我这边,自扞有自己的因素,也有外界的原因。二次拒我去见,也就不再追求,我们既是相知,又何能强求于人,就留下那断断续续五年的美好友谊,岂不是两全么!林昭有一条“哲学”,她说:“旧社会里认为异性之间无友谊,但这句话肯定的不适用于新社会,更不适用于革命队伍。”这条“异性之间友谊”的“改革主张”,我那时并不理解,曾向她提出讨论的意见,未复。她最后一信,终于答复了这个问题。她说:“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有什么感情是比同志感情更崇高美丽而又广阔无垠的呢?”这样,我终于明白,“异性之间”的友谊,便是“同志感情”,它可以超越男女的界线。这确是林昭的真意?她从此离我而去,保存好“崇高美丽的”同志感情于广阔无垠的空间。

林昭之死,卅一年前被《人民日报》披露以后,震惊了全国无数善良、正直的人们,激起了社会舆论对那个黑白颠倒的“疯狂年代”的强烈控诉和声讨!林昭的妹妹彭令范为平反冤狱,奔走呼号,历尽艰辛。据了解当杀害林昭时,“四人帮”直接掌握的上海公检法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但正确的意见并不能申张,遭到了打击,邪恶的势力却尽占上风,终于造成无可挽回的“冤案”。而在平反中,反对的势力依旧存在,主张杀人者仍居高位,

平反不可能彻底。近几年我国法制建设步伐加快,但对“林昭案件”真相,未见司法当局正式公布。林昭当年用磨光了的牙刷柄,刺穿了臂上血管所写的大量诗文与上诉抗争书等,久久被封于密室,不能公开。林昭所写,以及过去言行,究属香花还是毒草?真相何时能大白于天下?中国历史上,宋岳武穆,二代以后,不过廿年,洗刷“莫须有”罪名,立庙溢忠,昭告天下。而今林昭,衣冠冢埋于宋翰蕲王墓侧已卅余年,“四人帮”审判亦已十八年,何其“余毒”犹烈?现林昭妹妹,远去异国他乡,为求生存、发展,而拼搏在外,缺少人代为努力,以求彻底平反,伤哉!

值此建国五十年大庆来临,举国欢腾。我们在庆祝祖国复兴的今日,在怀念过去千千万万为建国牺牲的烈士,和为复兴中国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的同时,是不是也应当纪念一下林昭这样一位“小人物”呢?

我们不忘林昭,她是一位曾为铲除那封建旧土地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土地制度流过汗、出过力的可敬的革命干部,不忘林昭,她是建国初期为我国新发展的新闻事业,添过砖,加过瓦的优秀工作者;不忘林昭,她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是一位敢于向利用篡夺来的权力,实施封建式的现代“文字狱”,作决死抗争的英勇战士;更加不可忘记,林昭是热爱人民,热爱党,热爱祖国的光荣的革命战士。这可以从她早期的作品,以及以后的著述中,可以看到。她少有奇志要改造社会,改造国家,为了下一代的幸福,不惜自己的血汗,生命,她果然做到了这一点,是一般人所不能为,不敢为的。

最后,李璧莹从苏州来信,转告现在北京的杨原老同志(令昭在党时的直接领导)说的一句话:“林昭是比共产党员还要共产党的好同志啊!”这或许可算作她代表当时的党组织作出的“最后评价”。敬告林昭,你以你的生命,表明了自己,你不必再

“愧对江东父老”，你也可以说“我已经回到了党的队伍里”，我要向你讲许多话……你如泉下有知，也可以自慰和瞑目了吧！

最后，我还想呼吁上海的法院和主管部门，当你们看到这些纪念文字后，你们能否做些什么？你们既让人们知道林昭不是因反革命而死，那么为什么又不能公布其案情和她的被害真相呢？我还想对林昭的同学，朋友，师长和前辈们说，不管将来怎样，你们可否把林昭留在你们那里的遗墨或事迹，哪怕是点点滴滴，也贡献出来，集中起来，托一位林昭的挚友和亲人，曾经帮助过林昭，有力量的人组织这些材料，与有关方面联系，汇集这些材料。为死者争得永生！

1999.9.29. 写于杭州“贡院”

化作春风意更长

李虹岗

一、忆仓桥饯别

50年代春夏之交,苏南新专毕业同学各赴工作岗位,临行依依慷慨话别,正是充满革命激情的日子。记得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得知参加土改工作的同学即将离锡投入火热社会改革运动中去,我们在《苏南日报》工作的几个同学闻讯前往送别。工作团驻地在无锡西河头北岸一幢老式洋楼里。经过一段时期学习整装待发的土改战士,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时近中午,有人建议,明日一别难期再聚,不妨水酒小聚以壮行色,一致“乌拉”赞同。彭令昭更是兴致勃勃,喜形于色。于是我们一行来到中山路一家小面饭店,要了几碟饺子菜,打了几斤黄酒,畅谈痛饮,吞食阳春面而归。那时中山路与西河头间隔着一条城中河,河上架有一座拱形大石桥——仓桥。我们七八个少年行经其上,畅怀笑谈,两岸行人为之侧目。当时,最招人注意的是17岁的苏州姑娘彭令昭,不仅能大口饮酒,其性格之豪放,抱负之殷

切,大有“乘风破浪万里浪”之巾帼气概。她一路侃侃而谈,表示通过工作实践、深入生活,希望写出一部反映中国土地革命全过程的文艺作品。我几乎不相信眼前的彭令昭会是我们三班组内的那个女孩子。

那次饯别仓桥,让我回忆起往事:

1949年冬下乡时,我因护送家姊去上海治病,曾住在亲戚家好几天,心里还是惦记着生气勃勃的学校生活和热气腾腾的农村工作,真想能早日回到集体中去。堂弟上班了,我坐在他的桌前看书,桌而玻璃下压有几张好莱坞明星的画片。起初专注看书,也没在意。看着看着觉得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让我分心。我移开书本,原来盯着我的是玻璃下那位金发碧眼的好莱坞女郎。我摆下书本继续读我的书。奇怪,那双露在书本上端的眼睛还在那里望着我,好像曾在什么地方见到过,有些眼熟,可一时记不起来。

“这会是谁呢?”我干脆把书本推前,遮住女郎的金发,又用手掌盖住她的嘴鼻和下巴,只露出那双似曾相识的眼睛。突然一个熟悉的脸容跳了出来:“那不是彭令昭吗!”

新专开学初,我和彭令昭都编在三班。她爱好文学,年少而聪颖,是班里三位“小诗人”之一,人称“才女”。在她饱满而宽广的前额下,就是那双深邃而略带伤感的眼睛,时不时闪烁着难以名状的忧思,隐约含有一种不可言喻的超俗的气质。要不是我专注着眼前玻璃下那张彩照上的“阿堵”,一时还真品味不出来呢。但是除了眼睛,这个明星女郎就没有一点像我们学校的“才女”了。我想,如果彭令昭深邃的眼神来自她的灼知明见,那么她紧抿的嘴唇和较深的鼻翼沟,则显示了她深沉和固执的性格。旁人很难想像,在她紧闭的嘴唇内会喷发出什么惊人的话语来。小彭的两颊有浅浅的笑靥,却常常含有一种漠然、不屑、甚至讥

讽的笑意。

我又将视线投到桌前那深邃而忧伤的眼睛。眼前出现了三班为庆祝“八一”而排演节目的场而。当时三班女同学编排新疆舞蹈“雅萨松”，她们拆下自己的被面，缝成舞裙，扮演维吾尔族少女，在三班后厅排演，让大家提意见。彭令昭也参加演出，在四名演员中数她个儿小，她披了件红绸被而，在鼓笛声中唱着舞着。但是她的眼神总是流露出淡淡的忧思，尤其唱到为了爱情宁愿以死相殉的词曲，“你不答应我要求，我从克萨喀河跳下去！”她的神情益发低沉哀怨了，舞姿也变得恍恍惚惚，不由得让人产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的戚戚之情。

“她可能成为诗人，但当不了演员。”当时我想。

真没料到，那次饯别仓桥的彭令昭，竟是如此的果敢、豪放，富有抱负。眼前的她，分明是“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那神采熠熠的形象。那是个革命的年代，满怀美好的理想，以天下为己任的青年，在这激动人心的日子里，瞬间饯别，只是征程的开始，义无反顾。

待日后新专校友重聚惠山故园，岁月已流逝 30 载，哪知仓桥之别，竟成永诀。

二、化作清风意更长

彭令昭同学是 1957 年在北大被定为右派，于文革中以“反革命罪”被四人帮枪杀于上海龙华的。

1979 年 7 月 1 日，历经沧桑阔别 30 年的苏南新专部分师生聚会惠山，携上海倪竟雄等来无锡的还有彭令昭的胞妹令范。那时“四人帮”虽已打倒，但令昭冤案尚未昭雪，与会校友而对瘦弱伶仃、面容苍白的令范，视同自家妹妹一样备加眷护。为了避

免引起她的伤感,我们尽可能不在她面前提及令昭在校时的往事,也不打听有关她姐姐冤狱的事。在寄畅园喝茶时,倪竞雄悄悄向我们吐露她仅知道的一些令昭在狱中的情况,稍语辍止。这更增添了我们对这位貌似令昭孤身单影女士的哀怜。午间,我们在城中迎宾楼进餐,同学纷纷向令范女士敬酒,表示慰藉。这时她才稍宽容颜。

1980年12月,新专、北大、人大部分师生在北京为林昭举行悼念会。不久新华社发表《历史的审判》评述,文中赞颂林昭是位“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她“由于不愿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了上海的监牢,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形式,表达了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其后,林昭生前诗作相继在新专校友会刊上披露,其中写于1958年除夕,题为《悲愤诗》的长篇寄给校友羊华荣,内有“平生磊落魏奇气,化作清风意更长”两句。羊认为是林昭一生的写照,也是她自撰的墓志铭。

1984年5月,新专师友近百人再次聚会惠山,且乘艇游览太湖,彭令范也应邀前来。这时林昭已平反数年,令范也在痛苦中挣扎过来,脸颊较前稍滋润,且露笑容。行驶在太湖上的“梁溪号”,伴着白发同窗的欢言笑语破浪前进。令范谛视着飞溅而起的浪花似有所感。事后她给新专校友寄来了诗篇,题目是《代林昭寄语》:

我化作浪花
伴送着你们的笑语,
得到了慰藉。

我化作小草
跟随着你们的足迹，
我长遍天涯。

我化作清风
在你们身边轻轻地说着悄悄话：
“……祝你幸福！”

我化作泥土
融化在我挚爱的大地。
我是爱你们的，
可是……

林昭妹妹彭令范 1984 年 5 月 20 日写于太湖“梁溪号”上

又过了 5 年，1989 年 10 月，校友再一次聚会无锡，当人们乘“湖州号”向湖心三山驶去时，忽然一阵风起，清凉的湖水飞入船舱，亲吻着人们的脸肤衣裳。这时，倪竞雄双手蒙脸向着太湖风涛喊道：“令昭，令昭，你来啦！你来看我们啦！”泪水从指缝间滴下，闻者酸鼻。想起 5 年前林昭胞妹令范作于湖上的诗句“我化作浪花，伴送着你们的笑语”，我不禁也心潮涌动，涕泪欲滴。可不是吗，万里碧空有林昭英灵与清风共存。

那时彭令范已自费只身赴美攻读老年医学，并于 1988 年毕业于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获硕士学位。由于成绩优秀，她的名字被列入全国大专院校《名人录》，这是美国大学生的最高荣誉奖。彭令范还将作于 1984 年清明节前的一滴《鹧鸪天·回忆》译成英文发表，获得全美大学生诗作竞赛特奖。其词云：

数尽平生事事哀 黄昏烟雨怯重来
身随柳絮丝丝散，心共熏香寸寸灰。
清楚断 意徘徊 故乡明月冷苍苔
无言剩得钟声起 万念侵寻暮色催。

癸亥年清明前作

这首词很可能是令范赴美前去苏州灵岩墓地向亡姐告别而作。如果你身临其境：柳丝依依，墓草青青，烟雨黄昏，寺钟声，亲人皆作古，孤女独远行。这等情景，何以忍得！

1987年4月，倪竞雄来无锡，听说我保存有《新记者》，为收集林昭生前笔墨，特来访我。今检当时日记，大意有“倪竞雄来访，要复印《新记者》，她对令昭的友情是很深的，打算实现令昭生前的愿望，为她遗世的诗文、书信和日记出书，将以‘自由集’名义。倪竞雄认为，令昭是个革命理想主义者，她总是从更高的层次来探索事物的奥秘。她在痛苦中深思探索。从囚牢窗格中看蓝天，可能看得更远更深，辨得更清晰，解剖得更细腻。令昭是个历史跨度很大的时代女性”。

1988年5月，校友聚会常州。时令清明，又值林昭殉难20周年，会后校友十数人相约赴苏州灵岩祭扫林昭墓，并将他胞妹令范取得的成就告慰亡灵。事后倪竞雄又将扫墓照片寄海外令范，以慰思亲之念。倪说“令范有与林昭同样的聪明和坚韧的毅力。她的家庭遭遇误了她的青春，她是在拼命追回那失去的岁月。令人感奋。”

三、新世纪的榜样

又是十年过去了。当纪念“北大”建校100周年之时，《今日

名流》刊出一篇纪念“北京大学优秀儿女”的文章，题目为《姐姐，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撰稿人彭令范，时值林昭牺牲 30 周年。

令范在文章结尾时写道：新世纪的宠儿们，当你们沐浴于阳光灿烂、欢乐充盈的新时代，是否会留下神圣的一角来悼念林昭“未完成”的杰作呢？

一切认识林昭的人，请在你们繁忙的生活中留下几分钟来悼念她吧。她是爱你们的，这种爱，我认为远远超过我们姐妹之情。在我失去姐姐之后，感谢你们把我当作你们自己的妹妹一样。当我第一次听到姐姐的新专同学陈祥荪对我说，令范，林昭已不在，而你是我们大家的妹妹。我听了是很感动的。

无论生活多么不公平，无论人性多么险恶，那一道人性至善、充满希望的圣光永远存在。

姐姐，安息吧。

读了以上文章，让我再一次回味《代林昭寄语》的诗句：“我化作泥土，融在我挚爱的大地上。我是爱你们的，可是……”并由此记起捷克进步新闻工作者兼作家尤利乌斯·伏契克在他《绞刑下的报告》中呼喊：“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

如果说 1979 年 7 月 1 日初聚惠山得悉林昭殉难，校友的心情是悲痛而压抑的，那么 1981 年听了北京追悼林昭的现场录音，悲痛的泪水终于溢出了眼眶。如果说 1981 年《历史的审判》歌颂了一位“勇敢的南国女性”，使我们在悲痛之余为有这样的同学而倍感自豪，那么 1982 年仲春教育长罗列同志南下沪宁苏锡常与校友同学推心聚谈，当年美好的理想和亲密的情谊又将大家凝聚在一起。这可以林昭生前的道白为证：

“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与之比拟。”“啊，大地！祖国的大地，您的苦难可有尽期。”“……将

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血向热爱的自由献祭。”

热爱祖国,热爱自由,这就是林昭为我们树立的榜样,这也是新专同窗友谊得以持久的精神力量。这些年来虽然有些我所相识的同学已经离去,却难以抹去留在我心头的思念。

不可多得的才女——林昭

顾 康

1960年10月,正在浦东红桥老家养病的小哥顾雁,突然以什么“反革命”罪被公安局逮捕了。这凶讯传到上海家里,我们全家亲人如闻晴天霹雳,无不感到震惊和困惑。不久公安局又来我家搜查,虽然什么证据也没有抄到,但我们从他们口中获悉,说我小哥顾雁在老家印刷“反动传单”,一架油印机也被没收。在我的印象中,专注于物理学研究的小哥顾雁,同“反革命”三个字无论如何也联系不起来,他会印什么“反动传单”呢?我和我父母及大哥顾鸿谁也想不通。

及至1962年早春的一个午后,我家亭子间门口突然出现一个年轻陌生的女子。她梳两条辫子,穿蓝白相间花棉袄,脸色虽苍白,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因为自从小哥被捕后,我们家连平时往来的亲朋也不再往来,所以看到她不禁一惊。她旋即向我和我父亲自我介绍叫林昭,是我小哥顾雁的朋友。其时我要上班,由我父亲接待了她。当夜我从父亲口中知道林昭来访所谈的情况。原来她是被捕入狱后保外就医的。所谓“反动传单”,是写给中共各省(市)委书记的一封油印公开信,主要内容是为

共和国元帅彭德怀在 1959 年庐山会议遭到不公正批判、罢官鸣不平,呼吁中国共产党人正视“三面红旗”下的贫困和灾难,认为“大跃进”是反科学,否定彭德怀“万言书”是否定事实,也否定科学、民主,并由此提出“还我民主,还我科学”等口号。我和我父亲总算明白小哥顾雁出事之由来,而回味她的话又都很惊奇。她给我父亲的初次印象极深,我父亲说她有思想,有才气,有独立人格;但也为她忧虑,说她生不逢时,空有一片报国心,“鸡蛋碰石头”,很危险。

从此以后,林昭常来我家做客,我和我父亲,还有大哥顾鸿都喜欢听她对当时一些社会现象发表评论,从中透露出的忧国忧民的情感非同寻常,我们越来越觉得她是一位热血青年,急于想改变祖国命运的新女性。尤其是她讲到在法院审讯时同法官辩论“反革命”的概念,大胆地提出“到底谁是反革命”的反问,并分析论证等,我们听了很有说服力。后来,林昭将她写给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的万言书和她平时写的一部诗稿,要托我父亲暂时为她保存一下。她在万言书上,从追溯我小哥顾雁的母校——北大是“五四”运动的摇篮,具有讲科学、民主并为之奋斗的光荣传统,写到陆平作为北大校长的神圣职责;面后对北大当时压制民主、不讲科学的种种问题进行论说,并提出责问等。我从她流畅的文笔、激昂的言辞和敏捷的思想中感受到,她不仅很有胆识,而且很有才华。诗稿上的诗,大多是她面向现实人生的有感而发,且辞采清新,情感炽热,在对现实的不满中让人触摸到她一颗憧憬未来炽热的心……我们都很同情她,敬佩她,因此也更担心她的安危,经常替她捏着一把汗。然而她自己却不屈服也不畏惧,曾几次三番打好包裹去公安局门口要求入狱,不让进还静坐,每次都由她的母亲和妹妹强制领回家的。她说真理在她这一边,不怕将牢底坐穿。

林昭来我家总要问起我小哥顾雁在狱中的情况。当时此案迟迟未判,还处于拘留阶段。我们除了每月收到上海第二看守所一张送物单和我们去为小哥顾雁送一次物品外,狱中情况一无所知。有一次,她特意将自己平时用的一枝原子笔夹在物品中送进狱中,说我小哥顾雁见了会明白的……她见我父亲患有严重哮喘病,也很关心体贴,把自己省下的定量供应的糕饼券、糖票等送来。我父亲发病时也忙着敲背、倒茶、递药等。她对别人富有同情心、爱护心,是个热爱生活、向往幸福的知识女性。

这年夏天,我父母去浦东红桥老家歇夏期间,林昭仍来我家时由我大哥顾鸿接待。我大哥性格内向,他内心对林昭的思想、言论和才情异常赏识、赞叹。因此林昭入狱以后,我们久久不见她再来我家的日子里,他竟会不声不响地给法院寄去一本当时家喻户晓的书,就是古巴的卡斯特罗在狱中写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单印本,并用红笔将书中“无罪”二字划出来,以示林昭和我小哥他们都是无罪的人。我本人也为林昭和我小哥他们不平,在日记本上写了几行字。后在“文革”中都遭了殃,我和大哥都被打成了“反革命”。

1963年7月18日,家里来了个不速之客,叫张茹一,看上去还是个20岁左右的小姑娘,自称“林昭难友”,我们接待了她。起初她常常向我借书、借钱,还讨旧衣服等;后来又神秘地问我“大哥好吗?”“大哥那里最近有什么情况?”等等,我误认为她是问我大哥顾鸿,以后还继续问,问得我莫名其妙,我才意识到她问的“大哥”是别的什么人了。当时我大哥顾鸿感到她来历不明,叫我别再理她。直到1966年“文革”扫“四旧”,我母亲想起林昭曾有只空纸盒托管的事,便拿出来处理,在撕开时发现底部夹层有一张叫张春元的二寸照片,反面有林昭写的“大哥你好”等文字,我才知道当初张茹一所问的“大哥”是谁了。

“文革”结束后,我和我大哥顾鸿、小哥顾雁都先后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却惊悉林昭已在无法无天的十年浩劫中被枪决的噩耗,我们都非常难过。她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洋溢着青春的热情和智慧,是个有情有义的未出嫁的姑娘;她为真理而奋斗终生,大义凛然,至死不屈,是个无私无畏、敢想敢为的战士!正如我父亲生前所称道的:林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才女……

1999年8月 写于上海

流芳千古

——悼彭令昭同志

李茂章

我和彭令昭曾经两次在一起工作过,那都是在解放初期。一次是在1949年的秋冬时节,我在无锡塘头镇任指导员,令昭则是苏南新两专科学校三班的学生。三班学生被编入无锡农村工作团五队,由胡子衡带队来到塘头镇,令昭同志就在其中。一次是在1950年5月起到1951年的年底,都在苏南农村工作团一队(后改十一队)。1951年的5月初以前,我们又同在太仓八里乡一个工作组搞土改。

1949年的秋冬在塘头镇主要是搞反霸、秋征工作。那时刚解放不久,经济困难,群众对新政权还并不十分了解,加上敌情、匪情,形势相当复杂,任务繁重而紧急。我们镇政府设在严埭街上。彭令昭大概是负责严埭街附近的某一个村。记得她相当一段时期内是住宿在严埭街上的。胡子衡的队部也设在严埭街上,所以她和胡子衡及我有较多的接触。当时她给我的印象是,人生得清丽,风度飘逸,一口吴语普通话,善谈。话语风趣而又往往尖刻犀利。头上扎有两条和她的人一样清丽的而且非常相

配的辫子。与人交谈时,偶尔也在开会时, she 会把原本无须再编扎的辫子在末端附近弄开来,再慢慢地编扎起来。微歪着头,扎了这边的又扎那边的。悠然自若,边谈笑边编弄着。说不上这是她的习惯还是对她的辫子的偏爱。她对工作是相当负责的,也很会做群众工作,与同志们也都相处得很好。她很善于和人交谈,在交谈中又往往会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可从未见过发生面红耳赤的情况,总是在争论中伴随着阵阵笑声。这种争论不分对象,她和我、她和胡子衡都有过。她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说违心话,从不随声附和。当时我就知道她是苏州景海女中毕业的。据说这是一所有名的教会学校。彭令昭除了在某些方面不善于照料自己的生活外,在她身上看不到有任何名门闺秀通常会有的那种娇骄之气。

1949年12月13日,新专工作队三十多人在下旺村集中学习几天后,结束塘头镇的工作,返回新专学校。临行时,群众放鞭炮、敲锣打鼓地热烈欢送。新专学生们唱了一支又一支歌。依依惜别之情难以言表。因为镇里任务忙,所以只有我一个人代表党组织和政府去送行。眼见此情此景,我频频挥手,目送载满新专队员和当地群众结下的无限深情的船渐渐远去。

说来也巧,我在苏南党校学习结束后,被派到苏南农村工作团吴县团一队工作,想不到彭令昭也被派到一队,一队到太仓时又改为十一队。1950年年底,我们又同在太仓八里乡工作组里搞土改。这个工作组有近十号人,有部队里来的,有农工团的,有文工团的,也有当地政府的。当时我是工作组的副组长,彭令昭是组员。组长是由部队来的一个连指导员担任的。八里乡是太仓的近郊乡,乡的河对岸是昆山县境内的一个海匪窝点。本地宗教势力很强,信奉天主教的人很多,所以群众很难发动。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同心协力,分工合作,依靠广大群众,经过耐心

细致的工作,群众觉悟渐渐提高。镇反中镇压了一个恶霸,顺利地完成了土改和参军工作。彭令昭继续保持过去的那种对工作高度的负责精神和刚柔相济、风趣中透着原则、平凡中蕴含睿智的风貌。有一件事使我始终难以忘却。大致在1951年3月下旬到4月上旬,土改已按计划进入划分阶级成分的关键阶段,麻烦事发生了。上面说过,当地很多群众信奉天主教,我们工作组就住在教堂里。那神父过一阵就坐着相当高贵豪华的小船来到教堂传教做礼拜。这神父一来,教徒们都去拜望他,把最好吃的东西供奉给他。做礼拜的时候,教堂里坐满了教徒,一个个顶礼膜拜,那虔诚的劲儿,真令人惊叹不止。经常是神父一到,那些教徒们听神父的,不听我们的。我们要开的会开不起来,把我们的工作计划都打乱了。我们工作组真是恼火却又苦于没什么办法。有一天,那神父又在教堂领着满座的教徒做礼拜。工作组里从部队来的几个同志耐不住了,就在教堂外的走廊里,拿起枪朝天乒乒乓乓地乱打一气,打了一阵又打一阵。更恼人的是任你怎么打枪,那些教徒们纹丝不动。工作组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几个人就指桑骂槐地乱吼一气,一心要把做礼拜活动给搅掉,可惜无济于事。做礼拜结束,那神父出来说话了,他不卑不亢,不温不火,矜持而文静的背后带有几分傲气。其大意是说:开国的《共同纲领》是你们共产党和各方人士共同制订的大法,上面写明人民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你们今天的这种作为是违反《共同纲领》的。这神父大概吃准我们这些工作组的人全是“土包子”,肚子里没什么墨水,不懂得《共同纲领》里写了些什么,所以他只要把这大旗一拿出来,就会把我们困住或镇住。他估计对了,但也估计错了。比如我在党校专门学过《共同纲领》,但重点在政治、政权和经济政策等方面。对于宗教政策则碰也没碰过,所以确实给懵住了。为什么说他又估计错了呢?因为工作组人

员中,不全是“土包子”,也有“洋包子”。在神父得意地结束了他的话语后,彭令昭说话了,其大意是:《共同纲领》上确实写上了人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内容,是不能违反的。但最近中央有通知,为保证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凡是正在进行土改工作的地区,一般宗教活动应该停止。现在你们的宗教活动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土改工作,此等后果对你来说,将意味着什么?!这一席话,说得人情人理,说理中透着几分震慑。彭令昭说话向来不饶人,何况在这种场合。这完全出乎神父的意料。他一句话也没说,迟疑了一下,就走了,直到土改结束,再也没见他来过。彭令昭的这一席话,把我们工作组员们心头窝足了的急躁、恼怒和无奈,一扫而光,可以说是扬眉吐气,精神大奋。彭令昭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聪明才智,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大致在5月上旬,八里乡土改结束,我被调到队部任组织干事兼团支部书记。彭令昭则调到东古乡工作。在这期间,有一件事记在我的日记本上,也记在我的心上。1950年,随着土改工作的普遍展开,在土改工作队员中,有些人的家庭被划成剥削阶级成分,甚至有的家庭成员中有的被斗、被捕。土改工作本身就是一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所以组织上特别强调工作队员都要在认识上、行动上站稳阶级立场。这是当时形势所必须的,但这对彭令昭来说成了一件非常非常为难的事。由于种种原因,在一段时间里彭令昭的阶级立场问题成了全队瞩目和议论的热点。在我的日记本上记着:6月5日我去六里乡和黄国梅商量6月份的团工作计划,但后面拖有一句话“看来彭令昭的立场问题,要在全队讨论了”。这说明在这个时间里彭令昭的立场问题已闹得相当大的了。6月6日,我和队长祁文雅一起来到彭令昭工作的东古乡,召开全组工作人员会议。会上邵游、张锦明等表示了一定要站稳阶级立场的坚定态度,大家也都七张八

嘴地发了言。令昭和大家心里都明白：今天的会议主要是冲着她小彭来的，因为大家知道彭令昭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县长，她的母亲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大概彭令昭面对如此家庭情况没有像众人那样有“一定划清界线，站稳立场”的鲜明表态。在当时那个大气候中这种态度那还了得，简直是“顽固不化”。在这个会上，彭令昭面对重重压力，一直不开口。现在才知道，彭令昭纵有千百张嘴也很难说得清。要说真情，势必招来更猛烈的抨击；不说呢，谁能饶得了她。彭令昭偏又是一个不肯饶、不肯躲的人。终于她开口了：“我不明白，站稳立场就一定要与家庭断绝关系！”这就招来一个接一个的批评。这一下彭令昭挺不住了，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这一哭倒把会议气氛缓和了下来。之后，队长祁文雅和我也发了言。会议结束，彭令昭找我，说自己如果写信给家中要他们有什么问题向政府说清楚，这不行吗？非要断绝一切关系才叫站稳立场！我对她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你和家庭通信，通的什么信，你能说得清楚吗？不如暂且不问。她对此不置可否，虽然以后再也没有搞过彭令昭，但对彭令昭的打击是相当大的。据倪竞雄同志介绍，她的父亲是一个在其任职当地名声很不差的国民党中的好县长，她的母亲是银行家、国民党的国大代表，但她与我地下党有着长期的联系并给予相当多的帮助，彭令昭对此不会一无所闻。彭令昭又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她深知同志们只知道其父母的反动身份，要她表示站稳立场是合乎情理的，但在彭令昭的逻辑里，所谓要站稳立场、划清界限，其客体必须是阶级敌人，而要她把她的父母当成这样的对象来对待，既违背事实，也违背自己的良心。她天生不肯随波逐流，跟着大伙说些时髦话去迎合某种气候。在那个时候，一般工作队员，也包括我，明知自己家中没问题，也会在会上表示一下自己的坚定的阶级立场。当然，在句子前要加一个诸

如“假如”、“如果”等这样的词儿。独独彭令昭不这么做,为此她的态度问题弄得全队皆知,一度几乎成为众矢之的。即使在重重压力下,她也不肯作丝毫的让步。她的这一性格(应该说是品格)在以后“左”得发昏的年代,招致人生的极度坎坷,最后竟然倒在“四人帮”的枪口下,这就不足为怪了。她的一生是不幸的,就她的人生遭遇来说,人们都为之愤愤不平,并为之洒下同情的泪水。但这不是基于某种人道的考虑,因为从本质上说,彭令昭同志是一位深受人们敬佩的伟大的女性。我写了一首七律,以表述对她的缅怀与景仰:

韵飘秀辨冠才思,谈笑吴音飞妙辞。
桑径探孤欢夜月,柳桥退祟震晨曦。
肝义皎皎昭天地,傲骨铮铮惊魑魅。
青冢长眠应不憾,英名千古唱芳碑。

今日红花炭

——忆林昭同志

钱惕明 史洪 叶强 王润

“这是一个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名叫林昭。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了上海监牢……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80年1月27日，当我们读到穆青、郭超人、陆拂为写的《历史的审判》长篇通讯中的这段文字时，勾起了阵阵悲痛，林昭同志纯真坚强的风貌浮现在我们面前。

1949年党的生日那天，在惠泉山麓的苏南新专里，我们相识了林昭同志，那时她名叫彭令昭，毕业后一度分手。1952年桂花飘香的季节，我们又与林昭在《常州民报》相遇了。民报结束后，她调常州市文联工作。不久她考取北大新闻系，与我们分别了。我们盼望她学成归来，再共同战斗。谁知这次分别，竟成永诀。

她是苏州人，早年受其舅父（牺牲在雨花台的烈士）的影响，向往革命。一解放，她主动投身革命，跨进苏南新专。虽说她是同学中年龄较小的一个，但她文思敏捷，才华出众。篇幅短小的

新专纪念册上就选录了她三篇文章,赢得了新专女才子之称。虽说她当时对革命还知之甚少,但天真无邪,热情奔放,不久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虽说她与同学们初次相识,但她心地纯洁,以诚待人,不少同学亲昵地唤她小妹妹。那时,校园里无处不春风,相互信任,彼此关怀。领导信任学生,学生信任领导,同学之间亲密无间,赤诚之心近乎天真。大家常常散步于黄公洞边,休憩于二泉之旁,攀登上惠泉山顶,或倾诉美好的愿望,或提醒彼此的缺点,或争论学习问题,或商讨今后工作。谁能想到,当初很有希望的“女才子”、讨人欢喜的“小妹妹”,会在十几年后受到“史无前例”的恶遇!

彭令昭同志在常州工作三年多,其中将近两年时间是在《常州民报》度过的。当时,民报是家私营报纸,有几个新专同学和另几个同志,奉党组织之命前往工作。大家牢记着“我们是党派来的,要宣传好党的主张”。当时年方二十的林昭同志努力实践着这一信条。她爱读书,勤工作,喜写诗歌和通讯。她担任副刊编辑,精心编辑来稿,积极撰写诗文。最近,我们翻阅了残缺不全的《常州民报》,找到了她仅用林昭、小昭、高翔等笔名发表的通讯、诗歌、相声就有41篇。党颁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她在接连写的几篇通讯中,热情歌颂群众——《在总路线的阳光照耀下前进》、《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她深入工厂,和工人交朋友,民丰纱厂(常州国棉二厂)是她常去采访的基点。她是比较全面介绍全国劳动模范徐建华的一个记者,和工人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她的篇篇诗文,无不表达了自己爱党爱社会主义、爱革命爱祖国、爱工人也爱领袖的热忱和坚强信念。这大概是她能在“无法无天”的“发疯”年代里,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的缘由吧。

在民报时,林昭同志很瘦弱。她本来身材矮小,加上这瘦弱

的形态,显得更小样了,像个小女孩,可她待人处事又是那么能干老练。她嘴角常常带着微笑,短小的发辫上结扎着两朵白花(为纪念斯大林逝世),身穿花格布上衣,又常常肩披外衣,轻声细步地踱来踱去,那形象宛似惹人喜爱的“小花猫”。尽管她嘴巴不饶人,好与人争论,不轻易放过别人的缺点错误,但她尖锐的批评总是伴随着微笑进行的,给人以坦率、纯真之感。我们常常同她开玩笑:“小猫,今天吃到鱼没有?”说完彼此哈哈一笑。笑声里洋溢着信任,寄托着希望。今天,我们悼念林昭同志,仿佛又听到了她那爽朗的笑声,又看到了她那嘴角的微笑。

遗憾的是,林昭 1954 年离常去京后,我们没有与她联系。1957 年,风闻她遭到了不幸,以后再也没有听到有关她的任何讯息。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传来了关于她在上海被害的消息,但只是片言只语,情况很不清楚,数不清的悬念涌上了我们心头:她为何遇害?在狱中的表现怎样?怎么死的?能平反吗?何时开追悼会?

终于,这一天来到了。1980 年 12 月初,我们接到在宁同学转来的苏南新专、北大、人大部分师生悼念林昭同志筹备组的来信,说林昭的冤案已平反昭雪,定于 12 月 11 日在京举行林昭同志悼念会。我们心潮翻滚,立即去了唁函。悼念会后不久,新专在沪同学代表倪竞雄和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在由京返沪途中,来常为我们放了追悼会录音。得知林昭在京的老师、同学和各地专程去京参加悼念活动的同学有 80 人,悼念筹备组还收到了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京、杭州、广州、梅县、长沙、兰州、哈尔滨、长春、成都、乌鲁木齐、太原、银川、盐池等地同学的唁电唁函 30 多份,挽联和挽诗 30 余副(首)。作协江苏分会的新专同学高晓声、陈椿年等撰写了挽联。从录音中,我们听到了前苏南新专教育长、人大新闻系主任罗列同志致悼词的声音,也听到了全

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前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同志、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罗青同志和其他十几位老师、同学的发言,他们都回忆了林昭献身真理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林昭的妹妹告诉我们,由于无法得到林昭的骨灰,追悼会上只安放了林昭的遗像、她在狱中用血写的一首诗以及她生前留下的一束头发。据说,林昭入狱后,一次一次的审讯,无穷无尽的折磨,都没有使她屈服。她用记日记、写诗文等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不给笔墨,她就划破了手上的血管用鲜血书写,两手血痕斑斑,写了大量的血书。当时,有人对她说:你只要承认一句自己错了,就可放你出去。她回答道:“不,我没有错,决不向邪恶低头。”她年迈的母亲知道女儿凶多吉少,噙着泪水劝她:“孩子,你就认个错吧,不然,他们会杀死你的。”林昭回答:“我怎么能认错!认错就是投降,认错就是叛变,我没有错!”她临刑前不久,一位与林昭亲近的同志冒着风险去探监。林昭嘱托他说:“他们要杀死我。我死之后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请将我的诗文、书信搜集起来,出三个集子:诗集名《自由颂》;散文集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名《情书一束》。”她明知死亡就在眼前,但为了坚持真理,宁可带着“顽固不化”的枷锁走向死亡。

虽然林昭被害的详细经过犹待进一步查清,但在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中,作者已把林昭与被割断喉管送上刑场的张志新并提。林昭与张志新都是死于林江反革命集团的屠刀,经受了相似的磨难,属于同一类型的英雄。

悲痛之余,我们告慰林昭英灵,你所日夜呼唤的“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的真理,人民已用实践的标准进行了检验,获得了回答。你所舍身追求的“他日红花发”的伟大时刻已经来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先烈们血润的红花,今日已蓓蕾满枝,即将在神州大地上千枝竞发。

林昭二三事

陈叔方

在苏南新专时,林昭的原名是彭令昭,我和她都编在三班四组。那时学习空气很民主,大家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管对的错的,都说出来讨论。林昭思维敏捷,常常发表一些独到的见解,容易引起争论。争论起来,她轻易不肯饶人。因为她待人诚恳、热情,年纪又小,大家也乐意同她争论问题。记得在学完一个单元后,每人都要作个小结,然后全组人人发言,开展批评,最后集中起来,形成小组意见。对我的小组意见是由林昭执笔的。只见她一边听大家发言,一边在一个小本子上划杠杠,大家说完了,由她归纳。她写的小组意见文字不多,但说得很多。她联系我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参加革命的动机(这些都是自己在小组会上如实讲出来的),着重批评我的缺点,说到我的生活态度是“玩世不恭”,说完这四个字,还抬头看了我一眼,那意思是: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不服气吗!像是等着要同我开展争论似的。其实小组讨论时,并没有人说我玩世不恭,这明明是林昭的“发现”,心里确实有点不服气。不过那时我也很年轻而又幼稚,对人对事很任性,一有看不惯,机关枪迫击炮一起来,

讲话没有轻重，早就有同学说我自由散漫、遇事随便。如此看来，林昭提的意见还是有帮助的，至于是否重了一点，既然是玩世不恭了，也就无所谓了。小组意见就这样通过了。我本来对林昭印象一般，至此，我才对她刮目相看，感到这位女同学很有点辣椒味，蛮厉害的。

新专毕业，我们先后分配到常州市工作。当时常州没有党报，有家《常州民报》，是私营报纸，市委派了一些干部进去工作，其中新专同学有林昭、钱惕明、叶强和我。我们都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都想把报纸办好，不辜负市委的希望。报社党支部只有四名党员，我们都是团员，也帮助党支部做一些政治思想工作。这方面，林昭做得更好一些，她主动接近几位青年，和他们交朋友，谈思想，她常常把了解到的情况同我们交谈，商量如何做好思想工作。在工作中，她能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爱憎分明，富于正义感。有一次，我们一同去店员工会会堂，参加一个处理小业主虐待学徒的会议。到会的人很多，那时“斗争哲学”尚未盛行，会开得很民主，主持会议的领导同志当场调查事情经过，小业主能说会道，为自己掩饰，面问到学徒工时，他显得很紧张，表达不清楚，处境窘迫，会场有些乱。林昭很着急，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了个条子给主持人，意思是要他站稳工人阶级立场，不要把矛头错对了受害的学徒，并且径自交到主席台上。那位领导同志看了林昭的条子，点了点头，很快扭转了局面，支持了学徒，正确地处理了这个案子，会议开得很好。我当时就很佩服林昭的勇气和责任感。

又有一次，林昭经过我们的办公室，我们正在议论近来解放军的坦克几次经过市区，把路面压坏了，社会上有些反映，认为解放军坦克不应开进市区。林昭听了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对解放军的不敬。这时，窗外传来隆隆的马达轰鸣声，林昭坐在临

街窗口的位置上,她站起来转过身去,我也站起来向窗外望去,原来是一队解放军军车,拖着大炮经过街面,一群孩子欢叫着跟在后面跑,送走一辆又跑回来再送一辆,车上的解放军战士也挥手向孩子们打招呼,街道两边还有许多行人驻足看热闹。林昭站在窗口,全神贯注,观察这个动人的场景。她掏出小本子,飞快地写了一首诗,塞给我看了,主题是战争与和平,军人与孩子,是歌颂解放军,歌颂和平的。就那么几分钟,她写出了充满激情的诗句,我很惊叹她的敏感和文采。后来,这首诗在副刊上发表了。

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时间可能还早一点。那时我们单位的办公室在河边的一幢旧式二层小楼上。是个盛夏,饭后尚未上班,天气很热,林昭来了,穿了一件白底蓝花的连衣裙,很好看的。我说,你这件衣裳很别致呀!她淡淡地一笑,说是自己裁剪的。说完,她脸色沉重下来,告诉我新近发生的事:她在一个工作组,好像是在工厂工作,一次开会,她对工作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受到领导的指责,林昭不服,争论了一番,那位领导发动对她进行批判,林昭一气之下,退出了会场,那位领导竟然下令叫几位男同志强行把她架回,继续批判。对这样蛮横、粗暴的做法,林昭是难以忍受的。她一边说,一边流泪,哭得很伤心。我不知道该如何劝慰她,只是绞了一把毛巾给她擦眼泪,默默地听她讲。后来我说,你其实不必为此认真,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看待,就会理智一点。看得出来,她对我的说法并不同意,但又似乎发现了我的不安,反倒平静下来,坦然地说,没有关系的,我说过就算了,自己会处理的。我很内疚,她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我竟不能对她有半点帮助。我送她下楼,望着她离去的背影,体质如此单薄,而性格又如此倔强,我真担心她以后会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

往事如烟,许多事情记忆已经模糊,只这几件事,还算清楚。林昭离开常州以后的事我了解得很少,只知道她遭遇了不幸,并未看到详细的记述。就同她短时期的接触,给我的印象,她是那么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以至于容不得别人说半个不字;她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大胆地干预生活,而且义无反顾,并不考虑个人得失。在那个风雨年代,我们不少同学遇到不少坎坷,但一路跌跌撞撞,终于闯过来了,为什么偏偏容不得林昭?!几年前,倪竞雄来镇江,我们又谈起林昭,我说,假如林昭不到那个“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的北大校园去,还是留在常州工作,常州的同学多,大家劝着她点,护着她点,也许悲剧不会发生。竞雄不同意我的“假如”,她说,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过程中,不论在哪里,林昭都是在劫难逃的。

历史是不能“假如”的,但我想,假如我们的干部、知识分子都能多一点林昭的那种正直、真诚、正义和无私无畏,那一场灾难即使不可避免,至少也不会那么深重!

林昭的欣慰和遗憾

羊华荣

我与林昭在苏南新专和北京大学两度同窗,1957年在北大同被划为右派。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处境,我们自然地成了相互同情、相互关怀的朋友。1957年冬天,当时北大反右高潮已过,学校将放寒假,校方对右派的监管相对有所放松,这就使我们有了一些自由活动的机会。林昭是北大知名的右派之一,她的行动易被人注意,故我与林昭相约,每天黄昏在校外相见。我们有时相约在颐和园或圆明园遗址,有时相约在僻静的小酒店里,但大都相约在附近的田野中。北京的冬夜很冷,有风的时候更冷,当时林昭有肺病,弱不禁风,我们只能在荒坟和密林中寻找一些略可避风的地方。北大宿舍有暖气,但林昭宁肯在寒风中发抖,也不愿早些回到宿舍去,因为只有这一黄昏时刻,我们才能自由地谈天说地,尽情地喜笑怒骂;才能忘记白天的一切烦恼,静静地欣赏茫茫的夜色。从1957年冬天到来年的春天,我们风雨无阻,共同度过了一百多个难忘的黄昏。

当时我们无所不谈。记得有次谈到北大一位右派被捕入狱时,我们谈论起牢狱的问题。认为牢狱的大门为右派敞开着,但

牢狱是人盖的,也是人坐的。右派既然还是人,坐坐牢亦无所谓。并认为:牢狱可以毁掉人,亦可造就人,古今中外有很多名人就坐过牢,有些因坐牢而名闻于世。1962年夏,我与林昭在苏州相见时(当时林昭被捕后保释在外养病),她高兴地回忆起当年的议论。她说,她入狱后,立即想起那次有关牢狱的议论。由于当年的预见,思想有所准备,故在牢中并未感到恐惧。她还送我一张自制的名为“铁窗之花”的书笺。

苏州分手后,她不久再次被捕,我以后则去了四川,从此失去联系。

在与林昭相处中,我感到:林昭对社会生活中的专制现象十分不满,她希望有一个民主自由和公正的社会,她愿为此而摇旗呐喊。但她只是一介书生,比较单纯,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显然认识不足,因而她处处碰壁,屡遭不幸。更遇“文革”动乱,黑白颠倒,致使她死于非命。

林昭去世已三十年,往昔的是是非非,皆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被淡化。三十年后来回首往事,我感到,林昭有值得欣慰的地方,也有十分遗憾的地方。

我认为:林昭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她是不幸中的幸运者。在那个年代里,类似林昭那样形形色色的不幸者何止成千上万,他们大都不明不白地、默默地很快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林昭,活得明白,死得不明白。她的死,曾在社会上博得广泛的同情和关怀;她持久地受到苏南新专校友们的怀念;在北大百年校庆之际,有的回忆北大的文章中,亦提及林昭。林昭在北大只有四年,离开北大已四十年,但北大人并未忘记林昭,因为她毕生的追求,是与北大民主、自由、进步的传统相吻合的。林昭之死所以在社会上有持久的影响,这是由于她悲惨的经历,已成为那一不幸年代的标志之一,亦成为当时众多不幸者中的代表人物

之一。林昭是用血和泪书写自己历史的,她也得到了历史的承认。我想,林昭如九泉有知,当可感到一点欣慰。

林昭聪明,有文才,可惜未有充分展示其才华的机会。更可惜的是:她生前留下的一些文稿,也大多被毁或散失了。1968年早春,我到林昭上海的老家拜访其老母(我们1962年在苏州已相识),她告诉我,林昭留在上海的文稿在“文革”初已散失,手边仅留下她的一首诗。她随即找出此诗。这是一首长诗,诗名似为《普罗米修斯》(或为《盗火者普罗米修斯》),诗中热情地歌颂了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的幸福而献身的精神。林昭母亲去世后,不知此诗由谁保存了。

八十年代初,在北京罗青老先生家,谈起林昭,罗老说,林昭曾将一包文稿寄存在他那里,“文革”开始后,由于害怕而将它全部烧毁了,他感到十分惋惜和后悔。

林昭存放在上海和北京的主要文稿已散失,看来,她存在的文稿不会很多了,我认为,这对林昭来说,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因为人们再也无法全面地了解林昭了。

林昭在被捕抄家时,当会抄走一些文稿和书信。林昭成为右派后,在无休止的检查和思想汇报中,或许会有点什么,但愿这些档案公开后,从中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文革”开始时,我自知在劫难逃,及时将书信、文稿等毁掉,其中亦包括林昭的书信、诗文等。但仍设法保存了她的一张照片,一张自制的贺年卡和三首诗,以作纪念。诗已在《新专校友会刊》上刊出过(其中有些错字),我希望这次新专校友出文集时,能把它收进去,为林昭保存一些残余的文稿。

“此身行作沟中瘠,犹对西风吊落英。”就借用林昭的诗句来聊以自嘲吧。

林昭，您在哪里！

谷 天

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遇事总应该能够比较冷静地对待吧。可是，当我读到悼念林昭的一篇文章时，血管在膨胀，心脏在撕裂，灵魂在颤抖；忍着悲痛，好不容易才读完全篇。

1949年时，当我们都在无锡市惠山脚下就读于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时候，林昭大概是全校最小的小妹妹了。那时，她叫彭令昭，我在一班，她在三班，平时极少接触。但在一些集体场合中，她那光彩照人的风度，清晰敏锐的思维，以及她那发表在校报《新记者》上的一篇篇清新的散文、诗歌，总是极强地吸引着我 and 同学们。那时的林昭，可以说沐浴着解放初期的雨露阳光，生活在苏南新专这一群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群体之中。她热爱新社会，尽情讴歌新社会，愿为之付出一切。在苏南新专，如此强烈的奋发向上、追求进步与光明的氛围，更加使她如鱼得水、尽情展示她那过人的才华。我简直觉得她是同学中待时展翅的金凤凰。

因此，林昭那外秀内聪、天真活泼的动人形象，在我的记忆中永远“定格”。半个世纪过去了，面对残酷的现实，我不由得内

心撕裂地呼喊：

“林昭，您在哪里！”

林昭在“文革”中冤死的噩耗 1980 年我就知道了。那是校友们寄来的一纸“宣判无罪”的判决书。面对那冰冷的文字，我周身哆嗦，真无法想象林昭惨死的情景。等我知道一切真相后，再一次使我受到极为强烈的震撼。林昭面对残酷迫害那样大义凛然，那样视死如归，是基于她对祖国用万千烈士鲜血换来的民主、自由、幸福的无限向往，容不得半点封建的、法西斯行为去玷污。在这里，我想起了张志新烈士。林昭与张志新都为祖国的民主、进步、繁荣付出了生命；林昭所做出的一切，并无丝毫逊色于张志新之处，而林昭却没有得到张志新烈士牺牲后的殊荣。林昭所做出的一切，也在激荡着作为一个“苟活者”的我的灵魂，活生生剥离出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个“小”来。因此，我受到如此强烈的震撼，也是必然的了。

在为人类进步斗争中，有拿枪和拿笔的两类战士。人们说：拿枪的战士为他的追求，会一次洒尽全部鲜血；拿笔的战士却是在为他的追求，一生每时每刻地支付着生命。其实，拿笔的战士在必要时，也会一次付出全部鲜血。林昭就是这样一个为真理一次付出全部鲜血的拿笔的战士！因此，当她预感到自己将为真理而走向绞架时，留下了她那绞索勒着脖子的绝唱——林昭的诗。

我为有舍却性命为民鼓与呼的这样一位同学、有誓死不昧职业良心的这样一位新闻战友而自豪。历史车轮总是摧枯拉朽地向前转动。然而，历史的前进过程中，总还会有许多坎坎坷坷，所以，历史还需要许许多多像林昭这样的战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也像佛家所说的炼狱，冶炼着人生。林昭，她是从炼狱烈火中冲向晴空展翅翱翔的金凤凰！

无 声 的 歌

沈如英

台上像框中微笑的面庞，
像南国的鲜花，
在灿烂的阳光中绽放。
这是我亲爱的昭姐，
——我永远的思念。

我们曾坦诚相处，
那时我们都很年轻。
无忧无虑、单纯热情，
总以为每天都会有明媚的清晨，
让我们像百灵鸟一样自由鸣唱。
面对祖国的春天，
我们的歌声满怀赤诚，
深情缠绵，充满希望。

我们的相聚是那么短暂，

而分别却成为永恒漫长，
但不管时间的流逝，
也不管天人的隔阻，
你追求真理的执着信念，
你豪情如炽的肺腑之言，
像一支沁人心脾、
催人奋进的无声的歌，
永远回荡在我的心田。

当五七年的春风吹拂时，
你真诚地唱起嘹亮的歌。
赞美这春风将荡涤朽叶枯枝，
给神州大地铺上生命的新绿。
谁知这和煦的春风
竟隐藏着狂野的风暴，
它摧毁了善意的良知，
你的歌声被窒息了，
但这无声的歌化作了无形的火种。

待到那发疯的年代，
风刀霜剑横扫人间，
人们噤若寒蝉或假话连篇，
而你在大墙之内
却唱出更加激越的歌声，
虽然声波穿不透那厚重铁窗，
而这被幽禁的歌词
正表达了人民的心声。

恶魔夺去了你不屈的生命，
当我遥望你逝去的地方，
血染的红花正在开放。
你的形象正在升腾，
你那被幽禁的无声的歌，
将越唱越响……

悼林昭七律二首

朱怀真

自别梁溪未再逢，林花谢了太匆匆。
三春偏遇霜侵树，六月果遭雪舞空。
世上无茔埋侠骨，民间有传赞英风。
我来已晚难亲奠，忍向惠山觅旧踪。

今日名园昔课堂，河山依约旧时妆。
碧潭湛湛明眸秀，翠柳丝丝玄鬓长。
鸟啭枝头闻语笑，风行水上见文章。
才华甫露年方好，祸福由谁为断肠。

世路艰难岂可知？阴霾日渐掩朝晖。
空怀壮烈男儿胆，耻作阴柔市侩姿。
屈子长吟湘水泽，贾生曾泣汉宫闱。
于今一一皆昭雪，又见人间泪雨飞。

咏林昭同志衣冠冢

纵无骸骨有衣冠，更有楷模击世间。
碧水长流砍不断，青山永在自擎天。
留芳漫说西施艳，遗臭难销伯轲奸。
岁岁清明人祭扫，春风野草伴啼鹃。

献给林昭

邓荫柯

飞翔的星光

星空是静谧的，也是喧闹的。
——一座多么拥挤的美丽的宫苑。
银河里闪动着白茫茫的光影，
河岸上是一个个星座的家园，
星星们安分地守着自己的岗位，
或许带着几分惬意，几分安闲。
有的得意于光焰的煊赫，
有的惭愧于色彩的暗淡。
有的诡谲地眨着狡黠的眼睛，
有的闪烁着抱怨夜幕太厚的帷幔……
可惜啊，这么多发光的星体，
也驱不散无边无际的黑睛。
忽然一道流星闪过幽蓝的夜空，

这么迅疾，这么灿烂，
一路歌唱，一路燃烧，
向黑暗发出了认真的挑战。
多么短促的搏斗的轨迹，
多么奔放的自由的礼赞，
稍纵即逝的、飞翔的星光啊，
你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温暖，
给盼望光明的焦渴的天宇，
留下了辉煌的，悲壮的忆念。

风 帆^①

从阴暗的铁窗里，
飞出了一只
精致的、透明的风帆。

这么晶莹，
这么美妙，
像战士圣洁的心田。

这么小巧，
这么单弱，
若不胜轻风之吹卷。

这么强大，

① 林昭曾在狱中制作一只玻璃纸的帆船，寄托对自由的向往，今遗物犹存。

这么无畏，
激昂地回答海的召唤。

穿过风涛，
穿过浓雾，
驶向遥远的新岸。

啊，傲岸的英姿，
笔直的航线，
不屈不挠的纤细的桅杆！

壮烈的搏斗，
悲凉的沉没，
你安息在大海的心坎。

大海铭记着
你的信念，你的希望，
你对她热切的眷恋。

怀 念

在浓黑的悲凉里，
你是一盏明亮的灯。
在窒闷的禁锢里，
你是一股温馨的风。
在迷惘的希望里，
你是一杆招展的旗。

在冰冷的沉默里，
你是一曲傲然飞腾的歌声！
在胜利的乐章里，
你是一只激越的钟。
在澄清的玉宇里，
你是一颗闪耀的星。

在柔情的思念里，
你是一个微笑的梦。
在进军的行列里，
你是一名昂首阔步的士兵！

四月的江南

杏花、春雨、江南
水乡姑娘多情的裙衫

草长、花开、莺飞
情人的絮语在东风里飘散……

一记沉闷的枪声
击碎了迷离的梦幻

一个披着长发的南国女儿
寂然地倒在无语的风前

于是，一曲悲歌回响在

多灾多难的万水千山

在土地流血的心坎上
滚过一串急雨似的和弦

一缕带血的长发

女儿静静地仆倒在大地上
无情的风吹动她的长发

不许火葬，也无处掩埋
悲哀的母亲，你有什么办法？

罪孽的母亲，既然这样无用
为什么还生养、哺育了她

你颤栗的双手剪下一缕
带血的、过早灰白了的长发
它紧紧地缠绕在你心头
一朵美丽的悲哀的花

它也呼啸着飘动在我们心头
一支火红的炽烈的火把

你的选择

在专制和自由之间

你选择了自由
在蒙昧和真理之间
你选择了真理
在邪恶和正义之间
你选择了正义
在忍受和反抗之间
你选择了反抗
在屈服和死亡之间
你选择了死亡

你 的 信 念

你的世界是一方
镶着铁边的天空

你的希望是一曲
没有回应的歌声

你的爱情是一场
被撕得粉碎的梦

你的青春是一张
华发映衬的失血的面容

你的信念,却是一座
巍峨的巍峨的山峰

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活着走进会场

——奇观一瞬

郭 煌

在庄严肃穆的林昭追悼会上，
与会者个人心情沉重，喑寂无声，
忽然，一股令人寒噤的凉气袭人，
伴着凉气射来一道白光，
白光中闪出一个女子，
飘飘荡荡走进会场，
她头上青发沾结变褐，
一身白衣浸遍血痕，
脸色铁青挂满泪水，
双眉紧锁两眼圆睁，
呆滞的目光深含屈辱与痛苦，
剑般扫视，似在搜寻。
她是谁？
在寻找谁？

怀中鼓鼓囊囊揣一叠什么？
手上怎么还提一个沉甸甸的坛子？
只见这女子大摇大摆
 飘荡至主席台上，
热泪四溢，鞠躬行礼，
随即掏出怀中鼓囊物撒向会场，
顿时大幅雪片飘落，
众人倒抽一口冷气，
气氛紧张，
赶忙拾起细看，
原来是林昭在狱中一次又一次割开血管，
蘸着自己的鲜血写下的血诗。
众人瞠目咋舌耳语：
“想不到是林昭来了。”
这女子走上前悲凉地说：
“我是林昭，是你们正在追悼的林昭，
冥冥中久违十二年了，
悼词中说我‘怀揣一颗爱国心、忧国忧民，
是个有抱负、有思想、有才华、可望成大器的人’，
不必过誉，也不必痛惜，
逝者如斯夫！没有用了。
1968年4月29日被枪决于上海提篮桥监狱，
一粒子弹永远夺去了我的生命、壮志和青春。
过去我曾多次抗争多次呐喊：我无罪！
今天我仍然抗争仍然呐喊：我无罪！
不能容忍错杀无辜者逍遥法外，
不能让智者稚嫩的鲜血浇筑愚者向上爬的官梯，

我提来一坛沉甸甸的我自己的血，
搜寻，
泼向当年决定枪杀我的那个恶人！
——历史宣判他有罪！
中国应该制定这样一部法律：
对错杀无辜者应该严肃追究刑事责任！”

1993年11月17日

读杜烽《一个不寻常的追悼会》一文有感，匆草。

附：

一个不寻常的追悼会

此文是纪实文。对了解中国当时的历史背景、林昭之死的前前后后，了解林昭的思想境界及性格，了解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类似遭遇，了解中国的坎坷，有参考作用。全文如下：

不久之前，北京召开了一个不寻常的悼念会，有不少名人高官出席参加。譬如：全国政协副主席长聂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列、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罗青、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许觉民等等。被悼念的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女性，名叫林昭。为什么默默无闻的林昭，会吸引那么多名人前来怀念呢？1959年前后，上海出现了一本名为《星火》的地下刊物，上面刊登了很多针砭时弊的文章，对“大跃进”、“共产风”表示不满，对批判彭德怀更是深表反感。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也刊登在上面。这本地下刊物，就是林昭和她的朋友们编印的。这些愿做普罗米修斯的年轻人，当他们看到祖国和人民经受的灾难时，决心为人类偷盗天火，秘密

结社,出版刊物。他们还讨论了“南共纲领”,认为南斯拉夫的经验值得中国参考借鉴,并且写了书面意见,准备寄给各省市的领导人参阅。可惜,他们尚未行动,就都被捕了。林昭出生在苏州。1954年,她以江苏省考分最高的成绩进入北京大学新闻系。在此之前,她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过,还在常州《民报》做过新闻记者。她曾经怀着最虔诚的理想报身革命。可是,在社会活动中,她却看到了另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现实:信任换来了欺骗,真诚的友谊变成了相互的猜疑;真心者不受欢迎,巧言令色、到处逢迎者反而青云直上。这一切都引起了她深深的思索。进入北大第三年,“大鸣大放”开始了。林昭竭力为费孝通写的《早春天气》叫好;她支持流沙河的探索。她在《自由论坛》上大声朗诵:“我是剑,我是火焰!……”她还公然对当时报刊上流行的封什么“绝对权威”表示怀疑,并且预言:“‘绝对权威’只有利于教条、宗派……”(林昭预言以后,中国近十几年历史进程的畸形现实,完全证明:林昭之言是有见地的,正确的,准确的,高瞻远瞩的。——引者注)林昭在北大这个民主摇篮中觉醒,但也从这里跌入了深渊——她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右派”的荆冠并没有使她屈服,她给妹妹写信:“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她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维系我的一切全垮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还惨……”在悲愤之中,林昭向一切启蒙过她的人发出了责问。她写信给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老师:“你们为什么当时教育我要诚实、坦率,而没有教我如何做人!?”终于,她从悲愤走向绝望,她在绝命书中写道:“我的悲剧是过渡时期的悲剧,人们只看到我流泪,却看不到我心头在无声地流血……”她对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用别人的血来“染红面貌”的人深恶痛绝地

说：“我不爱也不能爱所有的人，那些折磨过、践踏过我的人，愿我死后影子永远缠住他们，撕咬他们。让他们永远记得曾出力把我拉开生活，杀死我。他们身上永远染着我的血。”林昭自杀被抢救后，她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她又质问北京大学领导，义正词严：“蔡元培先生当年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运动中被捕的学生，你呢!!!???”“反右”运动结束后，林昭被送去“劳改”，后来又因病遣送回上海的家中。她和朋友们编印《星火》，就是在回沪养病这段时间。1960年10月，林昭被捕入狱。1962年初，她因病“保外候审”。虽然母亲苦苦劝她安分养病，但她为了忧国忧民的理想，又执意去搞结社活动，同年12月，她再度被捕。在监狱里，林昭坚决不认罪。她一次又一次地割开血管，蘸着自己的鲜血写下了很多血诗。现只抄录两段：

“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洗吧！
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
谁能抹得去？！”

“啊，大地，祖国的大地，
你的苦难，可有尽期？
在无声的夜里，
我听见你沉郁的叹息。
你为什么这样衰弱，
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
为什么你血泪成河，

为什么你常遭乱离？
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
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

1968年4月29日，在“文化革命”的红色恐怖之中，林昭终于被枪决。当她接到判决书的时候，她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十二年过去了。这个含冤而死的普罗米修斯灵魂终于得到了昭雪。在为林昭举行的悼念会上，她在狱中写的一首血诗，被与会者久久地吟诵。

以上是全文。

林昭被处决后，她的父母相继暴卒。人亡家破。她有一妹妹，于1980年赴美国转赴加拿大。有一弟弟，下落不明。这些情况是当代女诗人、女作家、研究外国文学的专家张玲根据回忆提供的。张玲与林昭同为北大新闻系的高材生，同级，同寝室，不同班，都是五十年代北大诗坛的活跃人物。她酷爱写诗和散文，造诣很深，在北大曾主编过很受欢迎的促使新星飞升的文学杂志《未名湖》。她如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依然朝气蓬勃，在国内、国际文坛上十分活跃。

附录：林昭追悼会纪实

1968年4月29日，我们的同学林昭在上海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杀害了。事过十二年之后，冤案终于获得了平反昭雪。1980年12月11日，林昭生前的老师和同学在北京举行了悼念会。

悼念会场庄严肃穆。林昭同志的遗像簇拥在由菊花和翠柏编织的花圈之中。由于林昭殉难后家属无法得到骨灰，桌上的由塑料盆内存放着她生前留下的一束头发……会场四周陈列、悬挂着鲜花和挽联，以及题为《她曾经和我们在一起》的一组学生时代的照片。

上午十时，在《光荣的牺牲》的乐曲声中，全体肃立，向林昭的英魂致哀。

前苏南新专教育长、前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列老师首先致悼词。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前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同志、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罗青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许觉民同志也讲了话。

在追悼会上发言的还有苏南新专学生会主席林斤澜、新专

在沪同学代表倪竞雄、新专在锡同学代表金易东、中国人民大学同学甘粹、北京大学同学张玲、邓荫柯、王瑾希、张元勋和陆拂为。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同志也在悼念会上发了言。大家在会上回忆了林昭献身真理的事迹，朗诵了悼念林昭的诗歌。

林昭的老师杨晦、杨佰峻、乐黛云、于效谦、张隆栋、伍福强，新专同学朱宝寨、林楚平、谷飞、董二周、焦玉英、肖风、唐绥臣，北大同学刘绍棠、张钟、曹先擢、杨扬、吴翼明、宁凡、张智楚、吴尚宇、文秉勳、张佳佩等八十多人参加了悼念活动。

悼念会筹备组收到上海、苏州、常州、无锡、南京、杭州、广州、梅县、长沙、兰州、哈尔滨、长春、成都、乌鲁木齐、文原、银川、盐池等地发来的唁电唁函三十余份，挽联和挽诗三十余副（首）。北大教授张谷若、上海《解放日报》胡子衡、江苏省作协高晓声、陈椿年等都撰写了挽联。

我们谨向未能来京参加悼念会的林昭同志生前的老师、同学、好友、亲属致谢。

苏南新专、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部分师生，
林昭同志悼念筹备组

1981年1月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